THE RED WHEEL

【俄】亚·索尔仁尼琴 著

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

武学善 张达明 等 译

红轮

往日叙事

Yesterday's Story

第一卷 ③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俄】亚·索尔仁尼琴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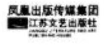
武学善 张达明 等 译

红轮

往日叙事

Yesterday's Story

第一卷 3



Part Three

第 三 部



第六十五章

(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

对于一个有进取心、意志坚定的人而言，他生活的主要目标、未来生活的核心和意义在人生的最初年代就已经形成，虽然常常是无意识的，却是确定的和牢固的。而后，培育和发展生活的核心不仅要靠我们的意志，而且环境本身也起着积淀作用。

斯托雷平就属于这样的人。据他回忆，他少年时代生活在莫斯科近郊谢列德尼科夫。他认为，生活在俄国土地上的俄国农民，应当精于拥有和善于利用土地，以使他和土地都能得到好处。

农民子弟这种对土地、耕耘、播种和收获的强烈眷恋情怀，意想不到地表现在侍从武官之子、元老院议员之曾孙的身上，斯托雷平的先人中有苏沃罗夫，亲属中有莱蒙托夫。无认知、无意识、无意向，恰恰是这种合二为一的强烈感情，俄国土地与俄国农民密不可分，而俄国土地和俄国农民又与俄国密不可分。没有了土地就没有俄国，对俄国命运的担忧，完全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对祖国怀有诚挚的同情心以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对祖国矢志不移的爱，虽然这种爱总的来说是一种温情，然而其中还渗透着橡树般的坚定性，这就是生活。

这种对土地的眷恋情怀，在他当过骑兵近卫军官的爷爷身上早已显现出来了，从他爷爷的遗言当中就能明显看出：如果不把农民从农村村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农民就富裕不了。如农村村社操纵包办一切，每一个农民要为大家负

责，实行强制性的平均主义，令人沮丧的不定期重分土地、某些毫无成效的改良措施以及耕耘和播种的地块，过长、过窄、过远，过于不合理。从附近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土地上来的人，也不服从这种令人寒心的大俄罗斯耕地的交错混杂规则，虽然你也许会为农民世世代代建立起来的划分和重新分配所有不可能完全相等的、不可能一律平整的和完全一样的耕地艺术而感动。

明白这个道理非常容易，复杂之处在于人们既没真正领悟其要害，也没有得出结论。主张土地重新分配的农村村社妨碍土地丰产，没有偿还欠下大自然的债务，也没有尊重农民本身的意志，更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土地应当成为农民稳定的私有财产。从另一方面来看，那就是采取中庸之道、折中的办法，强使个人意志与农村村社意志保持一致，相互掣肘，都受约束，难道就可能产生比丰收和富裕更高的价值吗？或者说，发展私有制可能不如人民所期待的更好吗？农村公社不仅对人民实行约束性的监护，还可能关心人民的生活观念和宗教信仰？是给予人民行动自由并给予他所需要的足够份额的土地，以使他能挺起胸膛走路，还是使他仍处于自古以来得不到自由的地位，并意识到他自己只不过是作为公共福利的微末碎屑，只能梦想有朝一日灵魂得以超度呢？对这个问题所产生的分歧，不仅在农村村社内是巨大的，在整个俄国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如果只是思考这一点，那就不能采取行动了。斯托雷平始终是现实主义者，他的思考和行动是一致的，他绝不要求人民十全十美。我们不可避免要将土地私有化，就像一切尝试都要通过生活本身检验一样，况且农村公社在农民中间引发了不少纠纷。

虽然我们对斯托雷平和他的生活业绩的必不可少的短文尽可能认真求实、简洁精练，但为满足最好奇读者的愿望，作者还是保留了一些细节，其余部分可随意在最近的大字体中找到。如果说俄国历史本身遭到了严重篡改，所有历史回忆录遭到严重歪曲，史学家受到迫害，那么作者也不允许自己如此严重地破坏小说形式。

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承担研究这个课题的重任，但所有人都急切地维护他们喜爱的理由，即俄国土地公社是俄国人民最好的精神创造。农村土地公社自从

留里科和戈斯托梅斯尔时代一直存在，只要俄国人民一息尚存，它将永远存在下去。阿门！还必须驳开一层幻想的迷雾，农村村社在俄国亘古即有之，但17世纪以前并不存在强制平分土地。农村村社是教会小教区，它管理教堂、选举牧师、选举德高望重的人做地方审判官，维护法典，帮助孤儿和孤寡老人，但从来没有强制平分或重新分配土地权，而且斧头、大镰和木犁所到之处，那块荒地就归农户所有，可以买卖，也可以继承。

然而，自从罗曼诺夫王朝当权之日起，他们就越发积极地推行这种控制农民土地的政策。按照沙皇的旨意赠与或赏赐，农民镰刀和木犁耕作下的土地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主的土地。彼得大帝又推行他残酷的人头税制，并责成地主征收和追缴。为了顺利征收人头税，需要按课税单位平分土地，意思是说要不时地重新分配土地。于是乎，在大俄罗斯一国建立了农村村社，也就是所谓的“人民亘古以来的精神创造物”诞生了，而且今天仍得到方方面面的人士喜爱。国家官僚机构喜爱是因为便于收缴人头税和维护农村秩序；土地自由党人、民粹派、社会主义都喜爱农村村社，认为它几乎就是俄国农村的现成的社会主义形式，考古学的圣地，进一步发展就可以共同耕作，共同使用产品，从今天的农村村社可以自然成长为全俄国最理想的土地公社。

不错，农民解放了，但农村并没因此而繁荣，反而衰败了。随着农民解放，出现了一种类似“死亡地带”。耕地没有扩大，居民增加了，人均耕地减少了。俄国中央部分的困境在于农民怨声载道，土地不足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不过，俄国农民拥有的土地面积，为英国农民的4倍，为德国农民的3倍，法国农民的2倍半。只是土地利用率低下，即农民对零散的、不能继承的地块耕作并不热心，每俄亩本应收获80普特，而这些地带只产出40普特。农村村社并不保护任何人的利益，但挫伤所有的人的积极性。任何一户的当家人都不准从事他所有喜爱的特殊经营活动，所有人都应遵守统一的耕作方式。虽说名曰“农村村社”，实际上应叫“零碎地块加三区轮作制、无权选择耕种品种甚至无权选择耕种期”的大杂烩。反正大家都一样，任何地段也不需要投入过多的辛勤劳动和足够的肥料，因为这块土地很快就要再分配，也许分给一个游手好闲的懒汉。

土地不足本应精耕细作，可惜并没有，对土地漠不关心成了风气，甚至闲来酗酒滋事。农民心中渴求的不是改善自己的土地，而是总想从哪儿再弄到更多的土地。

如果土地不再生产粮食，应当改造土地使其生产粮食，而绝对不能引导人们过非人的生活。

由于关心土地和土地产出，斯托雷平上大学时选择了彼得堡大学自然科学系。正因如此，学生时代没有引起他参加任何活动的激情。毕业后他步入国家公职岗位，进了农业部的一个委员会工作，那是亚历山大二世实行农民解放改革时期。后来，斯托雷平先后担任县级贵族代表，省级代表，进而担任省长。所有西部省份农民的土地都实行户税制。因此，斯托雷平观察到并确信，此种税制是富有成效的，而那里的农村公社只是说农民通过和平谈判分配土地、从大村分为独立的庄园。他感到这个办法很好，处处都能按照自己的爱好和偏爱行事，无论农业工具的存放，还是农业组合、播种、收割、栽培、牲畜；有自己喜欢的资产，骑上马溜溜，穿上高筒靴子和不透雨上衣，穿过秋天泥泞的田野。在这个特殊时期，大地只同干活的对话，对所有郊游的人来说，都是避而远之，心怀不畅。

当时，他已是俄国最年轻的省长，年方四旬。同时革命者杀害了现任内政部大臣普列韦，由此引起的人事大调动中，斯托雷平突然被任命为大省萨拉托夫省长，也是革命最为蓬勃发展的省份之一。该省左翼党派都很富有，毫不吝啬地把大把大把的钱花在报刊和宣传品上，对各级政府抱有一种狂热的对抗情绪，一旦省长出现在他的包厢里，他们就会马上摔椅子，扬长而去。在革命最混乱时期，出现这样的局面，一旦发生群众骚乱，省政府就迁离萨拉托夫，"影子"政府的管理权落入低级行政官员手中（而且有些得过沙皇授勋的高层官员表现出了机会主义倾向）。萨拉托夫的社团与俄国其他地方的社会团体的明显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认为并大声宣扬他们具有毫无疑义的合法性，而政府从未调动过军队，因为觉得似乎无疑是犯罪而作罢。突然一个新的省长露面了，他身材高大，大块头，行动果敢，威武专断，不像那些夜里在家吓得睡不着觉的孬

种，他不带卫队，单枪匹马，走到广场狂暴的人群当中去，把自己的外套扔给举着粗木棍子朝他走来的青年说："接着!" 他使足了劲高声劝说群众散开。当另一群人怀着极端的爱国主义情绪，在巴拉绍夫占领一座楼，一群知识分子讨论政治决议时，斯托雷平又只身干预，挽回了局势。当他挤进人群时，一个暴徒用酒瓶打伤了他早已有伤的右手。

20世纪的头几年，也就是1901年，1902年，1903年，俄国染上了一种日驱严重的危险的"恶寒症"，并且病入膏肓，原本应当有步骤地进行认真治疗，可就在这时，又好像患上了"肺穿孔"，居然宣布对日本作战。

一个不仅忠于职守，而且忠于君主制度原则的人就应该自然地遵纪守法，让他所有的疑虑和怨言慢慢地在内心消融，即使内心彻底失望，表面也要保持精神饱满。战争起源不清，战争是否不可避免地按照俄国意志进行也是个未知数。因此，很难激起发自内心的自我牺牲热情，也更难鼓动别人做出牺牲。既然沙皇发出号召，每一个祖国之子民就应当响应。

在先进的省份，对当局的刺杀行动也是先进的。在1905年那个狂暴的秋天，在斯托雷平的萨拉托夫的宅邸，政府派来镇压叛乱的侍从武官长萨哈罗夫在炸弹爆炸中身亡。

第一次刺杀斯托雷平是在同年夏天，当时他正视察省情，在一个普通的村庄，有人向他连开两枪，斯托雷平亲自追赶开枪人，但枪手还是跑脱了。第二次刺杀他是在剧院广场，面对群情激昂、满怀敌意的群众，有人从三楼向他脚下扔下一颗炸弹，造成数人死亡，而省长斯托雷平毫发未损，继续劝说群众散开。第三次，同样在众目睽睽之下，刺客的手枪直对他的胸膛，斯托雷平甩开大衣，大声说："开枪吧!" 吓得刺客丢下了手枪。最精彩的莫过于几封匿名信：小心点，毒死你两岁的儿子! 他唯一的儿子。

但是谋杀行刺并未使斯托雷平处处小心提防，也没能阻止他我行我素，反而更坚决地巡视省情，哪里社会动荡，频频闹事；哪里左派最鲁莽，最大胆妄为，他就到哪里去。他经常赤手空拳到激越的人群中去，既不叫喊，也不进行威胁，只是以平心静气的声调，稳健镇定的态度，耐心地向群众做解释。对于

他生命的内在核心而言，他只能向农民做说服工作。他特别喜欢面对面、直视对方的眼睛做解释，这种工作方式已经被俄国官员忘得一干二净了。要瓜分地主的土地吗？“特里什金长衫，不是量体裁衣。”即使真地分了地主土地也不会富裕多少；可是没了沙皇，我们都会变成乞丐。在农民面前，他取得了极大成功，他们倾听他的善意劝说，有一回在一次暴乱的集会上，结果要求请一名神甫为沙皇祈祷。

年轻的萨拉托夫省长越想越明白，俄国面临的威胁，不是文化界游行示威，不是大学生闹学潮，不是革命者扔炸弹，不是工人大罢工，甚至不是边远省份的武装起义，俄国面临的最可怕的威胁是农民起义。自发的怒火、骚乱、暴动，这一处火烧庄园，就能把农民的目光引向另一处庄园。正因如此，1905 年萨拉托夫省像患了传染病一样，不断发生纵火事件。因此，大地主都逃离了他们的庄园，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进行一场原因不明的纵火战争。与此同时，细心的观察家多多少少可以看出，这一切完全不是人民意识接受革命思想的结果，而是农民生活中某种根本性混乱引起的绝望情绪的总爆发。这种混乱状态的绝望情绪正是通过这一孔道深入农民心灵，甚至在 1904 年这个大丰收年，农民不是把他们的大部分收入用在改善生活条件或投入改进耕作上，而大多花在酗酒上面。究竟是什么妨碍农民不尽心尽力改善他们的处境，强化他们谋生之道呢？这种障碍就是他们不能真正拥有土地，而土地正是农民梦寐以求的。农民的前进道路被阻断了，农民自己也被农村公社所有制鲸吞了。俄国的前途命运和拯救俄国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停止烧毁庄园，消除引发农民愤怒的根源。但这不是采取严厉惩治手段，也不是调动军队镇压，而是为农民开辟一条自由地尽其所能利用土地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自我温饱有余，并可以满足他们的劳动目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提高耕作技术。

每逢年终，以陛下的名义诏各省省长要求各自做省情报告。历年总结报告，斯托雷平都按捺不住在报告中提出他有关农民和土地问题的内心思考。1904 年末，作为萨拉托夫省长，一改所有官样文牍形式，在报告里写进他所钟爱的观察结果和深刻体会，力图使读者（想象中的陛下本人）相信，必须寻找一条途

径使农民脱离农村公社，成为独立的劳动致富的居民。而这些土地的稳定拥有者代表可能成为稳定国家秩序的王牌支柱，对抗城里的那些轻率的理论家以及他们的破坏性宣传，成立一个与他们对立的坚强的农业党。

整个生命的早期种子必定在什么地方生根发芽，这是不足为怪的。终于，鲜活的根茎穿过厚厚的官方总结报告，破土而出。但是，上百份省长报告一律集中在彼得高夫，进行了精美、豪华的装订，而后束之高阁。所有报告的命运，并不指望沙皇动手翻阅，也不指望有人认真审阅。俄国的历史有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君主并不是一位勤奋认真的读者，也不是思想家，但是这一类文牍他都翻阅（听从何人的忠告，已无可考究）。这颗种子的根茎打动了他那颗尚未冷漠的压抑又羞怯地期望为人民富裕寻找一条路的心，只是这个根茎还太弱小，只能使国王的视线和动作变得更为柔和些罢了，留下一个好的印象。3年后斯托雷平暗示：

……当对俄国未来的信心动摇的时刻，当诸多理念遭到破坏的时刻，只有陛下对俄国农夫力量的信心没有动摇过。

当然不甚明确，但也正是俄国土地的基本联系，应当在它生死攸关的时候才显现出来；正因如此，才容许在此推测这种“链”的存在。

1906年4月，一份召见急电从彼得堡发往萨拉托夫。陛下亲切地接见了斯托雷平，并对他说很久以来便注视他在萨拉托夫的工作，认为他是一位难得的行政官员，打算任命他担任内政大臣。

国家成万上千的各种任命，几乎总是错误、短视甚至毫无意义的任命，因而1906年4月26日在第一杜马办公室这项任命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此时正是第一届杜马召开前夕，第一部俄国宪法颁布后第三天，俄国新杜马时期的交会点上。杜马来了，可政府要以什么姿态迎接它呢？

斯托雷平左右为难，这次提升是没有预料到的，他不准备接受这个重任，也不准备参加这个政权。不错，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也知道自己是天生的领袖材料，他多方面的思考领悟能力远远高于其他省长，但是……

“陛下，这项任命有违我的良知，陛下对我的恩宠超越我的能力。现任命

我为辅臣，我怎能胜任陛下的信任呢？……我也不了解彼得堡以及它的派别和影响。"

不，皇上这次没有动摇。

不过，这个赏赐令人讨厌，因为前任两位大臣都是在位时被暗杀的。

斯托雷平的思考领悟力大大高于其他省长，他明白，如果没有一个具有强硬手段和顽强意志的救世主出现，君主政体必定要灭亡。斯托雷平的确不是以一名首都官员而是以俄国外省的意志坚定的使者姿态出现在彼得堡。在会议上，由于他是外省人，大臣们都紧皱眉头。

通向内政大臣职位有两条路线，一是通过警察的阶梯向上爬，一是从政务的阶梯高升。提升的路线影响向第一条路线或第二条路线活动的偏重。斯托雷平的整个思想是国家整体性的。首先应当实行另一种警察作战方式，而这样的作战方式是俄国革命还没有遇到过也不希望遇到的。

第一届杜马议会召开了，代表们信心十足，坚持不懈地反对任何立法草案通过。当有人从讲坛上宣读全国各地发生过多少恐怖分子暗杀事件时，有些代表在他们的座位喊道："不多！太少了！"杜马比俄国本身更专横。杜马开会，不是在各个委员会深入考虑枯燥的立法工作，也不是批准和修改法律草案和预算案，而是联合起来高声叫骂，驱逐、搞垮政府，摧毁君主制，为俄国开创一条通向光辉的共和制道路，由名牌大学英才和群众集会涌现出来的天才，在心地善良、满头华发的穆罗姆采夫教授领导下的共和国。这届杜马的第一项决议，就是要求剥夺并平分地主土地，要求撤销第二国会参议院，为得使杜马更自由！公开要求政府辞职！还要求立法会议讨论修改宪法（在杜马之外，这项要求认定为刑事犯罪），并向社会许诺将来采取新的革命形式！在杜马里坐着的，几乎都是公开社会革命党人、恐怖分子、不合法政党的合法代表，最多的还是立宪民主党人，两个首都和十几个最敢说话的城市知识分子精英，他们总是以其才智的优越性战胜庸庸碌碌、腐朽无能的政府。看来，政府既没有一个演说家，没有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给予他们出其不意的迎头痛击的是谁也不认识的斯托雷平。他不是将军，

也不是官僚，更不是德高望重的前辈，只是一个普通的青年担当俄国大臣。他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上杜马讲坛，他体魄健壮、凛然威风、相貌堂堂、浓眉重发，他能言善辩，不让反对派演说家分毫，他以活生生的思想、坚定的立场提出自己的独到观点，以理服人。而他的思想既不是官方创造的，也不是经年积累，更不是抄袭他人的。他以其合理性来说服人，而这种合理性不容反驳，不容嘲笑，不容拒绝；他自信任何一个拥有健康思维的人不能不同意他的观点。于是，左派阵容动摇了，激怒了，跳起来大声吼叫，捶胸顿足，跳到桌子上大喊“辞职!”

斯托雷平并未屈服，反而更镇定。他可能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这类人士，按照人口统计数字，他以为在这里面对一个农民的杜马，原来竟是这样的杜马。因此，他要严肃对待，争取说服他们，绝对不能迁就他们装腔作势的风格，绝不能在这类有损尊严的“爱国者”面前感到羞愧。当他们集结在一起大肆宣扬暴乱的时候，斯托雷平号召他们耐心地为祖国工作。暴乱在许多主要城市发生过，虽不是教授的博学所能引发的，可是却能唤起农民去夺取地主的土地，那时会纵火，大喊大叫地进行屠杀，进而推倒王位，俄国成为幸福民主的共和国。斯托雷平依旧牢牢地依靠这条农村小路反对杜马，不是土地赠与，也不是无秩序地平分土地! 如同一切成熟的历史性举措一样，在斯托雷平之前，农村公社改革都是上层来构想的，斯托雷平是对公社改革投入整个意志、整个信念和整个命运的第一人。而在今天，当革命如火如荼的时期，农村公社改革已经成为国家生命攸关的需要。斯托雷平在杜马会议上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论什么样的平分土地，总体来说俄国不会因此富足起来，只能使农户破产，谷物减产。他列举了农民根本不知道的土地统计数字，从来没有一个当权者，没有一个来自世袭领地的人向人民说明这一点，立宪民主党人有点烦心，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和不掌握这些数字：官地为 1.4 亿俄亩，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冻土带和沙漠，余者是农民土地；农民的土地共有 1.6 亿俄亩；贵族领地共 5300 万俄亩，大部分是林地，即使全部土地分成小块，农民也富裕不起来。所以，不应当平分土地，也不能用赠地的办法平息暴乱。土地，不需要彼此你争我夺，而应该在自

己的耕地上采用另一种耕种法，那就是学会从每俄亩收获的不是35普特谷物，像优秀经营者那样收获80到100普特谷物。

为堵住左派的口舌，在杜马里和杜马之外都能听到他的论据。

"政府乐于农民富裕、殷实；那里农民过上富裕小康生活，那里的人们受教育程度高，那里才真正享有自由。为此，必须为有本领、爱劳动的农民和俄国的精英施展才能创造条件，必须把他们从目前的各种桎梏夹击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摆脱过了时的农村公社的各种束缚，给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

为堵塞右派的口实，他说：

"地主们都不希望自己的邻居是饥民和纵火者，而希望是安分守己的人。农民，一旦没有自家的土地，他们就不再尊重其他任何人的财产。"

他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财产状况了解农民的贫困处境。

全体城市居民和所有立宪民主党人从各个方面维护农村公社，而农村公社对一些人来说，是根本不需要的、不可理解的、完全无关的，只是出于一己利益和政治游戏的需要。

同年6月末，政府向居民发出告示，打算讲明改革的实质；而在7月初，杜马通过决议，绕过政府直接向居民许诺，杜马寸步不让，绝不在强行夺取私人土地的原则上妥协!

杜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这不啻是立法机构直接向合法政府发出挑战，农夫们，去夺取土地，杀死地主，开始私分土地! 可惜，他们的政治日历和自然日历不吻合，农作物尚未成熟，要马上收割，不是等于放一把火吗?

到底是什么缘故促使杜马做出这样愚蠢的举动呢? 此事是斯托雷平出席彼得高夫咨询会议在其他人中间引起的，同时他也明白，陛下身边一团糟。杜马对待政府极其无礼，要知道它是人民的杜马，岂能不效忠人民的沙皇，乃至亲近人民的沙皇? 人民扬言要夺取地主的土地，那就身体力行呀! 杜马与杜马中立宪民主党的议会领袖秘密谈判，后者极想夺取政权，但没有做出重大让步。与此同时，因因循守旧又加上年事已高，为官期间饱经风霜的戈列梅金，难以为政府掌舵导航，极欲交出权柄，他本人坚持推荐斯托雷平继任。这次任命对朝

廷而言，如雷贯耳，受到极大的震撼。因为首席大臣的任命，要选择高级别、获得奖章的数量多。与所有近臣保持足够的亲密关系。无人怨恨、殷勤助人者。斯托雷平那个采取果断措施的施政大纲与另一位总理大臣候选人德米特里·希波夫的温和主义施政纲领碰了车。

爱人民的方式各有不同，这就使我们采取的方式方法千差万别。希波夫，卓有建树的养蜂学家，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士，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人民的圣像捧侍者的角色。希波夫坚持与人为善的观点，他认为所有人的本质都是善良的，人民是善良的，只不过是我们不善于使他们的前途更繁荣发达而已。同时，他还拒绝沙皇在立宪民主党人比杜马占多数的情况下，由大臣办公厅领导政府，他认为理应由人民当选者立宪民主党人来领导国家。因而，他反对解散杜马，不仅是因为这一举措具有爆炸性危险，而且是杜马工作无能，工作不负责任，具有造反倾向，那就让杜马继续犯错误！一旦杜马不能领导俄国，顺其自然发展，人民就会知道人民的当选者的错误，从而在下一次选举中加以改正。

斯托雷平说，在检验其错误之前，整个四轮马车就翻了。俄国面临的最大危险莫过于我们无能，绝对不能低三下四地模仿西欧的土地制度，要有勇气走自己的路，正确的思想并不多，但必须表明为实现这种思想的意志。

希波夫反驳说，信心十足和成功的行动也不是一切，高于它的应当是高尚道德的世界观的底蕴，他责怪斯托雷平恰恰缺少这种底蕴。

7月初的那几天，像平时常常发生的那样，彼得堡的平静生活又决定了俄国政治生活的另一个焦点。要解散“国家杜马”吗？此举能否引发痛苦的革命风暴呢？不解散杜马？任其狂妄胡为？

斯托雷平只参加两三天彼得高夫的咨询会议，目的是决定实行伟大而又痛苦的统治。他清楚地了解，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遗产，几十年疏于国家建设之后的混乱局面，几个月对四处横行的革命节节让步之后的困难局面。

斯托雷平的论据虽然说服了陛下，但陛下还没有宣布解散杜马，也没有在诏书上签字。任命斯托雷平为大臣会议主席的决定已做出，他正采取种种措施

以应付这次任命后引发风波骚乱造成的后果。两个月前他还是省长，如今一步登天成了总理大臣。

去年秋天，在萨拉托夫，和当时其他省长以及所有省政权一样，斯托雷平也因1905年10月17日的宣言感到过分突然而弄得狼狈不堪。这不仅是因为宣言颁布之先没有任何暗示、预告，而且宣言颁布本身也十分荒唐。宣言本文的个别段落以单独方式，而不是通过政府发布，在当地私人印刷所印制，张贴在犹太人开的小铺橱窗上，引起城市民警注意，使地方政权手足无措，而文化界手舞足蹈。人们聚集在省监狱门前，使当局日夜战栗不安，致使行政当局的释放令比监狱管理局的释放令提早两天公布。

宣言从一旁的猛烈冲击扭转了千年航船的整个历史航向，好像过分仓促、旋风般脱离了专制君主的控制；或者君主还没有来得及细读第二遍？为何如此匆忙，犹如大难临头，急不可待地抛出来。什么灾难？真像萨拉托夫、阿尔罕戈尔斯克、科斯特罗姆等地人们理解的那样吗？地方政权不仅没有准备和发送解释文件，而且宣言内容本身也没有包含任何一种完整的法律文件，只是堆砌了一些空头许诺，几乎都是口号，首先是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而后是选举"国家杜马"。

"必须吸收那些目前完全被掳夺了选举权的居民阶级参加选举。"

是否表明真的有普遍平等选举权了呢？为什么寥寥几个字还拐弯抹角不肯直陈，然后又急忙说：

"应当确立一项不可动摇的原则，任何法律，得不到"国家杜马"认可都不能生效。"

尚不知未来的杜马如何选举，就预先轻易肯定那个未来体制的恒定不变，急急忙忙钻进圈套，就把它套在脖子上了。而那个杜马选举法本身就姗姗来迟，两个月以后才面世。由一组老态龙钟、昏聩无能的国家元老起草的杜马选举法，依旧是匆忙之作，考虑欠周全，十倍的错综紊乱，既不是普选法，也不是等级选举法和资格选举法。例如，为取悦工人，甚至许诺让工人代表在杜马的席位与全体代表分开，以突出他们的特殊地位。

即使说选举法不是惊慌失措和仓促从事的结果，其中存在的主要错误也是根本性质的。首先，一个泱泱大国，一个堂堂正正独立自主的俄国，不能也不应当不顾自身的独特历史和完全不同的生活理念，不能强使自己去适应别人，例如毗邻几个文化发达的欧洲国家，并用以制定选举法的游戏规则。另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是误以为本国全体农民、市民和商人的需要正是某些大城市中那些没有根基的小群体大声疾呼所要求的东西。第三个根本性错误是以为在全体居民受教育程度不同、习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条件下，时机已成熟，总的来说可以制订这样一部选举法，以使全体干粗活的劳动大众派出真正符合俄国气质和精神的干粗活的代表进"国家杜马"，千万不能让那些玩弄辞令、咬文嚼字、假借代表全俄名义的伪权利，尖酸刻薄、放浪形骸的特殊贵族半路偷换掉。农村选举总的说来几乎是普选，经过两级和三级选举，就会发生偷梁换柱，暗中换代表的事。由于貌似简化程序，没有规定实行县级选举，那里汇集了不同等级的候选人，彼此间都熟悉，以本县整个名义代表参加省级选举的人，还能代表本县利益，他们都是本县熟知的、有资格的土生土长的活动家。反之，如果本县不同等级的候选人直接去省级会议，就会湮没在不认识的人群当中，特别是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又不熟悉整个选举程序，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立宪民主党人就可以在省级选举会议上随意蒙骗他们。于是他们全忘了本县利益，在阶级特征上定错了位，这就为巧言善辩的政治头面人物造成了可乘之机。这样一来，依靠农民之说就化为乌有。这种偷梁换柱的把戏，几十年来注定使俄国的真正代表在俄国国会里不能代表俄国。因为真正的代表的困窘之处在于，要想做个名副其实的代表还必须提高自信心，提高文化水平，能言善辩，要有广阔的视野，有参与国家事务的经验。在现实事务上发展各级自治制度，尤其是乡一级自治，对于俄国的社会生活或许不是最重要的政策或良策，因为自治制度实行已经迟到了 40 年。

按照宣言的许诺，在彼得堡召开国会，占全国 82%的农业人口的代表不是 82%。当局害怕农民代表数在国会占优势，认为农民是乌合之众，他们的立法意志尚不成熟，结果国会席位让有组织有文化的知识分子独占了。俄国国家政权

由于同害怕农民的有产贵族是共生关系，过去沙皇统治时期和今天，也一直不信任农民，现在用国会来装点门面，同样故意歪曲农民的正常成长，不信任俄国的真正本质和俄国唯一的有希望的未来乃是历代统治者的通病。

1905年10月17日宣言，不仅匆匆草就，缺乏深思熟虑，而且模棱两可，采取四面见圆、八面见光的骑墙态度，而后这种两重性的做法又被吸收到1906年4月23日颁布的宪法框架（为了不刺激陛下的视听，名曰“基本法”）之中。宪法似乎在限制专制制度，又好像试图保留专制制度。宣言只是进一步敞开了革命大门，而今新上任的总理大臣，在宣言的庇护下，合法政府采取合法手段，将关上革命大门，政府凭借宣言的绚丽多彩的彩带裹着双手把鲜活的俄国从混乱之中解放出来。斯托雷平上任伊始也没有弄明白在这样的条件下首先应当寻找什么。俄国不能制订一部首先分化唯一政权的宪法，他现在应该第一个关心宪法，自己研究了并请教他人，将以极不平常的折中方针引导俄国前进；他立志要忠诚地、坚定不移地完成这一任务，并且目前只接纳同意新宪法体制的人员入阁；他心里明白，马上要冻结敌人的两翼。极右派，他们希望废除宣言，回到不受监督无拘无束地管理国家状态，还有俄国式自由自在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不希望改变航船航向，只想使航船对面一侧遭受失败，并压制敌人。

斯托雷平作为省长和总理大臣，对俄国今天整个江河日下、摇摇欲坠的局面有深刻地认识。俄国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完整而稳定的国家，革命阵营里也很难联合起来，几乎是摇摇晃晃地艰难行进，整个环节处处崩溃，长期经营的个别构件已经锈蚀了，脱开，互不相连，各自为政，甚至有些构件已经消熔了。今天的革命，也以“全部土地和整个意志”取代昔日的土地和意志，只是坚持稍稍离开宣言的意志一点，而土地将来要全部彻底夺取，不论谁一块也不留。

现存的有关结社自由的法律似乎太宽了，各种团体（如工程师、律师、教师联合会）自由地活动，甚至不想求得合法地位，即使向他客气地提供。出版更是自由的，不必经过政府核准、放任自流。于是敌视政府的人士便利用出

版自由来腐蚀人民。少数合法刊物也不加评论地转载《革命号召书》一类的东西，任其胡言乱语，转载不合法会议的随意决议。全俄工人代表苏维埃，知识分子发表破坏性号召书，整个社会情绪混乱不堪，所有谣言和诬陷之词，只要是针对政府的，一概相信无疑。舆论界也采取偏袒的态度，不负责任地刊登这类诋毁和不实之词，事后也不加以批驳和更正，舆论界的权力要比政府的权力大。

在各大学隐藏着革命出版物的仓库、武器、实验室、印刷所和革命组织的执行局。警察当局哪一次染指大学，整个社会和舆论界都大骂政府滥用职权，大谈政府干涉了他们不应干涉的事。而学校当局无力安抚学生，只好迎合暴乱青年，反对侦察结论。在教育学学者联合会的会议上，学者们互相传递上面写着“到工人中去做宣传”、“准备武装起义”、“援助社会革命委员会”等字样的学生帽和手提袋。

民事法庭和军事法庭审理政治案件时总是软弱地偏袒罪犯，一些革命杀人刑事要犯常在审理之前，在群众呼声的压力下采取软化态度，或证明其无罪，或搁置案件，或者干脆不予审理。

革命者更加肆无忌惮，无孔不入，从国外运回了足以威胁国家安全的武器。他们极力推进暴乱和罢工，哪里不准罢工，就在哪里炸毁桥梁，破坏铁路枢纽，推倒电线杆，以达到瓦解国家的目的。他们还成功地捣毁了酒类专卖店。

地方政权更是摇摆不定，各自为政，又疏于理政，更主要的是只要不触犯他们自己的利益，就吓得缩手缩脚。立宪民主党的官吏从政府取得实权，同时又站在政府的反对派立场上，即表面为政府服务，暗地里又宣传或参加革命小组，有时是同情革命，有时是害怕报复。地方政权的当权人物都处于散懒怠惰、胆小怕事、不知所措的瘫痪状态。恐怖分子可以不受制裁地杀害反对破坏社会秩序的官员。

恐怖战胜了政权，或者说是打败了政权；革命已经胜利，但还没有最后完成。

警察也处于昏昏欲睡或恐惧状态，低级警察和乡村警察由于与地方长久相

处而彼此熟习，长时间不注意周围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而居民不满情绪一旦爆发，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自己。城市低级警官是没有安全保障的群体，他们最容易受到谋害，按他们的工作性质来说，他们可以调查各种事件，恐怖分子正好利用这一点。县级警察机关面对怀有敌对的群众，行动上表现得十分软弱无能，这样能把群众引向歧途，推向新的越轨行动。

在广阔的农村更是没有人监督，没有约束，随便一个宣传鼓动者都可以顺利地播下不满的种子。从城里来三个宣传鼓动分子和一个姑娘就能挑唆 400 名农民赶着马车毁掉一座糖厂，而宣传鼓动者就在农民群众中间。农民破坏工厂时，厂里正在举办化妆舞会，厂长在弹钢琴。外来的纵火者不是附近农民，他们剖开牲畜的肚子扔在工厂的熊熊大火中，公牛母牛在自己的内脏上面拼命地吼叫。农民纵火烧毁财产、图书、绘画，把古老的家具劈成碎片，摔碎了瓷器，有的人还不准别人从燃烧的房子里抢救物品，有的地方农民用大马车运走掠获来的财物。当毁掉一个开明地主庄园时，他曾请求省长救助，而农村神甫多年已经屈从，没有力量阻止自己的信徒的叛乱行动。另一些城市，连牧师自己也参与反政府活动。

对付农村的骚乱，政府不得不派驻大量军队，有时动用成团兵力。军队集结毫无实际意义，有时，最受威胁的地区反而没有军队保护，或者分成小分队，而小分队常常变成宣传鼓动家的囊中物。地方长官滥用职权，把特殊的部队用于特殊的地方，出行时组成他们自己额外的警卫队，私家住宅周围布置配有大炮的整个连队，利用下属官员为他个人服务。这样做有损于军队，所起的破坏作用不亚于宣传鼓动分子。

对国家的不满情绪自然会影响到军队。转为后备役的士兵都进了城，在城里参加游行示威，常常与中学生混杂在一起。在军营以外，士兵酗酒闹事，根本无人管理。某些报刊只及时刊登暴动消息，别无其他内容。而那些宣传鼓动分子径直前去兵营，身着军装，毫无阻碍地在军营宣传，并带去成捆的宣传品。“掠夺者匪帮统治俄国，劳动人民的敌人指挥军队”已经成了专门术语，可是在军队和在俄国，没有学会反驳，而只有欺骗和惩处。宣传鼓动分子便利用一切

缺欠和失误进行煽动，如延误兵役期，拖延换军装，伙食不好，不订火车票等等。到处都疏于管理，事事无人负责。无人管理是因为国家发展滞后，革命者恰好利用这一点进行反抗。由于国家几十年来没有得到正常发展，宣传鼓动的语言很容易被人接受。军队对于宣传鼓动活动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军队长官多年习惯地申报"整个部队情况良好"。军队指挥机关和地方政权一样，已经僵化，毫无生机，或吓得要死，突然决定在兵营召开大会，表示愿意听取士兵要求。而士兵要求："限期三天予以答复！如果每天不增加半磅肉食，就不算改善伙食！"

对呀，每月支付士兵津贴不超过22个戈比，只准在厕所里吸烟，没有向长官敬礼还要罚你站铁块。正像对待农民和工人一样，军队里也疏于管理，传统的东西已毫无生机，上校和中尉们觉得，什么也不用去考虑，就这样也完全可以混上300年！

俄国战车的战马前蹄已经悬空在无底深渊之上，可以筹谋思考的时间不过几分钟，是勒住四散的战马呢，还是在异常困难的关头接管难以胜任的政权呢？

就在彼得高夫咨询会议召开这几天，恐怖分子小兄弟在彼得高夫成功地刺杀了一名将军，他们认错了军装，误把塞瓦斯托尔一名海军上将科兹洛夫当成德米特里·特列波夫。

陛下签发的第一道圣旨，是斯托雷平提出和执行的：

居民选举的代表不从事立法工作而偏离了本职，干预不属于他们的工作范围，从事明显不合法的活动，比如以"国家杜马"的名义发表《告人民书》。

解散杜马令完全可以发出，也好像可以了！但不是最后一刻悬崖勒马，还有一个绝望的惯性推力，朝这里推！朝那个万丈深渊推去！

这可是那只冷酷的手的一次冒险，但他也知道已经勒住了，还得坚持住！

"俄国国土正在恢复安宁，上帝帮助我们实现最主要的目标。"

斯托雷平特别强调：

"由于我们君主的竭诚努力，要提高农民的物质福利，我们对这项任务的意

志是不可动摇的。"

斯托雷平左右了沙皇意志。

"俄国农夫在不损害他人的财产条件下，在土地不足的地方通过合法和诚实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地产。"

"我们坚信，一定会出现宏伟的思想和英雄的业绩，要靠忘我的劳动来实现……"

双方关于提高农民地位的较量已经开始，先进的知识分子想用纵火和杀戮来提高农民地位，以期瓦解并彻底推翻俄国的生活秩序，而保守的自由派执政者则准备提高农民的福利，目的是巩固俄国的现有生活秩序。

为打击革命，就在同一天，斯托雷平宣布彼得堡省进入紧急状态，实行戒严。

杜马信心十足地扼住政府喉咙，预料到即将到来的胜利，已急不可待，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会遭受迎头打击！而今如何？受到了打击，到了革命发出惊惧呼声的时刻了！但呼叫声意外地不是惊恐万状，而是具有威吓性，好像千疮百孔的气球冒出了空气，开始声音很大，但很快就瘪了，那就是维堡的《告人民书》。

在被解散的杜马中，除了已被吓破胆的立宪民主党人，还有战斗的社会革命党人①和屡遭挫折的社会民主党人。《告人民书》是 1906 年 7 月 12 日从彼得堡发出的。

告陆军海军书

士兵们、水兵们，我们代表饱受屈辱的人民向沙皇提出获得土地和意志的要求。然而沙皇听从富有的大地主的意见，他们不情愿放弃财产……沙皇听信在满洲作战的将军，他们见到日本人就抱头逃窜，却血洗莫斯科……你们为什么要保卫这样的政府呢？难道你们的生活美满吗？政府高官把你们当勤务兵奴隶般地任意差遣……我们将制订

① 后改名为合法的"劳动团分子"。——译者注

法律增加士兵薪饷，禁止任何形式的侮辱人格的恶行。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选举的合法代表，我们向你们宣布，没有“国家杜马”，政府就是非法的！你们宣誓捍卫祖国，你们的祖国就是俄国的城市和乡村。谁向人民开枪射击，谁就是罪人、叛徒和敌人，谁就别想再回到故里。政府正与奥地利、德国帝国主义分子谈判，以使德国军队进犯我国。为这次谈判，我们控告政府叛国，这是非法的行径。士兵们、水兵们！你们的神圣天职是从叛国政府压迫下解放人民，为土地和意志而战！

如同一切革命宣传品一样，容许不经核对地宣布任何虚妄的消息，可怕的是与德国人谈判这类谣言。但这里不仅在语言上剑拔弩张，而且革命使者已经穿梭于塞瓦斯托波尔、克琅施塔得和斯维阿堡之间，谋划在统一的时间发动起义！他们并不隐讳武装起义计划，准备秋收之后掀起农民起义，军队退守农村，先进的军事要塞立即揭竿而起，再一次制造了令人赞叹的红色革命气氛！

同时，芬兰蠢蠢欲动，也并非意外。斯维阿堡可能及时宣告起义，斯维阿堡是戈利辛格弗尔附近诸岛的主要军事要塞。那时，全俄法律执行乏力，在芬兰几乎完全不起作用。刚刚宣布解散杜马，俄军现役炮兵上尉齐翁致电杜马分子说：“你们将在斯韦阿堡的炮火保护之下。”的确，国外流亡的和俄国本土的革命者都到了赫尔辛弗斯；的确，在咖啡馆里和花园空地上，优秀的演说家大喊大叫，驻地的水兵和士兵毫不受限制地徘徊在一个又一个集合之间，听取控诉俄国政府叛变和应该立即推翻政府的宣传。根据芬兰法律，不仅不准干涉这样的集合，而且戈利辛格弗尔大街，武装部队持械游行支持革命者；合法的出版社“福加斯”出版民主党的《兵营通讯》，公开号召武装起义，反对“恐怖的政府”和“全俄刽子手”。

芬兰是嵌入俄国病体的针刺之一。为了表面的尊严，装点门面或臆造出来的利益，俄国从瑞典手中夺取了芬兰，并入俄国版图；承认芬兰宪法比俄国早100年；先于俄国60年建立国会；亚历山大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给予芬兰享有

的自由，直到今天在俄国仍不准许；免除军人犯罪；芬兰人在帝国领土内享有特权；芬兰人可以建立自己的货币体系；芬兰的生活费用由俄国负担；两条设防不严的国界线；芬兰和瑞典、芬兰和俄国间开辟了一条从欧洲到俄国的便道，革命者、革命书籍和武器可以随意进出。芬兰所享有的特权，斯托雷平现在也无权不予承认。芬兰已成为俄国革命者的可靠避难所，比俄国邻近的欧洲国家更安全。按照芬兰和俄国的协议，可以引渡革命者，然而芬兰警察根本不监视革命者，俄国在芬兰又没有谍报机构。芬兰已成为所有俄国地下工作者的聚集地和桥头堡，制造炸弹和制造假文件的窝穴。在芬兰，几乎可以享有西欧的全部自由，而且只距俄国首都25俄里，又无法划清国界，革命者在这里召开过几十次代表大会，又是对彼得堡进行恐怖活动的基地，恐怖分子筹措到的资金全部汇到这里。俄国动乱开始了，以和平的阶级组织面目出现的“红色近卫军”公开地在全芬兰进行军事训练和检阅，甚至到维堡要塞墙下袭击宪兵。由于这一切历史的积淀，强大的俄国只好设置白岛警戒线予以隔开。

7月17日，芬兰爆发了野蛮的斯维阿堡暴动，宣布起义的炮兵和拒绝起义的步兵之间展开大血战，俄国士兵之间的血战持续了三天。其他人在死亡的威胁下强行归顺暴动，被逮捕的军官有的人被枪杀，有的人被刺刀挑起来扔到海里淹死，有的人开枪自尽。“处死军官”曾经是一个口号，在这个口号下号召步兵起义，而步兵没有参加起义，为此遭到了三天的重炮轰击，步兵用野战炮回击。在相互的炮轰中，在没有军官也无人管理的火药库爆炸中，数百名俄国士兵死于炮火之下。数十名民间恶魔趁机混进了起义队伍，3天中他们不断挑起事端相互残杀，而最后一天夜里，齐翁和他们的朋友秘密潜逃了，抛下起义人员受审。

在全芬兰，俄国政府找不到镇压暴动的军队，这又促成了新一轮的战斗，迎面而来的海军舰船也被射击。

第三天，克琅施塔得也发生了暴动，只坚持了6个小时。

根据自由的芬兰宪法，把这些炸毁赫尔辛弗斯和彼得堡之间桥梁、砍倒电线杆和携带武器参加暴动要塞的红色近卫军交付给军事法庭审理。此举大大伤害了芬兰人的宪法感情，因为法庭只轻描淡写地审讯了一番，短期内全部释放。

军事法庭只审判俄国人! 后来，大多数被判刑者都得到了赦免。

斯托雷平想的是，一开始态度越是坚决，造成的牺牲就越少。开始就放任默许，只能姑息养奸，导致后来的更大牺牲。他的靖绥政策的基点是，可以用说服的办法，但对革命恶魔不能用说服的语言来感化，对他们要坚决地、果断地加以惩处。如果政府不捍卫国家制度，纵容谋杀和扔炸弹，那么怎么能保卫政府呢? 政府要自卫。政府为什么要退却，而不是革命者撤退?

"那里的列车发生了炸弹爆炸，在社会革命的旗号下屠杀和平居民，政府就一定要到那里维护秩序，而置反对派的批评于不顾。"

在当时的俄国，这个声明也使人感到反对派的厚颜无耻。经过 70 年以后，大概全世界对此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革命者武装夺取印刷厂，印发了全民起义和大肆杀戮的号召书，宣布各省实行地方共和国，波罗的海沿岸燃起熊熊大火，坦波夫省、高加索、普列斯特·立陶夫斯科等地成团成团暴动，里海舰队，土拉兵工厂，整个南方工业区和全波兰罢工此起彼伏，斯达夫罗波尔和巴统骚乱不断，应采取断然措施，甚至是残酷的，但要严格依法行事。解除群众武装，爱国社团派出志愿人员在军队保护下补充罢工者的空缺，但不发给他们武器，不给制造内讧权，对负担重任的警察以坚决支持。由于法院以其准确、果断和快捷审理大大消除了行政干预，但法庭在镇压方面的软弱无能使全体居民感到沮丧。

"某些案件过于宽容，另一些案件审理则出现了不适当的从严惩处的思想，致使处罚过分残酷。"

正因如此，因遵循旧司法机器，并没有给群众留下好印象，人人自危。这说明，需要启用战时军事法庭，可这不是国内战争时期呀? 这样就要启用战时法庭，采用速审速判措施以得到居民的支持，但更可靠的是制止革命者。

"善良的人们公开表示维护秩序的决心，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 '战斗队员' 的疯狂勇敢精神 '掉价了'，因为他们的疯狂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和平保卫者的懦怯。"

然而，这种极为简单粗暴的思想，不仅超前于当今整个时代，而且超前于

皇上的意志，皇上正为粗暴地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而胆战心惊，那么而今还要顶着威胁压力继续推进吗？

恐怖分子自己也加速行动，他们决定处决上任刚一个月的新任总理大臣，8月15日一举炸毁总理大臣在药房岛的别墅，连同多名来访者一举全歼。这一次爆炸是革命爆炸最成功的范例之一，重伤32人，毙命27人！死伤最多的是局外人。两个团的兵力，5支消防队挖掘，寻找受伤人员和尸体，尸体卷曲，残肢断体，有的无头，有的无手足，大半个建筑被毁，四壁倒塌，楼梯断裂。斯托雷平唯一的3岁儿子和一个女儿跳下阳台，跨过围墙，跑到海岸街，男孩折断了腿，女孩跌倒在革命者乘坐的马车受惊吓的马蹄下。一名来访的妇女和幼儿，双双毙命。革命者本人和阻止他们进入的一名将军和守门人被炸成肉泥。只有一个房间没有被毁，那就是斯托雷平的办公室。炸弹爆炸时，他正坐在办公室里，由于爆炸的冲击波，一个巨大的青铜墨水瓶越过他的头，溅了他一身墨水。这就是他的全部损失。

一艘御用快艇开来，把斯托雷平全家接到了冬宫。在天气晴朗的礼拜六，快艇穿过座座桥涵，桥上是高举红旗的热火朝天的游行队伍。斯托雷平一个没有受伤的8岁女儿，由于害怕游行队伍，藏在皮椅下面，刚刚请求医生不要截掉女儿的腿的斯托雷平立刻对其他子女说：

“当他们朝我们射击的时候，孩子绝对不许藏起来。”

这些天来，全部左派报刊不断暗示斯托雷平说什么他的死期已到，要吸取教训，为时不晚，赶快辞职，以挽救子女和他本人的性命。同时也认定政府必然灭亡，让他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人民的全权代表，他也无法管理国家。不！恰恰是现在，斯托雷平绝不能向恐怖主义的首领让步，让胆小鬼去辞职吧！

“那里论据就是炸弹，那里自然的回答就是无情的惩治。我们痛苦地耻于处决少数人，是为了防止血流成河。”

这样，臭名昭著的斯托雷平的恐怖时代开始了。这是按照俄国人的语言和俄国人的理解给他贴上这样的标签，那么可以这样说外国人吗？时至今日，说到这种最残酷的猖獗罪行的黑暗时期，外国人在我国面前仍耻于启齿。斯托雷

平的恐怖政策是这样执行的，对特别严重的抢掠、杀戮和袭击警察、政府和平居民者，交付战时军事法庭，以便更及时、更靠近犯罪地点审讯和判决。有人建议宣布，把已逮捕的恐怖主义分子作为未捕获恐怖分子的人质。斯托雷平自然予以否定，扩大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在此之前已经毫无顾忌地推行了）；对在部队进行反政府学说的宣传者，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凡赞扬恐怖活动的人也应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前对“国家杜马”代表、新闻出版和舆论界已肆无忌惮地实行）。按法律条文，对以直接谋杀为目的并已造成事实的爆炸分子课以极刑，对已被揭露准备炸弹但尚实施者，则不准处以死刑。各政党和社团举行的会议，只要没有局外人参加，并不在公共场所，或局外知识分子，则不要求会议置于行政机关监视之下。

这些苛酷而残暴的措施，在俄国社会引起举国上下一致的极大愤怒，招致异国同声的谴责。报刊上纷纷发表文章、谈话和信件，不准对任何一个杀手，哪怕是最残忍的杀手执行死刑，战时军事法庭不能振兴社会道德风尚，只能促使他们更加野蛮。古奇科夫大胆地公开支持战时军事法庭（要比怀着怨恨心的警察和士兵杀人要好一些），他受到了左派铺天盖地地攻击。任何同情受害的公职人员的唁电都引起自由派人士的不满；任何一个人只要不大声赞美革命的恐怖行动，俄国社会都认为他是刽子手。

同时，不管野蛮还是不野蛮，启用战时军事法庭，恐怖事件立刻减少了，下降了。

在最紧急关头的那个月里，斯托雷平一家不管在什么地方住，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在陛下的再三要求下，他们依旧住在冬宫这个过分豪华、阴森森的、沙皇本家早已弃之不住的牢狱般的地方，所有进出口都有重兵把守。斯托雷平平日喜欢骑马在田野里独自驰骋，而今只能在宫中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散步，或者到皇家散步的屋顶走走。登上高踞彼得堡中心区、城墙垛掩护的屋顶，俄国总理大臣才能躲过威胁，保全性命。而俄国君主也同样连续两年“猫”在彼得高夫的那小块领地，同样已经没有在任何地方公开露面，甚至本国出行也要层层重兵护卫。

那么，当时俄国的实权究竟落在何人手中？难道革命还没有取得胜利吗？

冬宫大厅里只开启平日照明灯具，因此显得更加阴森昏暗。在半明半暗的昏黄灯火下，无数镀金相框、菱形吊灯的镀金和水晶玻璃都失去了往日的光泽。那些弃之不用价值连城的家具都盖上套子，以前曾经以其优美屈尊的姿势拥抱过众多达官显贵，到如今徒然张开木然的狮子大口，如同僵尸般死抓不放。帝王的宝座也蒙上罩子，如同弃之不用。

这一切不由令人胆战心寒，俄国君主政体是否还有生机？罗曼诺夫王朝还能准备庆祝300年大典吗？被1905年10月17日宣言吓破胆的王朝还没自缢吗？

斯托雷平从这些僵死的家具上感悟到，目前千百个身居高位的活尸集成堆，一心想阻止历史哪怕一点点进步。而在皇宫周围身带炸弹的青年，徘徊徜徉，他们想炸断历史，并以此结束历史。斯托雷平面前隐约出现的唯一自然的，但在地震般环境中不确定的道路，就是沿着废墟的山脊前行的平衡之路。迄今为止，不知为什么，一提到改革，就意味着削弱乃至毁灭政权，而实施残酷的措施维护秩序又意味着拒绝改革。不过，斯托雷平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二者兼有的希望! 依他的性格，一旦看清目标，他就已经有本事去勇敢地实现。他的习惯是，一方面不进行公开的政治纠葛争吵，另一方面也不去自我炫耀，而是实干，达到目的。他看清了路，就把握不放，甚至从这个缺乏理智、智力低下的“维特”宣言的影响下把俄国引上坚实的道路上来，拯救那部在相互掣肘中匆匆草就的宪法。

为怜惜陛下的情感，他连“宪法体制”和“宪法”字样都不敢贸然使用。尽管总理大臣面对来自两个方面融为一体的明显敌对情绪已经大为减少，但他仍怀着同情心去搞平衡，以免伤害陛下脆弱、胆怯的情感。人们常说，一个信徒不可能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来，他干事情靠自己的巨大能力，而不是靠上帝保佑。帝制派不可能为祖国干一番大事业，因为已经越出帝制派所尊重的界限。经过几个月的观察，他已经比较清楚，俄国那帮喋喋不休、咬文嚼字的人士，几乎都是神话里的人物，从外省人的观点看，他们实际上既不强有力，也不够聪明。他暗自下定决心，最佳选择是同他们对着干。他身居俄国政府首脑职位

应当想到，他不能再自由地扩展自己的谋略，而是要想如何使这些谋略纳入君主意志的轨道。即便君主明显地缺少意志，只有恐惧不安，并掺和固执脾气，乃至坚持错误，忍受不住惶惶不可终日的煎熬而一时感情冲动，即使如此，仍需小心谨慎地寻找君主意志的微弱闪光点，不要让风吹着它，精心呵护起来，以免熄灭。因为俄国处于观察发展走向的阶段，在破坏俄国君主体制的面貌和基石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前进，乃至生存。绝对不准采用对待普通人的标准去评价这位略有暮气、和气的尼古拉二世。那不，他正坐在桌子对面吸烟，露出普通人的淡淡微笑，但他自身毫不掩饰地保持着自古以来一直在金色光环中翱翔的形象。因此，任何一名最伟大的大臣也不敢私下自己篡夺哪怕是最孱弱的继位君主的王位，走比斯尔系科的路线，即为了君主政体的利益不加约束地强迫帝王意志，斯托雷平自己不能走这条路。

毫无疑问，陛下目前不知所措，信心不足，除非发生更大的骚乱，否则他害怕采取断然措施。作为政府令，陛下下令统计从俄国人民联盟收到电报的精确数字，并提供明细总表。他无疑需要力量，这种力量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他。他决定把他这种想法拿到大臣会议上讨论，此举是让人民明白，这个想法是陛下本人的，人民冷暖和苦乐沙皇更关心。

这一切使斯托雷平感到既痛心又怜惜，首先是为了俄国的利益，自然也为了帝王的利益。那位软弱又善良的帝王，比起罗曼诺夫王朝所有先辈都孱弱无能，又在最艰难时期碰上了王位危机。斯托雷平感情一时冲动，他不能对不幸中的沙皇撒手不管，他需要振奋精神，树立信心。这不仅因为他不振作精神就不能完成俄国王朝大业，同时对他天生的不温不火和摇摆不定的性格怀有恻隐之情。虽然他也能清楚地预见到，这位极易动摇的沙皇，有可能随时背叛自己的大臣。但按照传位形式，他必须把自己有力而紧迫的决策加许许多多的敬语：“否认您的善意见解，陛下，请宽容我忠心不二的直谏，我出于职责和誓言才胆敢直言不讳，请陛下相信，我丝毫不想影响陛下决策的自由，我急切期望保护陛下不陷于窘境和远离烦恼。”

只有冬宫花园里各类飞鸟千鸣百啭，还有宫内各大厅和所有门边值勤的年

迈仆从，总理大臣的鲜活形象，好像来此消夏先祖的幽灵，使习惯于守护这些老朽无言古迹的护卫感到惊讶不适。这些老态龙钟的仆从以颇为合乎礼仪、负责地脚跟相碰致敬意，悄然不语，如果问到既往的事，只回答必要的内容，不再多说一句，此刻才有一点活气。

斯托雷平闷得要命，急得发慌，因为每天缺少一个小时的兴致勃勃的散步时间，他的无穷尽的工作力可能坚持不下来。全神贯注思考问题的散步，只需要一个小时就能把所思考的问题理出头绪，定出一个总的目标来；没有目标，就不可能想出重大的决策，也就会注定沉没在无端微末小事当中。

当时，对他的郊游和旅行也要加以保护，这可不是由总理大臣自行决定的。今天，卫队把总理大臣从冬宫正门领出宫来。门前停着一轮四轮马车等他，马车沿街行驶，出城之后，斯托雷平在城郊驰骋。他也不知道走哪条路。他保证不干预，也不命令车夫怎么走，觉得打搅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带着报告晋见陛下，夏天去彼得高夫，冬天到皇村。按陛下的规矩，早晨差不多从正午开始。这样，斯托雷平傍晚带着报告到来，返回时间已近午夜1点。

尽管斯托雷平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恐怖分子还是想出办法找到他而杀死他。首先，通过大学生，通过他的长女，派一名恐怖分子做他几个幼儿的家庭教师，但这件事后来暴露了。恐怖分子讨好巴结他的长女，让她去他的家，但她觉得有失身份，并把那个住址告诉她父亲，而父亲同意她前去。同时，有一名恐怖分子被安插在冬宫警卫队，也没有得逞。他的口袋揣着手枪在入口处站岗，有一次恰好斯托雷平出来，由于突然出现使他惊慌失措，没有开枪，后来很快又暴露了。还有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者观察到斯托雷平看望自己生病的妹妹，便租下了隔街的房子，准备从这面窗户向对面窗户射击，这个图谋也失败了。还有一次在医学院开学典礼上（西尔伯贝格小组）刺杀他；在斯托雷平前往彼得高夫向陛下报告的路上狙击他（苏利亚季斯基），这一年里交叉进行暗杀者有多布任斯基小组、萝扎·拉宾诺维奇和列伊·拉比娜“飞行小分队”、特劳贝格“飞行小分队”、斯特罗加利谢科夫小组、费嘉·埃莉金娜小组和雷巴·利伯曼小组等。

斯托雷平对身边的人谈到这几个月来的感受，说：“每天早晨做祈祷，就把眼前这一天看成生命的最后一天，每当晚上感谢上帝又多赐予我一天的生命。我明白一个道理，死亡是为信念付出的代价。我有时清清楚楚地感觉到，终究会有一天，杀手的阴谋最后能够得逞。要知道，人生只能死一次，不能有几回死。”

在冬宫那种折磨人的地方生活的第一夜，刚刚从爆炸中恢复过来，两个孩子负伤，其他孩子受了惊吓的情况下，斯托雷平坐下一直工作到深夜。在我们受到最严重威胁的时候，在生命面临最大危险的情况下，恰恰也是完成生命中最重要任务的时候。恐怖分子拼命想要杀死斯托雷平，俄国要悬崖勒马，正悬在深渊之上。贵族地主世袭领地燃起熊熊大火，炸弹爆炸声此起彼伏，军队在暴动，战时军事法庭开庭审理。此刻，应当展望未来，应当按照审慎思考的改革体制的唯一要点向前推进。中止混乱的局面需要物质力量，政府要想复兴国家更应当重视精神力量，首先是土地改革：

“我们作为未来一代必将担负起历史重任。我们要为意志消沉、无所作为、老朽而束手无策，对俄国人民前途丧失信心负责。”

俄国的命运中枢在农村，救国的要求不是来自上流社会，那里的高官们墨守陈规、骄奢淫逸、腐化堕落；地主们自由自在地生活，缺乏责任感；宫廷嘛，说到宫廷，一个帝制派人士谈论宫廷，有失体面。一个国家，首先要有一双牢固的腿；医治国家，要从双腿开始，即从农民入手。绕过农村问题，根本谈不上俄国的健康发展。斯托雷平的主导思想，首先没有独立自主的公民，绝对建立不起来法制国家，而这样的公民在俄国就是农民。“先有公民，而后才有国家。”维特这样说过，任何一部宪法都应先行解放农民，但维特本人像抽筋似的主持宪法。而今轮到了斯托雷平在其之后解放农民。抽象的自由权不会有农民的真正的自由，只不过是“在死尸脸上涂脂抹粉”。当俄国的主要阶级在国家体制中得不到关心，那俄国也不会成为强国。所以斯托雷平说：

“我准备让农民阶级享有不受限制地获得帮助和减免税赋，以使农民走上文化发展的坦途，如果这项改革不能成功，那么我们全部通通滚蛋!”

政府担负起道义上的责任，指明农民摆脱贫困生活的合法途径。

“每个热爱劳动的劳动者都有权建立自家农庄，专心致志地从事自由劳动而不侵害他人的权利。”

官地、皇室领地、内阁官方的土地，迅速向农民转让，正好是900万俄亩。有关这900万俄亩土地的转让命令，是在药房岛发生爆炸当天签署的，遭到不愿意交出全部封地，也不想无偿地交出封地的大公们的一致反抗，现在以低价出卖世袭领地，长子继承的土地（斯托雷平以身作责，自己率先出卖自家下哥罗得地产给农民银行），降低现金支付额度，增加信贷，但更主要的是，农民可以自由地离开农村村社。

“继续强制所有人服从一种耕种方法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让庄户主人积极主动地耗费自己的最多心思去耕种临时分地也是根本不可能的。经常性分配土地会产生一种毫无保障的心理状态和冷漠态度，土地平分了，人心散了，在土地平均使用条件下，全国农业生产水平下降了。”

既包括农业生产水平，也包括社会主义文化水平。

虽然斯托雷平一手摧毁了农村村社，但他也许还不知道，此前发布了多少国家指导性文件约束和冻结农村村社，尼古拉一世也曾坚决地实行过土地改革纲领，和今天立宪民主党所期望的改革纲领没有什么区别，即平均分配土地(家庭、村、乡、县乃至省)，根据户口调查数字定期再分配。他在位末期，曾尝试以国家移民经验的形式，分成家庭庭院小区，亚历山大二世执政时停止实施。农民解放的时候，虽然把农民交由农村村社管辖的决定从表面上看十分荒唐可笑，也不合情理，但确实是这样做的。从理论上保留退出权，赎金即可以自由退出，但几乎没有人有财力赎买，到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末期又禁止退出，直到1905年秋天，沙皇大笔一挥所有赎买政策一律予以豁免。俄国沙皇，一个接着一个内心隐藏着对最爱劳动、为数最多的阶级的不信任，而国家正是依靠这个阶级才得以生存。亚历山大三世不信任农民到了这种程度，不经过农村村社，一般禁止农户分家，还发布许多专门指令提醒不准转卖份地恰好是1891年大饥荒之后，反对迁移之声越演越烈，而且贵族长官有权限制农村会议那么一点点

可怜的权利，动辄动用处罚权、逮捕权乃至鞭笞权。

亚历山大三世的错误在于把知识分子造反派引发的愤怒情感转移到了农民身上了。

当今皇上也不相信农民，仅3年前还坚持农村村社不可侵犯，甚至已经废除连环保（农村村社对屡教不改不肯纳税者实行的一种不合法、不能容忍的惩治办法）的时候，去年王位岌岌可危的时候，他还重复说，份地不能转让，波别多诺斯采夫也力主坚持农村村社。

事实很简单，整个当权阶层自觉不自觉地都在发抖，自私自利地抓住自家属地不放，包括贵族、大公、皇室，不管在哪儿，怎么样，只要土地所有制有变动，咳，可别动我们的家产呀!

贵族属地无法做出可信的统计，这也是农民心中对地主地产的继承权怨恨大大高于所统计数字的原因，不止是现在一代人，也不是他们的父辈、祖父一辈人，甚至曾祖父一辈，不知哪一辈，你们毫无公道地夺去了我们的土地，把我们连同村庄和土地赐予什么人! 这种难以愈合的创伤，虽经百年也不能愈合，这种不可抑制的愤怒，百年也难磨灭!

正由于农民缺少真正属于自己的、摸得着看得见的土地，致使他不再尊重所有他人的财产。施行已久的农村村社以它的世界观培养了正在全世界流行的社会主义。尽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农村村社存在，1905年俄国农村像一个大火药库，处于法律上无权地位的农民再也不能容忍了，农村村社束缚了农民的手脚，再也不能容许农村村社牵着农民鼻子，任其摆布，这与国家其他一切自由概念不相容。

“拥有个人财产的情感，如此自然，如同饥饿感，如同传宗接代的情欲，如同所有其他人的自身本能一样。”

这种情感应当得到满足。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这是国家恢复秩序的前提。农民没有私人土地，很容易听信谣言，听从以暴力实现他对土地热切渴望的挑唆。拥有自己土地的殷实农民就能对付任何破坏性运动、对付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的屏障。果不出所料，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如此卖力阻止农民脱离农村村社的

奴隶地位，不准农民养精蓄锐。是啊，农村问题成堆，有利于宣传鼓动家，土地改革必定使社会革命党的煽风点火活动自消自灭。

斯托雷平认为，他的关键性的土地法是1861年改革的继续，农民得到真正的完全彻底的解放整整延迟了45年，像当年适逢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一样，这次又赶上日俄战争惨败。

大概是1906年夏秋季节，斯托雷平前去彼得戈夫晋见陛下时，多次陈述、禀报，总算成功了。大概陛下本人对此真正深信不疑，乃至津津乐道：此乃朕意。农民富裕幸福，乃吾皇之主旨。实行土地改革乃是当今皇上竭诚继承他的伟大祖父解放农奴的未尽事业，所幸重臣斯托雷平制定了原则。而且今天陛下也执意改革不必通过杜马，以免杜马设置障碍，基本法共87条款。

"'国家杜马'休会期间，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大臣会议可将立法立案直接呈请皇帝陛下。"

杜马复会两个月内，如果法律未获通过，便不能再次提出而失效。这一段时间，是他与陛下关系的黄金时期。所以，斯托雷平急急忙忙想干出一番实际事业。

同年夏天，他试图把并非真正左翼的代表吸收入阁，例如古奇科夫、希波夫、尼古拉、利沃夫，结果不成功。他吸收入阁的原则是，当前不是按其言论，也不是他的施政纲领，也不看高声陈述政见，只是看他是否勤奋工作和想干出一番事业。人民只相信你的业绩，干事业要比空话更快捷，更可信，并不急于召开这样光是不负责的空谈，没有工作效率的下届杜马会议。在杜马，杜马代表在其不可侵犯的名目掩护下从事分化瓦解的勾当。我们要紧急采取步骤实行大多数居民迫切需要的改革。

不能裹足不前，也不可左顾右盼，而要行动，不能落后于世纪速度，在前进当中也不能无视现代形势的准确等高线。目标预测更准，就有了坚韧不拔地实现目标的决心。斯托雷平具有这样的雄才大略，他一方面以国务人员的身份与革命抗争，另一方面以警察首脑的身份镇压革命。

不！在俄国社会，自由像太阳那样绚丽夺目，人人喜爱，任何灾祸都不能与幸福公开地相提并论。凡干事业的人，都被认为是暴君的同义词。那些被邀请

的社会名流没有一个敢于冒风险进入斯托雷平的内阁，虽然也有人同情他。

1906年10月5日，斯托雷平收到沙皇签署的命令，即关于农民享有与其他阶级平等的公民权，承认1861年2月19日许诺的“自由的农村居民”地位。农民享有自由改变居住权、自由选择职业权、自主签署票据权、担任公职权、与贵族享有接受同等教育权，再也不需要征得“农村村社”同意或地方长官批准。不论第二届杜马、第三届杜马还是第四届杜马，尽管自我标榜是自由的“国家杜马”，热爱人民，只有他们爱人民，一直到革命前一直也没有批准这项法律草案！在本法律多年讨论期间，右派得到了左派演说家的鼎力支持，而且谴责斯托雷平过分革命。

审查乡级地方自治法，即无条件实行乡地方自治权，以便实行地方分权制结果是，那些爱好自由的人民保卫者们一直把该法案拖到1917年2月，责怪该法案缺少足够的民主性，右派势力乐于支持他们。这样一来，也就永远地关闭了农民自治权——自己管理地方事务，包括财政、灌溉、修路、学校和文化管理权的大门。

当城市知识分子突出宣言中有关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时候，他们却忘记还有信仰自由的概念。现在，正是两届杜马之间，斯托雷平废止了信仰自由的限制，旧教徒和新教徒的权利平等，确立了教堂和教会团体的自由权。

斯托雷平经过长期准备并且顽强地坚持实行犹太人平等法，与其说是遵循宣言精神，毋宁说是想把大部分犹太人与革命隔绝起来。根据他的犹太人关系法案，废止对犹太人的大部分限制。然而，尼古拉二世长时间动摇之后，以他罕见的坚持态度否决了犹太人关系法。斯托雷平感到很难堪，但采取多种措施以使否决该法案的阴影不致影响沙皇在社会民众心目中形象，留下恶名。既然犹太人平等法案被束之高阁，无限期拖延，这也是杜马阻止农民平等法案的真正原因：你们不给犹太人平等，我们也不给农民平等权！

此外，还有多项农业法案，如耕地规则法、灌溉法、改善土地利用形式法、优惠信贷法。

1906年11月9日公布农民脱离农村村社的基本法，确立了自己份地属

于个人财产或完全分得，附带住宅，标志诸法案业已完成。

同年秋冬两节，更重大的事件是为第二届杜马准备多项法案，但杜马对俄国历史重建难以胜任。

这届杜马是通过完全自由地选择出来的。由于解散第一届杜马引发社会激愤之情普遍高涨，第二届杜马选择也谣言四起，传说不断，说议会召开要改期，本届杜马也将立即被解散。没有解散，斯托雷平召开杜马会议，与杜马一起工作，以诚相见，平等相待，可以相互批评立法草案的种种设想。

第二届杜马于 1907 年 2 月末召开。1907 年 3 月 2 日举行会议的塔夫利宫会议大厉的高顶坍塌，横梁、枝形吊灯、木板、泥灰散落整个杜马大厅，四分之三的代表坐席、主席团、演讲席和政府代表席位，一片狼藉。如果坍塌时间迟几个小时，三百名代表，非死即伤，后果不堪设想，只有极左派和极右派有可能幸免于难，安全无恙。只是因为坍塌事件不是发生在议会召开时间，杜马才得以化险为夷。

左派代表没有放弃把坍塌解释为：

“是对人民代表的粗暴蔑视，甚至认为可能是个阴谋。”

“这也可能一个预谋事件，同时也太残忍了，今后必须保证我们的生命安全。”大嗓门的社会主义者，“工人”阿列克辛斯基说：

“如果人民知道我们头上的天棚砸下来，他们总会从中得出相应的结论。”

后来对天棚必然坍塌得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研究表明，如建筑是波将金时期修建的，由于长期在此做养花温室而朽蚀了。然而，这一坍塌事故不可能不给同代人，乃至唯物主义的同代人留下种种印象，促使人们把它看做一种征候，不仅要问：为什么如此巧合呢？是杜马岌岌可危？或者这届政府危在旦夕呢？或者俄国危如累卵呢？作为一种征候，要揭开天棚坍塌谜底之日，还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数十年的时光。

杜马会议迁至米哈伊洛夫宫的贵族院大厅举行。3 月 6 日，斯托雷平还是那样从容不迫，那么公正不阿、不偏不倚、率直坦诚，依旧那样精神焕发，对自己事业信心百倍，还是那样以挑战的目光，出现在“人民愤怒杜马”的例会上

宣读政府的公告，前言立即承认杜马渴望已久的事实：

“遵照民主的意志，我们的祖国应当成为一个法治国家，以使俄国臣民的义务和权力得以法典来确认，而不是根据某些人的意志来决定。”

亦即确认国家要根据1905年10月17日宣言加以重建，甚至可以把这个过程解释为强化民族意识成长过程，为此将要重新审查现行全部国家立法，对右翼而言是一个革命的冲刺，像无政府主义的炸弹一样。斯托雷平立即转向他一直珍藏于内心的土地法话题：

“不能再搁置被混乱土地政策弄得疲惫不堪的农民对土地锲而不舍的要求了；不容许再拖延为防止俄国大多数居民受到极大伤害的措施了，他们是经济上的弱势群体，他们自古以来靠手工经营模式已无法保证自身的温饱生活。”

而下一步，如果俄国早已是一个议会国家，面对斯托雷平的是一个有传统、有经验的议会，那他便能在新组成的杜马前展示一个规模宏大、经过深思熟虑的渐进的改革纲领，一个最完整、最全面、条理分明、迟早要提出来的最严整的俄国重建计划。可惜，他现在只能建设一点。

那种平凡的日常工作中隐藏着的闪光点，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显示出来。

由统一的思想联系起来的诸多措施，应当细致地推行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撤销数量众多的宫廷之后，要建立统一的省县两级管理机构，应撤销所有挂名的地方长官；至于撤销宪兵队后，同时制订警察工作新章程，准确地规范警察的职权范围；废除行政放逐制，对扣留、检查和折阅信件行为进行法律监督；建立地方法院，要人人都可以接受、收费低廉、审判快、贴近居民；民事法庭法官要由居民选举，并不断扩大职权范围；要制订国家官员的民事和刑事责任；要启动预审辩护制度，容许定罪假释；实行社会救济措施，国家对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实行最低生活保证，对疾病、伤残和养老实行国家保证；国家政权大力协助改善工人的物质福利待遇，赋予工人经济要求的罢工合法性不受惩罚权，应给予工人经济要求的自然表达权，政府不干预企业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工厂应该给予工人医疗帮助，禁止妇女和少年的夜班劳动，缩短工人

的工作时间，改善马车运输的道路；发展轨道、水路和公路交通，大力发展航运事业，建设阿穆尔铁路（从外贝加尔到伯力）；实行教育改革，完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知识结构，三级教育要相互联系，各级学校都要改善教师的生活待遇。首先，要办大家都能读得起的学校，然而在帝国范围内履行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最后探索为实行全面义务教育的手段——预算。对日战败后，财政困难重重，要厉行节约实行居民税赋均等——所得税和减轻穷人税赋，城市、地方拨款……

斯托雷平还可能历数他的宏大改革纲领，也许当天出席会议的代表中有人赞叹他的纲领宏伟又全面严整。这样的代表在没有经验的第二届中为数有限，他们的声音也很难能听到。是呀，难道说来自帝国四面八方的第二届激情奔放的演说家们，特别是外高加索人都在一连串的国家收入支出数字下打瞌睡吗？难道一定要每天晚上直到半夜各委员会把时光消磨在立法的无边无际的一大堆最后措辞上吗？饶了我们吧！你看，这类微末琐事已经得不到代表们的同情了！这种蕴藏着闪光点的平凡工作已经讲得太多太多，听众已经不再买账。酷爱自由奔放演说的红色间歇喷泉又要向哪个方向喷发呢？这个纲领及其无数条款乃至优待工人阶级、废除经济政策、取消宪兵队，也并非不可能是一个狡猾的假仁假义圈套，以防止革命爆发。凭什么醉心于吹毛求疵的立法和毫无希望的工作呢？最好还是大声披露政府，高谈阔论自由为好。

那个社会主义的风云人物彩烈捷利立刻发起猛烈进攻，说这届政府是：

“战时身事法庭的政府，它给整个国家带上镣铐，它使百业调零，人民彻底破产。”

政府执政党在8月已经制订了有关农民享有平等权利和独立庄园法，像当年所有俄国社会主义者一样，彩烈捷利也以自己的基本理念出发滔滔不绝地演讲，既不听杜马大厅里的代表发言，也没有怀着什么目的来参加会议。杜马主席戈洛温必须承认，对如何引导这位演说家，他束手无策。

彩列捷利说：“政府领导不对整个街区民居执行枪决的活动。”

这时杜马主席请求右翼人士不要破坏会议秩序，而彩烈捷利推波助澜，煽

动愤怒之火：

“……其目的是保护农奴制度！……立法法案删掉了人民业已从他的敌人手中夺到的权利。我们从政府血腥镇压的‘回光返照’中认清了这些法律的庐山真面目。让我们揭穿政府阴谋的呼声传向祖国四面八方，以唤醒尚未觉醒的人一起参加斗争！我们呼吁人民代表，准备好人民的力量——”

这不是号召发动起义吗？无法做出另外的解释。

“假托国家安定的名目，实行保护所有寄生阶级利益之实，为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卖光了所有土地，社会民主党寄希望于人民的自发行动上。”

阿列克辛斯基说：“地主，自命为俄国政府，农民希望不花一分钱得到全部土地，除了斗争之外，别无其他途径能够得到。”

立宪民主党人参加了会议，怀有明显敌意地默不作声。他们的本意是用超出一切愤懑的语言表示他们对改革大纲的谴责，但却表现为沉默，又有点不知所措。斯托雷平提出的自由解放的纲领，展示的改革体制，对执行机构和立法机构相互协调的信心十足态度，对杜马本身的友好姿态和温和语调，立宪民主党人不可能没有见到，但看在眼里又不愿看到，只好装作视而不见吧！而且这一切出于政府，意思是说，不是办不成的。这一切完全由官员直接付诸实施，首当其冲是破坏现存的生活方式。立宪民主党人沉默不语，他们在沉默中敌视这个好大喜功爱出风头的人。立宪民主党，只能让步又不愿让步，只好投奔革命！

所有的议会党团，从立宪民主党到极左派，甚至拒绝讨论政府纲领的实质，只有些愚昧的农民代表提议说：

“首先要工作，与政府一道工作。俄国派我们到这里来，命令我们不能光注视革命的办法，而且要努力通过和平的途径满足人民的要求，减轻人民的饥饿，给人民以希望。”

社会民主党团的贾帕里泽提出一个过渡公式：

“‘国家杜马’完全赞同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认为只有靠人民的支持才能把人民的意志写入宪法。”

即采取起义的方式。

然后，这位忍无可忍的沙皇总理大臣，在左派发言者的暴风雨般地攻击下，既没有逃之夭夭，也没有隐藏起来不见人，更没被吓倒，他身着黑色礼服，如同大理石塑像般威严的气度，神秘自信傲然的姿态，令他无法忍受的原因在于他不是行将就木、满身樟脑味的老朽，他也不是丑八怪，不是侏儒白痴，他潇洒英俊，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当然他必然会成功，他独自一人面对 500 人。他在讲台上以洪亮、清楚的声音说：

"仇恨的语言、怨恨的语言、恶言相加、不是协同工作的语言，但我不会用这样的语言讲话……当政府忘记政权是俄国人民完整性的守护神或背离它职责的时候，它曾经或即将给革命让路。我声明，政府的席位不是被告席。在这历史性时刻，我们的言行要对历史负责，各位也一样。政府欢迎任何公开揭露政府的组织混乱、滥用职权现象。但是如果打算采用攻击的方式麻痹政府的意志、攻击政府组织，并且威胁政府举手投降的话，那么政府会以十分沉稳冷静和合法意识的回答说：'你们吓唬不住我们'！"

他的一席话给敌人和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少年来反对派头一次遇上他这个气度不凡和坚定果敢的敌人。

在杜马之外，他的这一席讲话很快出了名，他收到成千上万封带签名的支持信，他给莫斯科人回信中说：

"要拯救俄国，我并不指望靠我个人的力量，而是靠集体的精神力量，而这种力量不止一次来自莫斯科。"

在这一时期以及此后 10 年间，混乱时代的形象又勾起许多俄国人的担心，引起演说家们的关注，鼓舞了活动家们，由于我们尽力而再次重演。

但是，在 1907 年，由于斯托雷平的伟大改革纲领和他那一个著名的演说，一个除了争论毫毛能力的杜马已暴露无遗。

尽管战时军事法庭法案没有得到杜马批准，一个半月后就自动失效，为什么杜马还是愤怒地谴责这个法案呢？因为实际上战时军事法庭法案已经在实施。又过了一个礼拜，斯托雷平再次出面回答说：

"我们听说，政府双手沾满了鲜血，战时军事法庭是俄国的耻辱，但是国家

处于危机时刻，政府有义务实行非常法，以防止国家崩溃。这个原则，适于个人，也适于国家。当一个人病危之际，要进行以毒攻毒的治疗。当杀人犯向你们进攻的时候，你们也可以杀死他。当国家肌体从根本上动摇的时候，政府有权中止法律实施过程和所有权力准则。国家生活中常常出现生死攸关的决定性时候，那时应当在理论完整化和国家完整之间做出选择。临时性采取的措施不能成为经常使用的措施。对恐怖分子的血腥妄想，绝不能任其发展，而应以武力对抗。俄国能够分辨出刽子手的手上血迹和善良医生的手上血迹。国家不期望软弱无能，而期盼对它的信任。我们希望听到你们对血腥的疯狂行动实行绥靖政策的赞同。”

啊，不! 那可不行! 如果是彻底放弃恐怖手段，就不能再代表他们的政党。你们终止你们的战时军事法庭，而恐怖手段，我们一定要继续干! 杜马，当然拒绝宣告：报刊赞扬恐怖行动和在军队中进行反政府宣传有罪。

杜马，自然不会着手审查政府预算，审查斯托雷平的宪法草案尚不是二十分之一，草案中尚无“基本法”概念。杜马各委员并没有开始工作，因为各委员都没有工作习惯。杜马对俄国的历史进程不感兴趣，但热衷为左翼社会鼓掌助威，鸣锣开道，在会议上，左翼人士的质问铺天盖地，后来，变成了试比谁声音更响亮，谁尖叫声更高。杜马的最高目标，可能拖长会期，直拖到战时军事法庭法案自动失效为止。之后，左翼人甚至希望解放杜马，以证明左派强大和政府无能的神话。

农民平等权利法案，由于没有得到杜马批准，不得已搁置起来了，而且斯托雷平的所有有关土地的法案也被束之高阁，相反，本届杜马与首届杜马一样，在会议上要求强行剥夺地主的土地。斯托雷平再次出面说服：

“全部土地再分配，整个国家将会颗粒无收，分配地主土地，不是国家的决策，俄国决不会因毁掉13万户高水农庄而变得繁荣富强。农民的份额虽因再分配有所增加，但在居民人口的快速增加和再分割条件下很快就化为乌有。总之，任何土地再分配都不利于发展，要发展经济，就得深化劳动。一旦再分配土地体制启动就不仅仅停留在分配地主的土地，进而要瓜分富裕农民的土地，所有

优秀的东西都得崩溃，分地的成果为零。”

“绝对不可用从身上割下来的肉来增强整个病体，应当用高营养的精华注入患处，那时整个肌体就能战胜疾病；国家的所有部门都应当帮助最弱势的人群。在这个方面，国家作为社会的整体，是义不容辞的。”

国家预先购买一部分准备出卖的土地，用社会土地基金来补贴，让无地少地农民以打折扣的优惠价格获得土地。

不行！这种平淡无奇、索然无味的决定，既没有杀人越货，也没有纵火烧毁农庄，不能满足俄国自由爱好者的口味。

斯托雷平一如既往，坚持己见：

“政府意识到它的神圣职责是保护俄国历史遗训，政府是坚定的、纯俄国式的……”

“为何又提出纯俄式的这种臭名昭著的弦外之音呢？还有‘俄国的历史遗训’，究竟是什么货色，有谁还需要它？”

“国家体制的敌人一直想摆脱俄国历史过去，其他强大的和坚定的民族中有人向俄国建议把俄国变成废墟，以便在废墟上建立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祖国。”

他又一次引用名言，高声地、清楚地、铿锵有力地、斩钉截铁地说：

“他们需要大动荡，我们需要一个伟大的俄国！”

斯托雷平作为一个悲观的预言家，缺少统一的理性智慧，以其仇恨杜马，憎恶进步社会，敌视投掷炸弹的社会主义者而载入俄国历史史册。这个不知疲倦的总理大臣，从不放弃参加诽谤他的会议，在会议讨论之前勇敢地发言，明白无误地、信心十足地阐明政府观点，以期消除成见和混乱现象。

10年过去了，二月革命前几个月，当那些无足轻重的大臣们，频频更迭而搅乱社会，让俄国丢丑的时候，人们想起了斯托雷平和他的对手，连克伦斯基也认为，斯托雷平的话从来都不是言之无物的。

“有谁还记得斯托雷平的第一个声明？杜马是怎样紧张地倾听他的每一个字么？有人热烈欢迎，有人满怀仇恨。但大家都知道并且相信，他的话不是徒托空言，放空炮，而是拥有坚强意志和崇高权威的强力政府的决心，能使其许诺

付诸实施。"

正是由于斯托雷平执政，才能够开拓和开创了俄国历史的全新时代。的确是，1905—1906年那段历史不会重演。斯托雷平对他的亲密合作者说过，再过10年到15年，革命者在俄国什么也捞不到。斯托雷平如此相信俄国，并从俄国身上吸收了坚定信心的力量。

俄国在其生存的第二个千年也垮不了!?

他接手一个漏洞百出和混乱不堪的国家生活，并创造性地把它引向一个没有贫困、没有愚昧和没有无权地位的俄国。

他不知疲倦地在第二届杜马讲话，以期引导它、拯救它，能让它正常工作。他这样做是为了留下一个不可改变的遗产，那就是人民代表要行使权力，就要相信自己，相信俄国，到那时一个宪法管理国家的时代就开始了。而他自己一定是法治国家的坚定卫士，他对待杜马要比杜马代表对待杜马更认真，并且他依然相信能与第二届杜马合作，而后再去解散这届不良的杜马，是为了得到更糟的下一届杜马吗?

斯托雷平也承认第一届杜马解散难，而第二届杜马保存也难。

在"国家杜马"代表们的高声大叫之下，杜马批准适龄青年应征入伍时，梯比里斯人祖罗夫跳上讲台，用蹩脚的俄语诽谤整个军队，嘲笑俄军作战失利，说俄国军队一贯不堪一击，将来也只能挨打，只是镇压人民干得很出色。而杜马代表吵吵嚷嚷地赞同祖罗夫的侮辱性的言论。在杜马之外，广大社会阶层，义愤填膺，几乎到了同意解散杜马的地步。

然后，斯托雷平竭力保留杜马，突发事件不能留下任何后患。

从春天起，斯托雷平一家就忍受不了冬宫的监狱般生活，按陛下的邀请，他们全家来到叶拉金宫夏。花园用铁疾篱笆围起来，外面有游动哨兵，内部有警官保卫，现在只能在宫内散步，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大臣只能在这样用栅栏搁隔起来的涅瓦河汉乘小船划行100俄丈，因为恐怖分子的封锁仍在继续。

他受伤的女儿已经做了好几次手术，仍不能站立行走。

在叶拉金宫，斯托雷平依旧在思考和决定俄国宪法的命运。

国家体制崩溃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心理因素，因为已习惯了掌权的集团，先是没有赶上，后来又不愿意看见和赶上新时代变化的步伐，即应在自己占有较大优势的条件下，处于最有利的地位时，做出深谋远虑的审慎让步。一个英明智谋之士，应当手握武器，不是仰面朝天被打翻在地时做出让步。让步之初，不可抗辩的权威性、政权、封号、资本、土地、不断被荐举等，当你的一切权利被慷慨的太阳洒满阳光，没有任何风暴来临的征兆的时候，这对人的本性是最难以接受的。

亚历山大一世当政时，这样开明的改革已经起步，但由于他缺乏远见卓识又被摒弃和废除。战胜拿破仑的卫国战争胜利蒙住了作为政治家亚历山大的智慧，本来改革的最佳时期应在战后进行，可惜，失去了机会。十二月党人起义猛然使俄国偏离正常轨道，胜利者尼古拉一世错误地理解了他的胜利，他由此得出结论，这次胜利给他一个暗示，似乎能一劳永逸地阻止革命运动，只有他统治时代结束了，才能再次发生革命。

亚历山大二世急于进行改革，但国家未能走出坎坷的低谷，踏上平坦之途。恐怖分子出于他们乌合之众的本性和革命恶毒心理暗示，认为现在正是他们进行暗杀的最后时机，认为只有靠开枪射击和扔炸弹才能葬送改革，恢复革命行动。他们得以成功后进一步设想，他们能使亚历山大三世因其性格宽厚可能做出广泛的让步，由于他爱俄国不会放弃复兴俄国的途径，他们逼使亚历山大采取不合作和顽抗的态度。于是，又一次失去了机会。

尼古拉二世，意外地登上王位，由于他的年龄和软弱的性格，对俄国最严酷的年代和延误的时间局面，最最缺少充分的准备。1901 年、1902 年和 1903 年，稍纵即逝的紫红色的曙光擦身而过，他和他身边的所有官员却不明白曙光的征兆，他认为永恒不变、唯命是从的俄国，必定要服从占据俄国王位者的意志，而这样的轻举妄动又碰在日本的峭壁上。在他经受考验的年代，只有彼得大帝才有能力应对，此外罗曼诺夫王朝中没有第二个人。当时，处于绝望中的尼古拉二世，签署 1905 年宣言以自保。

宣言草率匆忙，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缺乏造诣和底蕴，是在进退维谷的情

况下匆匆草拟的，但毕竟已经公诸于世。当今，王朝圈子里人人执迷不悟地认定，俄国是一个没有发展前途的顽石，甚至以愚蠢言行和挫败两届杜马而沾沾自喜，他们纠缠不休，要收回宣言，再恢复旧秩序。他们不仅唆使陛下背信弃义，而且要重蹈以前两次失败的覆辙。

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完全拒绝立宪机构、拒绝让步，也是行不通的，否则只能促进革命爆发。俄国无论怎样也不会回到1905年以前的状态，制订宪法，意味着应当学会按宪法办事。

但这种趋势任其发展，就会不断扩散尔后脱离正轨，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很快就引向革命。维特的选举法召集到塔夫利宫里来的，不是俄国，而是一幅俄国的讽刺画。这部选举法依旧不能真正代表俄国，因为还没包括那部分准备参加普选的公民大众。因此，为保留杜马，就必须修改选举法。修改选举法虽然是沙皇的旨令，但宣言发表之后，又有违法律，可是没有其他途径塑造具有工作能力的杜马，简单地解散杜马，又会激怒大众，引发新的更混乱的动乱！处于这种矛盾状态，只有采取不合法的方式修改选举法，才能体现真正的选择制和真正的人民代表权。

历史上最艰难的行动路线是走在两侧都是无底深渊的刀刃上，必须要保持平衡，既不能掉在这一面，也不能掉到那一方。只有处于两个革命之间，两方敌对群众之间，在两种平凡和庸碌之间，才是最可靠的行动路线。

这年夏天，斯托雷平秘密地会见了立宪民主党人（戏称“黑百人团”分子）马克拉诺夫、切尔诺科夫、司特鲁韦、布尔加科夫，寻求商定组成新一届政府，既不得罪左翼，又不伤害右翼，走中间路线。秘密会见是分别进行的，斯托雷平亲自接见，他以直率、坦诚、安详的信任目光，准确得体的谈吐，以及他两眼闪烁着智慧和坚定之光，使这些立宪民主党人五体投地。

俄国政府两年间至少三次试图邀请社会名流和社会团体分享政权，但都遭到拒绝，因为他们害怕玷污了名誉，扮演激愤的反对派角色更容易一些。俄国急进派幻想，从根基上，到那时再建立新的、完全自由的、亘古未有的、非常美妙的俄国新政权！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他们是否需要君主政体。他们不会，也

没有学会管理政权，只是幼稚地以爆炸和纵火自娱。况且，斯托雷平毫不怀疑地确信，杜马永远不会批准他的土地改革计划。

与立宪民主党的四套马车的最后一次会见是6月3日深夜在叶拉金宫进行的。

早在5月份就出现了突发事件，即一名杜马代表的住宅里，警察侦察到由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成员与革命军事组织代表一起开会，立即实行逮捕，但杜马代表旋即释放。

6月1日，斯托雷平突然向杜马建议说，为其参加反政府的阴谋活动，杜马应当开除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55名代表，并同意对其中15名牵连较深者加以逮捕。

“政府除了有义务保障代表的不可侵犯权外，也有义务保卫社会秩序，况且在首都这样事故多发的地方。”

社会民主党杜马议会党因在彼得堡大区不加掩饰地进行破坏性宣传。5月5日士兵代表团携带着有关他们要求的请愿书，来到涅瓦大街92号，在一位代表的家，杜马代表正在等候士兵代表团的到来，警察监视到了他们的活动。

杜马茫然。代表们吵吵嚷嚷，提抗议，认为他们代表不可侵犯，甚至包括任何活动的委任书。杜马主席戈洛温巧妙地摆脱了困境，寻找到一个正式的步骤，以避免杜马落到两难结局，站在颠覆者一边，或者抛弃他们。但也不能规避推诿，6月3日当局逮捕了来不及躲藏的15名社会民主党的杜马代表，但并不会解散杜马，公布新宪法。附有沙皇的声明坚持说，此举并非10月7日宣言的倒退，人民的全部权利均予保留，但许多由居民派来的代表不是来真心工作，而是来煽动暴乱，极力促使国家瓦解。

因此，现在只好改革选举体制，以使被选举的人更忠诚于人民的需要。

尽管斯托雷平做最后的努力来体现农民的利益，他目前还是缩减了农民中没有受过教育的代表虚数近一倍，也大大增加了大地主代表名额，首先是受过教育、富有经验同时拥护地方自治的人员。

如果说沙皇关于解散议会的旨令中没有阐述自由主义思想是不可容忍的，

斯托雷平不是如此固执地提高他特有的俄国式的调解，那么这一次解散杜马以及如此解释解散杜马的理由，也不至于引起社会各界如此强烈的不满情绪，也不致留下如此长久难以愈合的伤痕：

"'国家杜马'精神应当是俄国式的，我们强大的祖国的其他民族应当在杜马有他们所要的代表，但将不体现在他们可能成为俄国问题主宰者的数量上面。"

缩减了东方边区的选举权，增加了外高加索、波兰代表人数，各省城的地位更加稳固。斯托雷平可能一再重复说，问题不在于安抚警察，而在于逐步地、有耐心地建立一个法治国家，并说谁也不能马上办到。不！他们不想听，也不想听从。俄国社会承认6月3日采取这个决定性步骤是国家改革，而国家先天不足的左翼部分敢承认变革，后来在建设俄国的尝试中与政府合作，不再像恐怖分子扔炸弹那样把俄国炸成碎片，即所谓"6月3日政变"。

侨居国外多年的B·马克拉科夫，经过几十年的观察研究，也不得不承认：

"6月3日这个日期对我们而言，不管从字面意义或否定意义上看，如同12月3日对法兰西一样重要。但经过了所有苦难之后，这种判断也是不全面的。如果说这次变革中止了从历史上因袭下来的政府与先进的社会舆论残酷斗争的激烈的残暴时期，那么这次变革恰恰是政府与社会在制订宪法方面开始协同工作的一个短暂阶段。如果不是1914年爆发欧洲大战，那么俄国很可能继续没有社会动荡地、逐步地复兴，6月3日变革虽说是不合法的，当时却能帮助我们避免……政权在1917年之前的10年间，在丝毫不利于和平发展的局面下彻底崩溃。"

整个社会异口同声地咒骂斯托雷平，因为他的反动本性，因为他粗暴地践踏了宪法。可谁也没有发现，6月3日恰恰是俄国伟大复兴的起始点。人们由于激愤，心情激动，还没有看出，6月3日宪法除了种种限制外，扩大了地方自治权，地方自治合乎人民的利益。按斯托雷平的意见，地方自治并不是中央集权的附庸，具有古俄国精神和亚历山大的形式，应当成为整个国家的牢固基础。有工作能力、有积极性的地方自治，不是狂热的反对派（弗伦德党），也不是搞政治运动，而是强化和美化人民生活。这是斯托雷平的理想，他也想把杜马动

员起来，提高它，共同实现目标。

提高杜马地位，斯托雷平无能为力，但地方自治机构与内政大臣的关系，与斯托雷平主持的政府关系变化很快，十方融洽。斯托雷平对地方自治及其立法都是自觉自愿的。一个人身居高位，一般说能从更高层次看待迫在眉睫的问题，如深入研究国家法，研究俄国与西方的关系、军事科学和海洋科学。既然担当了国家重要职务，就有义务以十倍的勤奋精神投入工作。斯托雷平以极大的热情向热衷于地方自治的人士描绘他的设想，并注意对方的理解能力、记忆容量和办事能力。他与他们多次交谈并研究、跟踪调查他们的需要，积极收集有关地方的自治信息，努力讨他们的欢心。地方自治拥护者看他身居高位，又是实干家，并能准确把握全国和地方的需要，所以比较拥护他，而精神失败者大都离他而去，不管讨好或根本不讨好。

斯托雷平的前几任内政大臣和许多省长为地方自治设置了种种障碍，使问题复杂化，地方自治局又醉心于政治，地方自治的这种畸形发展在革命年代越演越烈。斯托雷平却认为，地方自治几乎就像独立农庄一样，是俄国的理想财富。他上台最初几个月就断然恢复了地方自治，恢复了亚历山大三世执政时期废止的乡级农民集会上公开直选县自治局，为农民开辟了进入县自治局的自由之途。他废除了省长对地方自治开支预算的监督权，他责成教育部每年拨给地方自治学校相当数量的奖学金，地方自治局的另一部分补贴来自农业土地规划总局，即给予农户各类农业技术指导，包括建立试验田、防止水土流失实验站、兽医站、农业机械租赁站以及提供大批土地测量、土地规划和农艺方面的人才。斯托雷平支持农村信贷，公司和农业合作社、农业地区的防火，为此他多次召开了各方面专家的全国代表会议。在斯托雷平的主持下，地方自治代表会议的性质起了变化，对政府已抱有友善态度。

“我在地方自治局、城市和政府的亲密友好关系上面预见到俄国的未来。”

斯托雷平不断促进地方自治活动日益兴旺，从根本上说是希望通过地方自治在全国范围提高农民的耕作技能。他尽了一切努力，好像这一切都是一致同意他追求一个重要的神圣的目标，那就是提高农业大国——俄国的国际地位。

1907年11月第三届杜马召开之际，斯托雷平要特别详细地阐明政府的施政纲领，所有以前第二届杜马没有涉及过的内容都提到议程上来了。最近几个月，他的施政纲领更加成熟：

"国家保证失去劳动能力工人的生活，为其上保险，保证他们获得医药帮助。"

斯托雷平为使其施政演说更能引人入胜，他完全脱稿，抒发个人感受：

"内部体制很不完善，改进行政当局工作还不够深入。目前基本农业阶级的物质福利还没有提高，农民生活依然十分贫困，没有拥有个人土地所有权，尚处于农村村社的高压之下，农民还是奴隶。"

那种与生俱来的、争强好胜的心理一直存在于斯托雷平的形象中，体现在他的性格上以及蕴育在他的命运之中，而在他对待反对派和社会舆论方面表现尤为突出。这一次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坦爽，要求赶快结束流血的混乱状态，要求这届杜马有工作效率。车轮没有陷入无底深渊，从悬崖边缘上拉了回来，真的就不会再有革命了吗？

现在，所有的人都看得清楚，极左派造成的破坏性的运动已经变成了公开的强盗行为，并把所有反社会的犯罪分子推向前台，使百姓家破人亡，腐蚀了青年一代。

但是，暴动已经镇压下去了，还没有做出任何让步……为实现理想必须有坚强的意志，只有具有成熟国家思想和坚强国家意志的政府才有权存在。

现在，斯托雷平把俄国从崩溃的边缘引向复兴之路之后，已拥有从来不曾有过的力量和权柄出现在杜马面前。"六月三日政变"之后，他不是以被告身份出现的，而是证明否决宪法的途径是正确的，他宣布：

"恢复秩序和恢复法律制度，应适合俄国人民自觉心理。"

这样危险的固执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在俄国路线的实施方面。

"我们的改革，为使其具有生命力，应当从俄罗斯民族汲取力量，即从庶民发展和自治发展中汲取力量，拥有土地的下层居民一旦与国家政权联系起来，他们的创造力是无穷尽的。下层庶民人数超过一亿，国家的全部实力却蕴藏在

他们中间。”

这种固执的思想，受到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者的百倍嘲笑。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怎么会不怕世人耻笑呢？

“人民有时忘了自己的民族根基，这个民族必然要灭亡。”

斯托雷平以毫不留情的记者眼光，一本正经地一点不客气地宣布：

“俄国与基督教保持了许多世纪的联系，对俄国历史基础的专一信仰是对没有根基的社会主义的一种抗衡。”

他甚至要教训最爱自由、受过高等教育、对自由有深刻理解的俄国公民怎么理解自由概念本身：

“当前的自由，由公民的自由和对国家体制和爱国主义的感情构成的。”

第三届杜马近日否决了对陛下称谓“专制君主”的字样，而斯托雷平不顾暴露他的腐朽守旧思想，贸然教训人民选择的代表，甚至讲专制制度的价值：

“历史上专制制度政权和君主的自由意志，都是俄国国家体制的最宝贵财富，因为这种唯一的政权的唯一意志，在动荡不安的危机时刻得到承认，才能拯救俄国，把俄国带回到秩序和历史真实的坦途。只要俄国存在，俄国的全体儿女就要努力保卫沙皇的至高无上的政权，因为只有沙皇政权才能把俄国团结起来，防止国家衰落。”

他并抱有为时过早的希望说：

“在俄国，实力不能高踞权利之上。”

他预测到，通向议会制度之路，既曲折，又漫长：

“俄国是从自己的根发达起来的，因此绝对不能把异国的花朵固定在我们俄国的树干上。”

他如此强词夺理，杜马左翼人士不能再保持沉默了，立宪民主党人也不能再失去自我。罗季切夫高踞该党其他负责人之上，也是立宪民主党一流的能言善辩的演说家之一，他从来不会心平气和地讲话，只有在激情之火燃烧中，才不至于以己度人，谈到所谓俄国时：

“俄国根本没有历史，最好不要谈历史。整整1000年间，正由于专制制度，

俄国没有培养个人，而没有个人便没有历史。”

这种提法，在当时非常时髦，即断定人满为患的俄国没有人，至少也得默许他们是土人。于是他以压倒俄国所有的激进派宣称：

“当有人对我谈到真正的俄国根基，可就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样的根基？民族感情我们有，可在促使我们首先要求实现权利。我们中每一个人都相信，他的权利将不会由于国家利益而遭到破坏?!”

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直到今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解决，重量中心永远摇摆不定，如获得权利又不负担繁重、危险的义务？或者以义务加以束缚又不赋予权利？或者如何找到二者间的敏感平衡呢？

罗季切夫是否找到一种办法，使他的演讲成为经典式的演说，又没有饱含着他的立宪民主党的暴怒之情呢？他又得寸进尺，继而谈到战时军事法庭，虽然他以极大的热情引经据典，摘引箴言警句，以及对他的贪得无厌政党那份专注情感也不至于驱使他用手指拉紧他脖子的扣绊，叫它“斯托雷平领带”（换个名叫“穆夫约夫衣领”），尽管如此，他的演说依旧不能载入史册，留名千古。

他在等待掌声，这也是反对派首脑人物习以为常的事，但是这一次还没有等到他面对大厅展示带有倦意的幸福时，面色苍白的斯托雷平起身从政府席走出去。会议大厅里响起一片震耳欲聋的喧哗声，杜马大厅中有一半人敲桌子，高声叫喊，许多人跑到讲台上来，威胁地包围罗季切夫。在无法控制平息喧闹声之后，议会主席宣布休会，不是休息，而是他自己首先离开会场。在一个高个子立宪民主党人的掩护下，他退到叶卡捷琳大厅。人们又追上他，提出决斗，他们要做总理大臣的决斗副手。斯托雷平作为总理大臣并不是那种对侮辱他的人寻找法律条文伺机报复的人。这时他的整个身心都投入了寻找那个不能限制、不容惩处、一直到允许卖淫嫖娼的20世纪自由词汇的答案——应当发出力士般的号召，做出一个男子汉的大胆决策。尽管他已经信心百倍地领导一个摆脱混乱并日益稳定的俄国，但他没有因为愤怒而失去自制力忘记预先树立一个对俄国十分宝贵的自尊自重的榜样，由于自尊他可以对个人受侮辱予以蔑视不计。从他担任多个国家要职的内在力量来讲，他是个豪杰义士，一个侠肝义胆的人。

他一直在推行他自己的国家路线，他用心、用智慧和生命做赌注，甚至没有留下哪怕一瞬，放下这一切去用于欺凌他的人去计较、纠缠，并且时时刻刻准备着每一天天明之后便就义献身。只有生命特别宝贵的人才具备置自己生死于度外的慷慨大度胸怀。

一位塞瓦斯托波尔将军的儿子说过：

"我不愿意让我的儿女留在身边倾听绞刑执行官的喊声。"

不合时代精神，更是令人吃惊！罗季切夫像所有立宪民主党人一样，已经惊慌失措。他们多年来习惯于玩弄机智圆滑语言，而忘记了侮辱人可能引发勾动手枪的扳机。他们惯于利用华丽的辞藻嘲笑所有异己的人，他们刚好忘记了要为自己的话负责，乃至以生命为代价。

总理大臣是有6个子女的45岁的父亲，可以毫不犹豫地押上自己的生命。53岁特维尔的代表对于这一剧变毫无准备。于是他趁休息时间来到杜马大臣室，跟在斯托雷平身后恳求他原谅。斯托雷平轻蔑地打量他一眼说："我宽恕您！"但并没同他握手。

性格的力量，在一年半之前俄国根本无人知晓，这种力量渐渐显示出来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斯托雷平一直留到会议结束，杜马对他采用了罗马凯旋式的欢呼。罗季切夫又登上讲坛收回的话，请求斯托雷平宽恕。这一切是15次会议上绝无仅有的怪事。

然而，尽管罗季切夫收回前言，"斯托雷平领带"却留名历史，要不然就是时代的错位。这是一个公民无边自由的时代，也是一个毫不负责任的非难责备的时代。

同年，斯托雷平一家又回到冬宫那空荡荡的死寂大厅过冬。在冬宫，更难让人相信专制政体还能有所发展，匿名恐吓信纷纷而来。恐怖分子一直想用铁和血来动摇不可动摇的总理大臣，甚至要防止他在杜马会议被杀。社会主义革命分子持意大利记者的护照，从记者席向他开枪射击。斯托雷平还住在药房岛的时候，虽然没有预感，但他知道，他不能善终。每一次当他离开家门时，他都默默地与亲人告别，并一再说，如果他在哪里毙命，就把他葬在哪里。

亚历山大·古奇科夫许诺十月党人支持斯托雷平。但他的支持是反复无常的、有条件的，有时友好又令人高兴，有时干脆拒绝支持，发生争执乃至冲突。6月3日宪法改变了杜马形势，虽然新一届杜马仍热衷于政治表述，而对事务性工作热情不高，第三届杜马中古奇科夫的十月党人超过了立宪民主党，已经不能形成从另一方面阻止斯托雷平改革的强大右翼力量。这样一来，这届杜马给人以政府能与温和的社会舆论和解的希望，舍此斯托雷平将无望拯救俄国。这届得到加强的杜马，有可能与拥有无限权势、往往是隐蔽匿名的宫廷势力——君主统治的吸血鬼们抗衡。

议会机关领导层的那些人，犹如强弩之末，依赖十月党人多数的支持偶尔尝试与斯托雷平抗衡一番，只有俄国民族主义派坚定地站在斯托雷平一边。1908年初，首先从建造四艘战舰一事引发一场冲突。在当年，建造战舰对俄国来说并非小事一桩。对马岛海战全军覆没后，俄国海军全部最好的海上作战力量都沉没到日本海海底。俄国已有三年没有海军，而零零散散的舰只已经没有任何组合舰队的意义了，难以胜任海岸防卫任务。海军领导层和政府迫于战败，不敢宣布大规模海军扩建计划，只建造四艘战舰，俄国资金尚可承受。反对意见，并不在于海军不需要重建，或者要价过高。社会的反对意见在另一个方面，古奇科夫在杜马会议一直固执地坚持他的意见：

"海军主管机关，决策有误，指挥不灵，组织混乱，首先要改造海军。我们的批评在微末小节上表现得过分幸灾乐祸，爱国主义的悲愤情绪培育这种停滞风气。我和我的政治盟友怀着痛苦的心情拒绝战败后的政府拨款等。然后，1905年宣言曾许诺：'在祖国面前承担起道义上的义务，就是改正我们的错误。'"

这三年间到底干了些什么呢？海军仍在徒然地装点门面，而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对舰队在日本人奇袭下全舰覆没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但他受惩罚了吗？没有，他仍在参议位置享福。杜马十月党人多数拒绝拨款，首先要求裁减海军部的庸员，清除腐败作风。

从深层次看，他仍是对的，而且斯托雷平本人也不能不同意他们的意见。

可是，这次清洗工作受到宫廷圈子里人的干扰。要从更深层次看，俄国的外部敌人并没有错失良机，俄国处于孤立无援地位，没有回旋余地。俄国所期望的和平时期，要有强大的海军做盾牌。斯托雷平以不知疲倦的精神，令人吃惊的随机应变的态度，采取花样翻新的手法，提出层出不穷的理由，顶着压力在三个会上——杜马执委会、杜马大会和政府内阁会力争，但每次反对意见占大多数，都让人吃惊：

“如果不改变预先确定的意见，那么证明可能存在相反的观点，而且是极不合理的。”

并不是任何一个富有经验的总理大臣都能够有如此大的毅力并能如此尊重论战的对手。而且，没有一个沙皇大臣能在任何地方、任何人面前引经据典，如此机智灵活和固执倔犟，这样直言不讳地提出理由，对各种理由加以一连串比较分析，并且如此生动活泼，妙语连珠，赢得同盟者和反对者的笑声阵阵。

“如果一个中学生撕了考卷，绝对不必夺下他的教科书以示惩罚。”

他开导说，这样做有利于集中国家的能量，全世界都在重建海军，而俄国无力保卫国家的海岸。整个海军舰只集中在一起也不过是一堆古老的瓷器，而不是训练有素的作战力量；海军不过是一个个散在的舰只，没有真正意义的舰队等，都一一做了精确的说明。他恳求杜马不要让政府推卸对俄国海上自卫的责任。

杜马随之又很快否决了他建设阿穆尔铁路的拨款议案，倒不是反对这一遥远的边区蕴育着异乡的精华，俄国将要失去它的提案，而是认为如此巨额开支，对于一个日益衰败的国家难以支撑。更确切地说，杜马自身还很稚嫩，不够成熟，还没学会从国家的立场考虑问题。

在另一些场合，斯托雷平一再说服杜马，但毫无结果。于是，他就抛开说服这一极端跳向行动这一极端，利用杜马休会期，炮制他的“八十七条”。在这两种情况下，复会后的杜马没敢废止它没有批准已经开始建设的工程，即战舰工程和阿穆尔铁路工程。斯托雷平以同样的手腕制订了俄国正教团体法——关于从一种宗教信仰改为另一种宗教信仰政策。但就斯托雷平本身来说，有一种

可怕的误解：他不是宫廷大臣，他的卓越之处不是靠什么人的庇护，也没有一天是靠人庇护办事的，而他的平衡路线如果没有杜马支持任何时候也无法实行。他确实需要杜马的支持，因此他使俄国相信，宪法管理国家的时代已确立，然而他真正需要的又不能得到杜马通过，所以他需要绕过杜马。

那么国家管理方式又该是什么样呢？以使忠诚祖国的管理者，为国家的利益更迅捷更有效进行管理呢？立法机关的果敢、稳定的实践，在所有国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即使在这已经稳固、完全不再疯狂的第三届杜马面前，斯托雷平也不得不年复一年地坚持对出版界这个所谓的“革命母亲”实行限制措施。

“如果有一个疯子，他现在大笔一挥在俄国实行不受限制的政治自由的话，那么明天彼得堡就会召开工人代表苏维埃，半年之后就会把俄国推向火的炼狱。”

并实行特别措施反对恐怖活动，古奇科夫同他的中间路线多数派开始予以支持，后来又要中止支持：

“诸位代表，你们想想，缓慢复兴的俄国如果装点种种自由放任的绯红色，那么它不再是健康的。我们内政部的任务就应在炸弹和勃朗宁之间解决，一旦精疲力竭、病入沉疴的人民躯体强壮以后，特别措施就自行消亡。”

一次又一次讲演无疑显示出斯托雷平的本领和才能，如一瞬间就能理解劈头盖脑的反驳意见的含义，瞬间回答反驳意见机敏智慧、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对深藏暗处的次要含义不放过，即使提出，作为演讲的框架和实出要点，概念、定义、程序的微细差异也不容忽略，同样也不能忽视引用西欧国家法的必要例证。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雄辩口才，通俗易懂的对比，总是集中阐明一种思想，有时使听众赏心悦目。在国内，整个僧侣阶层，在上至国王下至地方警察面前，宁愿保持沉默，躲避正式命令，而这位不可思议的沙皇总理大臣用同他书法一样清晰明确的演说降住和说服他们的反对立场。他从不逃避参加会议，每会必讲，利用每一个机会，一步一步推行他自己的事业，“播种”自己的信念。由于他那颗炽烈燃烧的心，哪怕在最方便地无声躲避的地方，他也不能保

持沉默。

例如，1909年2月，当时反对派质问阿泽夫事件。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因为阿泽夫而屡遭挫折，使该党的许多活动破产之后，提出了有关恶魔两面派阿泽夫的复杂又怪异的一幅图画，似乎政府参与了反对自己的恐怖活动，政府制造一批阿泽夫，刺杀身居高位的人士，目的是瓦解革命。这一个控告政府的漂亮口实，于是俄国舆论界立刻就不经检验地积极响应，大吹大擂地宣传一通后，2月11日反对派在杜马，犹如迅雷般突然提出质问。按照法律程序，斯托雷平根本没有义务在杜马公开回答质问，他可以缺席回答、一个月后采用书面形式。但他个人断然亲临杜马，听左派那些尽是未经证明的、不顾事实真相的、充满对政府和国家体制攻击诬陷之词的发言。反对派演说家波科罗夫斯基和布拉特，除了提出令人眼花缭乱、耸人听闻的假设之外，在座无虚席、气氛紧张的杜马大厅，不能举出一个事实为自己壮胆。斯托雷平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投入战斗，他有力地证明，左派领袖在传播神话，以期拯救他们的旗号。我不能保持沉默，留言在此，以备查存，舍此今天无法发掘全部真相。

斯托雷平这样激昂，并非不受前任警察首脑洛普欣[1]的影响，后者向革命者们提出阿泽夫的内部信息，并帮助布尔采夫编造阿泽夫的神话故事，在受过如此良好的教育的俄国人中间流传，岂不说明他们的脆弱吗？特别在王位周围的国家官员中间流传，岂不很可怕吗？洛普欣想方设法挽救自己的前程，因为主要谋杀对象普列韦和大公爵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他当权时毫无阻碍地被杀的。他疏忽防范那个阿泽夫，采取恶人先告状伎俩，一股脑儿把罪责推到阿泽夫和他雇用的合伙人头上。过去，由于疏忽牺牲了自己的领导普列韦的性命，今天不惜屈尊会见杀害普列韦的杀手萨温科夫，以便诋毁阿泽夫和政府。他甚至发信向斯托雷平提出抗议，因为斯托雷平不准他去伦敦会见恐怖分子，并把该信署名的副本转寄给侨居国外的社会革命党人，以便在西方报刊发表。这一切反映了洛普欣其人的卑劣本性，莫过于他的恶意诋毁，他说像阿泽夫这样人

① 洛普欣是斯托雷平的中学同窗。——译者注

有几十个，或者几百人？这样身居高位、口蜜腹剑的人能构成俄国的领导层吗？

现在，斯托雷平在杜马会议上历数无可辩驳的事实。阿泽夫从1892年起，一直到死前始终是警察局自愿的秘密同谋，甚至是个始终如一的头等合谋。到1906年萨温科夫被捕时，阿泽夫无论怎么说也没有参加过社会革命党的恐怖活动，但从党内熟人得到的个别情报，都能及时自觉地通知警察局。格尔舒尼是恐怖行动的中心人物的情报是他提供的，他阻止、干扰了对彼别多诺斯采夫的谋杀，阻止一次刺杀普列韦的行动，并提供了准备刺杀特列彼夫、杜尔诺沃和再次刺杀普列韦的情报。由于得了眩晕症，普列韦1904年7月再次幸免于难，他甚至指出凶手正是叶戈尔·萨佐诺夫。而控告中好像指出阿泽夫也参与了刺杀普列韦和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的行动。他不顾事实，胡编滥造，因为这两次刺杀事件发生时，阿泽夫都在国外。当时作为社会革命党的实习地，社会党负责领导人和鼓吹者经常到实习基地，为执行者打气，他们都亲眼见到过阿泽夫。而格尔舒尼刺杀西皮亚金时，他在伊萨基广场；谋杀彼别多诺斯采夫时，他在涅夫斯基广场；处死鲍格达诺维奇时，他在哈尔科夫的“季沃利”与杀手并肩而坐，杀手动摇不定，他督促他采取行动。而那个萨温科夫，刺杀普列韦和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时，准备谋杀特列彼夫以及塞瓦斯托波尔的教党广场，处处都有他参与。1906年，当准许阿泽夫参加战斗组织，他断然使战斗组织的所有行动都瓦解了，没能完成任务。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讲“奸细”一词不适于阿泽夫，这是革命者掩盖自己失败的惯用词语，也不能叫做警察局的谍报，而且也不是犯罪嫌疑人。

“在这件事情上与其说有利政府的亮点，倒不如说是革命的必然的黑暗一页。各位先生，当在受诱惑的青年和姑娘面揭露革命上层人士的全部龌龊行为时，他们（她们）会胆战心寒。纵容有关政府犯罪的耸人听闻的流言蜚语，把一切罪恶阴谋诡计和伤风败俗道德沦丧的劣行统统推到政府头上，把革命队伍中混乱和失误推到政府身上，也未必有利。”

顺便提出了希望：

“天真的政府会亲自帮助清除革命前进路上各种障碍!”

我们拒绝使用任何秘密的谍报，只用于防止刺杀行动。

“我们整个警察体系只是一种手段，为生活、劳动和实施法制创造条件。而罪恶的挑拨离间行为，政府绝对不能容忍，任何时候都不能容忍。”

时间不觉过了午夜，他在鼓掌声中离开杜马大厅。对于一个活动家来说，只不过几年间，他经历了太多的杀戮，炸弹爆炸和勃朗宁射击轰响，太多的当政者惨遭杀害。经过这些血腥的岁月，预言本身已经深深渗透、积淀到人的意识之中。由于他有关阿泽夫真相的演讲，预言也随之破灭。

“我们搭起建筑的脚手架，敌人硬说是一座丑陋残破的建筑，愤怒地砍掉了它的基础。自然，脚手架要坍塌了，可能把我们埋到废墟中。但愿这一切发生在中兴的自由俄国大厦主要轮廓已经实现的时候……”

当斯托雷平的一席讲话压倒了反对派的嚣张气焰后，他满怀信心地认为，诚实和正义已不在革命的一边。不过按照自由派的时尚信条，不管“斯托雷平领带”或者“斯托雷平车厢”，百年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不是斯托雷平所讲真情，而是黑了心的布尔采夫关于阿泽夫是密探的神话。

关于自由概念的内涵，斯托雷平不得不多次与社会民主党进行论战：

“不能只浮在上面打出某种异想天开的自由旗帜，我们更有义务解放我们的人民，使他们摆脱贫困、愚昧和无权的地位!”

在内政或外交、行政、机构问题无一不涉及的讲话当中，他始终没有忘记对作为国家主要支柱对下层庶民的关怀。

“开垦我们贫瘠的、产量低下的、过分凋敝的土地，是我们未来力量的保证，土地就是俄国!”

可惜，由于实行冒了很大风险的6月3日宪法使第三届杜马大有起色，然而它依旧没有成为热心关怀农民事业的民族议会，最苦的差事莫过在第三届杜马中讨论农业改革问题。

自从发布包括第二届杜马制订87条的圣令以来，已经过去了一年，两年，可是第三届杜马，对其中每一条款，争论，再争论，反复争论不休，既不同意，又群情激愤，不断要求做出解释。立宪民主党人，由于持有狂热的反对派立场，

几乎失去了理性，认为斯托雷平在农村实行的恰恰是右翼自由派纲领，因此拼命地维护农村村社。右翼势力害怕突然与传统决裂，才一齐上阵保卫那个农村的社会，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对这一步骤，即解放农民劳动和农民独立自主的反感竟如此强烈。经过长达二年加半个夏天的争论，抓住每句话的微细不同含义不放，只是为了拖延法律的通过。这些律师和教授又冥思苦想地出了一个损招儿，即农户一家之主不能随意支配自家的份地，每一次处理家产都应得全体家庭成员一致同意，即自己的老婆和孩子点头批准。每一个殷实、独立、尊贵的城里人和地主都感到这种做法是对他在自己家中地位的侮辱。这帮律师和教授根据俄国作家的训谕，始终真诚地热爱被压迫的农民，神圣的劳动者，并因为他们效忠才选入人民代表，他们认为这样的农民在成年以后依旧如此无权利的，依旧是不可救药的酗酒之徒，他一旦得到属于自己的份地，会立即把份地换酒喝光，使他的家人沿街乞讨。如果地主和农村村社对他的监管都取消了，应当由家庭来管辖这位神圣的劳动者。对这种说法，斯托雷平的回答是，不能把所有成年公民交给他们的子女来监管，不能把整个公民阶级看成长不大的弱智者，把全体俄国公民都看成是醉鬼。

"绝对不许根据个别畸形现象来制订通用法律，我们为全国制订法律时，应当想到强人、聪明人，而不是醉鬼、意志薄弱的人，而且俄国强者占大多数。"

社会舆论界，一下子甩掉了这个"大多数"断章取义，颠倒是非，以千人一面的陈词滥调，信口雌黄地诋毁，胡讲瞎编，他们说斯托雷平的法案是把赌注押在有实力的农民身上，意思是说押在富农二道贩子身上，与他们和睦相处，从另个方面争取右翼选票，他说的"捍卫强者，实质上是更深层次的反民族原则"。斯托雷平顶着这个恶名，也和其他污点一样，这个办事过分认真的沙皇大臣百年之后也洗刷不掉，他死后敌人又把一个又一个谎言贴在他的头上。

部分牧师僧侣也反对改革，因为分户后削弱了人民对正教的信仰。

在这两年半期间，已有百万户农民要求分户，土地规划委员会也开始工作，把村社土地转为独立庄园，政府向农民派出土地法讲解员，杜马好不容易才以几票的多数通过了土地改革法案。

一年以后，又经过多次冲突和动摇，好不容易在参议员中得到通过。

全体立法人员投票通过了土地改革法，又等了几个月，陛下才在法案上签了字。这几个月，右翼猛烈地攻击斯托雷平，诬蔑他是个文牍主义改革家，好像是政府官员强行把农民从农村村社赶出来，要瓦解农村村社。说他最有害的思想是把农民交给犹太小商贩统治，虽然土地改革草案明确规定，份地不得转让给其他社会阶层，不能卖给私人出资的机构，除了农民向银行贷款，不准向其他个人和机构申请抵押贷款。

现在等待陛下签署，是否有人暗中破坏呢？有人要求陛下不予受理呢？

陛下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一位友好的人前来谒见，可能通过一次谈话，改变他多年形成的看法。陛下周围，经常有上流社会人物出入，这种上流社会小圈子，有时是几个人组成的，有的人有封号，有爵位，有血缘裙带关系。这一类上流社会小圈子是一种非俄国的产物，但俄国的命运很大程度上由他们来掌握。在他们的空间里，不是因为这些上流社会患病，偏见和怪癖，而正是这个小有产者斯托雷平冲开这些上流小圈子直达政权的顶峰，当然不合法，也得不到赞同，又来自外省，无从庇护，无人扶助，而今又坚持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主张。他已成为帝国的第二号人物，根本不属于贵族界，也不了解贵族世界；不属于上流社会，不属于达官显贵，也不了解他们而且也从来不准备了解他们。在上流社会以外，在大俄罗斯，斯托雷平可以确立新的法典，实行新法，并且在俄国国内开始发挥作用，但在贵族的狭小圈子内则无任何影响。

从广义上说，事情是这样的，当斯托雷平把他们从革命、纵火和暴乱下拯救出来的时候，他对全体俄国人民，对他们来说是个有用的、有利的、必不可少的人。从 1906 年夏天到 1908 年秋，右翼和上流社会虽然对他怀有某种敌意，不与他争斗，让他与革命拼争。在这场斗争中，当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之后，而且俄国从绝望的混乱期间转而驶入国家正常生活的平静水域，斯托雷平的政策在他们看来是根本不能容忍的，也是难以接受的。而且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把 1905 年 10 月 17 日的宣言弃之不用，反倒引进宪法、代表机构和法律程序。

按照古奇科夫的分类，右翼和上流社会可以分为三个组群，首先是君侧党，他们在宪法体制中，除了自行消逝外，无事可做；其次是卸任的官僚，都是些倒霉的当权者，统统挤在参议院右翼席位上；最后是贵族中的顽固派，他们寸步不让，还打算再统治俄国100年。这里还可加上个叫人民联盟的，从国内秩序刚刚恢复，联盟就开始攻击斯托雷平，说他镇压革命不坚决，过分照顾杜马，忠于宪法，秘密减轻犹太人的负担，崇尚自由主义思想，诘问他到底想把俄国引向哪里?! 等等。但斯托雷平如同对待其他政党一样，也没有屈从他们的意志。他是为俄国服务的，而不是为彼得堡权势效劳的；他的所有活动从来都不是为个人打算。

难道说，斯托雷平从1905年10月17日宣言精神倒退的步骤还少吗？首先，他残酷镇压革命之后，又认真地从容地进行一系列不得不进行的改革。而这一切改革自然要破坏上流社会那种一成不变的享乐舒适的生活。上流社会人士比斯托雷平更早地明白这一点，他们中间某些集团已觉察到，参议院修正案对他们十分危险。

斯托雷平在他与革命的决斗中，作为发动者信心百倍，但却没料到从右翼方面来的危险。他一往无前地迈进，顺利地推行他的法律，并确信自己推行的法律将闯入上流社会，并确立应有的法律地位。他不能从上流社会吸收一项法律，因为他在那里找不到朋友，也找不到同盟者，甚至征得不到一条意见。斯托雷平尤为憎恨那些自私自利、贪赃枉法的人，并考虑改革警察体制，并任命一个委员会专门处理此事。但他1909年初这几个月还没有看出他所面临的更大的掣肘和危险，那就是上流社会给他安插一个内政府第一副大臣、贪得无厌的鼬鼠库尔洛夫。斯托雷平一意孤行，讲出比上层人物想象还要刺耳的真实情况。他好像没有看出皇后对他怀有敌意，他已经习惯于每一步都要等待，但还要阻挡住陛下突然变卦，因为他同意教育部采取强硬态度以制止大学生骚乱，而后突然绕过相关部门和总理大臣签署了刚好相反的举措，比直接破坏政府的稳定更糟。应当永远记住：陛下口头上说同意，其实还是不同意。

每次晋见陛下，接受圣上接见的时候，斯托雷平都要时刻准备接受圣上旨

意的突然改变。所以，他的公文包里常常带上一份存有当天签字的辞职报告文本，准备随时呈上。

1909年春天，上流社会开始加紧对斯托雷平施加压力，于是，辞职报告的时机越来越成熟，几乎就成为现实。这是由一件小事引起的，即缩减海军部的编制，斯托雷平表现出一个实干家的急躁情绪，通过杜马坚持自己的决定。当时，他也像维特一样，急于在参议院指出，这是破例地限制国王在军事问题的特权。事件发生的过程，是由于斯托雷平忽然患上了肺病而遭到曲解。陛下建议他去休假，到利瓦吉亚休息。休假，完全可以解释为是辞职的准备阶段。在维尔塔接到圣谕，授予斯托雷平一枚白色双头鹰勋章，只是为缓和解职的气氛。斯托雷平返回彼得堡已是暮春4月，他的双肺尚保留南方温暖的克里米亚的空气，由于吸入新鲜空气而精神焕发的他，很快回到积雪尚未融化、潮湿阴冷的叶拉根岛。整个彼得堡在盛传，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接替总理大臣职位，库尔洛夫荣升内政部大臣。大概，陛下这几天已决意革去斯托雷平的总理大臣职务。但4月末，陛下又发布了确认斯托雷平现职的圣谕。在军事问题上，他完全执行陛下的旨意，尊重陛下特权，这样他也就失去了十月党人和古奇科夫的支持。

与陛下的关系，是斯托雷平整个工作和建树中最脆弱的纽带，虽然这条纽带不参与工作和建树，但它决定一切。只要社会上不对这位皇上恶语相加，只要俄国受过教育的阶层不把他当成稻草人来嘲笑！整个俄国也许会一致认为，陛下狭隘肤浅、愚蠢凶狠、感觉迟钝。斯托雷平先是远离他，不准自己这么想。随着日益接近和更密切的接触，就其主要方面来说，他相信陛下不是那样的人。皇上甚至为其软弱而痛苦，为其脆弱而痛心疾首，这一切使他更加内向，影响了他极棒的身体，损害了他的健康。他不仅不是那种寻机报复或凶残的人，而且还有着基督教色彩的善良心怀，一个真诚的基督教徒，全心全意爱他的臣民，爱护他应该结识的大多数臣民。他真诚希望在他统治期间一切都好，王位在整个帝国统治时代诸事顺利，只是不苛求他为此付出过大和过长的紧张生活。他可能透彻理解任何理由，并理解其复杂的含义。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陛下，比起任何一位采取中庸之道的君主来说毫不逊色，他丝毫不偏离中庸之道一步，

其他人大概应当是相形见绌。他的善良仁慈的情感远胜于他的中庸之道，因此，一个帝制派总理的义务是善于与这样的皇上一道工作。

陛下真心诚意地说，他自己一生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祖国繁荣昌盛，个人微不足道的情感，在这个大目标面前，已黯然失色。他一再重温他在上帝面前承担的重大责任，可是他时而任命和支持这个宫廷司马的告密，时而支持和任命那个部首脑的窃窃私语。陛下了解自己身负重任，他毫不掩饰，直言不讳地拖延重大国家问题这类枯燥无味的事，或者根本废止这类不愉快的程序，如亲自接见“国家杜马”全体代表，如果他能接见的话，第三届杜马的许多事情可能是另一番结果。陛下喜欢大规模阅兵，他最讨厌的莫过于会见几十个人、上百人或上千人的有知识并有异端思想的人士，因为那些人不坦诚，并非自家人。温和、怯懦又脆弱，就是陛下的整个世界观，主要责任在于他有本领保护他的人身上，因为他不能坚持自己的看法，顶不住他人的意见。他只能在温室里，怀着对自己的优秀人民和杰出的国务活动家的无限信任，而后者则把一切料理妥当，而且有教养、有人情味，有自由思想和风华正茂。他认为斯托雷平便是这样的杰出大臣，他实现了卓越的目标，引导人民过上平安富足的生活，只要是不过分让陛下不安，不强制宫廷任何杰出人物做他不喜欢的事情，那就更好了。

斯托雷平作为陛下的忠实仆人，尽管没有选择权，从公务上和忠诚王室上讲，他应从内心支持陛下工作，在外部努力提高陛下的威望，他内心也喜欢这位心地善良、正直的人，虽然从国务活动上看他有许多重要的缺欠，但他仍极力帮助陛下克服缺点，从懦弱变得坚强。如果说支持陛下的目的是要巩固俄国的历史基础，那么当今执政的君主就应竭尽全力服务。斯托雷平不放过任何机会颂扬陛下，把他安排在人民隆重庆功会——波尔塔瓦胜利二百周年大庆的中心位置，谈到陛下时总用至尊至上的语气，把他自己计划到的事和制订法律的功劳记在陛下的名下，恳求听众精忠报效王室与古奇科夫公开交谈、与杜马斗争中志同道合者谈话，即使他们的激烈发言得到斯托雷平同情，本来也可以表明态度，同他们一起计划如何战胜杜马中的右翼集团，区分温和派。与对沙皇

夫妇怀有敌意的古奇科夫私下单独谈话时，斯托雷平从来不允许自己表现出对陛下不敬、不赞成的语气讲话。人越是软弱，越会变得更固执，陛下时而在这个问题，时而在那个问题上固执己见，这样更需要对他的固执表现做出让步，以便给他留下一种他有能力并不脆弱的印象。为了强化这种印象，要感谢他的仁慈参与，并请他宽恕自己的失言，说："由于我贸然行事，处置不当，使陛下龙颜不悦……"当完全不能回避的时候，要接受教训，也是一个帝制派的不忠表现，必须寻找一种形式，仿佛自己应当接受教训，或者是谈一个不相干的人。

"对一个国务人员而言，懦怯是最大的失策，同时也是一种罪过。"

斯托雷平对自己的认识很透彻，他是称职的，他善于治理国家，也看出这位沙皇需要他到什么程度。当然，在治理国家活动中他付出的心血、智慧和能量的份额，与一名总理大臣职位所需份额显然是不相称的。他真的算不清他工作所耗费时间究竟有多少。因为，陛下还没看见他宫中大臣带着报告乘马车从彼得堡前去利瓦吉亚谒见他的途中劳碌困顿。或者，陛下休假前去波尔塔瓦省和粤尔洛夫省巡幸他心爱的宠儿——独立庄园，总理大臣必须在圣上午宴前赶到，以示对丹麦国王夫妇的敬意。

陛下忘记了 1905 年和 1906 年俄国几乎就要跌进无底深渊的那时情景。而今 3 年之后，陛下第一次公开露面，自由前去波尔塔瓦时，斯托雷平不无自豪地报告说：

"革命的危险性已排除，陛下，您可以随心所欲了。"

"我不明白您说的什么革命，如果政权掌握在像波尔塔市市长杜姆巴泽这样勇敢而精力充沛的人手中，连骚乱也不会发生。"

斯托雷平非常痛苦，陛下怎能如此健忘，这么快就完全忘记了几乎推翻他本人的危险呢？陛下似乎根本没有记得斯托雷平为拯救帝国所做的一切努力。

确实，前几年，陛下对斯托雷平怀有特殊好感，切身感到他是国家和陛下的救命恩人。他向斯托雷平提供自己的行宫作为安全托身之地，把皇家游艇供他在芬兰湾暗礁之间穿梭游览。

1908 年夏天，斯托雷平乘皇家游艇隐名埋姓地到德国一游，在德国享受一

次任何普鲁士人意想不到的幸福时光，自由地走在大街上，不必躲避暗杀。他此行被德皇威廉得知后，希望会面。可是他回避了，脱逃了。威廉的几只帆船紧追其后，但没有赶上。一年后，俄德两位领导人会见时，德皇威廉终于与斯托雷平见面了。威廉蔑视尼古拉及其妻子到了有失体面的程度，整个会面时间只与斯托雷平交谈，对他赞扬有加，他一再说，再过 20 年，斯托雷平的远见卓识，高风亮节远胜于俾斯麦。

不错! 除了对内政策，还有对外政策。斯托雷平作为总政大臣，不仅兼任内政大臣，还要兼任更多职务吗?

根本不是，他尽量躲避对外政策，他忽视对外政策，不想在对外政策上花费力气，因为与对内政策相比，他觉得对外政策非常容易做出决策。他认为，这个领域，从来没有这样被忽视了的、多个世纪以来积淀下来的荒诞不经的关系，主要表现是那种你死我活的刻骨仇恨，思想上不共戴天的敌人，除了仇恨之外，他们无以为生。他认为，用四分之一的力量就足以做好对外政策，像大力士移山一样，这边是山，那边是深渊，界限分明。他确信，一个中等程度才智的执政人可以在任何时候防止一场对外战争。

也许忽视对外政策，斯托雷平内阁任命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伊兹沃利斯基担任外交大臣。伊兹沃利斯基在寻求有效的外交过程中，随意插手土耳其关系。他落到奥匈帝国同行的陷阱之中，默许他们 1908 年末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并且声明占领是经过俄国同意的。这是赤裸裸地利用我们对日战败后的虚弱地位，踩你的脚，还要笑脸相迎。德国强行要求俄国不能保持沉默，也不许中立，而要低三下四地宣布同意奥匈帝国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从而背弃整个巴尔干政策。俄国社会义愤填膺，舆论界和杜马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除了战争别无选择。采用战争手段，则是下下策，不行，斯托雷平考察国防部（国防部和其他部一样，独立施政）就进一步相信，在全面考察国内情况后更加相信，我们无论如何绝不能参战，我们长时间以来就没有打仗的准备，我们贸然宣战，必定要失败，而且下一步就会发生革命。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我们来说是很痛苦的，而对于那些任何情况下不打算打仗的人，可能容易接受，

至于泛斯拉夫委员会任何时候都会痛心的。由于刚愎自用造成的暂时外交损失，在内政建设的巨大成绩面前已经算不了什么。斯托雷平不能公开泄露反对战争的理由，但要提醒已经决定全国总动员对奥匈帝国作战的陛下，一旦开战必然导致对德战争，那将会威胁罗曼诺夫王朝命运。同一天，他对身边的人说："今天我挽救了俄国!" 斯托雷平通过个别交谈安抚那些怒气冲天的好战的杜马多数派首领们。社会革命党尤其急于参战，而且各国皇帝于 1910 年在波茨坦会晤后，他们长时间叫嚣说，为什么俄国拒绝采取进攻的立场呢？令法国人不安的是，为什么在波兰的四个俄国要塞弃之不用呢？斯托雷平认为，这些同盟国，无论怎么说也不是朋友，一旦俄国遭到不测，他们必定背弃我们。英国唯恐俄国成为一支国际势力，做梦也想俄国衰败没落。在法国，对俄国人既不爱，也不尊重，只是怕德国。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认为强大的民族主义俄国是有益的。

这一结果，使斯托雷平更加确信，对外政策不值得坚韧不拔的努力和耗费很长时间。这不，所有现实的威胁不费吹灰之力一一化解了。如果我们成为泱泱大国也不希望发动战争，谁也别想逼我们参战。伊兹沃利斯基遭解职之后，任命萨佐诺夫担任外交大臣时，斯托雷平恳求他说，只要避开了国际纠纷，便是整个外交政策。俄国根本不需要战争，在任何情况下，至少需要 10—20 年国内国际和平环境，改革成功以后，你就认不出今天的俄国，不论什么样的外部敌人，我们都不怕。

"到那时，俄国的根更健壮更坚实，在欧洲面前，在全世界面前，俄国政府将以完全另一种方式讲话。"

斯托雷平没有预见到另一种局面，它正在呼唤俄国参战要比割让两个斯拉夫省更急迫，结果避免了战争，绕过了战争。可是没有发现扬扬得意的巨子之光芒也有月亏的时候。当 1910 年 10 月在波茨坦，他陪陛下会见德皇威廉，承诺俄国不参加英国人反对德国的任何阴谋活动，对比德国承诺不支持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的侵略行动时，他既没有愧对俄国政府的荣誉，也不会在英国这个不可靠的盟友面前感到内疚。实行俄国的灵活而有理性的外交政策，光靠想象力

不行，与谁也好，什么目的也罢，俄国必须斗争。

在斯托雷平担任总理大臣这三四年间，国家不是采取激进改革政策或者试图一蹴而就，则是采用循序渐进的一往无前的改革政策，致使朋友和敌人，俄国人和外国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红色的混乱不再兴风作浪，革命已经偃旗息鼓，已成为历史陈迹。人们生机勃勃的日常生活越来越方便。国家采取思维健全的方式运作。斯托雷平3年、4年、5年来连续不断地引导全俄走向他认为的正确方向，他的实践证明，管理国家，就意味着要有远见卓识。他证实一个事实，那就是行动是最好的证明，要亲自去身体力行。出于爱俄国的赤诚，他对政党采取冷处理态度，既不接近任何一个政党，也不接受任何一个政党的压力，而是高踞所有政党之上。这样，所有政党都丧失了他们的颠覆政府的力量。他剪除身边左右所有政党的一切卑鄙伎俩。他从不计较微末小节，因而也不是那种图虚荣、好面子的人。由于他不图私利，毫不利己的品格，得到人们的敬爱、钦佩。他朝气蓬勃，意气风发，诲人不倦，亲自耐心地开导每一个人，人们与他一起工作精神愉快，工作更轻松。在危难时刻，他勇敢无畏，岿然不动，他的宏大的事业几乎采用艺术创作的模式进行，他年富力强，把他全部坚定的青春力量都投入到国家建设上面。他在祖国面前，光明磊落，纯白无瑕，经得起检验，经得起审查，没有留下丝毫供饶舌人诽谤的漏洞。他的姓氏证明，他确实是国家中流砥柱，他是俄国生活的中心，没有一个俄国沙皇可以与他相提并论（他确确实实具有沙皇的素质）。他是彼得大帝再世，是彼得大帝二次降临俄国，他精力充沛，孜孜不倦，既是提高人民生产力的热心家，又是锲而不舍的改革家，但是斯托雷平具有根本不同于彼得大帝的思想意识：

"改造我们的生活方式，绝不能伤害我们国家的生存基础——人民的心灵世界。"

还有人民的精神风貌和人民的信仰：

"俄国许多世纪以来就与正教教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各位，信教与不信教的，来到我们一个偏僻的乡村，走进一座农村教堂，您就看到我们的人民怎

样虔诚地祈祷，您就不能感受到深沉的祈祷情感气氛，也不能不认识到了教堂中祷告的词语，对祈祷的人来说，就是超凡脱俗的语言。”

差不多就在这几天，由于认识到问题另一方面，他又说：

“陛下圣明，我深切地感到我们的宗教院和教会正在崩溃。”

所以，元老院院长应当具有无畏的气概和坚强的意志。

斯托雷平的路线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核心，这个核心在全俄国不断地吸引受过教育的人士，可惜为数不多，其中保全着厚颜无耻的残渣余孽，或者暴露出俄国民族主义感性和正教信仰的动摇不定的萌芽。

这一宗教信仰的演变过程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扩展，大概在不受干扰的平静 20 年才能完成。

斯托雷平已经获得了这样的立足要塞和回旋余地，可以毫无困难地接收反对派拆断的箭矢，并且把它镶上新的金属箭羽，更有力地反射向他们：

“不错，俄国经过无数次考验之后，自然还不能满意，但他不仅不满意右翼党派，不满意右派政党，他也不满意自己。当俄国国家意识增强了，不满情绪自然就没有了，那时，俄国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还是俄国。”

他的脱离农村村社法律草案经过立法院反复检验，终于签署生效。与此同时，已有 200 万一家之主声明退出农村村社，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农户。斯托雷平预见到农业大丰收，事先在全俄建立了国家银行的广泛粮食储备库网，以公款补助农民在粮库储存粮食。

斯托雷平还有一个朝思暮想的夙愿，那就向乌拉尔以东，向西伯利亚、吉尔吉斯边区和七河地区移民。他的提议在杜马没有引起多少争论，也没有遇到拼命抵制。

看来，农民迁移乌拉尔以东的无人耕种土地后，在他们面前展现的并不是几个世纪，数百年的荒芜不毛之地！对农民来说任何指令也绝不会比这一举措更顺乎自然。这种早已为广大下层农民熟知的思想远远胜于其他办法，从未知事物中果断地抓住原因和条件的优势，半个世纪之后就可以取得定居资格，移民热潮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梦想、传说和故事，说什么“皇后的领地”、“西伯利

亚花园"、"妈姆河"。被官方截获的农民，又只身一人逃离，有时趁夜色悄悄赶着马车告别故土，前途茫茫数千里，走过异地他乡，绝不能公开身份，也并不经常有夜宿之处，得到周济，有时会走进全然不知何人在茂密森林中的住所。

1861 年的大改革，解放农奴，地主阶级出于自私自利的打算，再三要求俄国政府干扰农民移民活动，阻止他们迁到富饶的地方去。地主害怕由于农民迁移，他们领地的农工的工资明天就会提高，到了后天整个俄国，他们就无利可图了。俄国欧洲部分每平方俄里平均 31 人，而西伯利亚不足一人。直到 1891 年大饥荒之前一直不准从欧洲部分向西伯利亚移民，之后有所放松，而且开始兴建西伯利亚铁路，一直等到 1905 年的如火如荼的革命和捣毁居园时期，才彻底改变政策。

移民除了改善土地耕作之外，也是农民摆脱贫困的重要出路，因而斯托雷平很容易发现这一优势，并且不遗余力地促进移民活动，大批移民立即获得多种优惠条件。例如可以用官费去迁移地点考察，免费得到国家提供的信息，迁移前先建设小区，帮助移民家庭搬家，搬家时可携带家具和牲畜，国家贷款建造房屋，购买农机具。连那些最善于经营的农民阶层，由于难于就地发展，也陆陆续续迁移到东方。移民时，赠出的内阁阿尔泰土地大约等于 5 个比利时，此外对日作战归来途经西伯利亚的士兵也促进了农民得利。1906 年已任移民 13 万人，而后每年移民 50 万以上，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移民已超 400 万人，等于从叶尔马克时代开始 300 年间的移民总额。移民土地是无偿赠与的，属于个人所有，不只是使用权。每个家庭 50 俄亩土地，已经分了数万亩，每亩能收获 60 普特谷物——这便是斯托雷平的理想，灌溉饥饿平原，开凿公用渠道。总共不过 4 年，在俄国历史上只一瞬间，占罗曼诺夫王朝位治时间的七十五分之一。斯托雷平同他最得意大臣克里沃舍因，他们共同承担谋划农村体制改革任务，并在 1910 年 8 月 9 日一起巡视西伯利亚的许多移民点，大部分路程是坐四轮大货车走过的，他们的惊喜之情不亚于移民自己。移民在新居住点过着自由健康幸福的生活，他们二人由衷高兴。他们去过的许多坚固而美丽的小村，有教堂的大村乃至整个小城镇，3 年前还是渺无人烟的荒野。移民愉快地

劳动，随着第一批丰收，已经能够赚钱。这里有茂密的森林，收获颇丰的耕作土地，牲畜可以自由放牧，免费狩猎，自由捕鱼，3年之前有谁能够相信这是事实呢？那些生活在十分拥挤土地上的农民，为什么不想到这广阔的天地呢？

如果说这4年仅仅是个开始，谷物收获量已提高到年产量4000万普物，怎么能将其存在的20年后被强行解散呢？

斯托雷平亲眼目睹移民的整个变化以及西伯利亚的新鲜空气，他觉得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无论王朝的奖赏还是人民给予的荣耀，都无法与此相提并论。在两个月内，他亲眼目睹到了他的工作计划蓝图，已经由伟大的人民在广阔富饶的地方变为活生生的现实。移民勇敢地、一往无前地进入无人居住的遥远地方，他们是俄国人民中的新生力量，永不满足的先行者，他们是自由主义者，用自己的劳动求得温饱，而且远离革命泥潭。他们强烈要求沙皇和正教给他们建立教堂和学校。迁移到新地方的俄国已肃清了革命毒瘤，例如斯托雷平在扎沃热的地方遇到一位过去的农民革命家，第一届杜马代表，如今已经是一个勤奋的庄园主人，他也主张社会要有良好的秩序。

在整个视察的行程中，斯托雷平与克里沃申因愉快讨论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使移民大潮自由地向前推进。

1个月以后，斯托雷平在波茨坦与德皇威廉并肩而坐，他感到背后有西伯利亚移民的善良的心在跳动，而一再令人吃惊的是，国际事务是这样容易理顺，这就是声名狼藉的“对外政策”，对德关系可以处理更好些。

俄国在复兴，这已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正在实行的改革，已经印在革命者的头脑和心田。30年来，他们的头脑和心中一直充满着渴望，即革命一定来临，他们为此而生活和行动。今天他们已丧失了信心，疲惫不堪，并且在撤退。他们处境困难，进退维谷，讲话无人听，革命已无法进行，革命已经失败，已经不能用革命染红未来的地平线，只是过去的地平线上尚残留一点即将熄灭的淡淡玫瑰红。1910年恐怖分子从斯托雷平本人身边滚蛋了，停止了追杀活动，停止了寻机刺杀活动。过去，许多计划通通失败了，他们心灰意冷，彻底失望，不再搞阴谋诡计了。这些年来，恐怖分子总是在知识分子家中会面，但今天已

不再兴高采烈了，不再相互道贺了。在整个居民当中，他们自己觉得虽然还没有受到迫害，但至少已经是多余的人，令人讨厌的人。因此，恐怖分子已丧失了行动的动力。

现在，斯托雷平又开始操心清理涅瓦河水，无偿为小客栈的客人提供茶叶的事情。他那令人羡慕的健康体魄，足以胜任各种工作，人们常常以新奇的目光注视他的行动。

1909—1910年冬天，斯托雷平又返回药房岛本家，他不能再过东藏西躲的生活，他出入塔夫利宫的日期众所周知，到了夏天又可以到他最喜爱的科文私邸度夏。

一次，斯托雷平视察飞行设施，有人向他介绍飞行员马齐耶维奇，并事先警告说，他是一个著名的社会革命党人（社会革命党立场既不妨碍参与军务，也不妨碍从事一般工作）。这位飞行员突然闪烁出一种挑战的眼光，微笑着建议一同登机飞翔。

尽管他的生命不仅属于他个人的，而是关系到俄国的兴衰，但是面对如此挑战，他还是不能屈服，因为决斗的荣誉感在他内心翻腾，压过了理性和责任，何况这次面临谋杀的危险呢？他立刻点头同意。

于是他们起飞了。飞机在高空转了两周，飞行员随时可以以机毁身亡的方式谋杀斯托雷平，但马齐耶维奇没有这样做。他们两个进行了毫无意义的交谈，彼此间用目光较劲。

在那些年代，还没有启用大喇叭在全国范围内为政府领导人歌功颂德，也没在大街小巷张贴领袖们肖像的习惯。在俄国，远离政治的普通老百姓很少知道谁是现任总理大臣，只知道沙皇一个人[①]，他们亲眼目睹生活平静似水，没有动乱，没有抢劫，可以在俄国平静地过日子。

---

① 斯托雷平也故意躲在沙皇背后。另外，尼古拉二世在皇后和拉斯普京的策动下，除斯托雷平任期较长之外，尤其是沙皇统治末期，总理大臣和内政大臣像走马灯似的屡屡换马。——译者注

立宪民主党进攻乏力，犹如强弩之末，也不敢侮辱斯托雷平。他们自行采取新的立场，不敢辱骂，也不想为胜者歌功颂德，他们沦落成为有口难辩、不伦不类的杂种。在十月党人看来，他们过于民族主义；而在民族主义看来，他们又过于十月革命党；在所有的左派眼中，他们是反动派；在货真价实的右派心目中，他们差不多还是立宪民主党。他们的方略，在破坏势力看来是反动的，而在反动派眼中，也是具有破坏性质的。它们就这样古怪离奇，而社会已经习惯于容忍它的存在了。

社会上还有一个阶层，他们每天都紧张地注视着谁还是今天的总理大臣，并奇怪地想他真的能支撑这么久还没下台。他们怀着愤恨的心情和关切的眼光注视这个亘古未见的、沽名钓誉、飞黄腾达的家伙，一个幸运儿的每一个新的成功步骤；他大权独揽，一个自负的野心家，外省人，非彼得堡人，你无法与他在国家事务上建立相互依赖关系；他还是一个有偏见的乐观主义者，当面临从根本上斩断特权和法律危机关头，他仍像鹦鹉学舌般反复申明，未来是光明的，这些人就是高层官僚和宫廷宦官佞臣阶层。他们与强大厚重的俄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无论在厚度和范围方面都是先天不足的，难以同总理大臣的国务活动抗衡。他们有自己的特殊算法，如打台球和玩牌那样，球数和牌数的账单用粉笔标记的似乎又被擦过，暗藏着什么杀机，并超出了娱乐官，高踞全国和全世界、整个宇宙之上，燃烧着白色的光芒。按照这种算法，斯托雷平不能稳操胜券，一定要彻底败北。因为他过早地、没有按年龄官阶的阶梯一下子飞黄腾达起来；因为他胆敢说谁敢不欠；因为在所有人的机遇当中，他做决定不讲人情，从自己人的中间为自己人而提拔自己人，似乎在国家需要的残酷无情借口的后面包藏着祸心；因为他不参与任何阴谋罪恶集团，也不参加任何友善交际活动，他装扮成完全独来独往的人，实际不可能有也没有过这样的人。无法偿还的账不断地膨胀，膨胀，一下子变成酥脆的白色粉末。斯托雷平这个阴谋家诱惑和蒙骗陛下，并仰仗这一点长久地把持总理大臣的位子不放，已经到该清算他的所有账目的时候了！他们把这一切翻译成“白粉的语言”和“蜡的语言”的同时，把他的每一项成功的改革却归结到他的功和过上面：他是有罪的，

因为他解放了农民，建立了各自的独立庄园；他是有罪的，因他与地方自治局拉帮结伙，开始把国家不可动摇、不可分割的管理权的一部分转到地方自治局的手中（贵族阻挠他的县级管理权的改革，虽然一半以上贵族头面人物并不住在县里）；他是有罪的，因为他加大了从地主兜里掏出来的土地收成（减租减息），以利安置农民；他是有罪的，因为他准备让工厂主出钱和国家税收为工人保险；他是有罪的，因为他为店员实行节日休息制度，他的罪恶莫过于保护年迈的宗教礼仪主持和教派教徒；他不重视宫中服务的宦官，罪责难逃。最后一点或最重要的一点，他不是皇室侍从武官长，也不是御前大臣！

他在那些老态龙钟、须发皆白的参议院高官显贵眼中，是个令人不能容忍的、连升三级的暴发户，在整个贵族圈子心中他是一个不可接近的人，尤其不受皇后欢迎的人，每个晋见皇后陛下的人都向皇后耳中灌输这样的思想，那就是斯托雷平以牺牲皇帝陛下的声望来提高他自己的声誉。

这种环境，无疑具有钢的弹性，更有沼泽的黏性。它一个劲儿地使踏进去的脚往下沉，颇具柔韧性，连揉带搓，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压缩力是不可战胜的，让你无力脱逃。不仅陛下的意识和两耳充满着，而且整个气氛、整个环境充塞着怀疑情绪、指责非难的言论，愤慨不满之声，说什么一个人这样长时间、这样专横地把持这样高的职位，太不成体统！于是皇上渐渐发现，他的第一大臣，已经在这个位置待了5年，他不仅是王位的善意拯救者，同时他每一个新的成就都为自己博得了好的名声，因而遮住了陛下本人。

在这黏性中往往从这一边到那一边贯穿不露痕迹的、扯不断的有黏性的线，而这些黏性的线在这样的沼泽环境当中又具有不可战胜的沼泽弹性，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散发出苦臭气味。陛下的官僚们不敢与合法的国家政权对抗，于是他们与斯托雷平的对抗阴谋，意想不到地通过教会进行，即通过萨拉托夫的正教监管区。斯托雷平以前任萨拉托夫省长，主教叫叶尔莫根，与他一起的是修士司祭伊利奥多尔，后者是一名狂热的教徒，有如同精神病患者那样错乱疯狂的眼神。他们一起布道时反对现政府，认为现政府是异教徒和陛下的叛逆。那么现政府以何人为首，不是正是斯托雷平吗？他们赶走了现任萨拉托夫省长。

突然，这两个家伙又同拉斯普京勾结起来，结成联盟，他俩又与拉斯普京闹翻了，他们两个也反目成仇了，陛下下令停止这次由政府发起的对伊利奥多尔的调查，并把他送到察里津继续做修士司祭，倒是下令解除检查总长希诺德的职务，他也是斯托雷平政府的一员，这几个月里，不时听到斯托雷平的讲话：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俄国政府内阁就是政权，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政府只是政权的反映，政府必须了解压力和影响的总和，正要在压力和影响的重压下面进行工作。”

政府面对匿名的上流社会，躲在幕后的秘密黑窝，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有许多人，如古奇科夫就说服斯托雷平必须摆脱这缩手缩脚受制的地位，并公开与黑恶势力战斗。然而斯托雷平不想这样干，不愿意有伊利奥多尔一样的下场。

斯托雷平的敌人在不断增加，虽然他并没有主动树敌。他不能让个人感情冲击意志，撞倒理智，因为他的战斗不是在这条小路上的狭路相逢。因此，长时间以来极力避免与拉斯普京发生正面冲突。斯托雷平长时间只是有意躲避，极力不要让政府的路线与拉斯普京的路线交叉重合。然而，实际是不可能的，那些扯不断、黏性强的线到处都有，任命主教、提名元老院议员、任命省长、授予将军衔、参议院人选，甚至斯托雷平在他自己的内政部也要受他的第一副手暗中监视和掣肘。库尔洛夫是不称职的，他是个心术不正、不友好的人，他并不是斯托雷平荐举的，是按至尊的意旨安排的，又突然被任命警察总局和宪兵军团的首长，名义上好像是保卫俄国，但在他看来，与他那见不得人的政治投机比较起来，俄国并不觉得怎么太重要。斯托雷平的第一副手突然成为伊利奥多尔本人的好朋友，后来又成为拉斯普京的挚友，此时正是拉斯普京大大巩固他在皇村的地位的时候，他成为俄国国体上一个不能容忍的毒瘤之际。斯托雷平鉴于国务大事不能交由这个庄稼汉水平的人来决定，于1911年初决定遣送拉斯普京回乡，可惜没有过多久，这个家伙更加飞黄腾达了。

没有被刮去的彼得堡沼泽的覆盖层，本应起一定作用。紧张冲突的性质不经意间变了，甚至根据三等的理由，让你来不及知道是在哪里跌了一跤。偶然

碰上一个复杂又有争议的西部地方自治问题，然而在这个问题上遇到整个“喀吱响”环境的抵抗①。

俄国西部9个省，从科文到基辅，自从亚历山大二世即位以来也没决定像内地一样实行普选；地方自治局直到今天还保留任命的办法。这样的自治局绝对没有革命性。全体任命的官员都忠顺地工作，从来就不是政府的反对派。但从更深层次讲，任命的地方自治局没有像选举的自治局成员那样勇敢地利用本地力量，不计个人得失地依法扩大地方自治局的活动范围，加强地方征收工作，接管一部分政府职能，这也就是斯托雷平设想的全俄地方自治局。扩大地方自治权问题已经摆到他的总的国家路线日程上了。

斯托雷平没有采取地域普遍扩大的办法，因为这几个省波兰人只占人口总数的4%，而参议院西部边区所有9名代表全是波兰人。农民是立陶宛人、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地主全部都是波兰人，他们手中拥有财富、经济影响，雇佣劳动力，对当地习俗、教育、宗教都有很大影响。他们有稳定的支配权、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们又结成了团结一致的社团，在这种情况下选出来的地方自治局，可预见在波兰人占压倒多数的影响下，所有9个省都可能成为波兰人的一统天下，有朝一日要脱离俄国。当前的任务是不能让扩大的地方自治局成为波兰人的政治工具，处处采取保险措施以防止出现不公正的一面倒的局面。

根据亚历山大二世的地方自治法的总则，地主对农民处于绝对优越，今天在西部9个省利用这项统治阶级反对农民的自私法来保证为本民族报一箭之仇。为拯救西部省份俄罗斯民族特性，应当把从前的地方自治法颠倒过来，即不赋予波兰地主对他们佃户占有优越，取消选举等级制。为此选举分民族进行，允许僧侣教士参选，降低选举前个人财产资格以便从贫苦的非波兰人中选出更多的代表，能超过殷实的波兰人（可是波兰人占16%，是他们人口的4倍)。地方

①原文цавакть-цвякать-цвакать to squlen-大概是在沼泽地行走发出的喀吱响声。——译者注

自治局占大多数应当是来自农村村社的农民，而不是富裕的波兰人，特别是要由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或白俄罗斯人，当年他们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担任地方自治局主席和专科学校委员会主席。

“需要公开而公正地强调指出，西部边区已经是，也应当是俄国的一部分，因此必须保护俄国居民不受波兰地主的辖制。”

如果俄国能在事先慎重考虑到今天会出现这种局面，那为什么半个世纪竟无人提出如何保护俄国农民不受波兰地主欺凌呢!

从这件事可以推测斯托雷平的狡猾政治手腕的厉害，虽然他追求的目标是光明磊落的。两种乃至三种他最喜爱的路线，即农民路线、地方自治和民族路线，相互交叉，但他也没忽视降低选择财产资格，地方自治的民主化，俄国倾向革命的“半”知识分子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地方自治局，代替保守的波兰贵族，此举自然会得到“国家杜马”喜欢。事实上，杜马对地方自治局选举法案的民族主义精华紧皱眉头（左翼反对），但降低选举财产资格通过了，甚至比草案提出的还低两倍。杜马此举大概是对的，而有远见的右翼人士应当惊慌不安，这种降低选举财产资格之风，不会像传染病一样传到全俄国吗？法案通过了，而且在第二院不能不引起反对，不是反对民族主义那部分，而恰是反对斯托雷平的地方自治路线。

第二院一参议院，好像专为杜马快速通过法案煞车和秉公检查而设立。参议院 150 名代表近一半是选举产生的，另近一半是皇上亲自任命的（采取任命，一般总是有钳制的意思和君主个人的影响。这是尼古拉特殊嗜好的表现，喜欢把他得意的人委以重任，用以维持平衡，对抗过分果敢的实践家，这样就不必亲自阻止他们）。

“困乏的心灵冷如冰。”斯托雷平这样评价参议院。参议院尽是些耄耋老人，差不多老朽无用，甚至都是聋子，在会议上都抓不住所讨论问题的本意，他们应当预先知道讨论日程。参议院是所有过去政治家，如辞职的、解职的、革职的、退休的高官以及虚荣心极强却一无所成的人士的避风港。当时，维特是参议院里最阴险的毒蛇，也是斯托雷平本人最憎恶的人，因为维特有一颗冷酷、

无聊、枉然的嫉妒心，当斯托雷平得以平定俄国暴乱、恢复国内秩序，支撑国家政局的时候，维特的妒忌心大发，陷于不能自拔的地步。（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斯托雷平不仅撤了他的职，纠正了他那屡遭失败的体制，甚至要把敖得萨公署的“维特”街改为别的名字。维特流着泪跪在斯托雷平面前恳求不要改名，而斯托雷平说他根本没干预此事）维特并不是反对方的主要、公开发言人，而是反对派幕后的主要鼓吹者。

斯托雷平究竟要这个西部地方自治法草案战胜参议院，但这个倒霉的法律草案却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参议员们的阶级私利高于一切。大概为这么一个不那么重要的法案也要进行殊死战斗，恐怕还得拖上5年，那么斯托雷平政府的路线还要持续多久呢？

在参议院各委员会议上大多数论点都通过了，然而在全体会议上，就感到日益加强的敌意竟树起一面敌视的墙，斯托雷平借助陛下之力，即由陛下签字的一封致参议院主席的信件，信中要求通过这个法案。坚定的反对派之一，特列波夫谒见陛下的问题，您真把信件理解为命令吗？或者“凭良心说，您真心同意吗？”陛下惯于平衡双方战斗，自然承认他真心同意通过那些法案；陛下惯于不露真情，并没有把这一插曲告诉斯托雷平。此刻，陛下身边聚集了许多反对政府总理大臣的势力，所有陛下身边的人，所有前来晋见的人都提醒陛下要反对斯托雷平。又加上1911年初，处理伊利奥多尔和拉斯普京的危机时，斯托雷平的做法伤了沙皇的心，同时这种做法也没有成功。

3月4日，西部地方自治法草案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遭到否决。3月5日，斯托雷平递上辞职报告。

在人们生活中和社会生活中，类似的事不乏其例，当主要路线上所有严重的阻碍都一一清除了的时候，但常常在次要的障碍面前栽了跟头。可能是由于长时间持续不断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使人对阻力的感觉迟钝了。

按现行的国家宪法程序，不会因参议院一家投不信任票而要求政府辞职，按宪法规定，政府只对君主负责。然而，由于参议院不断投票反对，环视周围的敌对情绪，使斯托雷平明白了，只是躲在幕后，还没有出台，皇上已经放弃

了他的总理大臣。

斯托雷平的辞职报告呈上第四天仍未得到答复，那时彼得堡已传出科科夫佐夫出任总理大臣的消息，他的照片出现在商店橱窗和画店里。后来，斯托雷平受到孀居的皇太后召见，得到太后始终如一的、充分信任的支持。在大门前遇到了陛下，陛下擦着眼泪，怏怏不快地绕过去。太后亲切热情地说服斯托雷平，要他继续担任总理大臣："我将告诉我的儿子，只有您一个人有能力拯救俄国。"当日午夜2时，信使送来陛下致斯托雷平的信，共16页，信中承认自己错了，有点内疚，保证今后不再隐瞒政府事务，希望友好工作，要求他撤回辞呈。

斯托雷平当时表现出并非他固有的那种过分强硬态度，是怨恨的爆发还是想进一步扫清改革道路上的障碍呢？他坚持要反对派首脑B·特列波夫和П·都尔诺沃退出参议院无限期休假。而且参议院解散3天，在这3天里政府发布87条和西部地方自治法，此举于3月11日完成。那些白发苍苍、胸前挂满了星章、身缠绶带的达官显贵和大臣侍从们不得不庄严耸立，聆听解散参议院的最高命令，并数次高呼"万岁"，向皇帝陛下表忠心。

立法程序采取了非常步骤，87条以陛下命令的形式颁布成的法律，是在立法机关缺席和非常条件下定成的，而不是为宣布87条生效而蓄意解散立法机构。

现在该要对斯托雷平加以评价的时候了，他过于狂热，过分固执，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专横、过激、狭隘和偏执。他的这种品格影响对业已与他交恶的上流社会的工作。面临事业的需要，面临国家的需要，来自这帮老头子的干扰实在令人烦恼。他之所以敢于教训参议院一通，无疑考虑到有杜马的可靠支持。参议院否决西部地方自治法案，是个偶然事件，不值得呈递辞职报告，也不值得解散参议院，也没有必要强行颁布87条（马克拉科夫后来评论那次争论后政治热情冷漠十年说，斯托雷平没能利用法律的可靠手段，首先他应当耐心等待议会夏季休会，那时进行表决87条就不会受挫，而且杜马也没有理由废止自己赞成的法律，而该法案无论怎样也不必二次送到参议院）。回过头看，

斯托雷平也明白，只有按 87 条的速度，而不是别的，以起始的速度讨论他所有的基本法律草案，尽管采用起始速度，依然会滞留在杜马或参议院，或者一辈子也通不过。

从这些急不可待地抛开议会突击立法行动中，可以看得出维特宪法在俄国早产的后果，即宪法不成熟和宪法执行人的不成熟，但也隐约可见后来催生的 20 世纪整个世界议会制度伟大试验的先兆。又经把烧红的铁在锤头下锻造其坚固性和可塑性，在俄国锻造早于所有其他人，又比所有的人准备更差。有关议会程序和主要掌权者个人意志的可靠关系，其基本结论被审慎地搁置到 21 世纪初。

斯托雷平采用解散立法会议 3 天的蛮横做法再次招致彼得堡社会各界的反对，左派和中间派因为他绕过宪法，也遭到右派反对，因为他们受到了侮辱，他们的首领受到制裁。

斯托雷平那位不稳定的朋友古奇科夫勃然大怒，大发雷霆，尽管西部地方自治案实行恰好吻合他的十月党人杜马多数的路线，他还是发疯一样辞去杜马主席职务，远远离开，到了蒙古。他还以掌击门，夸大其词，把第三届杜马归为像第二届一样不可靠。古奇科夫辞职，斯托雷平特别感到意外，并希望他很快回心转意，古奇科夫不能背叛他!

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在斯托雷平的逼攻下，一开始理解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像直布罗陀海峡两岸耸立的岩石一样，大权独揽的权势者的轻率无礼行为“自从庇龙以后不曾见过的刚愎自用行为”，当失败反而有利时刻，又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幸运到来。

又过半个月，斯托雷平不得不去参议院为他政策辩护，参议院深知他的能量所在，那就是再过一个半月，他们不喜欢的法律草案就会自动失效的。斯托雷平得听取无数的责难，说他怀有报复心的敌对情绪，说他出于本能而恣意妄为，说他犯了令人寒心的狂热病，说他实行总理大臣独裁统治，批评他为保全地位而耍弄种种手腕，说靠杜马的革命本性进行赌博，说他排挤有教养的独立保守派人士，说他培植官员的唯唯诺诺的奴性，事无巨细都要从法律上提出反

驳。此外，还颇为动情地责备他断章取义地择引1905年10月17日宣言，篡改维堡告人民书。

但这一类揭发并没有动摇斯托雷平的意志，也没有影响他的情绪，他依旧精神饱满地、旁征博引地回答质问，而且更广泛更有说服力，无论在细节上和整体把握上都没有偏离整个争论的范围。对所有法理质问，他没有忽视用法的程序回答，并援引西方法律专家的理论，指出类似解散国会的实例，甚至指出格拉斯顿解散议会的事实。他证明说，君主的意志不容批评（他仍躲在已经背叛了他的王位后面），由君主意志来决定法律的非常性和普遍性，否认君主解散议会权意味着整个国家在未来的非常时期，必然要遭受危险。我们目前还没有政治文明，处于人民代表制发展的初期阶段，意见不合，冲突，耗时费力，影响工作，在立法机关内可能结成死结、形成僵局，只有君主才能解开死结，打破僵局，虽然这也是对议会政治相反的极端。他的一只脚已经滑离了1905年10月17日宣言，而宣言则努力维护议会制度。

斯托雷平在参议院面前站稳了脚跟，看起来他固守住一个执行者的强有力的立场。然而到4月末立法的最后一个礼拜时，该次法律草案仍命中注定被废止了，恰恰是在杜马。而今斯托雷平更多地寄希望于杜马，借杜马的表述方式加以调和，通过他的法案，事实上正是在杜马受到最具有毁灭性的抨击。

斯托雷平首先回答质问。他提出一条又一条新的理由，这样一来整个论据的框架已经大大超越业已经过辩证的立法条文，他特别详尽地从法律方面的辩护，他预计从这个方面发动总攻。他凭感觉提示大家，立法议会由于意见不一和经验不足阻碍了法律草案通过，而正因如此，千百万俄国人民在受苦受难，阻碍他们的祈祷。而今说到西部地方自治法上：

"人民大团结的感情能否取胜呢？而我们的西方和东方邻国团结而变得如此强大了。"

他暗示，正由于这次临时解散两院才保住了杜马决议和杜马的正确抉择。最后在极不友好的听众面前按自己作风进行公开的战斗，第一个冲在前面：

"政府是否有权实行强有力的政策并为它的政治理想而斗争呢？它是否应合

乎传统地、机械式地继续转动政府的车轮呢？这样，每一个问题都会有两种结局：躲避或承担全部责任，只是由于拯救我们的信仰目标，就要承受所有的打击吗？

以前，他对沙皇只是隐约地含有责备以表示自己的真实想法，今天从讲坛上一下子全吐露出来了：

“对于一个当权者而言，没有比懦怯地规避责任更大的罪孽了。负担责任，是我们生活中最大的幸福。”

不论将来什么时候，他的讲话都要公布于众的，这次讲话是他最后一次演说。

他坐在议会大臣席听取辩论。这一次他能否说服大家，推动立法工作，或者哪怕是让怀着敌对情绪的听众感到为难呢！由于古奇科夫出走而群龙无首的十月党议会党团的第一个发言，已经预示着好事不多。演说人引发一个危机，即辩论总理大臣个人在立法当中的作用。

“哪怕是最好的措施，如果它是经由可疑的立法途径通过的，也是对过去的背离。我们的历史灾难，就是对法的思想不尊重，对法律的不可动性不尊重。凡是没有遭到反对的措施，都具有再次出现的倾向。”

这就是演说人主要的、经常性的工作吗？倾听反对自己的言论真是那么容易唉？他是否已经丧失了回答的能力了？立法者只管立法而不用去执行，或者阻挠法律通过而不需要为国家摆脱困难去寻找出路，光说不练何等轻松！从20世纪徒有其表的华丽讲坛下从容不迫地提出一套空洞无物、能得到一致通过，但超越目前十万火急需要的法律，只空谈法律制度，又有多么容易！身穿笔挺洋服，颈系领带，别上宝石领针，奢谈我们千年历史灾难，既不去想想我们渡过多少难关，熬过多少奇寒，也不去想哈扎尔入侵，鞑靼人犯境，立陶宛人进攻，波兰人作乱，正是那些压榨过我们的人最尊重法律！

雍容华贵的瓦西里·马克拉诺夫款款走来，他是下一个发言的，其能言善辩是无以伦比的。正是他，一位机智狡黠、老成练达的法学家，马上要攻破总理大臣的法律依据的层层设防！啊不，要出其不意！只有大演说家才能做到。他宽

宏大度，离开他主攻的战场：

“我甚至想，从形式上说，87 条是不可废止的。”

原来如此！连大法学家都承认这项法律是不可废止的，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但除了该法不可废止之外，还需要凭良心去忠实执行。”

马克拉科夫的主攻点，是斯托雷平形式上正确地执行了法律，却曲解了它的本意。他满怀热情讲演，而他发言的第一部分只轻描淡写地说，曲解是一种政治上犯罪行为，总理大臣被一种好大喜功的情绪所控制，他的道德观比起欧洲基督教道德观，只算是果金特人[1]的道德观，在挤得满满的、神情紧张的杜马大厅里，马克拉科夫说出这样侮辱性的话语，好像给大臣们人几个响亮的嘴巴，终于逼近了不可接近的人，为立宪民主党整整 5 年的深仇大恨报了一箭之仇。而新任杜马主席，正因得到主席职位而暗自高兴的罗江科站起身来，但不敢贸然打断发言，马克拉科夫没有舍弃律师惯用的步步紧逼那种激动人心的手法：

“假如总理大臣，他的整个旺盛精力和果敢精神，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他若真地低下头来，那该是多么令人敬佩的表示啊。”

他又把俄国称做斯托雷平的世袭领地，又不啻狠狠地打了一个嘴巴。

在马克拉科夫猛烈抨击下，总理大臣处境不利，不知怎么不仅不能回击，由于受到侮辱，必须离开大臣席。这倒不是因为害怕遭到打击，而是他的处境十分尴尬，只能证明对手有理。

“这就是我们当权阶级的古老心理状态。我们所有的省长，斯托雷平是一个缩影，一个典型。他就是在这种心理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因而不理解为什么杜马站在另一种立场上。就‘国家杜马’而言，西部各省有没有地方自治局对比俄国是否成为法治国家来说，只是小事一桩。”

的确，斯托雷平彻底失算了，他对杜马估计不足，但怎么也弄不明白，为

---

①西南非洲一个民族，19 世纪初有人口百万，由于英国的种族灭绝政策，到 20 世纪中叶只剩不足万人。——译者注

什么杜马竟能说，西部地方自治，全国地方自治，乡级地方自治，农民本身和民族利益是微末小事呢？而且抓住总理大臣不放，一门心思清算他一连串的失败，才算大事吗？他原指望杜马也需要地方自治，还指望从杜马处得到反响，得到支持，以为杜马能满意降低地方自治局选举财产资格，支持民主化前景，以此加强自己反对参议院的立场。不，如今所有指望都落空了。杜马把所有有利条件都抛弃了。尽管立宪民主党的大律师也承认地方自治法是不可废止的，他现在还想教导斯托雷平一番应当如何做官：

“每一个人员都应当服从法律，学会让步。”

这样的关系实在叫人难以忍受，为争取地方自治法通过还付出代价，低下头聆听教诲。

“总理大臣在俄国是否成了最负盛名的人物？”

只有杜马一家一直不予承认。

“你瞧，几年后……”

几年后，斯托雷平在杜马辩论时第一次处于劣势。第一次有些什么断下来，变了样，落到看样子还不像沼泽泥潭的地方。在他们大声嘲笑之下，他把俄国从极度混乱状态中拯救出来，他是力能胜任的。在西部半打省份不大的改革上却栽了跟头。

“极度自命不凡和胆大妄为的性格使他把自己的政治理想置于法律之上。有时，历史会宽恕那些善于推翻所有法律、牵着国家鼻子走的泰斗们，可惜那些巨人们并不知道应当让逊一点。”

他没有牵着国家鼻子走吗？难道他什么也没有干吗？噢，从另一方面测算劳动的人，看不到也忘记了以前国家濒临深渊的事，它永远不会担起我们肩负的重担。

“四年来，我们不知疲倦地指出，以他为最高领导的有损名誉的统治方法……相信自己观点……沽名钓誉的野心勃勃的统治者形象……假托真正的绥靖政策，不断煽风点火，为的是使自己成为不可或缺的人。”

好像他从来是不迎着炸弹硝烟大踏步前进，而只是一个追求升官发财、封

侯晋爵的人，投机取巧才是最终目的。你无法回答我，你们的子女一根毫毛未损，我的孩子被炸成残废。

……一种异样感觉涌上心头，5年来成功的建树，突然间好像变成了一堆瓦砾，一片废墟，一切都受到怀疑……5年前如果丢下他们，他们现在早已统统完蛋，一命呜呼。正是靠他斯托雷平铁的手腕把他们从灭亡中拯救出来的，而今他却被判处挨耳光子。你自己先动摇了：对，错了，对，在平坦顺利时，忘乎所以，还想教训一下妄自尊大的参议院。

马克拉科夫突然采用了大大出乎意料之外机智灵活的战术，他把话锋一转，做出痛心的样子，高声说道：

"至于说到保皇派思想，我是保皇派，比起总理大臣毫不逊色!"

他又威吓杜马一通：

"我认为否定君主政体，尤其是君主政体的深厚的历史根基的国家，是一种愚蠢行为。但这位君主政体的卫士在他与参议院的冲突中假托了陛下的名义……没有价值的改革……令人生疑的行动……提出辞呈从中牟利……"

这种机敏的战术加上律师那种颤抖的声音，早已不是面向杜马，他在不断升高，高过杜马主席那个像水壶一样硕大的胴体，升高，再升高，他不能不把话传到那些人的耳朵中，用总理大臣最终辞职的必然性来安慰他们。马克拉科夫今天站出来讲话，表面上好像保卫杜马，实际上他以哗众取宠的言辞想达到把不可靠的总理大臣与伟大的沙皇隔离开的目的。也只有杜马才敢与斯托雷平发生正面冲突，也只有杜马才能与心怀不满的君主结盟，与怀有刻骨铭心仇恨的上流社会结盟。马克拉科夫达到了主要目标之后，现在准备最后一记耳光：

"对这种类型国务人员，俄语中有过辉煌时期，但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他可能仍在其位，但是，先生们，这已是垂死挣扎。"

确切地说，这叫一刀再断。已经痛骂了一通，侮辱了一顿，可又不能得到决斗的挑战，因为证明受侮辱对象已经破产。

然而，他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只靠他唯一的口诛能干出一番大事，他既没有理有据的新发现，又没有一言九鼎的威望，只能靠如簧之舌，巧妙地利用听

众弱点已知因素的错位组合，一下子就把一位担当全俄重要职位的巨人扳倒，挤走，其意在于朝尚未辞职的政府头上泼污水。

这时，讲坛上又来了一个立宪民主党人，歇斯底里、变化无常的人物普里斯凯维奇，他总是狡猾地试图博得那些永恒不变的左派敌人的鼓掌，他从另一个方面即受攻击更少的方面报复斯托雷平一番。

从这一方面进行侮辱，也够人受的。他说斯托雷平懦怯地以陛下的圣名为掩护，亵渎了俄国专制君主的威望，面对萨拉托夫叛乱缺乏坚定的立场，讨好革命，实行个人独裁统治，不理解俄国国家理想，缺乏聪明才智和坚强意志。

"必须予以盖棺论定，他迟早要混蛋!"

普里什克维奇不承认斯托雷平有权自称俄国民族主义者，他的民族主义是最有害的潮流，从前俄国也有过，他激活了少数民族内心希望实行民族自决权的民族分化。他让边区实行民族自决权，是一种愚蠢行为，因为帝国的异民族不能与本土俄国居民享有同等自决权。西部边区并没有要求选举地方自治局，而是杜马臆想出来的，总理大臣为讨杜马欢心，由杜马参加修订的法律，对俄国居民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法律，是波兰人的胜利，左派的胜利，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分立主义将蜂拥进入西部地方自治局。

并非每一个人一生中都能落到这样的地步。这一天，斯托雷平处于无人保护当众受辱、慢慢执行死刑的境地。他惊愕，他茫然，他不知所措，但来自敌对一方的进攻炮火依旧十分猛烈。后继而来的演说家们的非难诋毁之词盖过了和填补了前面演说家的指责，从各方面依次而来的令人难以忍受的侮辱毁誉之词，突然使我们从来也没有动摇过的信心也开始动摇了。打击连着打击，一个一个落在我们的头上，渐渐地摧残我们的坚定立场。我们熟知的完整目标，瞬间倾斜了，翻转过来，裂开了，你会战战兢兢地怀疑它是否是完整的和唯一的？并不是为这项法案不值得低头，但你可早一天或更早见到可不是这样呀？

急不可待的演说家们穿梭般你来我往，不是10个人，也不是15人，第三届杜马的虎狼相噬远远胜过历届杜马。

斯托雷平听到一位社会主义者说，他把俄国人民置于血泊中，作为人民最

凶残的敌人，他不会给俄国专制制度带来一点危害，他的西部地方自治法，乃是镇压人民“金字塔的顶峰”。

又来了一个相当知名的立宪民主党人：

“他大言不惭地说他是民族主义代表，我们倒要看看总理大臣的丰功伟绩究竟在哪里？我们既不知道萨多瓦城下的胜利，也不知道色当[1]城外的凯旋。”

这不是怪罪斯托雷平没有发动战争吗？

“他奢求他的思想是俄国人民唯一合乎真理的思想，这是对民族感情的亵渎。”

又一个右派上台说：

“总理大臣，应当自认有罪，请求王位宽恕，因为您欺骗了最高政权。”

这是一次仇恨大爆发，仿佛所有的人都在等待适当的时机到来，报仇雪恨，把他们这些年受压抑的满腔怒火、切齿仇恨一股脑儿释放出来。

也有人表示赞成他，说了赞许的话，但这样的人很少，对于一颗有良知的心来说，对他们提出的理由也不能漠然置之。他感到几乎一切都彻底崩溃了，不止这项法律草案，而是5年间整个国家管理工作，乃至一生中所有的谋略。

他觉得一生做过许许多多事，可究竟一无所有，一切都化成泡影了。

演说家来来往往，上上下下，会议延续到傍晚，又到半夜，再过午夜，只是到了此时才提议表决。有两个来自西部的农民，罗江科一整天不允许他们发言，虽然他们一开始就要求参加辩论，现在他们开始说了：

“你们堵住我们的嘴，我们非常欢迎西部边区实行地方自治，但愿那里能执行87条或其他什么。如果等待你们，等待你们的改革，那我们什么能等到。”

可惜，为时过晚，代表不听他们的呼声。马上进行表决，200名反对，80名赞成，只有俄国民族主义者坚定地相信斯托雷平。

西部地方自治法搁置下来了，当斯托雷平死后才顺利通过，而在西部实行

---

①色当，在法国东北部。1870年德法战争时，拿破仑第三和他的嫡系部队在此向普兵士投降。——译者注

地方自治对后来战争时期大有帮助。

早在4月份，敏感的贵族鼻子就嗅到陛下对斯托雷平冷漠了，甚至有点反感。而上流社会开始在斯托雷平周围制造一种他的时代即将结束的氛围。大概在寻找一种体面的形式，把他安排在一个没有影响的虚职，让其卸任。这样的设想，例如新设计一个东西伯利亚总督职位，把他派到他喜欢去的边区。

斯托雷平可能屈从，顺从地走开，这样可以保存一条命，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直到俄国再次需要他，再次得到承认。（有用！1917年7月，为拒绝参战，用得到他。1917年彼得堡和莫吉廖夫用到他了，如果没有遭到刺杀的话）

然而，在药房岛爆炸事件后，他就摒弃了这种弱者的出逃方式，当时革命者就是逼他走这条路，今天他同样拒绝这一个出路，议会却把他往这条路上逼。他应当恪尽职守。

当时，药房岛爆炸事件之后，他就说出：

"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没有为陛下撰写备忘录，一旦我死了，不致产生任何不必要的混乱。我要在第二次谋杀之前完成编撰工作。"

在第二次，第四次，第六次谋杀时有没有这样的备忘录，我们不得而知，就在药房岛爆炸事件之后，他依旧每日穿过各岛间的桥梁前去冬宫，那些日日夜夜能抽暇编撰吗？白天的政务都需要紧急处理，每天活动排得满满的，要想约见，得事先预约，耐心等待。

4月份，在参议院和"国家杜马"遭到惨败之后，斯托雷平编写的治国大纲更加成熟，虽然他早有准备。治国大纲的第二阶段是1906年第一治国大纲的直接继续，那时已经提到第二届杜马那些充耳不闻的代表面前，因为当时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和赏识。在他整整60个月执政期间，这个治国大纲不断变为现实。它正在一环扣一环，一圈扣一圈，像树木生长一样，在现实生活中和在它作者的心目中也难分辨，也无法听得到。只有做一次整体有效的回顾，才能分辨清楚，并可以叫做"治国先治脚"，治理下层，治理农民，都一一圆满完成了，现在该是治理官僚主义的时候了。

斯托雷平的第二治国大纲是1911年5月下令编写的（但有个停顿，那就

是"只要上帝保佑，这一切，这一切都能办到"），即由政府各管理部门分列草拟完成。

在前一年，他的"地方经济事务委员会"已经启动，法律草案是由各部官员、省长、贵族头面人物、市长和地方自治局的人员协同准备。这个委员会社会上传说叫做"先行思考"委员会，其目的是供官员制订法律，再由有实际生活的人们加以检验。按照新的大纲要求，地方自治事务由内政部分出来成立独立的部主管所有地方的官方机关（内政部只保留保卫机关，警察机关，解除不属于它的职能），地方自治局权力扩大了，这是学习美国各州的管理经验。地方自治局全权管理本地粮食供应（为了免除饥饿威胁建立新粮食供给条例，按此条例饥民供给原则是：富裕者贷粮、身强力壮的人以社会劳动换取粮食，无劳动能力者由慈善机关救济）。为给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提供贷款，为地方公共设施，道路建设，国家成立了专门的银行。高等学校划归省地方自治局管理，中等学校划归县地方自治局，初等学校归乡地方自治局（乡级地方自治局，目前杜马尚未批准建立）。地方自治局选举的财产资格降低10倍，以便独立庄园主人和不动产少的工人能被选进地方自治机构。

建立新的劳动部，以监督所有企业，并研究西方工人阶级的地位，准备制订法律以改善我们工人阶级的地位，把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改造为国家和地方自治建设的参加者。建立社会保障部，少数民族部（在他们权利平等的基础上），宗教事务部，管理全部教派，东正教是其中一部分。宗教院变为宗教事务部的一个委员会，任务是研究大主教管区制度，鉴于俄国人民的正教信仰要求被忽视，应当大大扩充神学院网，扩大教会中学以加强教会中间层，所有神甫都必须由神学院毕业。卫生部向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拨款，建立农村居民和工人的免费医疗制度，消除瘟疫和传染病，提高国内医疗水平。最后还要建立一个新部，开发利用地下资源。

所有各部要开展工作都需要巨额预算。极为富有的俄国的国家预算却依赖西方穷得多的国家的贷款！俄国资源丰富，而冶金和机械工业落后。在俄国资产低于它的实际价值和实际收入，因此外国企业家很容易收回投资。为改变这种

局面，首先提高白酒和葡萄酒的消费税，实行先进的所得税制（低收入者几乎享受免税，间接税率也不高）。国家预算增长一倍多，以增税开辟新的拨款财源。贷款到来之初先用贷款研究地下资源，建设公路和铁路，经过15—20年（1927—1932年），俄国欧洲部分的公路和铁路不亚于欧洲中部各国的公路和铁路网。这项计划包括水路网和运河网，交通部必须在1912年完成计划草案。犹太人银行和股份有限公司应聘请私方承担人，废除对犹太人的限制是斯托雷平治国大纲的一个不变部分，国家银行逐步超过私人银行的业务。

增加（从实际生活需要考虑）所有官员、警察、教师、神职人员、铁路和邮政职员工资，采取这项措施可能吸收更多受过教育的人员。1908年已经广泛施行免费初等教育，到1922年应当实行全部免费教育，中等学校达到5000所，高等学校1500所。扩大低收入阶级最低收费的进修，所有大学领取奖学金的学生人数扩大20倍，奖励学生的同时，成立研究生院为国家高层次职位培养人材。在这种2—3年制的研究生院设立适应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系科，并有明细计划，哪个科应招收哪个大学的毕业生，如矿产系从矿产学院招生，军事工程系从军事学院招生，宗教事务系从神学院招生。这些行家里手和专门人才将为俄国增辉。高职位不能再由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平庸无能或由于受庇护偶然提拔的人来占据，陛下遴选大臣不能眯缝眼睛，从记忆中挑选或听取贵族的建议，而应从内阁推荐名单中挑选。少数民族事务部应选择在非俄国群众中有威望的社会贤达人士来领导。

准备给予社会民主党以合法地位，但禁止恐怖分子留在党内。

斯托雷平的治国大纲包括对外政策。对外政策的基点是俄国不需要扩强疆土，但要保卫现有领土，整顿国家管理机构程序，提高居民地位，因此，俄国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为提高俄皇在海牙和平论坛的主动性，斯托雷平于1911年5月提出建立国际议会的计划，来自世界各国的人士到了欧洲的一个小国。国际议会各委员会的业务是常设的。国际议会下设国际统计局，每年筹集所有国家公布的资料，包括居民数和移民数，工业和贸易发展数字，自然资源、未开垦的土地、商品交换条件、居民地位、工业中工人数量、农业、

失业人数、人均收入，不同居民阶层的收入，捐税、内债、储蓄。国际议会根据统计资料确定应给予处境困难的国家以援助，监督生产过剩造成的危机爆发或由于贫困引发的危机以及移民冲突，俄国准备参加此类援助，国际银行以各国捐款向处境困难的国家贷款。

斯托雷平特别重视与美国的关系，首先希望美国支持他的国际议会的倡议。美国没有理由嫉妒俄国，害怕俄国，美国和俄国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只是美国的犹太人强化宣传造成了提防俄国、厌恶俄国，造成一种印象好像俄国所有的人都受压迫、毫无自由可言。斯托雷平提议，美国可以向俄国派出大型代表团、议员代表团、国际会议代表团、记者代表团进行实地考察。

辞职要影响他治国大纲的实现，但希望得到皇太后的支持，即使将来辞职再复职，也可能遭到反对。当然来自各个方面的反对势力，比如有“国家杜马”、参议院，两院恰好缺乏国家意识的高度。

这项俄国的宏大治国方略到1927—1932年，可能远胜于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将使俄国成为亘古未见的、破天荒的强大国家，第一次完全展示他的才能。

这项治国方略秋天才通过，其实从夏天就放在了他科文私邸的办公桌内。他死后，政府派来一个委员会，在见证人在场情况下，并没发现这个文件。此后，这项治国方略草案就永远失踪了，任何地方也没有发现，没有讨论、没有提供证明，也没有找到，只有保存在编写助手的证明材料中。有可能被共产党人找到了，他的计划思想被改头换面的形式加以利用。有人嘲笑说，共产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恰好与斯托雷平的最后五年计划吻合。

那年夏天，斯托雷平从来没有这样厌倦和压抑，但对孩子们十分亲切。在他最困难的时刻，他害怕并感到死亡来临，他担心俄国的覆灭，他从来就不怕死，他怕的是俄国的崩溃。他对他自己与不负责任的宦官争斗不力非常不满意，此意是他对大臣吉马舍夫透露的。他说：“我们储备已够消耗几年，就像骆驼靠它储备的脂肪生活一样，这之后，就会垮了……”他对内政部副手克雷然斯基说：“我从基辅回来，我们就着手改组警察。”8月，他最后一次来到彼得堡，在

叶拉根岛主持大臣会议，最后一次与古奇科夫会面，讨论如何推动"国家杜马"通过增加下层官员的养老全法案。在彼得堡，许多人警告斯托雷平，好像芬兰革命者已经宣布他的死刑判决书。

他们已干过多次。

沙皇到基辅享受奢华的庆典活动。他想不到在他为数众多的御司马和皇宫侍从中间，还有一个人，他的总理大臣有过多少闪闪发光钮扣的盛装，而留下他处理国家大事。

纪念碑揭幕，正好是亚历山大二世第一次改革 50 周年。

斯托雷平与亲人告别，与科文私邸邻居、与朋友告别时非常伤感，恋恋不舍。他说，从来出行没有这样不快。当然，这次出差仍有一定意义，那就是基辅是西部边区的主要城市，在这里应当强化西部各省地方自治制度，这些年正是基辅点燃了俄国民族意识之光。

不知列车怎么开动后又停留了半个小时，而后再启动。

大概斯托雷平不是从彼得堡出发的，他又没有带宪兵队的军官，身边只有一名校级参谋叶绍洛夫，而且他不是负责保卫工作的，只是协助总理秘密处理接待，会见记者和负责正式集会的事宜。

基辅大典活动的整个保卫工作，陛下早预先于他精心安排，后来又在宫中多次详细讨论过，不再采用常规方式，既不由地方政权领导保卫工作。当然，由那个围绕陛下屁股转并讨得陛下欢心的库尔洛夫全权领导。从 1911 年春天起，库尔洛夫走遍了陛下专列要去的地方，这些省份的主管机关的官员都得服从他的指挥。这种做法激怒了基辅总督费多尔·特列波夫将军，他向基托雷平提出抗议，并请求辞职，把这件事通报陛下，有可能改变保卫工作的命令，无疑会挫伤皇帝陛下那颗预先体验了快乐的幼稚的心。也正由于怜恤帝王那颗童心，斯托雷平劝导特列波夫以后再递辞呈。这样，陛下的保卫工作从熟习本地情况的各地主管手中交给一个外来人的手中，库尔洛夫对上只服从宫廷司令杰久林一人，杰久林派出上校斯波里多维奇负责保护君主陛下并与库尔洛夫保持联系。

库尔洛夫好像是斯托雷平的属下、副手，可是已经统领王国的全部警察和宪兵，完全不受斯托雷平管辖，独立于斯托雷平。然而，斯托雷平反觉得这样是为了他不再为警察的事情操心动脑。斯托雷平不喜欢库尔洛夫其人，在整个行为方式，所有生活看法，与他刚好相反，与常人格格不入。在决定每一件事时，他都固守一个原则，那就这件事能给带来什么好处。从他身上看到一只凶残的尖嘴野猪，它用爪子前刨后蹬，大吃大嚼，而后跷蹶跑掉。他习惯到处笼络人，与斯托雷平的敌人勾结在一起。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无声无息的官僚，而是像大贵族一样，贪得无厌地饕餮大吃，酒宴狂饮，看成生活成就的尺度，所以除了公务，还搞点商业经营，浑水摸鱼的投机活动，涉足期票买卖。可是他并不具备足够的聪明才智，因此他上了沃斯克列克辛斯基的圈套，把他从监狱放出来，做内奸、搞两面派，差一点没与沃斯科列克斯基在阿斯特拉罕大街同归于尽，而后他编造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其他警察将军。

但你要费好大的劲儿才能及时躲开这个“壁虫”，有更重要任务等你去干，不值得在他身上浪费精力，自己应当时时绕开走。

那个宫廷司令杰久林，是个术士和庆典活动的指挥。来自上流社会，重要的“沼泽黏性”的一个，是斯托雷平不共戴天的敌人。而今，比其他人更了解陛下冷漠斯托雷平的事实，他公然把陛下的冷淡表现在他的脸上，让所有的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而且还洋洋得意！老练的贵族人群，捕捉到一点蛛丝马迹，计算着这类微末差异，便轻率地表示出来，斯托雷平已不值得尊重，也不值得注意。从8月27日斯托雷平到达基辅伊始，便被贬低，明目张胆地把他从宫廷程序表中一笔勾销，因为他不够资格，他是个平常人。

给斯托雷平安排的住宿房间是在人人可以自由出入的省长房间，窗子对着花园，离地面只有一俄尺，不便保卫，但库尔洛夫拒绝了叶绍洛夫在庄园设宪兵岗哨的要求，说是多此一举。公务员和文官，还有远道农民前来要求总理大臣签字。人行步道只离总理大臣房间几步之摇，入口处人人可以随意入内，既没有警察站岗，也没有军官执勤。当他去索菲娅修道院时，也没有派护卫；当他拜会总主教，也没有贵族代表，地方自治局代表和城市自治局代表陪同。

礼节性的拜访都是多余，斯托雷平继续工作，从基辅继续进行管理国家事务的工作。

从8月26日起，博格罗夫已经准备刺杀斯托雷平。有关此事没有一个人通知总理大臣，库尔洛夫——韦里金——斯波里多维奇——库利亚布科一伙没有一个检查一下总理大臣要不要保护。

斯托雷平没有得到保护，几乎尽人皆知，爱国人士自告奋勇提议由他们保卫斯托雷平。提出申请的人有2000多人，申请书等待批准，拖延了时间，经过圈抹之后退还下来，但为时已晚。叶绍洛夫经过艰苦努力，才在人行道上设了一个宪兵岗哨。

29日，对情况一无所知的斯托雷平前去车站参加恭迎圣上的仪式。没有人给他派来宫廷马车，警察局的汽车没有钱开出来，他被迫找到一辆街头出租的半篷马车，车上根本没有保护措施，只有他与叶绍洛夫二人。当宫廷马车已经开走的时候，依然没有收到何时放行总理大臣马车的命令，叶绍洛夫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总理大臣的半篷马车安排在执勤侍从武官三人小组之后。

基辅市长季亚科夫知道斯托雷平的处境，此后几天把他个人的双座马车派来供他使用。

这些天，赖恩教授多次恳求斯托雷平穿上切梅尔津带铠甲的军装。斯托雷平拒绝说，这种军装并不防弹。不知为什么，他常常想象，不是手枪而是炸弹置他于死地。

不论8月30日、8月31日，还是在商贾花园，斯托雷平依然对博格罗夫的出现以及有关他的一切情报，一无所知。

博格罗夫的准备工作又隐蔽，又狡猾！他没有想到，他面对的堂堂俄国总理保卫竟如此不森严！既然这样，这些天来，即使没有什么鸟剧院，他也可以射杀斯托雷平40次。

9月1日清晨，他收到了特列波夫一封警告便笺，要提防不测，随后库尔洛夫一个人到来，办理公事，签署无以数计的奖励文件。在办公时，他顺便说有秘密谍报提醒重点防备博格罗夫，总理最好等保卫机关派汽车来接他。

斯托雷平没引起重视，问："找到炸弹没有。" "没有"。

他也没有问到底怎么回事儿，不过暗探局即使出于保卫工作目的而收买告密者这种假设也是不允许的，这种做法应绝对禁止。虽然库尔洛夫是知情的，但仍听之任之，不加干涉。

人们一再催促斯托雷平参加这里的盛大庆典活动，有赛马，还有军事演习。因为他不属于贵族行列，让他提前一个半小时出发，否则禁止通过，但斯托雷平拒绝空空浪费这一个半小时时间。

他那不知疲倦地奋斗的一生最后几天里，由于宫廷的烦琐礼节，参加过许多的礼仪性活动。

斯托雷平一行几乎到开演前最后一刻才拿到入场券，他们拿到戏票的时间未必比博格罗夫早，叶绍洛夫的戏票不是与斯托雷平挨号的。斯托雷平的票是第一排左侧通道边上的，叶绍洛夫的票在第三排拥挤的中间。当他找到这个位置，又被保加利亚侍从武官上校占了。叶绍洛夫长时间不清楚怎么回事，最后给他一张靠右侧通道的票。

这样，各在一边，无人打搅，也没有护卫。

斯托雷平可以到特列波夫包厢看戏，但他拒绝了，认为这是过分小心提防的胆怯举动。

叶绍洛夫到戏院入口处询问过库利亚布科，是否逮捕思想不良分子，库利亚布科回答说："明天开会讨论如何处置他们。"

斯托雷平问过库尔洛夫有关思想不良分子的动态，库尔洛夫说不知道，说幕间休息再商量。这时，戏已经开演。

第一次幕间休息，库尔洛夫依旧什么也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斯托雷平也不再想这件事了，他一个人从通道走过去。

此时他还在为这些无意义的事情影响工作而痛心，今天是9月份工作的第一天，秋天应当是他的改革做出决定的季节。

第二次幕间休息，科科夫佐夫前来告别，他是个幸运儿，可以回到彼得堡他的财政部工作。

"带我一起走吧！"斯托雷平忧郁地开了个玩笑，"我在这里不舒畅，我和您在这里都是多余的人，最好是绕过去，没有我们才好。"

这位财政大臣总是异想天开、脾气固执，需要经常开导他，因为他认为财政大臣的角色不是扩大预算以促进俄国的强大进程，而是节制开支，保存资金。但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一位干事业的人。

第三次幕间休息，斯托雷平依然没有离开气闷的演出大厅，哪儿也没有去。他站在乐池墙边，双肘倚在栏杆上，面朝通道。他身穿白色轻便大礼服，捆得紧紧的，像穿着甲胄一样，热得难受！

大厅里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过道空空的，可以从这一头看到那一头。从一边走过来一个人，左摇右摆地走来，他瘦瘦的，高高的，身穿燕尾服，黑色的，与这个夏季的集会很不协调，在人群中显得特别突出。

斯托雷平站在那里与一名侍从交谈。侍从与总理大臣并肩交谈没有什么损失，何况附近没有更重要的大人物。

他们俩同时猜测这个犯罪分子要行凶！他长长的脸，全神戒备，露出聪明机智的表情，犹太青年有不少是这样聪明机智的人。

他们已经猜出他的意图，那个侍从为了保命匆忙跑到一边去了。

斯托雷平从乐池栏杆上收回双肘，向前扑过去，双手伸向前，向前猛冲过去，他想抓住这个恐怖分子，像从前常常抓住恐怕分子那样！

那个人马上亮出勃朗宁手枪，对准他，恐怖分子的脸上不知为什么斜着痉挛的表情，既不是胜利的表情，也不是吃惊，好像一种说不出来的紧张表情。

开枪！一下子把斯托雷平向后推去，背部再次靠上乐池栏杆。

又开一枪，再向后推一下。

好像射击把斯托雷平钉在乐池栏杆上一样，他靠着栏杆随便站立。

恐怖分子，转过他的黑色脊背，转身逃跑了。

没有人在后面追赶他。

有人高声叫道："抓住他！"听声音好像是弗雷德里克斯的颤抖声音。

斯托雷平依旧站着，他不敢动一动，站着轻松些。

有几个人追去，或许能抓住他。

他正什么感觉也没有，只是像一个并未受到伤害的人那样站着，但他知道死期已到。

他受伤以后，还能记住那个瘦瘦的杀手的表情。

斯托雷平依旧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赖恩教授跑过来。

白色大礼服右侧的血渍立刻向四周扩大，凝结，染了一大片。

在这片血渍下面，在这个地方，血还是温暖的。

斯托雷平抬起眼睛向右看，在他头上，感到或想起在哪里，现在找到了。

那就是圣上，站在包厢护栅后面，以吃惊的眼光朝这里望。

他将来会怎么呢？……

斯托雷平想为他画十字，但右手不好使，抬不起来。早已有伤的倒霉右手，今天又给打断的。

俄国将会发生什么呢？

同时，斯托雷平抬起左手，用它有节奏地恭恭敬敬地，不紧不慢为陛下画十字。

这时，他已经站立不住了。

开枪杀人，这在俄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根本不算新奇。

但这一次开枪是整个 20 世纪的一次预演。

沙皇不论在当时，还是稍后一会都没有从包厢下来，也没有来到受伤的斯托雷平身边。

他没有来，他没有来到伤者身边。

可要知道，这两颗子弹已经杀死了整个王朝。

第一批子弹来自叶卡捷琳堡人。

第六十六章

什么是国家公职呢？国家公职是各种职务当中最稳定的一种职业，如果能正确理解的话也是最有利的职业。国家公职，是高层人士不停地向我们发号施令和我们一步一步地向他们靠拢的过程。如果你有本事的话，还有能使人引以为荣的奖赏和让人心醉的金钱，这些收入远远超过你的薪水。

稳稳当当坐在豪华的办公桌后面，身处自己人中间，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嘿、嘿、嘿，"指派供养官场的"老家雀"，如果没有自己的"猪崽"，你就别想稳坐在办公桌后面。

为我们正规国家奠定基础的彼得大帝，给我们留下一份"官阶晋升"大表，它既适用于军事部门供职者又适应于文职机关供职者。它为我们规定了精确的台阶，不容你说三道四，明确规定了，高踞一盘散沙似的俄国人民头上的两个台阶间连带关系的政绩，同时又可使每个公务人员都能正确理解他们升迁的意义，他的领导台阶（地位）、从属台阶（地位）并考虑能得以提拔的条件。谁能灵犀一点通，透彻理解这些规则，谁就能成功地爬上国家的最高层。

但并不仅仅要理解这些规律，还要耐心地长期效力。在枯燥而辛勤的忍耐中日积月累，在极度缓慢有节奏的晋升过程中慢慢攀爬，如此，你一生中永远爬不到应有高度。为上级甘愿效犬马之力是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只效力永远达不到足够的高度，还必须有个人的果敢行动，毫无非议地理解和运用这些规律，但这样条件还不充分，当然还应善于随时夺取和制造必要的机会。通晓规律能武装我们像猛兽口中尖齿利牙，你机警地用它打发不友好人士，排挤竞

争对手，应付监察，倒霉时应付法庭。有时为了真正认识自己的实力，可以用你的牙齿轻轻地“感受”一个你的顶头上司。聪明而有节制地运用这类“勇敢”行为，可以大大加快你跃上高层的速度。

在下层公职台阶，由于环境关系和你年轻无知，有可能投错了路，因为你对荣誉追求的简单直线思维，你错误地作为近卫军官开始服役，这种选择存在着极大的障碍。在这之后，你自己改行了，进了军法学院，毕业后在军法机关工作，可是由于改行为时过晚，已经丧失了跃升的速度。你在外省检察机关苦苦熬了 13 年，此时你已 43。你在官场台阶的中下线厮混了多年，你仍与为数众多的下层小吏为伍，其中有许多失意落魄之士。你枉然通晓种种方法和手段，但由于你固执性格，怎么也适应不了环境，所以你没有被提拔到高层交椅上，而在那里应得的财源会源源不断。

有一次，你心情抑郁地在你的河叉城检察长的办公室里踱步，从窗子看到外省的赤贫景象，一下子想起自己的一连串失意，一下子悟出一个极为了不起的道理，可以立刻改变你的仕途前程。瞧，当今最有权势的内政大臣普列韦，以前也是河叉城的检察长。如果不在自己办公室四壁挂起历任河叉城区法院工作的检察长的照片，办个陈列馆，怎么能进一步发挥河叉城法院的职能呢？要想为这个陈列馆得到我们全体所爱的内政大臣普列韦的荣誉照片，何不专门奉命出差亲自见他本人呢？这个率先提议者，舍我库尔洛夫其谁呢？

公文已发出了，又奉命出差。普列韦由于受到恭维，“龙颜”大悦，而他的标准照经过仔细包裹后从铁路运送。并非用首倡者的那双爱慕他的手钉在墙上，大权在握的内政大臣注视这“过了口”的“半老徐娘”的河叉城检察长，矮个子，小脑袋，平头短发，蓬松胡须，下颚光秃秃的，缺乏自信，但十分真诚，他出其不意地问道：“我们需要人手，您不想从司法机关到行政机关来吗？”库尔洛夫对这次改行早就有充分准备。于是从 1903 年起他不声不响地开始调动，开始任库尔斯克省副省长，而后调任明斯克省省长。

瞧，多么优美的撑杆跳，现在他可以开始一个无可非议的在升官图的主要台阶上冲劲十足的跃升过程。当然了，它的奴仆和引礼员可别赶上动乱危险时

期，那时别说是仕途飞黄腾达，国家高层地位人士的生命也有可能难保，例如率领人数众多的军队保护大庄园主财产。（这一命题又要我们回头看拿破仑的例证。拿破仑是什么人？拿破仑，小矮个子，具有钢铁般的坚强意志，统领大众的能力。当然，拿破仑的故事颇有浪漫色彩，为使自己能在受到威胁的地主的安乐窝里得以藏身，并享受到安逸生活，他在宴席上以沉着冷静的态度，坚定果敢的精神和局势了如指掌的分析，来安抚那些颇有魅力和姿色的太太小姐们）光荣的"升官图炮制者"不可能预见到这样的危险动乱时代，大阶梯的各级台阶突然滑动了，有些人甚至从最高的台阶上跌落下来，碰得头破血流，丧命黄泉，像永远不能忘怀的普列韦那样；或者跌几个台阶，或者其他尚存者，已不知顶头上司的意志，不再像以前那样自信，或自由地行事，现在还要左顾右盼，变换方向，以便得到社会舆论的欢迎，至少不完全采取否定的态度。

不过，库尔洛夫变得小心谨慎了，也知道他自己在这种转换过程当中具备十分有利的条件，乃至在处于两面性规律的情况下，感到自己正处于被提升的有利时机，因为他既是王室的忠实奴仆，也是自由派人士欢迎的人。他担任明斯克省长，上任伊始第一件事就是下令驱逐愤怒的明斯克青年，他们主要来自"崩得"，同时又不失时机地表白他自己是犹太人，享有完全平等权利的可靠卫士。省长官邸驻扎着两个哥萨克骑兵连，他又不失时机地向人民代表解释说，这只是为了驻扎方便，又说是军队首长安排的。车站附近军队开枪射击围攻的群众，他预见到社会可能会反应强烈，于是下令成立军事法庭追究开枪者的责任。然而，恐怖分子并不赏识这种花招儿，依旧向他头上扔炸弹，只是炸弹未爆炸。后来才知道，冯-科坚事先亲手卸下了雷管。在镇压群众这个插曲上偶然失策，库尔洛夫失去了明斯克省长职位，使整个右翼集团认为他是"10月17日风潮"的受害者，又派任他到唯王位是听的基辅省当省长，但他未让自己套在右翼集团的马车上，致使右翼人士面子全无，并支持那位颇有魄力的苏霍姆林诺夫将军，虽然他在亲犹太界中名声不佳。

没有任何溜溜滑的台阶不能攀升，没有任何险恶不实之词能够玷污一个真正的国务人员，只要时时不忘精打细算，不失掉沉着冷静。身处俄国公职教阶

制度下的库尔洛夫知道，有不少这类的政治活动家，国家在他们的把持之下，如果高层领导人士能团结一致，总会明白上流社会共同团结的重要性，在艰难的公务活动局面中相互扶持一把，始终不要用不体面的责备语言贬低彼此的威信，如德米特里·特列波夫不加节制地责难洛普欣，说警察总局没有拨给必要的手段保卫大公爵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那么他们就能继续把持政府。后来引渡阿泽夫时，人们又毫无人性地诬陷洛普欣本人，一点儿不考虑他的级别和机关威信，也诋毁所有法律，因为对泄露国家机密行进惩处，也没有一项法律能够处罚与秘密合作人采取不当的行为。我们大家都怀着悲痛和崇敬的心情悼念大公爵，大公爵的遗孀曾前去监狱看望杀手的那种圣洁虔诚，但这也不能赋予我们在任何事情上、任何时候把彼此间的污点置于职业威信之上。

然后，并不是每一个官员都能把握住这一点，这是一种特殊的才能，库尔洛夫当然心领神会。可是这不是消极地等待可能有利的升迁调动或等待公开的肥缺，又不能只靠空缺，自己要为自己选定下一个有利的职位，也要靠自己的坚韧不拔努力得到它。好心肠的内政大臣杜尔诺沃答应库尔洛夫把他从犹太人骚动的明斯克省调到富饶、更重要的大城省。可惜，1906 年初那暴风雨的岁月，杜尔诺沃也没能保住他的大臣位置，接替他的是粗野的暴发户斯托雷平，如库尔洛夫一样从外省省长职位一下子飞升到大臣圈子，完全不合法规的。斯托雷平不知道或者不想实行杜尔诺沃的承诺，下城省空缺任用了别人。

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刻，今天要在这个暴发户的怪家伙手下服务，绝对不能卑躬屈膝，是你言而无信。应当坚定把握住开始的目标。在这可怕的岁月里，留在革命的明斯克，意味着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毁掉仕途前程，丢了名誉，甚至丢掉脑袋。除了申请退职这外，别无其他出路。

在其他任何时候提出辞职无疑于自杀，自行中断服务，这就意味着永远辞职。但在今天变化无常时期，可能是最好的深谋远虑的举措，退职后观察局势走向。如果一切都完善了，那就是摆脱威胁的最佳选择时机；如果秩序恢复正常，必然将有新的空缺。当然库尔洛夫不采用完全退职的途径，因为他还是宫廷侍从。

由于库尔洛夫具有特殊的远见卓识，他利用休假时期到国外休养生息，当然去好客的法兰西最好，从法国观察俄国事变的发展。

这里必须说清楚，尽管国家升官图的官位等级是宇宙万物固有的部分，人类躯体和石头基座支持着世界，但官位等级依然不是主要创造性和最有活力的组织，而是那快乐活命的溪水在石头基座之间任意流淌，这就是金钱。金钱不仅能赋予整个人无可比拟的力量，还有权力，更有个人完全独立自由的地位，也可预见享受到快乐的玫瑰色的梦。人的一生从原则上讲不要局限一种职务，所有的职务只不过是发挥生平才能的基础。

库尔洛夫远在年轻时期，就充分认识到生存的重要性，所以不无聪明地选择工厂主的儿女为妻，让她带来丰厚的嫁妆。而今能比许多事业有成的将军享有更多的自由，他有机会远从欧洲，从巴黎，从威尼斯怀着悲痛的心情观察俄国可能毁灭的命运，同时享受着世界的物质福利。即使俄国真完蛋了，他也能在这里度过多年的简朴生活。

事变进程，猛烈而疯狂，军事要塞，整团、整个地区爆发起义，药房岛大爆炸火光盖过一切。到 1906 年秋天，骚乱趋于缓和，这标志库尔洛夫该回国复职了，到了提出去内政部时，但必须向那个斯托雷平低头。

他们的关系一开始就不顺利，库尔洛夫没有选择讨好的办法，公务上客客气气，但背后是认真地施压。库尔洛夫敢于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受到陛下对他抱有好感的鼓励，而其结果是人所共知的。陛下不忘他在明斯克几个月备受煎熬之苦，几乎失掉了如此杰出的行政活动家。于是库尔洛夫开门见山地对斯托雷平提出，他已谋求彼得堡或莫斯科的市长职位，虽然这两个职位并不空缺。但斯托雷平没有遵从他的要求（他不可能知道陛下对库尔洛夫抱有好感），而是劝他先暂时赴任基辅省省长（近期要求撤换苏霍姆林诺夫）。库尔洛夫十分不情愿地同意了，认为这项任命不仅没有大大提高他的地位，反而比过去（独立省府）台阶分量降低了，大有损害一个人在官场世界的威信。他的意图是短期任命，熬过一段时间，他相信一定能任彼得堡市长。

刚刚到基辅时，局势非常复杂，安抚住轻举妄动的右翼势力，又得提高犹

太人的地位，这些库尔洛夫处理得都很漂亮（在不幸的明斯克事件以后，他绝对有必要这样做，现在在国家升迁阶梯上这种两面光的规律起作用）。可以说，这次任命基辅省长，对他来讲特别幸运，前程无量，与杰出的将军苏霍姆林诺夫的终身友谊关系也得到了加强。又与另一位杰出的将军，陛下的宠儿尼古拉·尤多维奇·伊万诺夫结交甚密。库尔洛夫现在得到了两名可靠的说情人，通过他们时不时在陛下耳边美言几句，使皇帝陛下时刻想到受过难的并且无限忠诚于君主的库尔洛夫。

他还有个不小的收获，是在基辅暗探局有幸结识了两个友好而又有用的人，一个是宪兵上校斯波里多维奇，另一个是因逮捕社会革命党战斗队员而名噪一时的戈尔舒尼，他受伤之后被提升为宫廷保卫局长的要职。他的连襟库利亚布科，是一个大手大脚，头脑简单，虽不怎么聪明，但是为人很亲切。这个库利亚布科，在军界和警界服役不力，被革职后，花费巨款，轻易利用伪造文件被斯波里多维奇留用为雇佣文书，后来又提拔为秘密谍报机关头目。而今，遵循人所共知的、颇受赏识的惯例，到处按照自己的路线安插自己人的原则，在他离开基辅后把库利亚布科安排为基辅暗探局局长助手。库利亚布科属于那种可爱又可靠、头脑简单的人之一，他们自己思想上所想的东西和您所想的东西一模一样，绝对可靠，其中包括钱的事。

至于钱的事，这是一个特别敏感的界面，您可以完全信任一个不相干的外人，而自己的女人和家庭，只要一涉及金钱，那就没有真正的亲情可言。您钟爱的金钱关系的内幕，要比爱情关系秘密得多，金钱关系可能分裂所有可爱的家庭，这类事情只能同诚心诚意被选中的人一块干，他与库利亚布科的关系正是这样。当库尔洛夫一得机会，就能造就这样一个可靠的人，把一个宪兵上尉提到局长位置，解除多余的从属关系，使其免遭非议，并不时稍加管教，但要更多更多地扩大他的权力和影响。库利亚布科与警察总局信函交往是否采取蔑视态度，是否对省长粗暴无礼，或者安插刑侦局长位置上，让他以其勤奋工作和无限忠诚来弥补自己的错误。

彼得堡市长，没有调离，也没有退职，突然遭恐怖分子暗杀（在那次暗杀

中，斯托雷平差一点没有被打死)。而今，库尔洛夫自然要等待总理许诺，但一天过去了，任命一直没有下来。当时，他从基辅给斯托雷平拍电报提醒他（从斯托雷平方面说，这已第二次骗局)。斯托雷平证实任命因圣上对库尔洛夫的爱护而受阻，皇帝陛下不经意地表示不满，像库尔洛夫这样的忠实奴仆要是到这个新岗位，过不了几天也会遭到凶手的暗算，同时册封他为宫廷御司马。

库尔洛夫对皇帝陛下的垂怜，感恩戴德不尽，给予他的比他所追求的、自己选择的职位更高，更多。这次他虽然没有得到安排，但陛下的青睐所引起的希望，未来一连串的成功前景已经展示在眼前，而且万能的斯托雷平也无权加以阻挠。

库尔洛夫任警察总局局长，而且名义上担任不能提拔的和危险的监狱管理局局长职务。他要疏通刚愎自用的警察司令特鲁谢维奇的敌对关系，对付不怀好意的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防备怀有隐秘敌意的法务大臣谢格沃维托夫，还要协调与斯托雷平那种一成不变、毫无诚意、敬而远之的关系，以及他的副手马卡罗夫的嫉妒心。但是一贯殚精竭虑地实现自己目标的库尔洛夫像子弹一样穿过了这种错综复杂的环境。那是因为他有不露面的忠实朋友，王位前的真诚说情人，他们能帮助库尔洛夫立刻得到比他想得更多的实惠。1909 年 1 月，趁马卡罗夫离职，库尔洛夫大出斯托雷平意料，越过特鲁谢维奇，一跃升为内政部大臣的副手! 这项任命是按皇后陛下的意愿安排的。他说只有在库尔洛夫的保卫下，陛下的生命才是安全的。同时，他们认为只有在库尔洛夫身上才能找到抗衡过分自由主义倾向的斯托雷平的力量。这项任命，使警察总局受到特殊重视，并完全在库尔洛夫管辖之下。他开始大改组、大规模的人事变动，自己不喜欢的人降职使用，提升自己的亲信（那位可爱又可笑的库利亚布科负责俄国整个西南部地区的暗探局工作，甚至许多将军都得服从他指挥，虽然他自己刚刚提升为中校。同样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强行把韦里金安排为新设置的、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警察总局副局长，官级和薪俸立即随之增加，在所有的人的眼里，韦里金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秘书，但他对库尔洛夫忠诚不贰，最推心置腹的亲信，连金钱的机密方面也得到充分信任)，库尔洛夫以敏锐的眼光把他的

心腹亲信突然提升，反之他又能突然使警察总局高职位人员按“升官图”均等提拔，同时又使每一个官都提升一级，就不能得罪其余的人了。

职务上飞黄腾达的头几个礼拜，库尔洛夫确实有点头脑发晕，得意忘形，但他很快冷静下来了，他看出他夺取到的职权范围方面的缺欠，只要独立的宪兵军团保持独立地位，他就不可能全权地管辖俄国的整个事务。1905 年曾有过先例，奉圣上的旨令，警察总局和宪兵军团服从德米特里·特列波夫一个人统一指挥，库尔洛夫打算恢复这个旨令。因为这一旨令，库尔洛夫获得向陛下直接控告的权利和参加政府会议的权利，由于怕竞争，斯托雷平当然不同意。但库尔洛夫事实上掌握了宪兵军团的实权，这是靠当时已是国防大臣的苏霍姆林诺夫耍了个手腕，他任命冯·陶贝男爵（特鲁谢维奇的亲信）很适合他的顿河区部队的委派首领，这样就为库尔洛夫统辖宪兵团廓清了道路，扫除了障碍。与此同时，库尔洛夫又从高级文官改为将军，他仍保留御司马头衔。瞧，库尔洛夫面前开辟了前所未是的国务活动的天地，整个王国的侦察和保卫工作由他一人大权独揽！况且，斯托雷平全力以赴地钻研土地和地方自治，或移民和工业化问题，很少过问自己的内政部事务。

在库尔洛夫的个人权势空前强大和国内局势大大稳定的时刻，他可以实行他的进一步稳定政策了，不再像斯托雷平那样轻率地与革命者进行殊死搏斗，他自己不主动触怒革命者，并采取适当的缓和政策。在这种缓和气氛下，所有的尖刀都无影无踪地埋在沙土下面。由于不再实行镇压和弄得满城风雨的事件，警察局首脑们就赢得了道德方面的主动性赞誉，也就是说不再受到社会舆论谴责。库尔洛夫与社会革命党前来刺杀沙皇的斯列托夫战斗小组周旋的一招儿就很聪明，斯列托夫小组的人都扮成马车夫，监视陛下的出行，小组中有一个是警察局的秘密合作者。库尔洛夫可以轻易地在他们实现阴谋计划前全部逮捕，交付法庭，无疑要判他们死刑。但采取这样血腥的镇压也不能阻止以后对至高无上的陛下的谋杀活动，况且又会在社会舆论界眼目中，留下一个回光返照的印象。于是库尔洛夫找到一个特殊的道路，就是通过那个合作者预先警告恐怖分子，暗探局已在监视他们的行动，并给予他们全部顺利逃往国外的机会。

或者，陛下出于爱护他的军队的缘故："禁止在军队进行任何劝导性宣传。"库尔洛夫也下令禁止在青年学生中进行这些宣传，其目的是确保整个社会平安和个人不受非难。

利用秘密合作者的前景极有诱惑力，常常是必要的，但要求具备很高的调查力，也常常受挫，可惜，那个不幸的彼特罗夫遭到了失败，也正是他库尔洛夫为了和解才下令释放并指派彼特罗夫到国外去调查。上帝保佑，库尔洛夫没参加会见，那里发生了炸弹爆炸，不留情面的报刊界也没有放过他。

在社会舆论的不断谴责和追究下，最保险的办法，就是不再利用告密者。如果真要利用告密者，他们最好不是革命政党中央的人员，而是地方暗探局利用地方小组的代理人。库利亚布科在这方面干得非常出色，又不会引起社会的不良反应。

库尔洛夫的权力范围之大，地位之高，目前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权柄的范围暂时满足了库尔洛夫那颗傲慢的虚荣心，但是缺少金钱去实现豪门贵族那样自由豪放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可使生活更加充实，唯一能像世袭贵族一样体面。这种生活方式确实能反映出生命的震颤，远远胜于洁白台布上的美酒夜光杯，远远胜于过去近卫军人的丰盛晚宴，以及在撩人心动的女人拥簇下的聚餐？不是在枯燥乏味的家庭环境，而是在俱乐部、在大饭店，或与男友聚餐，那时还携带芭蕾舞演员。可惜，这样的生活方式需要大量的闲钱，而他的薪俸加上奖金也没有多少，妻子的陪嫁几乎耗尽。库尔洛夫在举债度日。

这种局面迫使作为内政大臣副手的库尔洛夫不得不从事经营活动，他把在职搞经营一事已告知斯托雷平。当然，这样不间断地管理个人的经济活动以及与此有关的证券交易，有时负债累累，多少要分散一些库尔洛夫将军对公务的精力，然而商业活动和证券业并没有太多影响他强化帝国秘密警察组织，而且国王多次出巡，在库尔洛夫掌权几年间排得满满的。

这时国内混乱状况大为好转，骚乱已经平息，陛下希望走出多年自我幽禁的状态，要与人民会面，或去国外走走。严格来说，库尔洛夫的职责完全不必关心陛下国内的安全保卫工作，但他立刻明白这种关系是各种关系当中最微妙、

最令人瞩目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陛下能了解他是忠贞不渝的卫士，并为他祝福。通过这种关系，天南地北的旅行需要维持秩序，一位负责将军可以经手数十万金卢布保安拨款，而且应视为作战支出，无论怎么用，用在何处，什么人需要和哪里需要都不用记录，也不对外公开。这种新的财政制度并非没有受敌方的抵制和猛烈批评，但实行新财政制度，对所有主要关系一方十分方便。

同时彼特罗夫不幸身亡，不再在革命政党中寻找代理人之后，库尔洛夫对革命者的意图一无所知，因此需要补充强化勤卫军队的警察保卫，需要调动各地的差遣部队，其所有费用要从作战资金中支付。作战资金，由韦里金和库利亚布科这样可靠的人来管理，他们有能力节省开支。为此，库尔洛夫设法让库利亚布科离开外省驻地前来效力。陛下想去意大利旅游，去见德皇威廉，还想在皇后出生地戈梅菌小住两个月，出席波尔塔瓦会战胜利 200 周年庆典，然后去里加，秋天在利瓦季亚度过数月。

在这一连串的旅游和休息中，圣上一家感到十分称心如意，这意味着皇上一家加深了对库尔洛夫的宠爱和感激之情，因而对他更加宠爱。而此举更重要的结果，是陛下对斯托雷平的特殊偏爱开始动摇了，再加上他那不明智的改革，他注定要垮台，而库尔洛夫以他的方式为自己选择了下一个职务，不该放弃利用可利用的机会，包括危急时刻。1911 年春，当斯托雷平与参议院发生冲突时(库尔洛夫在参议院有许多同情者)，许多人肯定地说，斯托雷平垮台不过几个礼拜的事，最多不出数月便把斯托雷平安排到一个有名无实的位置上。到那时，无论怎么排列，内政部大臣的职位，非库尔洛夫莫属。在那些日子，时机已经成熟，他迫切要求陛下关注自己对权力的渴求。库尔洛夫慎重从事，通过大公爵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探风，结果带来一个坏的消息，斯托雷平的地位依旧稳固。

当时由于缺少宠臣的同情，不论库尔洛夫还是受他庇护的人都不能，也不可能得到升迁。凡是不愿意在总理大臣面前鞠躬屈膝的正直人，根本不能继续服务。

而且，斯托雷平任命一个检查组，审查警察总局的秘密金库，此举让人难

以忍受，简直是掐住你的喉咙。

此时，圣上决定隆重地巡访基辅，举行圣奥列加和亚历山大二世纪念碑扫墓仪式。库尔洛夫更加急切地独揽所有保卫措施的大权，抛开警察总局和西南边区总督费多尔·特列波夫。而后者也追求由他自己领导保卫工作，并表示他受到奇辱大耻。库尔洛夫的帮手们经验老到，如今库利亚布科干脆在基辅坐镇。这样长线差遣使库尔洛夫有可能用其连襟和其得心应手的经费以及影响提供保障，同样几个礼拜内可以摆脱压力，也能保证把个人预算转移到官方经费上面去，众多骑兵连、许多外勤和暗探局的官员从首都和其他地方调到基辅，加强保卫工作，共有 2000 名下级官员和 48 名军官。宫廷上校斯波里多维奇和自己人韦里金（已是少年侍从，不久将晋升侍从）从上面进行监督，库尔洛夫指定他俩进驻城市委员会专司分配节日戏票，以防不受欢迎的人混入城市。所有其他各种票，包括大教堂、商贾花园、跑马场以及纪念碑扫墓式的，都由他的连襟掌握。

无疑，所有革命政党都宣布总动员，为的是在庆典期间实施谋杀沙皇的计划，甚至不止萨文科夫一个人领导刺杀沙皇的阴谋计划，然而与他对峙的，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人数众多的库尔科夫保卫部队。

库利亚布科在以前自愿为暗探局效力，颇为聪慧的秘密合作者博格罗夫 8 月 26 日没有给他挂电话之前，尽管暗探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依旧查不出深层隐藏的恐怖分子。博格罗夫送的情报正好赶上警察上层领导举行节日家宴（这几个礼拜，所有午餐、晚宴都像节日一样丰盛），是库利亚布科宴请斯波里多维奇和韦里金，并请先科–波波夫斯基等人作陪。这种家宴的人情味，也影响到与博格罗夫的谈话。因为他透彻地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侦察机关的官员要同秘密合作者保持经常联系，不只是熟悉他们，而且使后者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对合作者哪怕露出一点不信任，那时他的活动就出现动摇。更为宝贵的在于，这个乖孩子博格罗夫消逝了一段以后又重新回来，最终报告了一些恶毒的阴谋计划。由于这种意外收获而引发的忘我高兴的心情，完全是有情可原的，也是能够理解的，而对他的信任度也随之提高。

库尔洛夫没有出席这次家宴是由于他患了轻度风湿病，他住在“欧洲”大饭店。他不知疲倦地领导全面的保安措施，在他房间里与有限的几个应邀的人一起进餐，因此，有关博格罗夫的出现以及他带来的情报，只能明天早晨他全权履行职务时，他们三个才能向他报告。库尔洛夫当即对这个特殊情况做了估价，他能从这一事件中能得到什么样的奖赏呢？实际如何处理呢？可以采取“斯廖托夫”方案，通过博格罗夫警告尼古拉和雅科夫列维奇，他们的计划警察局已掌握，让他们悄悄地带走炸弹，节日庆祝大典可以平安之事，风险不大。可是抓获这个恐怖小组，荣誉可是巨大的。库利亚布科的所有安排都得到赞同，并进一步强化克列明丘戈的搜捕工作，派出以宪兵上尉为首的数十名警察寻找那个黑头发、黑眼睛、皮肤黧黑，有一张知识分子面孔的恐怖分子。库尔洛夫给过分热心的库利亚布科泼了一点冷水，认为恐怖分子提供警察家作为落脚点，可能坑了博格罗夫；很明显，博格罗夫家倒挺合适，虽然老博格罗夫那套可以容纳整个大医院的大宅院从外部监视十分困难。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准对博格罗夫实行跟踪监视，使他受到侮辱！可以采取客观的补充措施，即往彼得堡打电话，问问冯-科坚，去年社会革命党是否发给过卡利马诺维奇一封信。

盛大庆典活动进入忙碌时期，后天高贵的宾客将陆续到来。他们四个人马不停蹄地做准备。虽然库尔洛夫近日身体不爽，也得赶忙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下命令，发指示，拨经费，巡视，视察，接见，马不停蹄，但也不能把这些天的主要构想忽略了，那有盛大而隆重的庆典，丰盛欢乐的主餐和晚宴，香槟美酒夜光杯，还有音乐晚会和大合唱，只是朝臣们对圣上的节日庆典众说纷纭。在这种进退维谷的情况下，只好请求斯托雷平出面帮忙，因为有些设想和措施应与基辅总督共同讨论决定。还有一个不错的想法，至少要带上有关博格罗夫的情报去见斯托雷平本人。总理大臣的重要性在所有的人心目中大大丧失了，陛下对他不再赏识的表现十分抢眼，致使库尔洛夫几乎觉得自尊心受到伤害，只是勉强地，以公事公办的冷淡声调严肃地提请他的“已故前任”首长注意。几十个相吻合的标记说明，明天他一定要坐上内政部的头把交椅。如果现在向斯托雷平通告说，他库尔洛夫已大权在握，一定能取得抓获全部恐怖分子的胜

利。如果斯托雷平再一次躲过陛下的撤职，那么库尔洛夫就一定要私下寻找自己的出路！时间紧迫，没有时间亲自报告：宪兵和军队的保卫工作充分而严密，库尔洛夫将军花费很多时间，奋不顾身地亲临庆典礼仪中最危险的地段，他气贯长虹，运筹有方，以保证皇家的安全。这些天来，整天研究部队分布，庆祝队伍通过，包围和收容等事宜，整个基辅暗探局的工作地点在大街，办公室只留一个人值班。有一名高级刑警专门研究博格罗夫的事情，大概博格罗夫没有提供有价值的新情报，大概这个老练的秘密活动家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在克列明丘戈躲过刑侦警察跟踪监视，溜到车站，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博格罗夫的家里。刑侦警察新手，很可能现在就要动手，鲁莽地闯进博格罗夫家，逮捕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但这样干不仅不能成功，而且会彻底失败。这就像谋杀亚历山大二世和普列韦的时候，当时逮捕战斗小组的一个成员，以此逼使小组其他成员加速行动。正确的保卫路线，是静观恐怖分子的下一步行动，通过博格罗夫不断地跟踪尼古垃·雅科夫列维奇，而不是采取任何手段。

商贾花园，危机四伏，部分边界山冈起伏，不便保卫，但一切顺利。

博格罗夫的情报来得很及时，9月1日深夜，他带来新消息，说带炸弹的人已经到达。可是他自己很激动，因为他陷入一个大阴谋的旋涡之中。库利亚布科一夜未眠，第二天早晨，库利亚布科就去找斯波里多维奇，两人在演习出发之前找到巷辅总督特列波夫。当然，让特列波夫参与这一条件是个错误，因为他已被排除在保卫工作之外。但他俩本人不敢这么早打搅库尔洛夫将军，况且到街心公园与恐怖分子见面，总共只有几个小时，特列波夫此前对博格罗夫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有关谋杀之事，他立刻派人送信警示斯托雷平不要离开住所，同时派库利亚布科把博格罗夫昨天夜间的警告传送给斯托雷平。但是，库利亚布科和韦里金自然首先拜见自己的顶头上司。库尔洛夫将军责骂了库利亚布科，他不该主动找特列波夫，他掺和进来会使保卫工作分散能力，造成不应有的混乱。现在当然要向斯托雷平做些解答，不是派库利亚布科直接会见斯托雷平，只找他的副官，也不要说博格罗夫信中讲的细节，只概括复述一下便可。

当天早晨，库尔洛夫也例行公事地向斯托雷平报告了近期事件，如韦里金

晋升侍从和许多奖赏的签字。报告时，他不能对总理大臣避而不谈博格罗夫的事情，但尽量缩小它的重要性，只请斯托雷平今天不要坐马车，而坐汽车出行。

库尔洛夫在报告时看出总理大臣的影响已无可挽回地衰落了。末了，斯托雷平请他给库尔洛夫安排去切尔尼戈夫的车厢。

"怎么，难道沙皇专列没给您安排位置吗?"

"没有请我。"

这是被贬和失宠的最后的标志! 他被免职之期，指日可待。

现在要求警察采取特别措施，以保证陛下从演习场顺利归来，不惜一切代价改变行车路线（斯波里多维奇急忙拜见宫廷卫戍司令提前报告，并且亲自视察路线)，顺利到达赛马场看赛马和演习，又顺利地到了戏院。戏院采取最严格的保安措施，有 92 名暗探局便衣以及 15 名暗探局军官。

当库尔洛夫回到"欧洲"大饭店进早餐时，又得到一个新消息，博格罗夫冒着生命威胁直接到饭店来了，通知说恐怕分子的计划有新的变化。对这个事件不应进行干预，任其下一步发展，静等博格罗夫的新情报。当然，为他不失掉恐怕分子的信任，只要提出要求，应予以满足，给他戏票。恐怖分子有高层庇护人的说法，令人目瞪口呆! 应当非常非常认真地斟酌一番，行动要特别谨慎小心，千万别卷进斗争的旋涡中去，弄不好可能使自己多年无可挑剔的服务毁于一旦。

然而，他们做了重大安排之后，并没有时间留心博格罗夫活动的细节。四个人坐了大概 1 个小时，马上就以精神抖擞、引人注目的姿态出现在陛下必经的各个路段，指挥警察采取各种保安措施。今天库尔洛夫将军必须驰骋在大街小巷，时而以声东击西的手法高声下令警察迷惑聚拢的人群，时而独自做主改变隐藏危险的皇上一行的行车路线，改为危险较小的路段，时而请求宫廷卫戍司令杰久林，他的密友呈请陛下批准改变了的行程。在全面的保卫工作上，斯波里多维奇上校不知疲倦地、颇有见地解、大胆果敢地协助库尔洛夫将军工作。

随着在宫中大摆豪华午宴，那时已接近歌剧开演时间，库尔洛夫必须事先仔细地检查警察对剧院环境搜查的结果（演员的洗手间，乃至化妆盒是否藏着可疑之物），然后再到宫中迎接陛下一行，引导到戏院。只在开幕前几分钟才能在贵宾席落座，距沙皇包厢最近的第一排第三个座位（第一个座位是皇上的宠儿尼洛夫海军上将，一天到头总是醉醺醺的；第二个座位是宫廷卫戍司令杰久林，库尔洛夫一直靠他们得到宫中的第一手消息，而且他们是他的得力同情者）。斯托雷平坐在第五个席位，他对库尔洛夫说这是他的副官叶绍洛夫从库利亚布科手中拿到的票。此事与之毫无联系的是恐怖分子傍晚没有在大街会面，这么说白天已经会面了吧！这件事，斯托雷平一无所知。

可是库尔洛夫明白，白天在赛马场一整天不断接到库利亚布科的关于博格罗夫的消息，库利亚布科的工作得到将军的完全肯定。库尔洛夫也许不知道，任何情况下都应向斯托雷平做详细的报告。他低声地把整个行动讲给宫廷司令，也没有隐瞒高层庇护人的动人细节，之后也没转身讲给总理大臣兼内政党大臣，倒问起斯托雷平自己都知道什么。后来，在幕间休息时，自由走动，他斯文地迈着方步去看看库利亚布科在哪里。

库科亚布科正在坐立不安，因为博格罗夫跑到戏院告诉他，恐怖分子在比比科夫大街傍晚接头，由于那里刑警已经布下罗网，临时又取消了！前景暗淡，辉煌的成功转而成为失败！前功尽弃！恐怖分子溜了?!库利亚布科痛切地感到，博格罗夫不需要留在戏院，应当守在家里，在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身边监视他，不让他离开博格罗夫家一步。然而，博格罗夫节日盛装打扮，他以观看大典演出为荣，因为基辅最体面的人物都没得到戏票，受到彼得堡的达官显贵的排挤(犹太人只有两个百万富翁)。博格罗夫乐得得意忘形，如果完全禁止他看戏，他对突然来的打击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所以库利亚布科只好做出决定，即派博格罗夫赶快回家查看一下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是否在他家，然后赶快回来看戏。博格罗夫回来说，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正在吃饭，这样也好，让他安安静静继续吃他的晚饭。

在第一幕期间，库利亚布科那颗一直不安定的心，像被弹簧挤压一样难受，

提心吊胆。舞台上宫廷众人诋毁皇后，然而又把她和王子扔到大海里淹死。可是库利亚布科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没有听到，他好像看到狡猾的、巧于逃避的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施展隐身术，穿过刑警的封锁线，渐渐地走远了，手中提着装勃朗宁手枪的皮包。中校库利亚布科的晋级、勋章和高额奖金也被他带走了，统统泡了汤，而且还不止他一个人。

第一次暮间休息，库利亚布科请博格罗夫再回家一趟，同时，他的恩人库尔洛夫将军正在耀武扬威地走过来。

库尔洛夫从第一句话里抓住了事情本质，他不赞成派博格罗夫回家。那么好吧，第一次回家是取手套，第二次再回家绝对不行，将会使一切努力化为乌有。啊，原来是这样! 他头脑中产生一种颇有远见卓识的想法，恐怖分子已经第二次改变计划，他们通过什么途径联系呢？他不想让博格罗夫充当联系人，当然，要通过很少露面的人带便笺，传送情报，可是博格罗夫家是多层建筑又人口众多，颇有不便。也不排除通过电话转告吧？但是基辅还没有这种技术手段用以监听博格罗夫家的电话。来得正好，库尔洛夫向急忙赶过的韦里金下命令把邮政电话局局长找来，与之商量办法。

第一次幕间休息尚未结束，韦里金和库利亚布科便想起身穿过大街，走到弗兰苏阿咖啡店对面，邮政局长迎面走来。监听电话是可行的，邮政局长答应到晚 11 点，即第三幕开始前，库利亚布科就可以开始偷听电话。

警察首脑的权利和优越性在于，所有类似的细节只有自己掌握，不向任何外人讲，因为这类细节当中可能有一个秘密的线索，这类细节当中可能暴露某一个漏洞，况且这个漏洞不应从一个方面发现。

库尔洛夫返回那荣誉席位后含混不清地回答说，恐怖分子晚些时候在其他一个未知地点碰头，具体将由博格罗夫处通知，但他没有说博格罗夫就坐在他们身后。

库利亚布科夫开始坐立不安，11 点越来越近了，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当然吃过晚饭了，那么餐后自然而然要到另一家住宅，那么暗探局精心安排的作战计划不就落空了吗？第二幕刚刚落下帷幕，心神不定的库利亚布科就斯文地站

起来，点头示意叫来博格罗夫。

斯托雷平仍在关心恐怖分子的不明情况，他打断了库尔洛夫与宫廷卫戍司令杰久林的兴致勃勃的谈话，请他说明现在局势。库尔洛夫不得不表示歉意，便从座位走出剧场，到走廊命令一名宪兵军官去找库利亚布科。他看见电话又想叫来邮政和电话局长，库利亚布科急忙跑来报告说，他第二次派博格罗夫回家检查。此举引起库尔洛夫极大不满，他责备库利亚布科不听话。

就在此刻，从剧场传来不明的声响，而后有人叫喊，惊慌失措的观众从剧场里狼狈逃窜，据说有人开枪射杀斯托雷平，库利亚布科茫然失措，连库尔洛夫也有点失态，他们奔向剧场，看看情况。库尔洛夫也没马上制止观众东突西窜乱跑，现在危险尚未过去，射击可能随之而来。观众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高层人士，自然都觉得再次射击必然对自己而来，苏霍姆林诺夫也从第一排跳出来，韦里金下令为保全自己关闭防火门。

开枪射击的人正是博格罗夫，库尔洛夫从手提马刀的斯波里多维奇口中知道的；斯波里多维奇抽出马刀，冲向在走廊中遭到军官痛打的凶手，但看出是博格罗夫他就没下手，提着刀站在陛下包厢外。

库尔洛夫听说斯托雷平没有被打死，干脆就不进剧场了，现在与受伤的斯托雷平见面或说话，可能很不愉快。

库利亚布科完全丧失了自制力，情绪坏到了危险的极限，发疯似的抓住手枪套，打算自杀。

只有库尔洛夫将军一人保持高度冷静，他走到广场下令把群众清除广场，把剧院包围起来，出口逐个搜查后再放行，他准备请陛下安全退场。

目前凶手在宪兵手中，或许是个错误，应尽快把他弄到自己手里。

此时正是幕间休息时间，人们把斯托雷平送到医院，剧院里唱起圣歌，舞台上的人都跪在皇帝陛下面前。博格罗夫被带到茶点部，开始审讯。开头审讯他的是那个从痛打中救他出来的值班宪兵军官。库利亚布科毫无必要地在那里徘徊，拼命证明他不负法律责任。他认为如果不损害自己上司的面子，就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责。他急忙揽过自己的责任，那就是在剧院没监视住博格罗夫。

但对简单讯问的问题，即博格罗夫进剧院时为什么不搜查？他竟无言以对。韦里金机警地回答说："搜查合作者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可能失掉他的信任，我们一般不采取这样的措施。"

库尔洛夫自己尽量回避去审讯现场，他担心要出事儿，他听取了韦里金的报告后，情况更明白了，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那么所有的人和整个事业都会完蛋。现在应当分秒必争，因为这将决定他多年惨淡经营的事业和他的前途命运。库尔洛夫亲自出面干涉此事，表现出他个人的兴趣，他还不愿意，好歹开导说服库利亚布科，派他出面到茶点部，坚持把博格罗夫带回暗探局，同时那个马刀入鞘的斯波里多维奇又解释说，审讯博格罗夫是库利亚布科的本职工作。但审判庭的检察长已经赶到，拒绝交出博格罗夫。库利亚布科绝望了，气急败坏地要求第三者不在场的情况下与博格罗夫面对面单独谈话，以取得重要情报，但仍遭到拒绝。当库利亚布科说明，会见博格罗夫取得真实情报的请求，是得到库尔洛夫支持的，检察长犹豫一下，还是拒绝了。

与此同时，库尔洛夫必须保证陛下从戏院平安返回行宫，这样他就可以离开此地。

当所有的车辆和人员离开戏院之后，他们四个人才进"欧洲"大酒店聚会，研究目前的处境。他们匆忙中干了一件错事，他们没有集中精力安抚库利亚布科，而只是一个劲儿地开导他，指示他选择正确途径，然后决定再做一次努力把博格罗夫夺回来，便派一名警察署长，以警察总局和宪兵军团首脑的名义把博格罗夫引渡到暗探局审讯。但这一企图彻底失败，检察长不仅拒绝交出博格罗夫（他已经与司法部大臣谢格洛维托夫取得联系），从那个愚蠢的警察署长得知库利亚布科正在欧洲大酒店，便马上打电话叫他到戏院来接受询问。

而库利亚布科在博格罗夫开枪射杀斯托雷平之后这么短短几个小时，还没有醒悟过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甚至没有明白此事与自己的利益之间的联系。在这种没有思想准备，里表不明的状态下参加讯问，并在讯问中和盘托出斯波里多维奇、韦里金和库尔洛夫都知道博格罗夫进入戏院一事，而且所有步骤，库利亚布科都要得到他们的同意。他又犯了一个无法改正的错误，使侦

查工作和他的同伙的处境长时间复杂化，同时也没有减轻他自己的罪责。

至于说博格罗夫，他不受任何影响，也没有任何解释。审讯之初，他隐瞒了戏票的出处，后来说是韦里金给的，又说是斯波里多维奇给的。

同时，一个正确的辩护计划很快由冷静、有经验的库尔洛夫和斯波里多维奇制订出来。斯波里多维奇虽然对博格罗夫其人其事一无所知，而且原则上也毋须了解，因为这属于地方暗探局的职权范围内的事情，而他只领导宫廷安全工作，也无暇顾及此事。那个韦里金与此事关系更少，一般说他没有任何专门的保卫工作任务，甚至与政治调查也没有任何关系，他在库尔洛夫身边等待执行特殊使命。他们二人与博格罗夫无任何关联，不会下达任何命令。至于说库尔洛夫，事实上他全权负责大典期间全面保卫工作，正由这项任务规模大、范围广，他不可能了解每一个细节（有关博格罗夫的情报只是极其一般特点），应当相信每一个地区的具体执行人，如果缺少这种信任，就不可能实行领导。因此，采取具体的侦察措施不是他的任务。库利亚布科已工作多年，颇有经验，库尔洛夫有充分根据相信他。

如果从一开始就这样判断和进行辩护，那么他们3个人由于身居高位，很快就能摆脱被动局面。地位稳固后，那时库尔洛夫将军会更有效地更有权威地伸出援助之手，保护自己由于不够审慎和某种职务上粗心大意而陷入不幸的下属。要知道，库利亚布科也能有充分理由证明他自己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博格罗夫背信弃义，他以前诚心诚意为暗探局效力；只要看一眼他那瘦弱的身体，高度近视的知识分子外貌，怎么也想不到他是恐怖分子。对他没有进一步监督或搜查，不幸造成了这样的错误。

可是，库利亚布科，像一匹被牛虻叮咬的公牛，因为交配而丧失了任何明确的判断能力，东突西窜，哞哞叫个不停，涎水四溅，依旧不能引到被召来接受讯问的正路上来。

整个案件审理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层的态度，即赋予国务总理大臣的死伤多大或多小的重要意义。当晚库尔洛夫根据宫廷惯例和陛下态度表现出的细节分析，今天有充分根据断定，案件审理将低调进行，从而容易摆脱事

件发生之初因提供的证词有欠周详而带来的种种不愉快，况且宫廷卫戍司令杰久林当晚再次保证兑现从前许下的诺言，而今斯托雷平一死，会更顺利地呈请格升库尔洛夫继任内政部大臣要职。

在各种行动方案中有一个方案是刻不容缓的，这些天保卫工作中也有些疏漏，今晚必须加以克服，为使案件侦查工作顺利进行，尽量加快审理速度，干脆晚间就开始，在基辅全城掀起一起搜查和逮捕高潮，切断博格罗夫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首先袭击直到现在仍受到特殊照顾的博格罗夫家，寻找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和武器，尽量多派警官，逮捕他家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姑妈。继而拘捕基辅一切不论什么时候有过无政府倾向的人士。拘捕博格罗夫记事簿中记载的人，他的亲属以及律师是熟人。虽然拘捕律师一定会引发社会不满情绪，而又怎么样，因为拘捕理由充分，库尔洛夫将军有权采取一般的和重要的维护秩序的措施，但也不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向下属交代。不过，今夜行动对他来说，消除人民批评政府无所作为，有着重要作用。

这天夜里抓捕 78 人，后来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进行了审讯。

现在，库尔洛夫又采取一个正确的措施，虽然他本人十分同情库利亚布科，但还是亲自下令解除库利亚布科的职务。

然而，这一狂暴之夜，并未因此而结束。库尔洛夫突然被叫到科科夫佐夫的住所，此前他只是财政大臣，在午夜时被任命履行总理大臣的职责。这说明，我在此刻可能任命他临时领导内政部! 但科科夫佐夫并非为此召见库尔洛夫，“抓完了吧!” “抓够了没有?”从整个谈话看，显然新总理大臣以莫须有的罪名来责备库尔洛夫的不遗余力。

库尔洛夫将军怀着沉重的心情迎来 9 月 2 日黎明，现在，难以驾驭的库利亚布科想拖所有的人下水，开始揭发他人，采取“最后的和最直率的”方法为自己辩护、开脱。当宫廷大臣斯托雷平濒临死亡之际，他可能知道库尔洛夫对此事完全知道，而且还同意博格罗夫进戏院。但是，库尔洛夫的行动已经得到了斯托雷平本人的同意和允许，而且他已向斯托雷平集团报告了此事的详细经过。

此举事实上已不会使已故总理大臣受到牵连，故而库尔洛夫极方便地为自己辩护。

为了使这类报导不至于过分庞杂，不至于把真相湮没在浩瀚的法律档案中，经两名自由派记者之手开始报导，于是整个报刊界大声响应并发挥对他们最有利的主题，即斯托雷平死在他亲手建立的专事反对革命的警察体制的手中。

第六十七章

夏日清晨，整个茫然不知所措的基辅城，到处流传着口头的和报刊上刊载的谣言，想象和事实的传闻。很快又向各个方面延伸，如斯托雷平活着还是死了呢？谁是凶手？怎么下手杀的人？

有一个谣言说，子弹是带毒的！另一个谣言说，杀手就坐在第四排，是来自高层人士！《生意人报》急忙报导说，杀手坐在第一排，是一个狂热的帝制派，与侍从合谋杀人。

关于斯托雷平情况的最可信的报导说，斯托雷平中弹后，依旧十分冷静，他自己脱下大礼服，背心上很快染红了一大片，他用一只手按住胸部，很快手被血染红了。他跌坐在靠背椅上，是意志在支撑着他。正巧，身边的医学教授赖恩和在戏院的其他医生都过来为他止血，并把他送到戏院大门外，鲜血也沾红了他们的衣服。同时，救护车也赶到戏院，把斯托雷平送到附近的小弗拉基米尔大街的马科夫医院。

子弹共两颗，一颗嵌入右乳下，子弹正射中胸前挂着的圣弗拉基米尔勋章上，起了缓冲作用，大大地削弱了伤害冲力，但子弹无法取出，已嵌进脊椎的肌腱里，医生担心子弹伤及肌膜和肝脏。第二颗子弹穿过右手又穿过栅搁，射到乐池，打伤了一个小提琴家的脚。治疗的第二步，是从背部取出子弹，但暂时不能做手术。夜间，斯托雷平情况很严重，心脏不好。待包扎之后，受圣餐，他还能高声唱圣餐接受者的祈祷诗，用左手画十字。他疼痛难忍，但仍然坚强地挺着。

天亮前，斯托雷平的情况大为好转，也可能是他的精神力量支持着，医生们希望有一个好的结局，甚至认为有百分之九十活下去的希望。斯托雷平要一面镜子，看看自己舌头，说："啦，看样子我又逃过一劫。"说他肚子痛，"我好像在总督家用午餐。"每一个敲击声和沙沙声都使他焦躁不安，神经高度紧张。医院门前的马车路上铺上稻草，从彼得堡请来的蔡德勒说："病人食欲不佳，但不准吃泻药，给葡萄酒和咖啡里加点消化物，痛时注射吗啡。"

杀手是什么人？杀手是个年轻的律师助手，有长期革命的经历，不止一次受到通缉逮捕。他是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也是社会革命党的战斗组成员。

但公共舆论并不满足，认为这样重大而又复杂的行动不可能靠一个人就能获得成功，尽管他是个嗜杀成性的社会革命党党员！人心的自然趋向追寻一个巨大的阴谋计划，有一大群恐怖分子。有这样一个谣言，说社会革命党与"崩得"分子和芬兰人联合行动，刺杀斯托雷平只是一连串行动的第一件，人们还把另几个事件联系起来看，如前几天有一个革命者（那是一个没有来得及逃往国外的普通刑事犯）在暗探局拘留时自杀，又如昨天在戏院附近的封都克列耶夫大街有一辆汽车沿街奔跑，马车乘客殴打不让他们进戏院的哨兵，还有人要切断戏院照明电线，只是这些坏人没切断主要线路，他们想使戏院变得一片漆黑，以此掩护凶手逃脱，还为他准备好军帽和军大衣。审讯时，杀手也好像承认有这样的计划。

后来这一推测没有得到证实。

随后又有个传说，说杀手不是一个随便不相干的外来人，而是本城受人尊敬的富翁之子。他是用个人戏票进入戏院的，基辅地方当局吓懵了。当局威胁要剥夺老博格罗夫的皇家俱乐部和"契约"俱乐部的准入证，甚至迟迟疑疑地打算吊销老博格罗夫的律师等级。有一名律师，小博格罗夫一年半以前直接从大学那里取得律师资格，但他一次也没有履行律师业务，而且声明要与老博格罗夫断绝一切关系。同样，也是过分匆忙，完全可以不这么办。

地方报刊和中央报刊发出无数消息，铺天盖地而来，可信的，但匆忙发稿而未加证实；不可信的，匆忙中又无人驳倒。有消息说，8月29日谋杀就可能

发生，在沙皇一行到达基辅前20分钟，在迎接沙皇的广场附近一座大厦楼前有一个不相干的骑手来回跑动，只待当局出来干涉后他才离去，这个骑手就是博格罗夫。另外一条消息说，9月1日赛马场演出滑稽剧时，博格罗夫出现在小看台上，速步马繁育协会秘书不止一次见到博格罗夫来回奔跑，他说他等“宫廷摄影师”，就把他请出小看台，那里的栅搁只有半人高，离总理大臣只有几步之遥。

这一切对公众来说，也没法弄清楚，这里面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基辅觉得自己要负责任，因为戏票由市议会负责分发。9月2日白天，市杜马召开专门会议，市长季亚科夫反驳批评说，罪犯不是基辅议会放进戏院的，而是其他机关送进去的，因为这些机关要去一部分票。是什么样的机关？老百姓虽然吵吵嚷嚷，却心照不宣。市长轻轻叹了口气说是暗探局。

市杜马炸了营，愤怒地咆哮着，要求公布戏票分配名单复本。随后还没摸清社会刮什么风，就匆忙选举斯托雷平做基辅荣誉公民。

当时的社会风气倾向，不是等待更可靠的消息，而是尽全力让政府难堪。在报刊看来，这场战斗，无论怎么干只赢不输，斯托雷平是被革命者杀死的？意味深长，是给反动派一次教训！是暗探局谋害的？又意味深长地暗示，是他们自己动手杀害内政部大臣和政府首脑。9月3日傍晚，斯托雷平病情逆转，医生宣布患腹膜炎，然而令人担心的是病情十分严重，心脏跳动十分微弱，濒临死亡。社会上一直在发表谈话和写文章说，我们的暗探局已经腐朽透顶，说暗探局是国中之国。我们的警察在挑拨离间，它只能干这类蝇营狗苟的秽事！警察与革命，暗探局与恐怖活动是共生共荣，相互依存的！我们的体制本身促进警察组织干这一类阴谋或者无力制止阴谋活动。

眼前发生的一切越来越使自由主义者转而欢呼雀跃，因为暗探局自己动手用手枪收拾了镇压革命的刽子手！

又一股谣言浪潮汹涌而至，说暗探局的记事本中有记录，手枪是库利亚布科给博格罗夫的。还说，在斯托雷平被杀之前，库利亚布科离开戏院急忙乘汽车走了。还有个谣言说库利亚布科从基辅消失了，再也找不到他。没有，没有

消失，还在街上发号命令，群众高喊："滚开，你这奸细!"

中间派，半右派和右派，个个提心吊胆，他们吓得目瞪口呆，因为不止斯托雷平的保卫很糟，整个俄国无人保护，不设防，完全无戒备，国家安全不可能采用秘密搜查和代价甚高的吵吵嚷嚷的警卫队来保障。性急的米柳科长说，为保卫大庆典活动花了 90 万卢布，而后改口说 30 万卢布，再后可能还少。俄国社会几乎差不多对恐怖活动生疏了，远离了，已经过去了，觉得恐怖分子已经解除武装了，国家政权强化了。在沙皇观看节日戏剧演出时，采用特殊保卫措施的情况下，突然听到枪击声，有谁还能给国家带来平安呢?

"国家杜马"出了麻烦。十月党人质问暗探局活动，但左派要求质问警察挑拨革命者队伍的行为。如此明目张胆蔑视整个安全保卫法，致使极右组织"贵族领地"、斯托雷平和他的路线头号敌人，在这些日子里也不得不承认暗探局一直在策动暗杀活动。

是的，除此之外，无法做出解释，也说不清楚。根据事件发出后头几天的一鳞半爪消息可以归纳为：允许携带手枪的博格罗夫进入戏院，他专门揭露一个叫不出名的恐怖分子，而那个恐怖分子是否在戏院也没有人知道，甚至根本不可能在戏院。如果不是警察串通一气反对斯托雷平，以那样可耻的态度对待总理大臣，也不至于引起争议。应当是或愿意当被欺骗的混蛋或者干脆就是荷马式的混蛋。

什么样的细节没有见诸报端啊! 一个比一个离奇。当博格罗夫从家前往戏院途中，普通刑警觉得他可疑，可是库利亚布科的副手却说"自己人"。戏票也分给所谓"人民保安"里来路不明的个人，例如弗朗茨·皮亚夫洛克，过去是强盗匪帮的首领，现在是库利亚布科的手下干将。甚至连警察总局也被排除大典保卫工作之外，西南边区总督也不例外。这一切由隐秘的拥有无限权力的库尔洛夫、韦里金、斯波里多维奇替代，他们迄今为止默默无闻，他们的名字结合一起就像蜘蛛网膨胀起来，像往常一样令人震惊。同时又泄露一个秘密，斯托雷平的右翼敌人给了库尔洛夫一大笔期票，到今天尚未付清；小吏韦里金从库尔洛夫掌权第一天便破格提升，整个警察总局都得在这个大红人面前讨好，他捞

到数万卢布而无人监督，而今作为没有失职的人离开基辅，逃避了一切责任。还有，不久前拉斯普京提议要下城省长担任内政大臣，后者咒骂斯托雷平，说随时都可以收拾他。

瞧，报刊上又由非常熟悉内情的人士涂上了一层墨水，说什么斯托雷平本人把西南区总督排除大庆典保卫工作之外，斯托雷平本人赞同把戏票送给博格罗夫。

斯托雷平已经无法知道，也不能反驳，而报刊高高兴兴抓住机会。哈，哈，原来如此！这样一来，博格罗夫不是警察局的奸细，而是政府的奸细?! 那么是不是阿泽夫本人也来参加刺杀斯托雷平了吗？他们不是要抓住一百名革命者，制造一起大规模法律审判过程吗？这样，库尔洛夫们只不过是斯托雷平路线的产物罢了。这样一来，斯托雷平不就成了全俄间谍的始作俑者吗？斯托雷平不就成了他亲手制造奸细阴谋的牺牲品了吗？俄国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政策，鲜有善终者。

这一结果，不能不令立宪民主党报刊高兴得哆嗦一下。如果说右翼刊物公开为库尔洛夫辩护的话，也不知为什么一向善于在报刊检查中玩狡猾手段的立宪民主党报刊，忽然间黔驴技穷，竟高声咒骂一通：

"斯托雷平是在他满可以庆贺自己凯旋的时刻中弹身亡的。命运何以这样不宽恕人？难道没有听到手枪射击轰响后面的警告声吗？现在俄国社会可能有不流血抗议方法，但命运可能想提醒我们，这种方法还要保留吗？"

哪怕不出于本意，仅仅出于礼貌，也许不会这样露骨地表现出对斯托雷平受杀害的喜悦欢快心情。而《俄罗斯新闻》则以无限惋惜的心情，慎重地评论说，这次恐怖事件自然反映一种社会情绪，是国家十分混乱的直接后果，由此引发社会各阶层普通的极端不满情绪。最好不再重现"政府与人民为敌"的局面，不是犯错误，也不是由于愚蠢，而是真正的敌对情绪。《说话》杂志说，现在可以盖棺论定"民族政策没有任何积极内容"。一言以蔽之，斯托雷平为其全部罪过早该如此下场，因此，基辅枪声好像来得太迟了。

虽然立宪民主党不再为恐怖手段鼓掌欢呼，已经习惯于说，恐怖分子为反

对派鸣锣开道，他们也不能从博格罗夫的枪声中大大地吸入新鲜空气。他们总是心如刀绞，哈，哪怕他们也粉身碎骨！整个社会遵循传统的感觉，已经舒舒服服地停顿了。本来就一贯坚定地赞美革命者“英雄举动”和“自我献身的牺牲精神”。在众多新发现当中，忽然露出一个秘密，有一个“国家杜马”代表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收到社会革命党在国外的中央委员会的一封密信的摘录，这封信对谁都不失去体面，也不会触犯刑律。

这次刺杀事件的响应电报从国外源源不断飞来。反应十分热烈，气量狭窄的布尔采夫好像对地下反政府秘密活动颇有远见，绘声绘色地发表一通见解。而立宪民主党中央吵吵嚷嚷地说，本党从来没有委托博格罗夫开枪射杀斯托雷平，但立宪民主党热烈欢迎刺杀斯托雷平的义举，此举有着巨大的宣传意义，能使领导层惊慌失措。

此外，在整个社会的心目中，博格罗夫孤军奋战形象更具有英雄气概！可惜，如果不是与暗探局有瓜葛，那就是真正的人民英雄！

形势又急转直下，现在当暗探局和政府的罪行得到证实的时候，博格罗夫本人就不算犯罪吗？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尤其他的熟人和他的家人，主要目的是如果可能就把博格罗夫与暗探局分开，并且证明这不是阿泽夫丑恶案件的重演！特别希望能证明博格罗夫是清白的，只杀了人，犯了罪，此外没有任何污点！人们憎恨库利亚布科，正是因为他诬陷博格罗夫是他的长期合作者。许多报刊报导说，正是库利亚布科这个家伙毁掉了列夫·托尔斯泰的亲笔信。

博格罗夫的兄长公开表示愤慨，因为报刊上竟敢使用“谋杀罪”一词。老博格罗夫在柏林得到他小儿子刺杀斯托雷平的消息后，以明显骄傲的心情，为他一手培养的儿子辩护，为此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说我的儿子喜欢骑马奔驰，喜欢水上竞舟，爱玩牌，常到俱乐部消遣，是个爱生活会享乐的青年，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他根本不缺钱花，不会为几个小钱折腰。毫无疑问，是暗探局官员的犯罪行为，他们搞的鬼。我儿子真杀人了？我不敢苟同，不可能。

不论受人尊敬的老博格罗夫，还是所有律师的辩护词，事实已经如此，不

管可敬的报刊，还是“教授们”的报纸，他们都在讨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否可以认为博格罗夫是一位纯洁的革命者，其他问题可以忽略不计？一名24岁放荡青年是否有权独立做出决定，为人民的幸福，开枪射中国家心脏，不仅杀死总理大臣，而且封杀了整个国家发展纲要，从而改变了一亿七千万人民的国家历史进程呢？

整个社会都在为这个问题焦虑不安，心急如焚，博格罗夫到底是一个诚实而纯洁的人，还是暗探局同伙？如果是暗探局的人，太可惜，太不幸了，如果是诚实而纯洁的人，或许更好些，何况当时犯罪的也只有他一个人，这是环境使然，是这个该死的社会制度的罪过，而博格罗夫只不过是这种制度的悲惨牺牲者。

虽然某些报刊实行限制，不许直接露骨地赞誉杀手，但是溢美之词依然占据着报刊的每一行。据说，博格罗夫有很强的自持能力，始终保持着高度冷静，甚至讽刺态度。他表现出一个真正革命者的精神风貌，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他叼着烟，双手叉在胸前，像拿破仑一样，始终保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但他会为双亲惋惜，还想给报刊写点东西……

整个右翼报刊都没有为斯托雷平鸣不平，只有《新时代》，尽管与斯托雷平关系不睦，还是推出了他们看法：

“来历不明的军队再一次到了……再一次失去安全感……斯托雷平迎刃而上，所以易于遭受打击。这是呼唤人民觉醒，是对俄国议会一记耳光子。这不仅是个人的残暴行为，而且是对俄国的冒犯，不是为无产阶级苦难而扬起亿万富翁之子的杀人之手，而出于财阀后裔的情感，因为斯托雷平是他们夺取钱财的障碍。斯托雷平准备对俄国商业信贷实行国有化政策，斯托雷平——这是俄国的民族政策，他为此吃尽了苦头，牺牲一切。”

在这些日日夜夜，声音最嘹亮、范围最广的，是为俄国的祈祷声。有些人从戏院出来，就径直来到米哈依洛夫修道院，当夜举行祈祷仪式，做弥撒。9月2日基辅各教党做弥撒人流不断。人满为患的索菲娅大教堂和弗拉基米尔大教堂，祈祷人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有些人痛哭流涕，圣弗拉基米尔大学教授协

会发电报号召大家来祈祷。当天，古奇科夫在塔夫利达宫举行简短的祈祷仪式，彼得堡市杜马大厅也举行祈祷，在总参教堂、在海军部，也同样祈祷。在卡赞大教堂预定做祈祷的有十月党人、民族主义者、“国家杜马”、国防部、内政部、农业部……

之后，还有人在其他教堂祈祷。

还有莫斯科。

在俄国的所有地方，所有城市都在祈祷。

祈祷圣歌不绝，与事毫无补益。

第六十八章

关于他，报纸上都写了些什么呢？关于斯托雷平又写了些什么呢？

难道他还活着吗？真的活下来了？受着煎熬，痛苦万分。这一切又是为什么呢？

博格罗夫站在很近的地方，仿佛看到由于子弹的急速射击，没有系上纽扣的长礼服在抖动。他切身感到这不单单是射击，这简直是将子弹直接钉入了敌人的身体。它并没有射出全部 8 颗子弹，但也没有数一数到底射出了几颗，他也搞糊涂了。然而他心满意足，深信已经成功，于是撒腿就跑。

他当时是何等的匆忙啊！现在才知道，原来只有两颗子弹打中，而且第二颗只打中了胳膊?! 他自己都没有发现左轮枪抖动了一下。这就是说，他已经在开始跑了？

当时，在射击的那一刻，他清楚地闪过了一个念头：还来得及逃命！在没有坐满的大厅里，那些体面的人们惊恐万状，拼命地惊叫着跑开，躲到座椅的后面。还有一些人，仿佛应该逃命的是他们而不是博格罗夫，在他面前展开了一条畅通无阻的通道，于是他拔腿就跑，手里还抓着那把左轮枪不放。其实应当扔掉它，那样不就认不出他来了吗？已经离出口不远了，一名军官抓住了他那只持枪的手，牢牢地抓住了手腕子，枪落到了地上，也许是被夺去了，他那时已经顾不得了。不由分说，脑袋上就挨了一下子，好像是用望远镜打的，后来他就不知道是谁用什么把他摔倒，带到了什么地方，又如何打了他。

后来进行了一次审讯，他这才搞清楚：自己被人家打落了 2 颗牙齿。

为了立功，他准备接受严厉的审讯，直至牺牲生命。可是他忘了，没有料到会遭到毒打，也没有料到在处死之前会遭受肉体的痛苦和折磨。当给他戴上手铐准备押往要塞时，博格罗夫便感到一阵剧痛，大叫了起来，请求轻一点儿。这还只是第一个夜晚，他尚处在深感自豪的亢奋状态，注意到的痛苦还很少。

在第二天和第三天，当忧郁替代了激奋的时候，他开始感到了痛苦，而在侧射暗堡的囚室中，这种痛苦比此前尤甚。在如此痛苦的境遇中，对于生活设施的缺乏就尤其感到难以忍受，这里没有抽水马桶，没有自来水、电灯，没有柔软的床铺和家常的饮食。难耐的孤独，身体疏于医治，使得博格罗夫请来了医生。

在剧院里，是宪兵中校伊万诺夫救了博格罗夫，让他越过栏杆，把他推到了包厢里，使其免遭军官们的毒打。伊万诺夫还自愿协助主审官，进行了部分审讯。他还毫不避讳地亲自代替博格罗夫回答了一些问题。关于他，报纸上又会写些什么呢？父母得知后又会怎么说呢？那么，斯托雷平又怎么样了呢？

斯托雷平没有死，不过会死的，因为伤着了肝脏！

主要的是预料到了社会的情绪："对于这个牺牲品是不会予以同情的。"

在义愤填膺的日子里，仇恨不再会使我们感到压抑，恪尽职守的感觉使我们得到精神上的平衡。

争斗终止了，博格罗夫感到软弱乏力。摆脱掉了一切责任，这可还是头一次。

是的，他是对的。在进行暗杀活动时，他的一切疑虑和担心都不复存在了。我们生命的全部价值只在于实现其目标，有的人目标是珍重自身，而有的人则是牺牲自己。

改变历史原来并不复杂，只要弄到一张剧票，走过17排池座，再扣动一下扳机就成了。

他独自一个人就做到了，是按照自身独特的想法行事的。他没有牵扯到任何人，任何人都没有遭到打击，没有牵连任何保护人和律师。

现在他一生中的主要事情已经完成，他的未来也已经确定。现在审讯中提

出的这些问题，使博格罗夫不但不觉得气愤，反而感到轻松。整个上一个星期折磨着他的愈益沉重的机密计划实施了。当时，只要一提起这件事他就神经紧张。现在终于可以把一切都讲出来了！哪怕是跟这些人讲都成。完成任务后即使接受侦讯都会觉得无比轻松，可以感到自豪，再也无须转弯抹角，躲躲闪闪了，他直言不讳地声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

当然现在要是跟自己圈子里的人畅谈起来会轻松愉快得多，因为现在他取得了特殊的成就。然而，那些审讯者们都是些有学问、有礼貌又很细心的人，他们十分尊重博格罗夫的人格及观点，并且将主要内容都一一记录在案。也就是说，一切都是按照官僚政治的步骤在进行，博格罗夫的证词将完好地加以保存，并且将会在报刊上发表，在历史面前阐明并证明他独自建树的伟大功勋。

他毫不紧张，毫不隐瞒，既不耍手腕也不转弯抹角，他现在是自豪地、直截了当地和盘托出了。他承认自己是助理律师莫尔德科·格尔金维奇·博格罗夫，在基辅庆典之前很久就有了刺杀斯托雷平的念头，因为他是人民的公敌。他认为斯托雷平是使俄国走向反动的罪魁祸首，他限制言论自由，压制异族民众。他对“国家杜马”的意愿漠然置之。那把左轮手枪是3年前买的，很少使用，即使射击也是朝空中打。他没有制定什么刺杀计划，只是确信在剧院中有靠近目标的机会。刺杀行动没有跟任何人密谋，他也没有参加任何组织。抓获他时搜出的钱夹中有这样一个预先写好的字条：“我声明，刺杀御前大臣斯托雷平纯属我个人的行为，没有任何同谋者，亦并非是执行任何党派的命令。”入场券上写的是真实姓名，子弹上没有毒。

据说他从前在暗探局工作过，是真的吗？

这是回避不了的，不能隐瞒。

“是的，我在暗探局干过。那是4年前的事了。对，提供过情报。为什么？嗯……我想捞点外快。问我为什么要外快吗？这我不想回答。”

不过，他没有说出任何人，没有露出任何一个接头地点，也没有供出任何秘密情况。自然，也没有人提出这种问题。

他一再表明，没有人知道我的目的。有一次也说漏了嘴，说这是库利亚布

科的建议，并为他提供了商人花园和剧院的入场券。不，不，他不知道。再说，除了支持、鼓励和金钱之外，他从库利亚布科那里又得到了些什么呢？现在连他也陷入了困境。他所流露出的不仅是出于感激或出于某种意图的考虑，他与库利亚布科之间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亲近感。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能够仅仅是出于同情而尽举手之劳，然而……

这样一来，整个令人惊愕的刺杀就毫不神秘、毫不使人费解了，只需两三件清晰的笔录就会使人一目了然。

9月2日又做了一个补充笔录，说博格罗夫还曾产生过刺杀沙皇的念头，由于担心会引发对犹太人的虐杀，所以才没有付诸实施。

作为一个犹太人，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不该引发哪怕是对犹太人利益的极微小的限制。

博格罗夫并没有耍手腕，没有编造，他彻底忠于自己的人民，看来这是他内心坚定的主要原动力。

他是如此忠实可靠，以至于竟然拒绝在自己的口供笔录上签字，因为他知道政府在得到了这份口供后就得到了行动的武器，就会以虐杀相威胁，限制犹太人进行恐怖活动。

因此，这个口供就只好单做一个笔录，只有预审员和检察官在下面签了名。

"对供词是否有什么补充或变动？"

"没有。"

"还有一个问题，到底为什么在暗探局忠实地服务了4年之后您决定搞这次暗杀？"

博格罗夫装出大度的样子，轻蔑地回答说："我拒绝解释原因。"

你们还不明白吗？我从未给你们服务过。对于我的事业你们又能懂得些什么呢？

不是我为你们，而是你们为我服了务。不过，这一点只有历史才能了解，才会明白。

那么，审讯结束了吗？

现在，这宗案子就要提交给法庭了。

法庭？什么法庭！在此之前他为什么竟如此迟钝！这就是法庭，被告是内阁总理。可是未经审讯，也没有证人。整个法庭是由一个人思想的激奋而造成的。判决是死刑，并得到了执行！

这时，头脑和情绪都冷静了下来。遭毒打的身体痛得厉害！毒打使他感到震惊，感到口中被打落牙齿的地方空落落的。

于是，又回到了现实中。法庭？他本人就是一名律师，当他极其巧妙地筹划之时，怎么就没有考虑到法庭呢？他一心只想着刺杀。然而，必遭审讯，这则是必然的结果像扎苏里奇那样！俄国司法的许多自由手段展现在他的面前！可以找辩护人，但最好是基辅的辩护人！

通过他可以立即同亲人取得联系！替他转达，让他们明白，自己还能了解什么情况？

不行，这行不通，因为他是"暗探"。这是唯一的一个抹不掉的污点，是一个公众不能够饶恕的污点。当法庭公开辩论这个问题时，所有正直的人们对他都会避之唯恐不及。现在即使对同情者谈及这个问题，都会令人感到难以容忍。如果他明天找来戈利坚魏泽尔，哭倒在他面前，说这些都是凭空想出来的，说这是为了瓦解暗探局的一种招法，是为了有助于暗杀。不，无论是戈利坚魏泽尔还是公众都不会跨越这一步。他只会是有律师的语言，而没有律师的灵魂。人们已不能为了替他辩护而发表炽热的演讲了。

此路不通，他会令人避之不及，一切后果都将落在他的身上，他应当自己为自己辩护。

此案将提交军事法庭处理。

哈哈，这可不是高等法院，也不是扎苏里奇，这里至少也免不了要判苦役。

审讯之后博格罗夫就关进了牢房。这里的牢房一切都是旧式的，没有监视孔，没有通风窗，牢门用沉重的挂锁锁着，但牢室内却很明亮、宽敞。这是一个圆形塔楼状的侧射暗堡，设在位于德涅伯河崖岸别朝尔堡垒的一角。向窗外望去可以看到旧土围子，在晒得发黄的草地上隐现着一条很少有人走的小径。

峡谷的对面看得见邻近的秃山，被军事法庭判了死刑的人就在那里行刑。

那是位于山谷边的一座荒凉的秃山，那就是传说中的巫婆们举行狂欢夜会的地方。

囚室里有一个盛脏水的木桶，臭气熏天，没有浴盆，没有淋浴，至于换洗内衣，连想都甭想。

经过一段时间的审讯之后，接踵而来的是胃口大开。好家伙！已经很久没体验过了，简直像一只饿狼！现在，就连被他戏称之为“没完没了的肉饼”也变成了有诱惑力的食物！怎样才能美餐一顿呢？

他一向不珍重他那已经形成的生活状态，而现在只要能够重返生活，就一切都方便了，就又可以过日子了。

由于过度紧张和自己产生的错觉，加上装腔作势、惰性及精神压抑，身体已经疲惫不堪，于是刺痛感、震动感、无名火接踵而来，那么返回到生活中去该有多好呀？一定要回去！

这牢房的石头空间既憋得慌又显得空空荡荡。从牢房马桶走过去，到窗前去看那座令人失望的秃山。那就是将处决你的地方？受着此前所向往的孤独的折磨，又感到苦闷，因为跟活人的全部谈话都已近结束，甚至对审讯的结束都感到有些惋惜。

然而，审讯并没有结束，他再次接受补充审讯。

当他被压着经过昏暗的圆形前厅和回声很响的走廊时，他那尚存的善于发现的本能重又启动了，重又进行着寻找。要集中精力！要找到！

又是那个令人喜欢的宪兵中校伊万诺夫（他是库利亚布科的朋友），是他救了自己，在剧院里免遭毒打。现在只来他一个人，没有主审官，他依然是那样怀着善意。

他的问题是，在你父亲那里又找到了一支左轮手枪，你知道他使用过吗？他为什么要保存这支枪？某某，某某到过你家吗？为什么事去的？

还有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接着，唉，审讯就结束了，他在笔录上签了字。

审讯是结束了，但伊万诺夫还没说完。他充满同情和理解地望着博格罗夫，

他几乎是很诚恳地讲着话：

“请准许我对你说几种设想。您是一位具有不寻常精神力量的人物，有着非凡的勇气，您成就了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事情。然而，您现在的立场对您毫无帮助。您为什么要傲慢地固守原则，固守此前您关于预谋的申明呢？这只会加重您的苦难，那是必死无疑的。您为什么要往绞索的套子里钻呢？出于对革命者们的忠诚吗？但是，他们全都抛弃了您，没有一个人承认您是自己人。您在现实中所要完成的事业已完成，这是跑不掉的。您为什么还要这样坚持下去呢？现在您该为自己考虑一下了，应该减轻您自己的痛苦。不要表现得像是一个国家级的罪犯，不要无条件地坚持说就是想刺杀内阁总理。您有可能是受到了某些因素的影响，因为一时的冲动才干出来的，差不多是偶然的行为。与此相反，您忠实地为暗探局效过力，反对过革命者，那么，您为什么要迷途于革命者的圈子中呢？您应该减轻自己的痛苦，请仔细地考虑考虑，我劝您，在法庭上改变证词。”

“改变证词不是已经来不及了吗？”

“一点儿都不晚。这是有可能的，人们也常这样做，会进行重审的。您不会受到前后矛盾的威胁，因为您没有同谋者，没有同情者，又没有证人，谁都打不倒您。”

出于谨慎，由于不信任，博格罗夫没有立即回答。不过，这个思想犹如一把宽宽的刀子插进了他的体内，开始切断从前的那些牢固的联系。

于是，他又回到了厚石墙围着的囚室里，没有人监视，没有人能看见。又是从牢门走到窗户，窗口又出现了一张呆板的面孔对着那该死的秃山。

真的就这样一下子变得软弱无力，陷入了死亡的状态吗？真的屈服了吗？要试一试救自己一命！

对恐怖分子的判决，已经由死刑改判服苦役了，连萨佐诺夫都……

毒打都那样难以容忍，那么绞刑不是就更痛苦了吗？

是的，看来在审讯中他是输了。他受审时的表现不妥。

既然全体革命者都拒绝支持他，没有人想利用他的功劳往自己的旗帜上贴

金，那么他岂不是就自由了吗？

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归了这个匪帮的？难道他是革命者吗？他只是个自由的个体，是自由发展的支持者，仅此而已。

改变说法？改变整个对这次行动的解释？

放弃功劳，以便自救？

是的，他从来不崇尚虚荣。

他已经做出牺牲，但还不够，现在还要他牺牲自己的社会荣誉吗？

他的名誉已遭玷污，污点不会很快刷洗掉。

这世界是何等狭窄！囚室里只有一扇窗子，窗外的荒坡上躺着一条小径，甚至望不到德涅伯河，空洞洞的巫婆山的上空风儿在回荡，像这个该诅咒的俄国一样，到处是一派忧郁、荒凉和遭难的景象。

清晨起来，淋浴后穿着紧腿内裤、雪白的衬衣，一个面对生活的青年人从阳台上望去，哪里有像海滨维尔佛朗什那样迷人的绿色海湾呢？尼斯的棕榈，大街上喧闹的菜摊和那些频送秋波的女摊主又在哪里？散步的地方何在？舒适的芒通海滩何在？蒙特卡洛赌场前硕大无比的法国梧桐又在哪里？还有那些别具一格的奢华的沙龙，金碧辉煌的宫墙、黄灿灿的金顶……

第一层大厅是玩小赌注的场所，这里的人们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一位叼着香烟的姑娘站在赌台前，还有一些老太太、张大嘴巴的男人和手里拿着铅笔的狂热的调查员。在画着格子的赌台上，每当沿着黑红两色赌盘滚动的小球刚停下来，一瞬间，庄家的助手们就使用犹如巫婆瘦骨嶙峋的手臂般的小耙子，灵活地将输家的赌注全部收拢过来。同时，以轻蔑的神情将庄家间或输掉的钱赔给赌客。庄家的那副嘴脸有时模糊不清，有时像长着可笑的鼻子的黑胡子强盗，有时又像个戴着黑框眼镜的体面的学者。那个青年姑娘，身穿紫色连衫裙，睫毛和眉毛都描得黑黑的，朝空中吐着一个个烟圈儿，以狂热的目光注视着赌局。每当赢了时，脸上就露出迷人的微笑，如果有人误认为这微笑是针对自己的，他就会试图带她离开赌台。博格罗夫也在这个大厅里下过注，心急火燎地注视着那颗疯狂转动的小球。而当金钱充足时，他就走到里面的大厅去。

里面的大厅门票很贵，那是个人赌场，是真正的赌博，下注没有限制，没有下注者和围观者的人群，每张赌桌只有不到10个人。在那里，表现得激动不安会被看成是有失体面的。倒霉的青年赌徒看上去十分粗鲁，板着一副疯人般的面孔在赌桌前走来走去。在这样异常高大的大厅中，笼罩着一派令人神经紧张的寂静，显得十分空旷。这里不用筹码，在巴卡拉牌桌边的那个老头，犹如患了中风一般，脸色通红。他连数都不数就从脚边的袋子里抽出一叠叠的纸币，一百张50法郎的，一百张100法郎的，一捆捆全是封着的新票子。而那位表情丰富的瘦瘦的意大利女人曲意奉承而无误地发着牌，又同样曲意奉承而无误地把一叠叠的纸币推进深深的抽屉里去。多么令人激动！多么兴奋！半个小时之内就能度过整个一生。

比博格罗夫在基辅歌剧院还使人更加激动，那又是怎样一种生活的旋律啊！

再也看不到这一切了。

注视着一个个面孔，从一个大厅走进另一个大厅，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不论走运还是倒霉，不论只是从远处看姑娘还是出钱找个意大利女人过夜，都会突然感觉到那是你生活中的辉煌篇章。当然，这种感觉不是一下子产生的，而是在以后，当远离那一切的时候。在宽敞、慷慨的基辅，在潮湿、阴郁的彼得堡，而现在则是在紧锁着的囚室之中。

可是，你都没能珍重……

如果逐一地思考一下所发生的事情，所见到的、感受到的、幻想过的，那么，在周游欧洲之时，在疗养地的生活中，则浸透着一种心满意足的芬芳……

1906年，是慕尼黑……巴黎……威斯巴登。

1907年，是尼斯……芒通。

1908年，是梅兰……蒙特勒……莱比锡。

1909年，是巴黎……尼斯……蒙特卡洛。

1910年，甚至在今年的2月间，这最后一个春天，他还重游过拉祖尔内别列格。

活了24年，这是短暂的一生吗？抑或是漫长的一生？

假若善于……

不，要继续玩下去！赌注下得比在私人赌场内下得还要大！

伊万诺夫是在骗人吗？他是派来的？当然是派来的！这样更有利。不过，对博格罗夫来说也不无益处。

加快了从石墙到石墙间的走动，好在没有人看到。

是的，不能像头山羊似的无谓地去撞墙壁。不，这不是诡计，也不是行贿。

这是用强有力的智慧求得解脱。

供词将失去真实性吗？那就让他为当暗探局的人而吊死好啦！如果说已经把自己的名字与暗探局连在一起，那为什么不再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份报酬呢？如果顶用，这条命也就得救了！如果不顶用，那就大难临头了！

是啊！把自己跟暗探局挂上，这可是有分量的一步棋。

无中生有地说自己跟暗探局一直在合作！把暗探局跟恐怖活动搅和在一起，让他们永世不得解脱！让这一行动的社会效果无限地扩大！这会给这个体制以双重打击，败坏暗探局体制本身的名声，也就是再一次对斯托雷平的打击！即便到了阴间也要挨这一下。

为了这样一个新的目标，要毫无保留地献出自己个人的荣誉。

凭空编造一起暗杀不可能吗？可他却凭空编造出来了！

难道现在就真的轻而易举了吗？

第六十九章

身体只允许斯托雷平两眼直盯着天棚上的一个点。既不能右侧卧也不能左侧卧，只能仰卧着，压得腰酸背痛，犹如被钉在了床上一般，并且总觉得肩胛骨下面有一颗尚未取出的子弹头。

第一夜非常可怕，死神在对面喘着气，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

早晨病痛减轻了，伤口仍在隐隐作痛。

意识则完好、清晰，能自如思考，精神像正常人一样，已经不相信会必死无疑了。

照照镜子，看到面带生气，并不苍白、呆滞，也不发烧了。最初几个钟头的那种钻心的疼痛消失了，也不恶心了。真想不去注意身体的疼痛，只凭精神、思想活着，那该多么轻松！

“击中要害的那颗子弹打在哪里?”

医生们说：“打在了弗拉基米尔十字勋章上，因而力量减弱并改变了方向。”

“变好了呢？还是变糟了?”

“没有咳血，没有腹膜炎，这很好。”

病人和受了伤的人立即就不被当成是成年人和独立的人了。他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地位，而且还失去了了解自身情况的权利。假若在学生时代没学过拉丁文，那么他就听不懂医生半吞半吐的谈话，也就不知道子弹穿透了横膈膜，击破了肝脏。

总算是没击中心脏，没击中咽喉，没有立即送命，这还不算很糟。

不过，肝脏我们也仅有一个啊！

敌人知道该打什么，于是就打中了他的肝脏。

难道会死吗？

终归还是摊上了这一天。

早就觉得不舒服的右手掌这下子永远残废了，可能当时用右手挡了一下。

那位受伤的乐师据说伤得不重。

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出于好奇”还是要问问：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刺客是怎么混入剧院的？这个问题已经彻底触到了痛处。

不过，在基辅的这些天都会遇刺，干吗一定要在剧院里呢？

那些警察是干什么的！他们要的只是当官，只是升迁。格拉西莫夫在彼得堡的时候，在那些革命闹得最厉害的年代里，他多少次无声无息地救了沙皇，救了斯托雷平和其他的一些人啊！恐怖分子出于报复而诽谤他，库尔洛夫责骂他。

那个库尔洛夫是个愚昧无知、头脑混乱、自以为是的小人，是个强加给所有警察的长官。他没有除掉他，而是把狂妄的警备队留给了他，为的是照顾沙皇的情面。现在，看他有何面目见我！

吩咐找他来。没来，狡猾的家伙！跟沙皇一起参加庆典去了。

难道斯托雷平还有权叫他来吗？

难道斯托雷平作为政府的首脑真的拥有过充分的权力吗？

原来如此，俄国政府的首脑遇刺，竟没有一个人来说明情况。

第一天自我感觉十分良好，好像马上就能摆脱困境，会安然无恙。这完全是世俗的想法。医生亦不回避他们从报纸上读到的东西，说行刺者是暗探局的暗探博格罗夫。

博格罗夫？是昨天提到的那个人吗？是那个密告恐怖分子的特工吗？真是难以想象。

现在，这些问题会折磨坏身子的，反正还不是一样。谁干的？为什么干的？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摊上了……

他的精神在自由地驰骋，毫无沮丧，头脑异常清晰。

斯托雷平在等，等着进行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谈话——他在等沙皇。

晚上，刚被送到医院包扎好，在第一次领圣餐之前，斯托雷平就请求转告沙皇，他准备为沙皇献出生命。

在痛苦的第一个夜晚，当死神将降临的那几个小时，他一直在等待。今天早晨，痛苦减轻了，他更是在等着见面了。

他有许多的事情需要转奏，需要预先提醒。现在斯托雷平可能以从未有过的独立性与他交谈，进行一次彻底的交谈。

然而，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沙皇还是没有来。

斯托雷平对这位沙皇实在是太了解了！记得在霍登场事件时，他仍照样到法国大使那里去出席舞会。要知道，对沙皇而言没有什么比阅兵更高兴、更重要的事了。9月2日按日程远在城外正好有一场重要的阅兵，集中了几万人的部队，怎么好打乱日程呢。

他很了解情况，但是仍在等待着。

9月2日晚上，沙皇将回到城里，那就更要等了。

然而，沙皇还是没有来。

于是，头脑最清醒的一天便这样不可挽回地过去了，毫无结果。

难道他真的就不能把那个典礼的日程稍微改动一下吗？

难道了解一些国家大事、了解该做而未做的事和国家所面临的危险，对他来说就那么无关紧要吗？难道了解一个临死的人的想法对他来说就那么无关紧要吗？

斯托雷平想在今天把自己的变革计划呈告沙皇，把它作为一种遗产留下来，并且要有说服力地、有吸引力地促成其实现。

这一切不是为了争功。他战胜了革命为的不是他自己，使国家复原，为的是沙皇的未来！这可是为了陛下自己啊！

要知道，他自己已经看不到俄国将陷入困境，也看不到它如何摆脱困境。

只来了一位小预审员问了问，做了个笔录。无非是问问剧院的事是如何发

生的，大臣靠近谁站着，刺客是如何走近的，哪只手持枪……

科科夫佐夫来了，医生将他放了进来。他现在已经成了临时常务大臣。

在两届内阁中都没有发生过的事现在发生了，科科夫佐夫接替了这个位子。

他不只是个反对派，他目光短浅，感情也贫乏。怎样才能增强他的智慧？开阔他心胸呢？在他着手办一些事之前，他应当变得大胆些才成。为什么不用克里沃舍因呢？

这是沙皇的意愿。

对他说了些事情，首先，要争取使沙皇撤换苏霍姆林诺夫，必定会在军事机关中引起混乱。

这一天没有什么事做，幸好秘书送来了一叠电报，俄国各地来电祝他早日康复。

在不幸的时刻我们会听到朋友的呼唤，不过总是姗姗来迟。在做事时如果有十六分之一的朋友在身边该是多么可贵。

电报和报纸的报道中都说举行了祈祷，特别是在首都的各教堂都补做了祈祷。各地教堂还寄来了一些小圣像。切尔尼戈夫的主教还带来了瓦尔瓦拉圣油。

在俄国大地上人们非常喜好这种夸张的做法，而不是代之以日常的工作。祈祷很容易，得到支持却难，干事业则更难。

斯托雷平也知道无处不在的上帝在主宰着自己。

首先要做的是尽自己的力量填满农民的粮囤。

难道现在就得离开吗？在即将开始进行主要变革的时候离去？

多么渴望听到纯真而有力的声音啊！听到对继续保持意志和力量的许诺。

然而，在整个俄国都听不到这种声音。是啊，它是否存在呢？

还有精力，才49岁就要离开人世！抛下这样一个俄国，民间对君主权力愤怒的呼声越来越强、越刺耳；诽谤愈烈，误解愈深。

上帝啊，你到底是如何安排的，我们不晓得你的意图。不论你多少次宽恕过每个人的所作所为，不论我们曾多少次超越过我们所设想的极限，在每个新的领域，甚至在面临死亡的最后时刻，都越来越惊恐地有失控之感。当极其需

要我的时候，你却命令我住手。

那么奥利娅怎么办呢？那么，那老少6人又该怎么办呢？这究竟是上帝的惩罚，还是他的恩赐呢？除了短暂的睡眠，病情一刻也不见好转。如果时时想着病痛，记着自己是个受了伤的人，那准会死的。

大概会死去。

电报和传闻都没有什么新东西，无关痛痒，单靠这些也弄不清：那里到底在干些什么？是在继续毁坏还是正在恢复？不该流血的地方在流血吗，还是疲惫的心脏已经将血吸干了？

医生似乎并不是在治病，只知道注射吗啡和咖啡因，说过3个星期就能够下床了，也不换绷带，连碰都不碰它一下。他们只是取出了一颗子弹，然后就再也不管了，等着彼得堡派名医来。

他本来是一个忙碌的人，这下子却无事可做了，连个可交谈的人都没有，又不能请人转达。他意识到自己注定就是个任何时候都不能干涉未来的人，于是他就认真地分析起自己的过去来。

1906年，"一切都处在动荡和暴乱之中。"

1907年，"吓不倒人。"

像这些话一样，还没有想好，事情就突然发生了。能站得住脚就是福气！而将勾心斗角代之以国家的力量，并在其中勉强地行走，则是一种悲哀。

然而又怎么能抱怨呢？他本来一事无成，会在药剂师岛上送命的，可是他被释放了，于是才会有这5年的工作。

他感到在自己的身上交会着俄国所有的羁绊，他必然会下定决心去跟那个吹牛大王进行决斗。

眼下也是那样一种决斗。只不过敌手在暗中，而自己则暴露在明处。

刺客的表情令人吃惊，充满着胜利的信心，胜利的喜悦淹没在知识分子脸上露出的苦笑之中：人们会明白吗？干得多聪明！

50年来，他们所有的人全都变成了这个样子。

俄国与他们何干？它的任务与……

不，这不是暗探局的密探干的。

生活会发出对我们的预先警告、某种先兆或类似的东西，它好像是毫不相干的，但与我们的关联却大大超出我们的意料。因此，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些事先的警告。所以，有关阿泽夫的讲话便使得暗探干出了卑劣的恐怖勾当。杜马里的政敌就曾预先警告说，政府本身将毁在情报人员的手中。瞧，这不是惊人的相似吗？

那么，现在他们将如何欢庆他们尚未赢得的……这一炮对他们来说打的正是时候，于是杜马便结束了正在举行的4月会议。

应当抽时间关注警察局，而不是讨厌它。

1909年，俄国的解体加速了。

1910年，这是个有建树的一年。农村已在俄国的大地上播种，改变了自然的面貌。你那幸运的西伯利亚之行是一生中真正的巅峰，这一切都是你的杰作。

也许，你已经做完了你该做的事？允许一个人做的事并不多，一个人不能扭转整个历史。

即便是在这非常的时刻，一个人也是同四面八方相关联的，是被安排好了的。

不，不是这样！不，上帝！感谢你，慷慨的上帝，你让我做完了所做的一切。

从8月到9月恰恰是旅行频繁的一段时间。就拿这几天来说吧，正赶上此地令人厌烦的庆典，而去年却是在西伯利亚的草原上，穿行于大大小小的谷垛之间。

多么想再到那里去一趟啊！

9月2日的一整夜也过去了，不像第一夜那样可怕了。

体温仍是37度，脉搏也不超过90次。很相信医生们说的“大有希望”的话，既不发烧，也无呓语，只是感到全身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感到虚弱。右肋的伤口四周，犹如铁铸的一般沉重。那里的深处正在暗中发生着什么变化呢？不再流血了，还是不给换绷带，也不进行治疗，是不允许吗？

奥利娅从科文庄园赶来了。

看到了吗，我的朋友……是啊……是啊……

然而，不论是庆典结束的当天晚上，还是次日的早晨，沙皇都没有来，是要在白天来吗？

他的日程到底是怎样安排的呢？按照日程的安排先去基辅城外，然后再到科罗斯坚。

那么，就不来了吗？

没有来。

斯托雷平很了解沙皇！但还是希望他能来。他已经准备好了，不是以一个臣子而是以一个临终人的身份与他进行谈话。只能对他一个人说，不能对别人说。

……沙皇陛下！请不要相信那些骗人的话，说什么已经一切都好了。其实，我们还将遭到一场凶猛风暴的袭击！我们仍将遭受两股力量的冲击，一股是不负责任的力量，另一股是狂妄的力量，其中的一股力量是您完全能够控制的。请您清除这些杂草吧，陛下！

对猛烈的左冲右撞有着亲身感受的他，如果不向沙皇进言，那么还有谁能进言呢？没有。

这样的叫喊事尚不能令沙皇震惊，他不觉得惋惜吗？或者相反，这还不能使他改变部属吗？

他一贯如此，凭感觉办事。他不会改变，也不会对安排好的事情做出变动。

唔，只是在今年春天才跟西部的地方自治局闹僵了。

任凭那位亲自治理国家的人指责好啦。

一切都完好无损，就连最边远的一座塔楼都没有拱手让给任何人。

如果主要工作及主要方面都进行得卓有成效，那为什么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你的敌人，周围充满了敌对情绪吗？

正如在谈到育林问题时所说的：敌手在疯狂地砍伐树木，不让我们育木成林，那样森林就必定培育不成，说的就是必定，并且我们将被倒下的树木压死。

然而，但愿这一切在总体说来已经出现了一个面目一新的俄国之后再发生。

可是，这样的一个俄国出现了吗？难道主要的工作完成了吗？天哪！直到现在斯托雷平才看到最主要的东西，而现在他甚至连欠起身的力气都已经没有了。

死，一点都不可怕，早已把死的恐惧置之度外了，这连他自己都感到十分惊异。这可是在还不到50岁的年龄啊！一切担心都是为了俄国。

哦，已经无能为力了。

可怕的是没有继承人，完成不了未尽的事业。我们都不能接触到真正的事业。替代我们的到处都是德国人，或者是一些软弱无能的人。只需出现一个铁腕人物，那么，从这个大国的四面八方，卡钳、戒尺、尖镐和铁锹立刻就会向我们劈头盖脸地袭来。

陛下！如果对种种情况熟视无睹，我们就会垮台！国家生活在如此动乱之中，那是不能容忍的！皇上，我有一种极坏的预感，这不只是因为挨了这一枪。陛下！1905年还可能重演！可不能再打仗啦！应当扶持，扶持那些健康的社会阶层！不要信任那些聚集在您周围的自私自利的人！

这一天过得十分漫长，思绪已经不如昨天那样清晰了，一会儿昏沉，一会儿恶心，一会儿盗汗，感到虚弱，感到肝部犹如上了铁箍。彼得堡的蔡德勒来了，但外科医生们照样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沙皇在奥夫卢奇出席一个教堂的揭幕典礼。

他在等着，或许古奇科夫能来。这些年来他们之间能够互相理解，但愿现在能重温旧情。

他还在路上，或是刚刚动身，不过也是不紧不慢的。此前，他曾送过来一幅古老信徒派的圣像。

情况越来越不妙了。

他早就留下了这个遗愿，所有的亲人都知道：要把他葬在被刺之地。结果，他被刺于全俄国的摇篮，在这个俄国第一条根的发祥之地。近些年来，正是在这里，俄国的民族感情保持得最为鲜明。不是在宦海茫茫的彼得堡，也不是在

充斥着立宪民主党人的莫斯科，而恰恰是在这里！在最后一个春天，他为这个基辅跟西部的地方自治局进行了一场较量。

在那几个星期中，他的心破碎了。现在，但愿它能帮助止住流血。现在的这颗心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了。

到了傍晚，他的意识时而变得有些模糊了。这时才想起他可以把要说的话写下来呈给沙皇看。他怎么早没有想到呢！现在的话说出来很激烈，比完全清醒的时候更有说服力。现在他可以完全说服沙皇了！皇上也就不得不去做那些善事了。

于是他要来了纸、垫板和钢笔。他忽然想到，他的右手在写字时总是用左手撑着，现在他受了伤，可怎么个写法呢？他很虚弱。

他说起了胡话。妻子和阿法纳西耶夫医生守在身边，一连几夜都没得休息。

早晨，他神智清醒了。医生们很惊慌，检查出是腹膜炎，脉搏 120 次。病情平稳时对采取措施犹豫不决，而这时却做出了果断的决定：立即换绷带。还在背部进行了手术，取出了那颗致命的子弹头。

斯托雷平朝子弹头瞟了一眼。

今天他已经十分虚弱，即使沙皇来了，他也不能说太多话了。

原来，沙皇在昨天很晚的时候来过医院，当时他已经失去了知觉。

今天早晨他又离开了基辅，是按照日程的安排离去的。

在半昏沉的状态中，在输液中度过了 9 月 4 日。

时断时续地思索着。

面对未来，他敞开了俄国的大门，可不要再把它关上啊。

天哪，该怎样去设想这个未来呢？是光明荣耀的，还是阴暗沉重的呢？业已开始的运动会怎样继续，会有什么转折呢？

要投身于这一运动，参加进去。我为它而生！为它而存在！

然而，已经出现了妥协，这可不是我的本意。一切都很好。

5 日早晨，斯托雷平又完全清醒了，他请求地对那些教授说：

"你们怎能在我生命的最后日子不讲真话呢？"

教授们支支吾吾，斯托雷平右手缠着绷带，又不能用左手把脉，不过，他已经没有脉搏了。于是，人家就给他输氧，注射咖啡因。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今天沙皇也没有来……

皇上也为自己的软弱苦恼。他支吾搪塞，令人厌恶，他还是没有来。

在这样的时代，是上帝的意志为我们派来了这样一位君王……

我们理解不了你的用意。

啊，上帝，我们的造物主！请开启他的智慧和心灵吧！

9月5日一整天，意识模糊的他非常痛苦，呻吟着，辗转不安。令人惊异的是，他的心脏仍在拖延着，有时完全停跳了，只是靠咖啡因的作用才重新跳起来。

昨天止住了横膈膜的流血，本应通过手术止血，用消毒纱布去填充肝脏，但却没有进行这一步。

禁止外人进入病房。

晚上，在昏厥前还曾要求过开电灯："拿信来！拿笔来！……是谁拿来了一支没尖儿的钢笔？"

还说了些有关治理俄国的话。

有几次清楚地说着"芬兰"，还用左手在床单上画了出来。

没有给他拿来纸和铅笔，因为他用不了。

晚上8点钟他的四肢开始变冷，呼吸非常困难。

9点钟留下了最后的遗言："让我侧侧身。"阿法纳西耶夫帮助他翻了个身。

此后，便完全失去了知觉。

人们进来看他。

大司祭做起了送终祈祷。

一直到死，他面色始终栩栩如生。

妻子呆立着。

晚上9时，经过了4昼夜的搏斗，几乎恰恰就在4天前遇刺的那个时刻，

斯托雷平逝世了。

阿法纳西耶夫医生一连4夜守在他的身边，分担着他的痛苦。他观察过许多有才智、有能力的人，在濒临死亡时他们一般都要做垂死挣扎，表现出惊慌失措，显出精神的虚弱，为求救而祈祷，在医生的眼神中寻求希望。而这位面临死亡的人却没有祈祷，表现出少见的平和，少有的泰然自若。

斯托雷平以平常心面对死亡，他从容地从生命的一种状态过渡到了另一种状态。

世人们得以见到光明，

而使其然者反受其辱。

第七十章

人们本来想把这一死讯拖到次日凌晨再宣布，然而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基辅的犹太人中发生了恐慌，而敖德萨的犹太人也立刻得到了这个消息。人们开始逃出城去，代表们即刻动身去当局祈求保护犹太人。

当局答应并且给予了保护，他们关注的是能否发生虐杀犹太人的事件，这证明博格罗夫的担心是对的。警察为防备万一驱散了大街上爱国主义者举行的游行，正在作屠杀犹太人准备的可疑者遭到了逮捕。庆典后尚未离去的部队中有3万人被调进基辅布置在犹太人街区附近。内阁大臣会议执行主席科科夫佐夫发布了严厉的通令，要采取最坚决的措施保护犹太人。总督公布了沙皇的命令："严禁群体、社团和个人任意妄为，以防引起动乱。"米哈伊尔·阿尔汉格尔同盟向盟员们发出呼吁，要求他们在大街上严守秩序。市杜马的右翼领袖发表声明称，一切反对他人的言论都是同秩序与法制的斗士斯托雷平的良心及意愿背道而驰的。"作为基辅市民的精神脉搏，我们应竭尽全力使事态平稳。"右翼人士决定不再举行游行，以免为社会动乱推波助澜。基辅的右翼人士在斯托雷平逝世前便想到了，他所住的马科夫斯基医院没有受到警察局的任何保护。只要斯托雷平开始康复，只要博格罗夫有同党，那么进医院补上几枪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大概，这种克制的做法是右翼分子很容易做到的，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把斯托雷平看做是自己人，相反，他们认为他是叛徒。因为本该拒绝并驳斥《10月17日诏书》，而斯托雷平却在诏书限定的范围内寻求俄国的发展。虽然他已经使俄国避免了革命，但对他们来说他还是不够好。令人不可容忍的右翼极

端观点是不寻求任何社会发展，不进行任何思想运动，不作任何让步，而只是对沙皇顶礼膜拜，只是让国家处于毫无生气的呆滞状态，并且直到永远，永远，永远。是的，现在斯托雷平被一个犹太人杀死了，于是他便更易于被右翼分子所接受了。基辅当地的盟员准备在斯托雷平遇刺的那座歌剧院里上演《为沙皇献身》。不过，他们得知，当局把这个剧的日场和晚场都取消了。然而，彼得堡的右翼上层对斯托雷平的敌对情绪却没有丝毫改变。杜马的右翼党团有意地做出了姿态，没有任何人去参加葬礼。马尔科夫二世，普里什凯维奇和扎梅斯洛夫斯基都没有出席。右翼报刊直言不讳地写道：

"斯托雷平不代表俄国……但愿他的追求变成对其每个助手的警告：切勿屈从于现代自由思潮的诱惑。"

大主教安东尼·赫拉波维茨基在日托米尔的追悼会上指责斯托雷平的改革是左派的改革，并且号召东正教徒为他的罪过进行赎罪祈祷。那位著名的无拘无束的察里津的伊利奥多尔（而且与斯托雷平有私仇）竟然拒绝为他举行追悼："斯托雷平跟我们非亲非故，又不了解他，他没干过什么好事。"

他们都是在按照沙皇给定下的调子在行事。沙皇总共只去过医院一次，甚至都没有走过去瞧瞧斯托雷平，这是无论如何也瞒不住世人的。早已确定的、期盼已久的典礼一定要举行，剧院的枪声对它没有丝毫影响；举行了阅兵式，巡察了基辅的各类机关，乘车去了奥夫卢奇和切尔尼戈夫。9月4日沙皇才返回来，与死者告别已为时过晚，但等着明天把遗体直接送达修道院尚为时过早。在呆板的庆典日程安排中，沙皇仿佛在踮着脚尖似的从保龄球的立柱之间走过那样，捱过了遇刺者遇刺后在剧院里的最初几分钟，接着又捱过了遇刺者在医院里等着见他的那段时间，继而捱过了他去世的那一天、送往大修道院的一天和下葬的那天。大家都看到了，沙皇对斯托雷平毫无同情之心。

人们背地里在传，报刊上也透露出："据说，沙皇不认为这是特别的损失。"

更令人松口气的是没有爆发同情的浪潮。在俄国举行的祈祷很快就变成了追悼，追悼一过也就完事了。

现在更不需要自由报刊表示什么"深切哀悼"。但是所有的报刊却一再重复

着宪兵中校伊万诺夫对博格罗夫个人的赞誉之词，可以读到如下的词句：

"受伤的大臣在临死前反复考虑的是什么呢？对他所生活与活动的这个警察体制的本质他是否弄清楚了呢？"

并且，随随便便地以历史的名义给出了一个交易所式的评价：

"死者是否是国家的一位大人物呢？他是否有过广泛而深刻的国家纲领？一个有确定原则的、成体系的计划？不，他并没有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有整体思想气派的人。"

这几天，国家的一个委员会在斯托雷平的科文庄园里没收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份俄国20年发展纲要。各报用放肆的、自以为是的卑劣态度加以指责，在这20世纪里，那些臭名昭著的记者表现出的卑劣尤为突出。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教训说：

"任何人都不要忘记，法律（在立法机构中由法学系的毕业生和其他法律工作者制定并通过的法律条文）高于宗教并且高于民族感情。"

只有梅尼希科夫在《新时代》中写道：

"这是对全世界的射击。他在风华正茂的年龄，在履行职责中遇刺，而他的政治生命才刚刚开始。他是以国家领导人而不是以警察首脑的身份同革命作斗争的。他是一位新型的国务活动家。除了祈愿他"永垂不朽"以及手提香炉里的缕缕青烟，我们无以为报。我们的反应是：俄国失去了一位首脑。这些追悼会便是他事业的影子。对革命应当作一出非戏剧性的反击。"

除了记者和政客们的观点，国家难道还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吗？我们几乎没有解释过俄国所遭受的损失。

一些基辅人讨论过要为斯托雷平立一座纪念碑，国家没有表示要参与此事。

在左派、半左派及右派的讥讽、蔑视和误解中，从流亡国外的恐怖分子到笃信宗教的沙皇，俄国埋葬了自己百年来或两百年来最优秀的政府首脑。

只有在欧洲国家的报纸上才能读到这样的消息：（法国的半官方刊物说）对国家的伤害不在于表面而在于对国家基础的伤害，说斯托雷平是一位伟大的活动家，是国家秩序的支柱，他在极短的时间内使俄国恢复了安康。《泰晤士报》

说他在极短时间内使得俄国的政治生活适应于政府机关，这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得到的。说他是一位为自己的理念捐躯的人，他的死是俄国全民族的悲哀。可以期待的是，他的死并不是斯托雷平时代的结束。维也纳的报纸说又一位伟大的俄国人倒下了，成了野蛮兽性的牺牲品；俄国的社会主义恐怖分子在俄国资产阶级和大学生中称自己为解放者，以此来掩饰令人生厌的野蛮，这只能为和平的文化工作设置障碍。

斯托雷平死后身穿白色制服躺在橡木棺材中，在众多的花环中孀妇选了一个荆冠放在他的胸前，他脚边的垫子上放着被子弹打破了的圣弗拉基米尔勋章。狭小的医院入口很拥挤，向他告别的人们排起了长队。

本打算葬在阿斯科尔多沃伊墓地，可是沙皇来到医院后吩咐葬到大修道院去。

9月7日，从医院到基辅伯朝拉大修道院的几俄里大街两则挤满了人，街上有士兵夹道列队保护，活着的时候没人保护，死了却保护起来了。遇刺的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宪兵在场，而现在却有来自3个城市的几百名宪兵，他们有的骑马有的步行，前呼后拥地摆出架势，因为死者曾兼任内务大臣。然而这种有意的修饰却歪曲了他对俄国的伟大功绩。那些在他生前没有支持过他的人，现在却聚集在这里，有来自各机关的代表团，有高级军人也有非军界的高官。但是，库尔洛夫去了彼得堡，斯波里多维奇去了雅尔塔。

几支军乐队奏着乐，手持火把的人走在队伍的前头，随后是身穿白袍的贵族和地方自治局的官员，还有那个倒霉的剧院合唱队。教堂唱诗班的歌手们身着蓝色长衫，举着10面神幡，一个高高的大十字架。诵经士分两排走着，助祭们拿着长链手提香炉。3位高级僧侣，8名修士大司祭，头上的金冠闪着光。有几处，百姓们跪在了灵车前。灵车套着6匹马，一色的白眼罩，白饰缨。每当在教堂附近停住时，高级僧侣们便诵起福音书来。灵车后面是亲属，随后是将军、军官、举着旗帜的君主主义者组织的队伍，用车载着几百个用银箔和鲜花编成的花圈。送葬的队伍整整3个小时才走完。

还有一个细节：头一天的晚上沙皇离开了基辅，到克里米亚疗养去了。不过，陛下也送了个花圈，皇后也送了花圈。

9月9日举行葬礼时彼得堡的代表团也赶到了。"国家杜马"来的人数不多，只有50人，是俄国民族主义阶层的，他们自始至终都忠于斯托雷平，不过，他们的基辅领袖舒尔金正在雅尔塔旅游，还有懊悔不已的古奇科夫带领的一小撮十月党人。杜马的左派和极右派中没有一个人来。罗江科送了个花圈，只是以他自己的名义送的。有人问他："为什么不代表杜马？"他回答说："代表们没授权给我。"

亲王中没有一个人来。

葬礼前的几夜，灵柩停在特拉别兹教堂，守灵的有首席贵族、地方自治局官员、市杜马议员，还有内务部官员。对了，还有农业改革中的忠实朋友——农业大臣克里沃舍因和斯托雷平的助手雷科申。

教主做了安魂弥撒，霍尔姆斯科罗斯的叶夫洛吉主教致了充满感情的悼词，悼词中称死者为十字军骑士。

灵柩启运前，墓穴周围便挤满了报界的代表、照相师和摄影师。俄国人民同盟的"盟员们"坚持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要求驱散他们。记者们不肯离去，于是便强迫他们离开。

伴随着钟声，灵柩被抬出了教堂，又有宪兵在站岗放哨。绒垫子上放着勋章，54名司祭、6名助祭、4位主教和修道院的院长都穿着白色的法衣，抬棺木的是军阶不太高的官员。送葬的大臣有谢格洛维托夫和季马舍夫，克里沃舍因搀扶着遗孀。此外，还有罗江科、古奇科夫、巴拉绍夫、弗拉基米尔·博布林斯基，还有皮赫诺。

有个古老信徒派的男人想在灵柩前发表讲话，宪兵不让他讲，把他赶开了。

在墓穴边做过安灵祈祷之后，伴随着《科利·斯拉文》和《永垂不朽》的乐曲声以及大修道院外的三阵排枪声，一位伟大的俄国人的遗体被放进了特拉别兹教堂和大教堂之间的墓穴里，开始填土了。

他没有被吓倒。

他遇刺身亡了。

第七十一章

几个小时之后，在侧射暗堡的一间大囚室里，他们开始了对博格罗夫的秘密审讯。关于将在彼得堡公开审讯，对暗探局的怀疑将真相大白的说法看来是谣传。当然，对他进行的胆怯的秘密审讯，也没有公布起诉书。最好不要使怀疑得以证实，不要加强左翼的力量，要掩盖博格罗夫一案的真相，自己就得当大罪人才行！博格罗夫是他们的人！暗杀是当局本身策划的！

如果对审判都保密，那么葬礼上的士兵夹道列队和宪兵在放着死者勋章的垫子前站岗还有什么意义呢？

原来，昨天，也就是9月8日，被告曾要纸写“非常重要的供词”，但监狱方面考虑到他已经被提交给军事法庭，就拒绝了他的请求。今天检察院已得知此事，但仍按原计划进行。

审判定于下午5时开始。没有考虑到侧射暗堡里没有电，天色已近黄昏，开庭时已经是灰蒙蒙的了，于是便派人去找煤油灯来。

法庭的4名成员是卫戍部队的上校、中校，主席是少将，检察长是一位中将。看来，后两位是目睹了沙皇对遇刺致死的内阁总理大臣的蔑视态度，而且心领神会了。他们自己就能在这里得出结论，也许是找人商量过，不过那人是谁，我们便不得而知了。至少传唤过12名证人，其中5人没有出庭。被传唤的人中竟然没有库尔洛夫，法庭显然不敢惊动高层。韦尔金仿佛与此案完全无关似的在最初几天就匆匆忙忙地赶到彼得堡去了。在宫廷庆典时，因牵涉保卫问题，斯波里多维奇不能立即离开基辅，然而他蔑视法庭，两次传唤皆未到庭。

司法大臣对宫廷大臣发出警告，声言要亲自向沙皇报告请求传唤斯波里多维奇，这时他才到庭接受调查，不过（因与法庭的4名成员已经串通好）他没有回答出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因为这跟他毫不相干。因此，他今天也没有出庭。

没有出庭的5名证人之中，也没有一个人被要求二次出庭。

由于被告拒绝，所以也没有辩护律师。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做审讯记录，就好像这场审判发生在战场上，发生在被敌人的炮弹震动着的塔楼之中，或者说，好像这是在审讯一个盗窃犯。

到场旁听的是地方上的一些头面人物，有总督费奥多尔·特列波夫，军区司令尼古拉·尤多维奇·伊万诺夫（由于谋杀暴露，博格罗夫曾两次救了他的命），基辅省的省长，省首席贵族，还有几名检察官。司法大臣谢格洛维托夫也来到法庭上坐了一会儿。但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指出忽略了做记录，或许是没有人发现这一疏漏。

把此事的始末详细地写出来会令当局感到极不舒服。从宦海的常规来说，对所发生事件的看法早就深深地印在他们的头脑之中了。

博格罗夫忽然请求让证人库利亚布科留在法庭上听自己的陈述。按照规定这是不准许的，然而法庭同意了。博格罗夫沉着冷静地说出了审讯中的一切。昨天没有给他纸把这一切都写下来，于是今天他就把它说了出来。

他的口供竟然与此前的截然相反！

他说，想除掉这个人民的公敌、各族人民的敌人、这个进步和宪法的敌人。这并非是蓄谋已久的，而是纯属偶然。博格罗夫带着左轮手枪已经好几天了，可是还没有决定到底要杀死谁。他杀死斯托雷平并非预谋，对他自己来说都是出乎意料的。在暗探局服务纯粹是出于对保卫工作的同情，实际上他并没拿过报酬。

可是，今年春天和秋天从巴黎来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曾两次找过他，要他对1908年党费的使用情况进行汇报，指责他与暗探局有联系，要求他进行一件恐怖活动，否则便宣布他为混入的奸细而除掉他。

(救救我吧，我是你们的人！你们看，我在为你们受罪！)

无政府主义者与博格罗夫商量要杀死库利亚布科。

库利亚布科像被子弹击中了似的抖动了一下。这便是他所感到的威胁吗？几天来在审讯中他一直是痛哭流涕，承认自己太蠢了。为的就是要避开地道的国家叛徒这个罪名。那么，他本人也是个内定的主要牺牲品吗？

有人拿进来几盏煤油灯。天棚上出现了一些可怖的阴影，人们身体的移动和手势的黑影都被放得很大。

库利亚布科是博格罗夫自己选定的目标，因为在频繁的交往中，这一类的暗杀总是能逃脱罪责的。

博格罗夫真是太聪明，太可爱了！库利亚布科现在心里豁然开朗：如果我是主要牺牲品，那么我岂不几乎就是无罪的了吗？

然而，库利亚布科的信任和他对博格罗夫的和蔼态度并没能使后者罢手。在8月31日夜里，他来到了库利亚布科的家刺杀他。他又能怎么办呢？可是，看到他那样的和善，晚上在家里光着身子的那副样子，就不忍心动手杀他了。

我对库利亚布科有恻隐之心，对你们所有的人也一样！你们要承认，我是你们的人！

他为库利亚布科辩解的热情话语取得了对方对自己的信任，库利亚布科甘心情愿地被迷惑住了。

棚顶上的怪影，令人区分不出这是在阴间还是在阳世。况且，这一切都发生在傍晚，而且又是在秃山附近。

法庭对这一戏剧性的转折感到惊诧不已。

“可是，您为什么要刺杀御前大臣斯托雷平呢？”

“那可完全是出于偶然，只不过他在观众中是个最显眼的重要人物。”

他刚刚被捕的时候，那种拿破仑式的傲慢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这些天来他一直披着英雄的战袍朝着断头台上走呢？他为什么要在自己的面前设置严重的障碍，承认最严厉的指控呢？

法庭深感惊异，但却没有提出一个这类的问题。那么，法庭真的感到诧异么？没有任何人问他，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对供词做出这样剧烈的改变？出于何

种动机？

要进一步审讯吗？要作详细的记录吗？要重新进行调查吗？要改变自己的决定吗？

不，好像炮弹已经落在侧射暗堡的塔楼附近了，法庭急于结束审判，要尽可能快地在暗中结束这场审判。仿佛要故意使左翼报刊发出最坏的谴责：这是你们的人干的！

对乐不可支的库利亚布科的审判犹如坐滑梯一样顺利。现在他很容易合作，因为他已经听到了全部新的解释。他对这位忠实的同事博格罗夫赞不绝口。因为他一直在说：博格罗夫的行为对暗探局绝对有利。不相信博格罗夫是绝对不可能的，监视他是不道德的。为什么库里亚布科没有在博格罗夫的家里逮捕那些可疑的革命者呢？因为如果在他们密谋的现场抓获他们，就会把博格罗夫的秘密暴露给革命者。关于放博格罗夫进剧院的问题，斯托雷平是知道的！

斯托雷平的坟墓已经填土压实，现在可以任意践踏了。

原来一切都很简单，一目了然。既然博格罗夫和库利亚布科的供词如此相吻合，法庭有什么必要再去审讯到庭的那6名证人呢？有什么必要去读未到庭的斯波里多维奇和韦尔金的证言呢？法庭成员可以暂时退庭去举行会议了。

这个预谋好的法庭装模作样地审着案子，问被告："还有什么要向法庭陈述的？"

博格罗夫要求吃饭。

被叫来的监狱管理员报告说，博格罗夫享受的是军官待遇。

法庭吩咐让他管够吃。

20分钟后法庭成员们回来了，并且宣布了判决：律师摩尔得科·格尔绍夫的助手博格罗夫承认自己参加了以暴力改变俄国现行国家基本法制的活动（如法典102条所称的非法组织，法典中无其他条款，整个法典未对已延续半个世纪的革命者的单独枪击做出规定，整个法典不适用于革命年代），承认有进行暗杀的预谋，今判决如下：剥夺其一切权力并处以绞刑。

博格罗夫浑身一抖。

立即执行？这么说，一下子，就一切都完了？

失算了，本想定能成功！却没成。

这是最糟的结果。

也许，法庭原本很愿意放过他，然而，还有一个博格罗夫所不知道的法规，即在沙皇四周两俄里的范围之内总是处在军事管制的状态。问题并不在于他刺杀了御前大臣，而在于他是在沙皇在场的情况下开了枪！

对库利亚布科则另外做出了一个决定，法庭没有采取措施，没下命令，没有安排监视，此事将通告相应的非军事部门。

如此而已，无须评论。

现在给了博格罗夫一生中的最后一张纸，回囚室后就不会给了，让他给父母写最后一封信。

散庭后人们都离去了，两个世界的怪影映在天棚上，在等押解人员的到来。

博格罗夫被桌上的煤油灯照着，可以写信。

尽管解释变了，可父母还是父母。他在各种解释中尽可能吃力地爬行过，可是写这封信的机会不会再有了。

这信难道只是写给父母的吗？它将被印成数十份。这是致全世界的一封信。

然而，这一切又如何表达呢？如何才能通得过？

“亲爱的爸爸、妈妈！这是唯一能使我感到沉重的时刻……你们将会在真实和臆想的秘密面前感到无所适从……”

臆想，看来，已经清楚，就是不要相信人们说的我是什么暗探局的密探。是的，下面会更清楚：

“但愿你们仍然认为我是一个诚实的人。”

诚实的人，这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对老博格罗夫而言，对整个律师界而言，对整个俄国社会而言，诚实的人，就是国家和当局的敌人。

诚实的人，也就是说，是出于理想而进行了暗杀。

这是能通过书报检查的。

急于结束审判，急于执行死刑。第二天，在9月10日夜里，博格罗夫就要

被处决。斯托雷平的亲属请求推迟，请求在对暗探局基辅分部的审查得出结果后再处决。审查工作即将开始，9月10日参议院特鲁谢维奇已经得到任命，11日就将到达基辅。如果没有礼拜天不得处决犯人的规定，那他早就被处决了。这样一来，还要等到星期一才行。

俄国的任何一个大恐怖分子都没有这样匆匆审判，匆匆处决。要尽快解决掉，以便不再复审、不再调查、不再拖延下去。法庭采取的最后方案令人皆大欢喜，几乎没人有罪，几乎没给任何人留下疏于职守的污点。

不过，开始了对暗探局的调查。被告签署的笔录并没有令法庭感到为难。那么，暗探局怎样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呢？

9月10日星期六，在侧射暗堡的一片寂静中，一位审查员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死刑犯的囚室。按法律规定，死刑犯的囚室是禁止这个世界任何人进入的。

他要进行补充审讯！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对一个死刑犯来说，都不存在什么补充审讯！我们知道监狱的环境及其力量。不管监狱的墙是用几层砖砌成的，不管它有多么厚，总会有一个特点：对于囚犯来说它是不可逾越的，而对当权者来说越过它却不费吹灰之力。

博格罗夫的心颤抖了！他的解释起作用了！理智的大门并没有完全被堵死！

这位走进囚室的人仍是宪兵中校伊万诺夫，这些天来他已经喜欢上了博格罗夫。他对报界说：“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杰出的人之一。”事隔多年，在经历了革命的全部成功之后，伊万诺夫已侨居国外，可是对一家嘲笑博格罗夫的外表不怎么讨人喜欢的白卫军报纸，他仍旧给予了驳斥。

走进这扇难以走进的大门，是为了对他在法庭上做出的救命的解释表示感谢吗？

不，他是因为博格罗夫的说法在法律上不够充分而来的。

然而，法庭的决定也并非是十拿九稳的。

法庭并不是掌握在暗探局的手中。

现在是要逃避判决吗？

逃跑，那更好！不服苦役，而是流亡国外。这可是暗探局能够办得到的。

真是难以置信。

如果有人不顾法律的规定允许这位中校进来见死刑犯呢？如果有许多有影响的人物对此感兴趣呢？难道这是第一次吗？暗探局不是不止一次地安排过越狱吗？彼得罗夫，所罗门·雷斯，还有其他许多人。

对。

一个外面来的人，还有宪兵的军衔，他在一个被禁锢的死囚面前有着无限的优势、有着尚待查验的使人起死回生的机会。

然而，那生的机会在期待中颤抖着，在计谋中颤抖着！

要知道，不需要太多的补充，需要的只是强调。因为法庭上说的还不够有说服力，要表明充分的理由使得人们完全相信。应当强调的是，在革命者以死相威胁的情况下，你们才干出了恐怖的勾当，而且要说出细节。

还要签字。

这场谈话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而且是永远都不会知道的，因为当事人早已去世。不过，留下了一个形式上的笔录。

从笔录上看，不久前态度还很傲慢的死囚很情愿地回答了突然的审讯中所提出的问题，帮助寻找适当的措辞，并且签了字。

审讯是以会见的形式开始的，仿佛时间机器把这次会见从战后动荡的 1946 年一下子抛到了 1911 年，只不过是把一个人的照片拿给他看：认识这个人吗？

等待处决的死囚与其为死后的岁月忧伤，还不如帮助这位宪兵中校搞清楚这张照片。这名死囚好像就等着这张照片似的，便从容不迫地讲了起来。

是的，是的，今年 3 月份正是这个无政府主义分子从卢基扬诺夫监狱出来后找过我，说那里对我十分恼火，一年前监狱收到一封再次指控我的信。现在派他来问些问题。

只不过是一张照片而已，但却引出了一段叙述，有什么办法呢？不想在法庭上那样，这时有充分的时间记录下来。

5 月份又有 2 名无政府主义分子从巴黎来了，他们组成了“革命委员会”，要走遍整个俄国到那些中断了革命工作的地方去弄清失败原因，聚积力量和武

器，还要收取博格罗夫的520卢布欠款。虽然他说自己没有花这笔钱，但还是从父母那里拿来钱还上了。可是，7月末，在克列缅丘格附近的别墅里，他还是收到了一封巴黎寄来的挂号信，信里有些带有敌意的审査性的问题。

抛开胜利的荣耀，抛开已经得到的东西，从高处一个跟头栽下来，不感到惋惜吗？不是作为蒙特卡罗养尊处优的人，而是作为警察署的一名小卒载入史册，不感到惋惜吗？又要计算花掉的和缴纳的党费，去回忆那些细琐的告密，去解释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建立的功绩：为了自己不被当成叛徒而遭杀害，为了赎罪而去杀害某个人吗？很明显，笔录不能永远保密，只需在传播中稍有改变，一两天就会在报纸上登出来。要选择连自己都认为比死更糟的解释吗？

然而，面对死亡比面对耻辱更为可怕。

看着别人死总是更轻松些，而自己的死则总是沉痛的。

如果能够活下来，哎哟哟，我会再次翻供的！

是的，8月16日又有个熟悉的无政府主义分子途经巴黎来到了博格罗夫在基辅的家中。他是“海燕”小组成员，他仔细地、不慌不忙地做着长长的笔录。与从前一样，脑袋里找得出现实的细节。这样一来，博格罗夫的叛国罪就板上钉钉了。现在已经决定要把事实真相告知博格罗夫曾到过的每个地方，由律师向全社会公布将他处以死刑，紧接着就会出现复仇者的暗杀活动。但“海燕”小组决定：在9月5日之前以恐怖行动为自己恢复名誉，最好是暗杀库里亚布科。

杀死库利亚布科，于是，库利亚布科便声名大噪了。还有一个小问题：“为什么在法庭上您那样袒护库利亚布科呢?”博格罗夫说：“库利亚布科在回答检察官的问题时显得惊慌失措，不知该如何回答。我很可怜他。”

然而，他并不像喜欢亲密的朋友那样地喜欢库利亚布科呀，这并不是一个像样的回答。哦，就算是这样好啦。

这时，偶然在基辅的庆典上遇到了斯托雷平。偶然见过他一次，那是在彼得堡的自来水站，公众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身上，于是就决定了。假若此前在过道上遇到了别的什么人，他也会开枪的。这就是恐怖分子自由活动的机会！

我的这次恐怖活动几乎是在失去了知觉的状态下干的。这一行动差不多是没有准备的，是一种拼命的举动。库尔洛夫需要的就是这个。这是一位故弄玄虚的高手，一位制造各种可能解释的能手，瞧，他又编出了一套说法，而且与日期、动机、行为完全一致。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方面都一致，在那些主要的解释中，不也并非完全一致吗?!

如果事情确实如此，假如是无政府主义分子杀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吹嘘一番呢？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还可能有一种解释，即自由而傲慢的决定已经做出，胁迫促使其完成了。这种说法更好些。

不过，这并不是订货人所要求的。

用别出心裁的迂回曲折的办法爬到杆子的顶端，使得公众陶醉，可是如果突然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滑落下来可怎么办?

哎呀！真不想死呀！

开上一枪，而自己则转过笨拙的俄国人的身躯，难道还会喷上香水重新走进蒙特卡罗金碧辉煌的大厅吗?

第二天是个礼拜天，给死刑犯派来个拉比。博格罗夫对他说：

“请转告犹太人同胞，我不想使他们遭难。相反，我是为了犹太人的福祉而奋斗的。”

这是唯一的未更改的一条供词。

拉比指责他说，会因他而引发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博格罗夫回答说：

“一个伟大的民族不能像奴隶一样在压迫者面前卑躬屈膝!”

这句话也被广泛地刊登在了俄国的报纸上。

博格罗夫的死期在一小时一小时地临近，再没有人来看他了，也没有打开牢门让他逃命……

伊万诺夫欺骗了他?!

礼拜天的傍晚，伊万诺夫对要塞附近秃山前的空旷地带进行了搜查，并且

用步兵、哥萨克和警察封锁了起来。除了法定的委员会成员外还有20余人被允许到场，他们是“俄国人民同盟”的人。他们对博格罗夫是否真的被处以绞刑持怀疑态度。上囚车的时候，博格罗夫仍穿着那身现在已经显得十分可笑的燕尾服，在电筒的光照下，有人认出来了：“是他！是他！”“在剧院里我还狠狠地揍了他！”

这不像是在演戏。

车子走了4俄里，博格罗夫抱怨说这使他激动不安。

在刑场上，法庭书记在火把照耀下大声地宣读了判决书（仍旧是那个说是有犯罪预谋的）。

有人问博格罗夫：“你是否想对拉比说些什么。”“是的，我想继续单独跟拉比谈谈。”“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就动手吧。”

伊万诺夫骗了他。

博格罗夫请求在场的人转达他对父母的最后一次问候。

接着是一片寂静和迷乱，什么也辨别不清。

刽子手是卢基扬诺夫卡的一个苦役犯，他在背后给博格罗夫松开了双手。然后把博格罗夫带上绞刑架，给他穿上了白布尸衣。

博格罗夫穿着尸衣问道：

“要把头抬高些吗？”

刽子手踢翻了凳子。

博格罗夫乱蹬了一会儿，按规定尸身应吊足15分钟。在一片沉寂中，火把燃烧着，噼噼啪啪发出声响。

盟员有人说：“大概，他不会再开枪了。”

他已经不需要开枪了。

盟员们各拿了一段绳子留作纪念。

基辅的许多犹太大学生为悼念博格罗夫戴上了黑纱。

正确的供词使得这一切结束得何等得好，统共只不过是一个受压挤的人痛苦地挣扎了一阵而已。在警察中，没有给任何一个将军留下污点，也没坏了任

何一个高官显贵的名声。

既没有对这个国家发出骄傲的呼吁，也没有损害最高王权的一根毫毛。

这王权是如此的喜欢抚平无关紧要的事件，喜欢抚平一切后果，喜欢见到无足轻重的结局。

第七十二章

9月1日，阿莉克斯不舒服，阿列克谢也病了。她在行宫里待了一整天，晚上也没去看剧。白天，沙皇在跑马场满意地观看了他喜欢看的童子军操练——有4个分别由中学生、实科中学学生、市高等技工学校学生、孤儿院和救济院童子军组成的团队。他对所有的人表示感谢，稍事休息，他还要去出席一位总督举行的一个长时间的午宴。休息片刻之后，他又要带着两位大公主去歌剧院观看隆重的民间演出。

在第二次幕间休息时，沙皇走出包厢到包厢入口处的小客厅去吸烟。奥莉娅和塔尼娅喝着冷饮，有官员进来了解对演出的印象、希望和吩咐。

这时大厅里传来两声枪响。他们都跑进了包厢里，隔着覆盖着天鹅绒的栏杆，从上面张望，离得很近，就在自己的下面，斯托雷平站着靠在乐池的边上。

只见斯托雷平慢慢地朝这边转过头来，看到了沙皇，他举起一只手，不知为什么举起的是左手，向着这位君王祝福。

沙皇在包厢里看到斯托雷平面色惨白，白色制服上有一个大大的血点。随后他向坐席跨了一步，开始解制服的纽扣。雷思教授和白发苍苍的弗列德里克斯男爵俯下身去帮助他。

大厅的出口附近传来一片喧闹声。那是抓住了杀人犯，人们在打他、骂他，整个大厅的人一片惊恐。很快，勇猛的斯波里多维奇手持马刀挤到了第一排前，像个哨兵似的，神情紧张地站在了沙皇包厢的下面。

好家伙！这个保镖布置得太好了！可是，这些恶棍、坏蛋让你防不胜防。

倒霉的斯托雷平，这样喜庆的日子，却罩上了一层阴影。

这件令人悲伤的事件延长了幕间休息，观众中的医生都聚集到了斯托雷平的周围，人们架着双臂把他慢慢地扶走了。举行庆典的剧院大厅里重又挤满了人，因为沙皇在场，没有显出十分喧闹。除了第一排挨着过道那个斯托雷平曾坐过的座位空着外，剧场里又是座无虚席了。剽悍的斯波里多维奇马刀入鞘，重新坐到了自己第三排的那个座位上。

观众们强烈要求奏国歌，以此作为对暴徒开枪杀人的回答。身穿帽上缀着红缨制服的皇家歌剧团走上舞台，跪在台上唱起了“上帝保佑沙皇”。观众们起立，沙皇和公主们站在包厢的栏杆边，以便大家都能够看得到。

这首歌又重唱了两遍。

后来，继续演出到第三幕，沙皇带着两位公主离开了。既然要求加强防卫，那么保镖们便提高了警惕，忠心耿耿的库尔洛夫将军十分卖力。

沙皇回到行宫，心情十分沉重，他明白这是个悲惨的事件。

可怜的斯托雷平。

他很吃惊，很懊丧，自己没有太大的悲伤和痛苦。他在寻找着原因。

这一切都是因为斯托雷平任现职的时间太长了，他为什么不早一些辞职呢？要知道，此事早已酝酿成熟了，他自己也明白。为什么要等着被解职呢？

假如他早提个辞呈，那么现在也就完好无损了。

现在要任命科科夫佐夫代理他的职务，在斯托雷平不在的时候他曾不止一次代理过他的职务。

在行宫里，阿莉克斯还全然不知这一暗杀事件。她躺着，头痛得很厉害，背部神经也很痛，王子也在她房中，躺在床上。然而，感谢上帝，在沙皇去剧院期间，他们母子的疼痛都没有加重。

尼古拉讲述着发生的事情，用表情丰富的声音加以强调。这时，塔尼娅和奥莉娅泪流满面地闯进来给母亲讲述了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然而，阿莉克斯很平静。尼古拉已经不再为自己的冷漠而自责了，又恢复了某种平衡。

两个女儿走了。他坐到了阿莉克斯身边。她忍着疼痛，皱着眉头，沉思地说道：

“你知道……或许这还不是最糟的结果呢，但愿上帝使他康复，不论如何都必须让他离职。报纸上、客厅中对他的那些议论、闲话让人不痛快，母后也反对。”

事实上这是对的，不过这里还有某种不道德的东西。

“这是我的过错，”一筹莫展的尼古拉说道，“下不了决心，假若及时让斯托雷平离职，他也就不会伤着了。”

阿莉克斯两眼闪着光，深表理解地看着他。不过，却十分惋惜地说：

“我的丈夫总是有点下不了狠心。其实，君王的强硬便是臣民的福分，要利用强硬的手段，仁慈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尼古拉垂头丧气地坐着，臂肘支在膝盖上，面对着手中的茶杯说：

“他自己没提辞呈，没想到竟……”

从春天起，尼古拉就像盼解放一样盼着这份辞呈。3 月份他向母亲让了步！杜马的辩论从来也没有像 3 月份辩论西部地方自治那样令人恼火。特别是马克拉科夫的发言：斯托雷平在不可靠的事情中耍的把戏使沙皇看到自己被嘲弄了。

“他规定了如此苛刻的条件，如此蛮横地绕过了国家委员会。”

“尼基，他从来都是我们的人。巩固了讨人厌的杜马的实力。抱住那个倒霉的《诏书》不放。大家就这个问题已经对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在艰难的时刻他还是帮了忙。”

“可又不像敦巴泽那样坚决。”

但是，那艰难的时刻已经永远不会重演了，忠于沙皇的军队再也不会那样动摇了、人民不会再次受宣传鼓动的迷惑了。300 年的王朝度过了危机，现在或许会延续上 3000 年呢。

“是的，他无论如何不想收回《诏书》，不想削弱它。尽管它遭到右翼的指责。”

“他从来没有对‘我们的朋友’表示过尊敬！对他甚至有些残酷。”

"是啊，他并没使生活变得轻松，是个令人厌倦的人。"尼古拉表示同意。

啊，多么令人厌倦啊！为什么一个专制的君主该受这样的压抑呢？

卧室内一片寂静，听不到行宫的动静，也听不到城里的动静。

阿莉克斯说道：

"他很愿意占据你的位置。"

"哦，怎么？这可不像话。"尼古拉不同意这种看法，不仅是由于这个荒唐的想法不可能，而且他们谈话的基调也导致了他不同意这看法。

"唔，我想说的是：他过于争名夺利，甚至压过你都在所不惜。"

唉，这话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

"让我们祈祷吧！"尼古拉还是不同意这种看法，"让我们祈祷他早日康复。当然，接着就让他退休。"

塔尼娅这一夜哭了好长时间，姐妹俩都没睡好。

第二天早晨，有报告说伤者夜里很痛苦，不时地给他注射吗啡。9 月 2 日这一天，无论如何挤不出时间去看他。军事演习后安排了一次大阅兵，又离得很远，离基辅 55 俄里，乘车往返也很费时，并且阅兵本身也要占去很多时间。公主们要去弗拉基米尔大教堂和安德列耶夫教堂祈祷。

阅兵十分成功！伊万诺夫将军和阿列克谢也夫将军为他展现了一个巨大的方队。空中飞着 6 架飞机；有 4 个军在沙皇的身边走过，好像永远也走不完似的；有步兵，炮兵，龙骑兵，枪骑兵，骠骑兵；哥萨克有顿河的，有捷列克的，有奥伦堡的；骑兵有的走正步，有的是小跑。接着是马拉炮兵，重挽马、汽车、摩托，全都走得笔直。最后，是浮空部队以分列式走过，走到沙皇面前时，队伍中把一个载有 2 名军官的气球升到了空中。部队共有 9 万人，沙皇向每一支部队都致了谢。

这次阅兵圆满地结束了尼古拉在基辅逗留的美妙时光，这也是尼古拉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在这个俄国的中心地带，在俄国接受洗礼的这个地方，竟能受到这样热情的接待！竟能亲眼看到人民对自己如此无法遏止的爱戴！

阅兵回来已经很晚了，还没有接见军官们，晚上行宫里还要宴请各部队的

首领。明天一大早就要赶往奥夫卢奇，那里修复了12世纪的古老的圣瓦西里大教堂，在等着举行以水祝圣的仪式。

这次旅行又是奇妙无比的，先乘火车到达科罗斯坚，从那里差不多是在早上8点钟就改乘汽车直达奥夫卢奇。早晨天空阴霾无雨，必能放晴。到达科罗斯坚时，农民们用盐和面包隆重地欢迎他。一路上农民们为欢迎他用鲜花和圣像搭起了拱形门，看到人们举着圣像游行。

原来，整个奥夫卢奇的人一夜都没睡觉。乡下来了36支举着圣像的队伍，有3万农民，在城外队伍排了3俄里长。广场上，地方军布置了仪仗队和城里学校的童子军。奏起了国歌，沙皇在仪仗队和童子军前面走过。在大教堂前，他受到了贵族、地方自治局和城市代表团的欢迎。他们都捧着面包和盐欢迎他，还有以大主教为首的宗教界人士，主要的圣物是圣瓦西里的像和圣尸，以水为教堂祝圣的弥撒开始了。此后，沙皇到内室接见了大主教。

晚上才回到基辅。从火车站回行宫的路上，沙皇去了一趟医院，接见了闻讯赶来的斯托雷平夫人，但斯托雷平情况不好，医生劝沙皇不要去看。

沙皇松了一口气，此时此刻他不想跟斯托雷平谈话。

行宫里收到了一大堆深表同情的电报，有英国国王的、塞尔维亚国王的，有法国总统的，有土耳其苏丹的，有奥地利首相的，还有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国家政府的。所有的人都对沙皇的巨大悲痛深表同情，同时对暴行表示愤慨。

这些源源不断的电报无形中夸大了遇刺大臣的作用。尼古拉想起了威廉和爱德华总是热情地打听斯托雷平的情况。他们没有体验过与这位固执任性的大臣合作的痛苦。他对自己所有的想法都十分自信而固执，使君王感到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这些年来报纸上对斯托雷平不利的详细报道也提高了调门，报道他眼下在干什么，打算做什么，仿佛他就是国家生活的中心。

4月9日，礼拜日，沙皇在总督的家庭教堂做完祈祷后参观了基辅第一中学。该校在庆祝百年校庆，它恰恰是在拿破仑战争之前成立的。庆典很是隆重庄严，参加者除了本校师生之外，还有许多来宾，他们在学校的教堂里做了祈祷。礼堂中挂着沙皇的肖像和花体组合字，舞台上合唱团在唱《赞歌》。沙皇向

大家鞠躬致意，观看了陈列的圣物。卡索宣读了关于赐予学校“皇家”封号的沙皇命令，人们高呼“万岁!”礼堂里响起了《上帝保佑沙皇》的歌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沙皇在学校的烫金留言簿里题了辞，对靠近身边的学生们说了几句话，看了几间教室。凑巧得很，原来那个刺客博格罗夫就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

除此之外，沙皇还去出席了圣奥尔加纪念碑的揭幕仪式，这座纪念碑是沙皇送给基辅的礼物。这一天他还参观了战争史博物馆和手工业品博物馆，讲解得十分有趣。后来，还在行宫里接见了基辅大学的教授们。

晚上沙皇还要乘船离开装饰着彩灯的基辅山到切尔尼戈夫去。这是他早就想进行的一次河中航行，沿杰斯纳河逆流而上，小游艇走得很慢，虽然航道还预先特别进行了准备，但是有时还是要搁浅。杰斯纳河道高低不平，沿河航行很困难。沙皇全家人都来到了甲板上，看船如何排除搁浅。河的两岸上是一派原始的洪荒景象，但有时却又是何等地令人赏心悦目啊!

路上占去了所有的时间，伴着钟声到达切尔尼戈夫时已经是9月5日下午了。在皇家专用的码头上，有一支仪仗队奏起国歌迎接陛下。沙皇庄重地在仪仗队前走过。接着，受到了手持花束的孩子和宫廷随员们的欢迎。他们是乘火车到达的，其中有弗雷德里克斯，宫廷卫队长，行辕办公厅主任，海军上将尼洛夫，还有一些军人，其中有最受宠的将军苏霍姆林诺夫和伊万诺夫，有兴高采烈的库尔洛夫，主教公会的正教院总监，本省省长尼古拉·马克拉科夫，就是那位苛毒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兄长，但这位却是既忠诚又讨人喜欢。真令人难以置信，他俩竟然是一家人。

这位省长安排了一套盛大的、令人难以忘怀的节目，虽然总共只有几个小时。市长、市民和犹太人都用面包和盐表达欢迎之情。坐敞篷车前往主教所在的大教堂，路两边有居民夹道欢迎。整个市中心沉浸在一片旗帜、翠绿和鲜花的海洋中，居民的阳台上挂着壁毯和小俄罗斯的民间织物，在许多地方都摆放着沙皇陛下的半身像、肖像和花字纹章。当时的天气又非常好，这里的秋天与北方的夏季相仿。大教堂真令人惊奇！吻了圣物，吻了圣费奥多西的棺材。接

着，在广场上检阅了一个步兵团和2000名童子军。然后参加了贵族的聚会，在那里进早餐，还参观了博物馆。又依次在两个农民代表团的面前走过，这是切尔尼戈夫省的村长和被推选出的3000多名代表。像两年前到波尔塔瓦省时那样，那些坦率、体面的、蓄着大胡子的人，十分自然地站在面前。看着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强烈而明快的感觉，任何东西都不能同恢复力量时的那种感受相比。晚上还要乘船去基辅，人群在岸上随着船尾跑，唱着国歌，喊着“万岁!”。

是的，这时传来了斯托雷平健康情况恶化的消息。第二天早晨，在基辅码头上等候的科科夫佐夫，在响过礼炮后，把斯托雷平昨晚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他。到底还是没有救活！啊，真可怜，如此年轻就抛下孤儿寡母走了。真为他们惋惜！应当给孀妇一定的抚恤金。

时间非常紧，几小时后去塞瓦斯托波尔的列车就要开车。沙皇去了医院，参加追悼。阿莉克斯根本没有时间，沙皇一家要赶到行宫聚会。

斯托雷平的遗体停放在桌子上，盖着白布。可怜的孀妇呆若木鸡，欲哭无声。她说：“陛下，您看，苏萨宁在俄国还没有绝迹。”

当然，出于怜悯，沙皇没有反驳她。这话出自孀妇之口是可以原谅的，但跟苏萨宁相比是过于牵强了。那时为沙皇而牺牲的，这时是为政府，更何况还是为一个并不是一贯平稳的政府。

行宫里又收到了各国首脑的电报，是对内阁总理大臣的逝世表示哀悼的。

不过，有某种东西在妨碍尼古拉过于悲痛，直到现在还留有春天那种压抑感的影子，那是对自己意愿的强制。他当时是如何含着眼泪离开母亲的啊！即使现在他回忆起来都不会毫无痛苦，而那个人却是亲眼见到的。

基辅的大街上一直秩序井然，真不记得还有哪个地方是这个样子。在市中心的亚历山大大街上，在比比科夫林阴大道上，中学生们在夹道欢呼。基辅人，这些南方人可不像呆板的彼得堡人那样，他们的热情欢送使阿莉克斯流出了眼泪，尼古拉也被深深地感动了。

许多文武官员和他们的太太来到火车站为他们送行。在御用候车室里，他们从送行者的面前走过。在那里，沙皇对科科夫佐夫宣布说，他已经不再是代

总理大臣，而是总理大臣了。政府中再没有合适的人选了，克里沃舍因太生斯托雷平气了，而科科夫佐夫与死者形成一种平稳的反差，同他在一起能感到呼吸的通畅。他领导的是内阁，而不是帝国。那么，内务大臣一职由谁来继任呢？沙皇不太有把握地建议由下诺夫哥罗德省省长小赫沃斯托夫担任，可是没想到科科夫佐夫却拒绝了。那好，暂时不变，还让库尔洛夫代理，等您到克里米亚时再讨论吧。

对基辅的访问是成功的，现在又面临着一大快事，那就是出巡克里米亚。还记得吗，克里米亚已经完全归我们了！另外，这可是去他们还不曾见到过的新建成的行宫啊！

列车开动了。这时，尼古拉在参加过庆典之后才算是能够完全休息了。再也用不着去管那些接见、代表团、欢迎、鲜花和欢呼，那该是多么的令人愉快，一个人单独休息远比那一切都要好。再没有什么比乘车平稳地旅行更能令人内心平静的了。在俄日战争期间尼古拉经常出行，他懂得这一点。在那些闹革命的年代，他不得不屈辱地在家中闲待着。对一个沙皇来说，那是地地道道的软禁，不能骑马也不能出宫一步。他为自己的祖国感到耻辱，感到气愤！在经过这一切之后，看到车窗外疾闪而过的祖国大自然，倍感分外珍贵。长途往返于彼得堡与克里米亚之间，永远是一种享受。

更何况克里米亚本身……

9月7日下午一时，列车抵达塞瓦斯托波尔，他们立即就来到了南部湾。天气异常温暖。在这样的一天里，乘一艘手桨划的小船重登心爱的小艇该是何等惬意！来到舱室，一切都保持着原样，在床上躺下，想想心事儿，再起身踱到甲板上去，有一种完全回到了家的感觉。整个内心都复原了，在动乱的年代，“旗舰”便是全部的自由，他曾是那样地热爱它，那样地思念它。

然而，必须马上到黑海舰队去，去观看装甲舰和其他一些军舰。军舰闪闪发光的亮漆船身和海军士兵雄赳赳的面孔令尼古拉感到欣喜若狂。这与不久前闹革命时的肮脏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感谢上帝，一切都平息了。

晚上，无论城市还是舰只都被彩灯装饰得通明。沙皇陛下的花字纹章灯箱

熠熠闪光，烟花礼炮直升云霄。停泊场与城市比试着灯光效果，舰身被探照灯照着。

可是，不论心里怎样急，停泊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御旗舰”还是不得不待上一个星期左右。阻滞在“御旗舰”上的原因是，建造利瓦季宫的建筑师恳求过几日再交工，以便把一切都准备妥帖。满足他的愿望也是值得的，这样，第一个印象就会是完美的、无缺憾的。再者，阿莉克斯在已经待惯了的游艇上休息，会比在新行宫还没有完全布置好的房间里更好些。

在塞瓦斯托波尔期间，沙皇于9月10日，星期六，视察了北部的卫戍部队，后来在星期一又视察了一次。接着，大雨过后，又在星期二视察了星期一未曾视察过的部队。礼拜天，为故去的各代沙皇祈祷。再为斯托雷平举行过追悼会之后，接见了曾参加过塞瓦斯托波尔战役的老战士们。然后检阅了中学生仪仗队。童子军们还来到御舰上参观，表演了枪法和索科尔体操。最后，以划船比赛结束了这次活动。

这些天来，尼古拉休息得很好，睡得很多，真可谓沉沉大睡，开着舷窗，睡在海上的空气中，睡在海涛的喧闹声中。他还给母后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谈到了从别尔哥罗德到塞瓦斯托波尔的整个旅行过程。从春天起，全家人就盼望着这次旅行了，信中讲了旅行中所感受到的苦辣酸甜各种印象，按照顺序详细地讲述了所发生的事件，讲了军事演习、检阅和接见，讲了斯托雷平的被刺，也没有忘记写上每天的天气，在信中他还讲了母亲所不知道的宫廷仪式和婚礼的情况。

看来这些天没什么事，只是需要确定由谁来接替内务大臣。宫廷卫队长杰久林每天都来推荐任命库尔洛夫。的确，库尔洛夫配得上担当这个职务，他是优秀的警察事务专家。这几年沙皇出行得如此安全不是全靠了他吗？他一再说，宁可让自己去死，也不能使沙皇遭到不幸！他能预见到，能预先知道一切危险。从整个的服务态度来看还是应当任命库尔洛夫。然而不幸的是，基辅发生的这件事给他留下了阴影，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没有预先料到。因此，尽管宫廷卫队长一再坚持，沙皇仍没下决心。阿莉克斯想任命赫沃斯托夫，他是个快乐的、

有天赋的人，主张偏右，跟格里戈里很要好。科科夫佐夫在信中一再推荐马卡罗夫，他过去曾是斯托雷平的助手，阿莉克斯却不喜欢他。

不管在塞瓦斯托波尔逗留的日子多么好，最美妙的还是他们将迁入利瓦季宫。御前大臣中这几天有到过利瓦季的，带回来的消息最为诱人。外观金碧辉煌，内部也会极为舒适！

跟自己亲爱的家人们一起迁入可爱的新家，这可算是人生的一大快事。

为了不至于破坏利瓦季的平静，沙皇不止一次搁置了在克里米亚南海岸修筑铁路的方案，不能容许钢铁和烟雾闯入这个亘古未曾开发过的保护区。

每次走近这里，从船上看去，那些悬崖、那群山、那蓝天下的一派洪荒，极富吸引力。枝繁叶茂的青翠树木与怪石嶙峋的深深的蓝色海湾交相辉映。

雅尔塔为迎接王室的到来加紧进行了准备，为了停靠“御旗舰”还搭设了特殊的跳板，在防波堤上重修了御用凉亭，地方政要和欢快的百姓热情迎接，在通往利瓦季大道的桥上装饰着拱门。

公路顺坡而上，心在怦怦地跳：现在又将见到什么呢？对这位有才华的建筑师寄以厚望，他已经为尼古拉建过一座出色的宫殿了。然而，当这座精美的、赏心悦目的白色意大利风格的建筑物突兀地出现在皇室人员的面前时，他们全都惊叫了起来。他们走出汽车，开始绕着宫殿走了一圈，接着才满意地走了进去。阿莉克斯还没等看完一半，就忍不住了，说道：

“从童年起我就幻想着有这样一座宫殿了！”

一点都不假，那墙看了就让你喜欢。那一个个的台阶犹如在呼唤着你走上走下。二楼角上阿莉克斯的书房，非常明亮，十分迷人，还有一个对着雅尔塔的阳台！沙皇本人的大书房更是妙不可言，所有的卧室都很明亮、亲切、可爱，有一个共用的阳台。阿列克谢的游戏室设在角落处，院子是摩尔式的，紧挨着餐厅。

“今后我们每年春天都来这里！”

“有时秋天也来吗？”

如果有较重要的事情回奏陛下，那么大臣们也可以来，他们会高兴来的。

冬天在皇村，夏天在彼得戈夫，而在这里度过春天和秋天。3月初的彼得堡到处都是泥泞，雾濛濛的，随时都有风雪，而这里却长着紫藤，到处是“金雨”合欢、意大利银莲花、郁金香、鸢尾花！

现在，要熟悉这些新房间和其中的陈设就要用上几天的时间。

奥尔加快过16岁的生日了，会在这里举行舞会吗?!

多么美妙的休闲，多么令人神往的生活啊。与家人在亲密友爱的气氛中散步、进餐、喝茶，互相朗诵诗文，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啊。有时还与亲密的朋友们举办友好的聚会，如果自己的肩上没有义务的重担，就可以这样度过一生了。

阿莉克斯神奇的双眸闪着傲慢的光：

“这一切要让我们的朋友看看！我想让我们的朋友看看这座新宫殿并为它祝福！因为，现在我们不是要在这里住很久吗？这里的12月真是奇妙异常！为什么不请他来这里参加你的命名日呢？也好再让他给我们讲讲巴勒斯坦的故事。”

今年春天格里戈里到巴勒斯坦去了一趟，地位和职责不允许沙皇和皇后随便到那里去。可是，阿莉克斯却很想去。

地点好像也没有变，旁边就是父王的那座略显阴暗又有点潮湿的木结构宫殿，可是这座白色的、欣欣向荣的、稍稍靠近大海和悬崖的宫殿，却使得这里的一切都改观了！奇妙的整块白色大理石制成的椅子配着同样是整块大理石制成的桌子，可以坐在那里对着大海凝望。亲爱的黑海啊！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你更美好的吗？坐在夹竹桃的树荫下，从这里可以一连几个小时望着那汹涌澎湃的海浪。远处是轮船、帆船，从这里望过去，沧海茫茫，海天一色。

一个敏感的人不能不对我们所体验到的大自然的脚步无动于衷，特别是每当远离人群而只身独处之时，这种对大自然的感受则尤为强烈。有什么能比得上海边利瓦季和俄瑞阿得斯高耸入云的山峰更壮观呢？从此处放眼望去，那广阔无垠、细浪滚滚的海面令人神往，它不时地变换着颜色，忽而蔚蓝，忽而翠绿，忽而淡紫。或者，与什么人悄声谈着话，沿着山中直通俄瑞阿得斯山的小径信步走去；既不用攀上也不用滑下，小径不宽不窄正好容得下两人并肩而行；远离彼得堡的一切不快，不再去理会那些死乞白赖的强求，不听那些细琐的闲

言碎语；避开那些令人头痛的国家问题。不要去为那些难题费力操心，因为在那些问题面前，任何一颗正常的心都会操碎，任何智慧都无济于事。获救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在几周或几个月之内推开它，不再去想它，仿佛它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似的，而置身于这天堂般的角落，呼吸这木兰的香气，眯起眼睛透过树枝间的缝隙眺望远方。

在任何地方你都不会有这种独自置身于天堂的感觉。

然而，无论你如何努力地去忘记，都不能感到彻底的轻松。从极舒适的克里米亚的山中，俄国的皇袍向着北方和东方伸展开去，这皇袍蛮横地紧裹着双肩，令人时刻不能忘记。

没过几天，刚刚接任的科科夫佐夫就来了，也就是说，他遇到了很多难题。

其中十分令人不快的问题是，他们开始了对暗杀事件的调查，并且牵涉到了库尔洛夫和斯波里多维奇。不仅是办事不力，而且甚至牵涉到了间接参与的问题。

这太可怕了。

这样一来，库尔洛夫不是就不能接任空缺的内务大臣的职位了吗？

这样一来，他本身就等于遭到了残酷的惩罚。

现在该任命谁呢？只好采纳科科夫佐夫的建议任命马卡罗夫了。

那么，暂时就这样吧。

可是，科科夫佐夫认为应当惩罚或审判库尔洛夫等人。

然而，他们并没有违反哪条确切的法律规定啊！

沙皇处在了一筹莫展、进退两难的境地。

好在由于克里米亚令人陶醉的空气，在这9月份的日子里，使得皇太子的病情有了好转。这样一来，早已失去了感激之情的沙皇，在一股温情的冲击之下，也想对别人发发善心。

于是，他对科科夫佐夫表示，为了皇太子的健康他想办一件善事：停止对库尔洛夫、斯波里多维奇、韦里金和库利亚布科一案的调查。

科科夫佐夫说，不能中止调查的自然进程，因为全社会都在关注着这件事。

哦，那样一来就更不能将利剑高高举起了。

其实沙皇的赦免也是为了他自己，因为在剧院、在商贾花园他本人也会遭到暗杀的。

他赦免了。

5年之后换人并不新鲜，而科科夫佐夫却感到清新而舒服。大臣的更替总是令人有焕然一新的感觉，沙皇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我感到高兴的是，您的言行不像故去的斯托雷平。"

科科夫佐夫反驳道：

"陛下，斯托雷平是为您而死的啊。"

哦，可远非如此。

皇后不耐久站，她让科科夫佐夫坐在自己身边，宽厚地与他交谈着，她说：

"我觉得，您对斯托雷平的作为和人格的评价有些过了。请相信我的话，对故去者不应当如此惋惜，我相信，每个人都在完成自己分内的事，如果某个人不在了，那就是因为他已经扮演完了他的角色，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我想，斯托雷平的去世就是为了给您让出位置，而这一切又都是为了俄国的福祉。"

第七十三章

(沙皇的仁慈)

在斯托雷平尚未去世时，科科夫佐夫就任命并组成了暗探局基辅分部调查委员会。司法大臣谢格洛维托夫来到基辅，出乎库利亚布科的意料，他突然查封了基辅分部。博格罗夫还没有被处决，参政员特鲁谢维奇带领的由一些司法及警察官员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来到了基辅，预计将展开毫不留情的调查工作。公众也许无法理解，而在官场上来说很自然，这一切都绕过了特鲁谢维奇，他受到库尔洛夫的排挤，因此两人有仇。不过，库利亚布科也是特鲁谢维奇在任时被任命的。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复杂了。他们没收了暗探们的日记，甚至不厌其烦地对几百名警察进行了审问（其中一部分已经回到了彼得堡），问他们有关沙皇出行的情况。社会舆论认为，暗杀和匆忙地进行秘密审判使事情变得神秘莫测了，大家都在等着特鲁谢维奇做出耸人听闻的解释。“国家杜马”（正好是在斯托雷平死后第四十天举行的，但没有为他而是为另一位闭会期间去世的杜马议员进行了默哀。只是后来，罗江科才提到了斯托雷平）的新任内务大臣马卡罗夫许诺说政府不会掩盖任何东西，一切都将大白于天下。

然而，整个这项揭露真相的工作却搁浅了。几个月过去了，不但没有真相大白，没有正式公布任何东西，而且，当报纸上间或披露出一些似乎是库尔洛夫的真实情况时，就有人威胁要追究编辑的法律责任，如果材料是真的的话。有消息说库利亚布科被软禁在家中，不过并无此事。

调查工作完全是秘密进行的。库利亚布科尽可能地阻止调查，尽可能地扯

谎，并且改变供词。第一次审讯他就矢口否认放博格罗夫进入商贾花园，可是，至少4个人都知道博格罗夫进到了剧院里（正如博格罗夫在第一夜审讯的口供中承认的那样）。韦里金因为经验不足而动摇了，他觉得好像库利亚布科把这事报告给了库尔洛夫将军。但库尔洛夫说，他一概不知，他同时肯定斯波里多维奇和韦里金也不知道。被搞得晕头转向的库利亚布科提醒说，他二人都认识博格罗夫，并且在剧院里见到过他，不可能认不出来，因此斯波里多维奇才会拔出马刀对着博格罗夫。斯波里多维奇坚持认为有什么东西故意瞒着他，而库尔洛夫则说，他既不认识博格罗夫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对此人一无所知。

不管特鲁谢维奇如何想调查，但他的调查委员会被最高当局的麻木所控制，于是只好写上："斯波里多维奇上校对参政员进行了解释。"仅此而已。在调查期间，斯波里多维奇仍旧担任着宫廷卫队长的职务。

特鲁谢维奇只能在经费方面进行一些随意的调查，他得出的结论是，库利亚布科在秘密侦察方面用去了大笔经费，但是经费的来源不明。库尔洛夫不受监督地掌管着15万卢布，用其中的一部分偿还了私人债务，而韦里金有5万卢布尚未报销。

然而，库尔洛夫对全部款项都提供了报销人的签字凭据，并且证明，他没有用来支付债款，因为自身仍有债务，从而证明了自己的忠实。一般说来，牵涉私人经济问题，参政员特鲁谢维奇则无权过问。

对于调查委员会所有这些解释，在库尔洛夫看来，是既复杂又使人感到不快。然而，这还算不了什么。在斯托雷平还没有死去的时候，他曾接到过3次电话，要他去见见病人，3次他都成功地回绝了。如果去了他就免不了要当着证人的面回答另一些问题，那样的话，他现在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库尔洛夫是个久居官场的人，律师的清晰头脑使得他能够提供无可驳斥的自卫证据，因此在与调查委员会周旋了两个多月之后，他成了大臣的朋友。如果不是狡猾、下流的马卡罗夫下了3个绊儿，他还会坚持下去的。马卡罗夫从克里米亚回来后，传了沙皇的话给库尔洛夫："我感到惊奇，如此忠诚可靠的库尔洛夫至今还没有提交辞呈。"如何能证明这话真实无误呢？你当然不能去问沙

皇：你说没说过这话？于是，库尔洛夫只好提交了辞呈。这是一个很大的疏忽，正是因为这次离职，尽管证明他是无罪的，可现在却领不到法定的全额生活费，也得不到足额的养老金，又不能进参政院。现在他最需要这些，因为他在准备第二次结婚。不久，那位善解人意而友善的基督徒拉斯普京就对库尔洛夫许诺要帮助他洗清一切不公的罪名。

由于库尔洛夫官阶很高，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不是按照司法程序递交参政院，而是要递交军机处。军机处耽搁了几个月也没有做出任何决定。调查结果共有9厚册，但还需要他们4位提供新的证词。这些证词都很长，而库尔洛夫的证词内容又相当广泛。首先，他拒绝了韦里金和斯波里多维奇的所有指控。因为尽管他们控制着整个暗探局的工作，但却没有得到过任何正式的指令。接着，他否定了关于库利亚布科不称职的说法，他只是才能不很突出，俄国宪兵中没有人能够以此为荣。接下来库尔洛夫问道：指责他有罪的具体说法在哪里？唯一的事实是：违反了关于不得用密探做国家要员的保卫工作的通告。但是，第一，他并不知道规定该用什么人；第二，这个通告是警务厅发的，而他是大臣的副手，地位在警务厅之上，没有义务服从该决定。说什么没有利用博格罗夫的厨娘与密探萨巴耶夫的关系检查是否存在恐怖分子，这种办法不能列入警察局的工作范围之内，它与道德标准相矛盾。最主要的是，不能让上司与属下同时犯罪。既然库尔洛夫什么都不知道，那么犯罪的只能是库利亚布科一人。如果库尔洛夫知情，那么罪犯就是他，而库利亚布科是无辜的。然而，直到9月1日前库尔洛夫都不知道整个暗杀计划，而9月1日知道得也不详细。并且，在那一天他应当站在街上以确保沙皇出行的安全。作为负责整个保安工作的长官，他本人也不可专门去监视博格罗夫。做这么一大摊子工作，如果不信任自己的下属，那就没有办法领导。库尔洛夫来到剧院甚至也在斯托雷平之后，最近他才了解到，恐怖分子在某林阴路的接头没有进行。这里应指出的是，任何人都没有解除斯托雷平对警察的最高领导权。另一方面，对博格罗夫的说法是否是编造出来的，直到现在我们也不得而知，不能指责剧院内的警力不足，那里有95名安全人员和22名军官。但，一般说来应该承认，即使在最理想的保安措施

条件下，也不足以防止恐怖行为，尤其是个人的。

10年之后在流亡国外时，他写的就更是无可指责了："博格罗夫的供词使我异常不安，于是不顾斯托雷平的怀疑态度，我坚持要从彼得堡调一名军官来担任总理大臣的私人警卫。"也就是说，还要从彼得堡找一个人来作为对这里的100个人的补充。然而，斯托雷平认为，即使不再叫人来，对他采取的保安措施也已经是绰绰有余了。这指的是没有设置警卫人员的前厅和一楼窗外的花园。此后，库尔洛夫做出决定："在剧院里他本人将不离开斯托雷平一步。"可是斯托雷平却要派他去找库利亚布科弄清原因。这便是这些天来库尔洛夫唯一没来得及搞清楚的事情。

库利亚布科现在在回答参政院的审讯时推翻了自己最初的供词，说库尔洛夫知道，并请求将库尔洛夫不知道作为有法律效力的新供词。

然而，军机处的结论还是对那4个人不利。库尔洛夫没有为斯托雷平提供条件，没有在基辅总督不同意的情况下对基辅的保卫工作采取重要措施。相反，却不适当地扩大了库里亚布科保卫工作的职权范围，甚至包括与他的职务不相符的部分。轻率地委托他与博格罗夫共事，对最初的报告没有作任何检查，否则骗局就会立即被识破。库尔洛夫到基辅后，没有对阴谋活动进行起码的检查，无视关于博格罗夫本人来自警务司的预先报告，没有重视博格罗夫情报前后不一的可疑性。门票是斯波里多维奇和韦利金所在的委员会发的，明知博格罗夫政治不可靠却未经搜身检查就把他放进了商贾花园和剧院，使他得以自由地到处走动寻找牺牲品。对于保卫工作者来说本应特别警觉，但这里却没有体现任何警惕性，只是一贯的无所作为。博格罗夫的出没和一切行动都得到了充分的信任。因此得出结论，恐怖活动的准备工作是4人共谋的，其中任何一人都不得免于接受调查。犯罪成立，进行司法调查。立案调查，追究刑事责任。

司法结论就是这样毫不留情，同样残酷无情地降临在手无寸铁的百姓头上。然而，这个案件中的这些当事人是暗中受到保护的，库尔洛夫并不惧怕内阁大臣会议主席的仇视。司法大臣不得不采取两项决定性的宽松措施。既然不存在这4个人与博格罗夫之间的预先密谋，那么他们4人的罪过就不能被认为是政

治性的，而只是职务上的疏忽。再则，既然4个人的行为不是在履行军职而是在履行警察职务时发生的，那么，虽说4个人中的3人有军衔，也不应受到军法处置，而应当受到民法的处置。

只不过是一个御前大臣被杀了，受损的是一个非军职的人。整个阴云还没有聚集起来就飘散了。

现在采取的措施也很明智：1912年1月31日，最高军事当局发布命令，鉴于家庭的原因，将宪兵独立军中校库利亚布科转入步兵后备役。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1912年春季终于成立了参政员舒尔金的调查组。6月份他着手调查，8月份来到了基辅，这样的拖延有助于平复公众的激愤。在漫长的几个月当中，公众一直确信司法工作在进行，会有结果。在出结果时激愤的情绪会平和下来。既然在9天之内除掉博格罗夫有利，那么弄清这4个人的事自然就要拖上15个月了。

然而，事情远不是一帆风顺的。库尔洛夫现在是无官一身轻，他重新开始撰写一篇内容空泛的长文。文章中他以一个官场登山运动员般的敏锐眼光注视着脚踏和手攀的每一个凸起和凹陷，以便使他在逃命的攀登中不致受到阻碍。整个供词的基调仍与9月1日夜里的相同，然后渐渐发展，精细入微，既有增加扩展，又有补充。

一般说来，他不会被指控职务上的不作为，因为没有地方警察局的直接指令，他只是根据报告发出领导指示。再则，所有主要的保卫措施都是经侍从将官特列波夫同意后采取的。此外，博格罗夫从来也没有受到过政治方面的调查，他无论如何不能被认为是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没有理由怀疑博格罗夫提供的情报。监视博格罗夫吗？这当然是应该的。但库尔洛夫认为，一个有经验的暗探分局局长无论如何不能忽略采取这种基本措施。博格罗夫的犯罪事实本身并不复杂，每个情报、每项指示都曾详细地对御前大臣斯托雷平做过报告。库尔洛夫现在想起来了，博格罗夫好像接到过要他留心商贾花园中的大臣们的命令。但是，库尔洛夫确实不知道博格罗夫被放进了商贾花园。派奸细直接进入博格罗夫的家宅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样做会惊动到他家来的恐怖分子小组。演出开

始前和第一次幕间休息时，库尔洛夫在忙于向斯托雷平详细解释库利亚布科都对他说了些什么，并且企图得到库利亚布科的情报，但他没有来得及讲实质性的东西，后来库尔洛夫对御前大臣报告了自己不完全掌握的情报。在整个第一幕和整个第二幕期间，库尔洛夫都在与宫廷卫队长研究应采取的措施。枪声突然响起，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库尔洛夫无论如何想不到博格罗夫会在剧场里。库尔洛夫曾预先提醒库里亚布科，说博格罗夫应当寸步不离地站在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那里。完全可能，博格罗夫在一个小时前还不知道他将进行暗杀活动，这一要求使得他惊慌失措，因而屈从了别人的意志。这里，应当寻找更深刻的政治原因和我们尚不知晓的隐蔽力量，而不是殃及个别公职人员。博格罗夫与斯托雷平不可能有私仇，因此他不会是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搞暗杀的发起者。库尔洛夫的理解是，在演出进行中库利亚布科曾在剧院大门的某处与人进行过交谈。谈的是手套的事吗？是的，库利亚布科说的是手套的事。不过，搞不清楚的是，说的是关于演剧用的白手套呢，还是普通日常用的手套。散戏后库利亚布科要亲自在博格罗夫的家宅后面进行外部监视的决定，是跟斯波里多维奇谈的吗？看来是的，因为此外再没有任何人跟他交谈过，至少是不记得了。暗杀发生后，库尔洛夫命令库利亚布科写一个关于所发生事件的详细报告，但库利亚布科不知为什么一直在拖延着没执行这一命令，因此库尔洛夫没能搜集到该事件的确切情报。将博格罗夫带到暗探分局去审讯？是的，库尔洛夫支持这个想法，新上任的内阁大臣会议主席、御前大臣科科夫佐夫也同意。总督特列波夫从来没说过不配合任职的库利亚布科，于是同意由后者负责人民卫队的工作。

参政员舒尔金着手收集博格罗夫的审讯记录，他忽然发现法庭不知何故没有任何笔录。于是他只好询问在场的检察官和其他官员，以便了解审讯的进程。

尽管库尔洛夫解释得非常机智，尽管他在警察工作中有威信，侦察的理论与方法也正确，但参政员还是没有手软，照样指责库尔洛夫有罪，指责他职务上不作为，没有采取措施防止暴力；没有下令监视博格罗夫并对其住宅进行检查，没有核查其提供的情报；有两天明知发了票而未予制止，没有下令搜查武

器，没有监视其在剧院中的活动；知道大臣们有危险而没有布置警卫。

对另外的5个参政员亦未发现可以减罪的证据。

1912年8月检察机关做出了关于当事人有罪的结论，然而，司法机关如同一辆慢吞吞的破车，到了1912年的12月，军机处才开会研究库尔洛夫等4人的案子。

研究过该案子的参政员和检察官一致认定罪名成立。博格罗夫同样可能对沙皇包厢射击，但是，促使他没有那样干的不是警察，而是担心此举会引发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如果库尔洛夫不知道博格罗夫在剧院里，那么这种不知情会加重其罪责。他受命布置整个警卫工作，不能把罪责推到下属身上。斯波里多维奇和韦里金不论当时有什么任务，他们毕竟是供职于国家特殊的岗位之上；他们知道博格罗夫其人，看到了他在剧院里，却默不作声。

虽然罪名的措辞是“职务上的不作为并导致了严重后果”，可是材料中突出了4人都是暗杀事件的参与者，库利亚布科尤为明确。

这样，尽管沙皇陛下已经表示了要赦免，调查仍在一步步地紧逼过来。这一控告不是呈交给法院的，而是呈交给军机处那些德高望重的老者的。他们全都处于沙皇意志的荫庇之下。他们对斯托雷平心怀怨恨，他们久居官位，心里不能接受这种粗暴的指控。而且他们之中的某人曾陷入官场的困境之中，或许只有圣人才不会陷入困境。库尔洛夫不止一次地被指责职务上的不作为、越权和盗用公款。在同一个政府机关供职几十年的人们之间会互相解救的，老人们都带着颤抖、喘息的声音相互论证着。他们说，如果库尔洛夫有罪，那么库利亚布科就是无罪的；而如果像大家所看到的是库利亚布科有罪，那么其余的3个人就是无辜的了。库尔洛夫发生的不是职务上的无作为，而是不幸。不能要求任何长官亲自去做一切事情，只能是委托可靠的下级去做。

因此，他们一致指责库利亚布科一个人犯有罪并盗用了公款，应在监狱中服刑16个月。最高层指示将刑期改为4个月。

对于其余3个人的处理产生了分歧。6名成员（其中有后来名极一时的心地慈善的施蒂默尔）赞成宣告无罪，另5名仍认为该受到审判。5人之中就有内阁

大臣委员会主席内务大臣马卡罗夫，一贯忠诚的他认为应受审。这样一来，认为有罪的判决还是略占了优势，罪名还是成立了。但是，6 名赞成者要求将他们的意见呈交沙皇裁决。

虽然调查拖延了 15 个月，但公众并没有忘记，仍在等待决定。报上忽而披露些情况，忽而又推翻，又说赞成票与反对票各占一半，陷入了僵局；说已经起草了起诉状，将在塔夫利切斯基宫的叶卡捷琳娜厅进行法律诉讼；不！最高机关还没有接到军机处的决定，库尔洛夫将得到升迁。

像以往一样，坏消息是最可信的。1913 年 1 月初，沙皇陛下在军机处备忘录上亲笔批示：终止库尔洛夫将军、斯波里多维奇及五等文书韦里金一案，并对当事人无任何影响。

两个月之后，准备在王朝 300 周年庆典时大赦。但是沙皇却以匆忙赦免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特殊信任和同情，表达了特别的倾向和友善。

这一切的受益者是那位獐头鼠目、厮咬成性的官僚世界之冠，和那个在侦察理论方面随风倒、捡拾残羹剩饭的宫廷走狗，还有那个患萎靡贫血症的文官。既不体面又无始无终。

沙皇以非常感人的仁慈预告了并象征性地庆祝了王朝 300 周年。

当然，沙皇可以早做赦免，但是这是他的意愿，因为这并不是什么国家大事，而只是关于个人命运的问题，是个人对忠诚的犯罪者表示的宽大和仁慈。他早在克里米亚，在那个幸福的 9 月就已经做出了决定。那时他失掉了令人生厌的内阁总理大臣，又得到了皇太子的康复作为回报。当时接替斯托雷平内务大臣职务的马卡罗夫给沙皇送来了刺杀案的调查结果。原来这根线指向了库尔洛夫，沙皇马上就对库尔洛夫产生了反感。沙皇拿去了所有的文件，说要仔细研究一下，就把此案留下了，再未跟马卡罗夫提起。当军机处的表决结果对库尔洛夫不利时，沙皇马上又撤换了大臣。沙皇可能早晚会赦免库尔洛夫。但是他期待军机处的那些忠诚的老人们明白他的意见，自己做出决定。

他们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他们像夜间的妖精那样从气味和眼中闪烁的光芒

就能认出自己人。他们人道地袒护和救助像自己一样可能落难的人。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说这次投票不是关乎库尔洛夫的，而是决定是否抄他们自己的家，刺死他们本人并斩尽杀绝他们的家人，那么他们就会野蛮地猛扑过来。

他们哪能跟革命者相比呢？那些革命者义无反顾地去牺牲自己18—25岁的生命，而这些40、50甚至70岁的人几乎满脑袋想的都是向上爬，也就是说考虑的是一定要保住自己的官位。在他们之中为俄国着想的几乎是例外，而考虑官位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他们不让自己紧张地思索，做起事来慢慢腾腾；他们养尊处优，享受安逸，在社交圈里适度地闪着光；他们勾心斗角，传播流言蜚语。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是什么呢？是摆样子的东正教和对沙皇的忠诚，因为他们能否升迁将由他来决定。

他们怎能不断送俄国呢？他们供职的一切想法都集中于窥视升迁图，寻求升迁和奖赏。难道这不是政权患了瘫痪症了吗？如同我们几乎在后来的白党运动中没有见到1914年参战时的大将军那样，在后来的皇权开始颠覆和保卫皇权时我们也没有遇到一个警察中的顽固分子、宫廷的宠儿和军机处的元老，他们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从1907年到1917年没有意识到整个危险，革命到来时他们吓破了胆，甚至不能自卫。

15个月的调查确认了最初的激愤时间所知晓的一切，于是这个案子就被忘却了。一切都集中表现在凶手和叛徒案件的怯懦、可耻和纷乱的终结之中了。从那模棱两可的沉默中可以了解我们那位未来君主的性格。

自由的上流社会倾向于把博格罗夫看作是暗探，以便不惩办自己逢迎的对象，俄国沙皇也准许这个解释在俄国的记忆中留下污点。为了救那3名官员的性命，最高政权将污浊的罪名揽在了自己头上。树梢毫无顾忌地甩掉健壮的幼芽，保留了枯枝。

这姗姗来迟的对杀人者的赦免让那些不愿闭目塞听的人大开眼界。对坏人的每一次宽恕，都会使国家向灭亡靠近一步。沙皇的所作所为充分地表明他与斯托雷平的致力解决问题不可同日而语。斯托雷平死后其方针即被废止，杀人者得到了宽恕，这表现出一个拥有1.5亿人口的大国的麻木，而奉天承运的沙皇

应为他的臣民、思想、意识和尊严，在法律面前承担责任。

事有凑巧，就在军机处做出不审判库尔洛夫决定的那一天，它还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拒绝了阿尔汉格尔斯克省设置地方自治局的要求。那是一个典型的俄国式的最有文化的没有农奴的独立的农民省份，在古老的诺夫哥罗德时期和莫斯科大公国时期曾辉煌一时。在20世纪，因那里的贵族人数不足而不能获得自治权！俄国的君主政体在依靠不发达的农民阶级问题上表现得踌躇不决。他们几乎还是需要有文化的人监督的孩子。

在讥笑斯托雷平的时候，也讥笑了他所钟爱的地方自治思想。

1913年1月的赦免书是王权对斯托雷平的彻底背叛，是对斯托雷平的整个事业和整个一生的背叛。这一点是所有的政治派别都清楚的。同年在基辅举行了死者纪念碑的揭幕式，于是重新展开了对斯托雷平一生及其事业的讨论。但是现在多数自由报刊是一片骂声，但在他被刺的日子里是不敢的，说他是个好用权势的人，甚至是个典型的一时得势的人，说他没有自己的政治方向，每次选择都是出自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他每走一步考虑的都是自己的仕途，对那些挡路的人冷酷无情。自由派报刊把纪念碑揭幕称之为“基辅活动”，在那里的俄国民族主义分子和部分十月党人聚拢在他们“深感亲切的尸体旁”，“企图引起人们在纪念碑前的骚动”。罗江科再次以个人而不是集体名义送去了花圈，一些大臣也是以个人名义而不是代表政府来的，宫廷和皇宫都没有派代表来。

斯托雷平死了只不过两年，几乎俄国所有的公众和报刊都嘲笑对他所进行的纪念，讥笑他对俄国的民族主义进行了拙劣的复兴。

博格罗夫射出的果真是穿甲弹，穿透了。

第七十四章

尼古拉·罗曼诺夫26岁以前那无忧无虑的日子一去不返了，那时在彼得堡过的冬天是无与伦比的。原来每天上午都要听陈腐乏味的治国理论课，到22岁时这门课停了。于是整天无所事事，不过吃吃茶点，与皇亲国戚一起出席宴会；没一个晚上是在家里，不是去看芭蕾舞、法国短剧，就是去听吉普赛人、匈牙利人唱歌或唢呐艺人吹列兹金舞曲，要不就喝酒，试着玩轮盘赌。尼古拉很少在夜里1点钟以前上床，经常是3点钟才就寝，早上自然就很难起床了。他经常睡过一半以上应该念书的时间，甚至因此不得不取消国务委员会会议和其他时间不长的会议。除一年两次斋戒和偶尔举行的节日招待会以外，他的时间完全是空闲的。他有时同舍列美帖夫家的姑娘们到阿尼契科沃溜冰场上玩个痛快，有时同她们捉迷藏，有时凭栏眺望涅瓦河，有时同一些小伙子沿河岸闲逛。他很小就养成把一切记入日记的习惯，心想以后回忆往事一定很有意思。他很早就开始阅读俄国史书，读这些书时恍惚觉得那些古人还活着，还觉得书中描写的事情现在也有或不久也会发生。他学起英、德、法等国语言来很轻松，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军事方面，他对实际服役的重视超过理论，长期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步兵团担任营长、御前骑兵团担任连长，还在炮骑混合近卫旅服役过两年。

每年夏天，他轮流参加这些部队的野营集训。有时骑马行军；有时演习进攻；有时半夜起床，天亮时困得要命；有时同军官们比赛射击盘子，阵阵号角，嘹亮的歌声，使健康年少的尼古拉感到快乐沉迷；有时投身到无拘无束的大自

然怀抱中，摆脱了宫廷礼仪的束缚，尽情寻欢作乐：从篝火上跃过，玩掷木棍游戏，爬到干草垛顶上嬉闹，爬上屋顶，划赛艇或双桨小艇，捕鱼，射野鸭子。晚饭后，部队里没事，就到不远的克拉斯诺耶镇喝几杯酒，吃点冷盘，要不就坐打猎用的敞篷马车随着音乐声兜圈，或者同贵族女子学校的学生跳舞，同西班牙、小俄罗斯和茨岗姑娘吃吃喝喝，一直玩到早上6点钟。克拉斯诺耶镇举办令人心醉神迷的戏剧节时，他就去看歌剧、芭蕾，还常常到后台去。他非常喜欢小克舍辛斯卡雅第二，为之倾倒。

9月是皇帝和亲王家族的狩猎月。狩猎可以说是人类最上等的娱乐。骑马巡行、围堵，固定地点守望、开枪、再开枪，瞧，一只鹿蹦起来，又像兔子似的倒下了。短时间里打中几十只鹿，还有野羊、野猪哩！太太小姐们参加的犬猎，也捕获许多兔子、野鸡、山鹑、黑雷鸟。猎人们不辞辛苦，往往天没亮就起床，有时冒着风吹雨打，不顾天寒地冻，策马一口气跑30俄里。事后在音乐声中摆宴庆功，为打猎胜利而轮流执牛角杯畅饮香槟酒，随行乐队吹奏弯管号角。狩猎时有时还打野牛。来回路上偶尔也打网球玩。旅途中遇到教堂时也进去做弥撒，也能顺便看几场魔术表演。为消磨时间，有时还打扑克、打台球、赌钱。邻近的农民乐队有时前来献艺助兴，他们赠送给农家妇女几百条头巾，一时热闹非凡。

后来，遵照父皇旨意，也是他自己的选择，他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时间旅游。他不像别人那样到欧洲，而是选择东方国家。同行的有两位格奥尔基，一位是尼古拉的弟弟，另一位是希腊王子，另外还有一些快活的年轻侍从。他们在希腊游览了奥林匹斯山；在埃及登上了吉萨的金字塔，观光了阿斯旺和孟斐斯，还偷偷跑去看埃及舞女跳舞；在印度猎过虎豹；在锡兰猎象；在爪哇猎鳄鱼。

游玩虽十分有趣，但也留下了一些刻骨铭心的不愉快回忆。印度到处都是趾高气扬的英国人，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穿的红色制服，令人受不了。到暹罗[1]

① 现东南亚泰国的古称。——译者注

见到举世罕见的精美古文物，心里赞羡不已。可是到了日本大津，却突然遇到一个宗教狂热分子袭击，幸亏希腊王子临危不惧，救了尼古拉，否则那把军刀猛砍下来准会要了他的命。这次危险使他想到人命薄如纸，全在上帝手中，心中惊恐万分。这次旅游收获颇多，使尼古拉认识到离俄国不远处还存在着其他文明国家，它们都是别开生面，深不可测。这大千世界是何等宏伟复杂啊！我们对它的了解不过九牛一毛。

回国后，用两个月时间骑马经西伯利亚回宫。那里的土地一望无垠，其辽阔超过俄国人自己的想象。这是我们的国家，但我们几乎没人了解它。伊尔库茨克、托博尔斯克、叶卡杰琳堡等城市，尼古拉可能不会再去，但都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后来，他心里开始萌发情欲，开始渴望美好的爱情。一次，他参加叔叔谢尔盖和婶婶艾拉的婚礼，遇见艾拉的妹妹——黑森州公主——12 岁的小美人阿莉克斯。16 岁的尼古拉趁同她跳舞的机会送给她一枚胸针，她接受了，但有点犹豫。后来他们在一个亭子里再度相见，这次就在亭柱上刻上两人的名字了。从此，尼古拉心里无时无刻不浮现着她天仙般的倩影。她每次到彼得堡来，他总是迫不及待地前去拜访。到 20 岁时，他决心向她求婚。同许多皇族亲属一样，皇太子的婚姻大事不免与许多政治因素牵连在一起。父皇母后企图改变他的选择，父皇反对得很坚决，母后也不满意，他们心里另有打算。尼古拉年纪虽小，却坚持己见，认为自己必能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如此僵持了几年，最后终于获得了父母的同意。26 岁时，在喜气洋洋的春天里，他前往科堡向阿莉克斯求婚并表示希望立即举行订婚典礼。但是，虽然阿莉克斯的父亲公爵派了几名侍从来陪伴俄国皇太子，阿莉克斯的外祖母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也前来表示原则上支持，但并未达成任何实际协议，主要障碍是阿莉克斯不同意转信东正教。星期二，他们进行了一次艰难的谈话。阿莉克斯出面时显得更漂亮了，但满面愁容。她不同意转教。尼古拉无计可施，几乎陷于绝望之中，幸而星期三出现转机，阿莉克斯同意再与尼古拉会面。星期四他不得不出席日耳曼王子的婚礼，晚上还戴着小丑面具参加化装舞会，喝啤酒。星期五是他终生难忘的日

子，一块石头从心上落地：阿莉克斯终于同意皈依东正教。父皇母后会多么高兴啊！尼古拉快活得像喝醉了酒，甚至搞不清自己做成了一件什么事。德皇威廉向这对年轻人的订婚表示祝贺，德国整个皇族男女老少都高兴得拥抱接吻。尼古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拥有未婚妻了。做一个未婚夫简直是世上难得的幸福！单单是阿莉克斯对他的态度转变，就足以使他心花怒放了。她甚至用俄文给他写了两句话，几乎没有错。他们俩共乘一辆敞篷马车出行，一起到池塘边散步，到园中采花，一起拍照。人们驻足拥挤着观看他们。窗下常有步兵乐队为他们演奏，还有龙骑兵为他们表演。只要是与她在一起，哪怕只是坐坐车，走走路，坐一坐，他都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一点也不拘束。阿莉克斯还送给他一枚戒指呢！尼古拉飘飘欲仙了。她真是勾人魂魄哟！他们俩常在一起，有时到深更半夜。尼古拉衷心感激上帝。现在已到难分难舍地步，让他们分开是难以想象的。不久后，阿莉克斯到伦敦外祖母那里去，尼古拉只好一人不时到那些与她去过的地方漫步，采摘她喜欢的花，晚上装在信封里给她寄去。她的倩影随时随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她有一张在玫瑰丛中拍摄的小相片，他随身带着，进餐时拿出放在餐具边。

与她分别后不久，他回到俄国，好不容易又捱过两个多月，终于忍不住，乘船到伦敦去了。在父皇的豪华快船"北极星"号上，既有尽情的享受，又备受相思的熬煎。但美妙的时光接着就到来了。他又与心上人阿莉克斯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有时坐皇家马车到温莎花园兜风，有时去看玫瑰花展，有时在泰晤士河划船，有时一起在钢琴上四手联弹，然后在舒适的房间里与她一起休息。他利用一切机会尽可能与心爱的人儿待在一起，有时只有半小时，有时是整个晚上直到天亮。他在伦敦记的日记已完全不对她保密。她不懂俄语，却常常仿效他，在他的日记本里随手写一些词句。

她在日记本的一页上用英文写道：我的忠贞感情是难以用言辞表达的。

她在尼古拉的日记中潦草地写了许多难以辨认的字句，还故意把自己写的同尼古拉在彼得堡写的混在一起，表示两人心连心。

她用德文写道：两颗心连在一起真是奇妙无比，但愿同甘共苦，从最初的

一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永不变心。

尼古拉在日记中说自己穿衣服是根据不同情况而变化的，进餐、赴宴、检阅、观剧等不同场合各不相同，有时是匈牙利式轻骑兵短外衣，有时是高加索护卫兵常穿的长袍，有时是近卫军的常礼服。不论穿什么，他总能显示出俄国的荣辉和自己的英武。他也喜欢穿波兰式的军服，穿上这种军服好像自己在波兰军队里服役似的，也体会波兰人建立了战功时的荣誉感。在阿莉克斯身边度过的夜晚是多么美好、奇妙和宁静啊! 在英国的一个月天堂般的生活不知不觉地逝去了。

日记上画了一颗心，旁边有一行英文字：愿你永远不要忘记曾经最热烈地为你的幸福做过祈祷的人。

尼古拉记道，他到一家老式家具商店里买了一架很讲究的床，还有洗脸盆、帝国牌镜子，这些东西深得她的欢心。她素来爱好珍贵器物，这一回他也亲自为她选购了一些首饰。他还对她讲到克舍辛斯卡雅的芭蕾舞，说那是举世罕见的。

她在这里用英文写道：我亲爱的男孩啊，但愿你永不变心永远忠诚，请相信你所爱的姑娘吧! 自从你对我袒露心迹以后，我更爱你了。

他们在海滨过了最后几天，或坐在沙滩上，或眺望海峡，或赤脚踏着海水闲逛，与爱人寸步不离。尼古拉把离去的日子又推迟了一天，多过了一天快乐的日子。离别时难分难舍。他乘小舢板上了快船，见到那里放着一封她写的长长的情书，令他喜出望外。

她用英文在信里写道：我逮住爱神了，拴住了她的翅膀。她将在我们的心房里唱歌。

谁见到这样的话能不心潮澎湃呢? 他立即写了回信，请一位下船的英国人带给阿莉克斯，接着就想念她起来，甚至因此变憔悴了。刚刚分别，怎么得了哇!

她后来在这里写了一句英文：让海浪轻轻摇晃你安然入睡。你的守护神在保护你。

他在海上不断给她写信，让领港员代他寄出。并在信中承诺到了秋天再去看望她。

糟糕的是，秋天父皇突患重病。尼古拉虽恨不得一下子飞到阿莉克斯身边，却不得不履行自己的义务，和父母一起到了克里木。他在那里备受思念爱人的煎熬。只要有一天没收到阿莉克斯的信就满面愁苦，好在第二天往往得到加倍的奖励，同时收到两封。阿莉克斯也为未婚夫未如约前来哭了好几次。他们俩为什么不在夏天就结婚哟！整个9月他过得非常难受。有一段时间父皇健康有起色，起了床，接见大臣，批阅文件，只是非常固执，坚决拒绝任何医疗。尼古拉天天翘首盼望信鸽从天而降，常常骑马到葡萄园、农场、瀑布等地闲逛，有时远至海边灯塔、乌昌苏、阿鲁布卡。不久，父皇病况恶化，自我感觉很坏、恶心。可怜的父亲啊，你病这么重，我真难过！尼古拉坐在海边石头上，满腹忧伤，看海上巨浪翻腾。现在他不可能到阿莉克斯那里去。

又过不久，5位医生前来会诊。10月初的一天，父亲已经极其衰弱，要卧床休息。这时收到一封阿莉克斯给母后的信。父皇母后同意尼古拉写信请阿莉克斯从德国达姆施塔特到这里来。父母的关爱，令尼古拉感动得流泪。这对未婚夫妇不久后又能相聚了。虽是悲伤危难时刻，尼古拉还是感到无比幸福。父皇早饭后又躺下，尼古拉开始平生第一次代父批阅信使呈上的文件，这些东西都很枯燥无味，令人伤脑筋，而且写着许多陌生的姓名和从未听到过的情况。父皇怎么能把这些东西都记住？真难为他。尼古拉还带着人到雅尔塔去迎接贵宾。各式各样的新面孔使他觉得很新鲜。早餐时乐队突然奏乐，这在目前气氛下是不合适的。父皇此时正行临终圣礼。

尼古拉第一次恐惧地想到：若是父皇突然驾崩，那怎么办？主啊！那多可怕啊！他尼古拉会多么孤苦无助啊！毫无准备，怎么治理国家？从哪里能获得父皇那样的魄力？但除了他，还能传位给谁？他身为长子，是当然继承人，责无旁贷。何况弟弟格奥尔基有肺病。

又过一天，尼古拉前去迎接他的女神的到来，带着她回到立瓦基亚。他快乐至极，痛苦忧愁消失了大半。车过之处，每一驿站都有鞑靼人捧着面包和盐

前来欢迎。他的车装满了葡萄和鲜花。可是父皇的健康状况又恶化了。阿莉克斯的到来更是打扰了他。

尼古拉同阿莉克斯一整天寸步不离，一直到深夜她就寝为止。有她在身边，他心里总是喜滋滋的。她陪他批阅呈文。两人一起到奥利安达去玩，一起去欣赏海景，一起玩牌。只要有她在场，他就充满勇气，心里踏实，他对她的爱情越来越深。能娶到这样一位妻子，他觉得如获珍宝，无上幸福。她第一次领圣餐绣制圣餐盘的盖布，他在旁帮忙。

她在日记此处写道：你的心上人在为你也为你病中的敬爱的父皇祈祷。你要坚强，要吩咐医生每天把病情和治疗细节向你报告。这样你才能第一个知道一切情况。不能让别人比你知道得早。你是父皇钟爱的儿子，你要显示自己的意志，不能让别人忘记你的身份。

她说得对。应该学会显示自己，让人了解。

两人到海边散步，没坐车，因为他担心她走不动，没力气走回来。

又过一天，父皇又一次领圣餐。主啊，难道真的垂危了吗？父皇慷慨仁慈，同时又坚强有力。尼古拉想到他的病就心如刀割。主啊！求你免除对我这样的考验吧！我承受不起，也不愿承受，求你不要给我重担吧！

晚上先在父皇病榻旁边。病人哮喘发作得很厉害。尼古拉被告知须准备接替皇位，可以先与父皇一起料理政务，得到父皇的指导。尼古拉听见这话以后吓得浑身发凉，也一下子适应不了，心里又害怕又痛苦。他走到阿莉克斯身旁。

当你垂头丧气的时候，你就到你的心上人这里来吧！她能照亮你的心，给你温暖。

父皇一夜没睡着觉，天亮时情况更坏了。人们被召到他床前。没说是告别，其实是告别。这些天真难熬。怎么结束啊！尼古拉害怕那个时刻的到来。

尼古拉不敢离开房间一步。阿莉克斯是他最大的安慰，整天陪着他，看他批阅各大臣的呈文，后来出席弗拉基米尔叔叔召集的医生会议。早餐时人人屏息静气，鸦雀无声。后来父皇又稍有起色，次日还坐进了安乐椅。尼古拉再次与他一起处理政务。人名、事件不可胜数，怎能记住？如何做出指示？如何加

以解决？父皇讲完后疲惫不堪，又躺下了。

次日晨呼吸困难，输入氧气。

第三次行圣礼。上帝终于召唤他去了。

全俄国震惊，尼古拉刹那间感到天旋地转，头昏眼花，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行宫上的御旗缓缓降下，全雅尔塔都看得见。港湾里的军舰放了礼炮。

下午，就在父皇卧室里举行了祭祷仪式。

一天内的变化多大啊！以前的轻松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从此一生都得忙碌了。

当俄国皇帝，是困难已极，力所不及的事。

但这同别的事一样，是上帝的旨意。

当晚，在秋天浓重的夜色中，把遗体从行宫迁到教堂。两行人举着火把，景象令人感到害怕。

但即使心痛欲绝，上帝也赐给我们以宁静的快乐：为阿莉克斯举行了涂油礼。接着一整天，他同她起草电报稿。天气很冷，海在呼啸。第三天还是做这件事，但两人在白天坐车兜了一阵风。晚上他还是坐在她身边。跟她一起，他才感到自己有力量登上皇位。

她在这里用德文写道："你是上帝之子，他指引你，别怕！"又用英文写道："你应该更多地问自己，应该怎样行动才能见到天使？"

庞大的皇帝家族内部争论起来：怎么办婚礼？是隆重盛大呢，还是只在小范围？是老沙皇葬礼后在彼得堡，还是现在就在这里？叔叔辈人多势众，都坚持在彼得堡。尼古拉只好从命。

沙皇驾崩一周后，众人动身回彼得堡。哥萨克和步兵轮流把灵柩从立瓦基亚的教堂抬到雅尔塔的码头，然后由一艘高悬海军安德列耶夫军旗的军舰把它沿克里木半岛海岸线运至塞瓦斯托波尔港，港内军舰排成一行迎送，接着由一列火车送往北方。每到一个火车站都要举行追悼仪式。阿莉克斯在火车上一直待在尼古拉身边，使他感到无比的欣慰。

她在这里写了一句英文：爱情凝结在一起的人儿，什么力量也拆不散。我

很快就要成为你唯一的妻子。

一辆灵车穿过莫斯科城把灵柩运至克里姆林宫，中途在10个教堂边停下举行祭祷仪式。尼克拉代替父皇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格奥尔基大厅向聚在一起的各阶层人士讲几句话。他为此从清晨起就坐立不安，心里发慌。感谢上帝，这事总算顺利地过去了。

抵达彼得堡后，从火车站到彼得保罗要塞，人群跟着灵柩走了4小时。埋葬前，在要塞里举行了许多次追悼仪式，夜以继日，有许多外国代表和王子参加。大家的精神极度紧张，眼睛都哭肿了。尼古拉每做完一次祭祷，就更清楚地感到自己负担的沉重。须接见国务委员会全体成员，还得讲一番话（波别多诺斯采夫起草讲话稿并教他怎么说）；他还接见了全体侍从，又讲了一番话；后来又阅读各部的报告，听取一些人的口头汇报；还得想些话与外国代表团成员交谈；本来还有点时间可以同阿莉克斯待在一起，却被与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皇帝会见占用了。天天都是东一下西一下地忙碌，枯燥至极。最好赶快结婚，那样就不用分开了。高级神职人员主持了安灵仪式，到第二十天又在彼得保罗要塞举行悼念仪式，在墓地也举行了祈祷仪式。在两位王子走后，尼古拉巴望其他贵宾都赶走掉。但他还是须接见各式各样的外宾，有的递交国书，还得对五花八门的问题做出答复，弄得头昏脑涨，不知所措，思想负担沉重。在冬宫音乐厅举行宴会招待各国前来参加葬礼的王子，尼古拉在宴会上心里闷得想哭出声来。各部前来汇报的越来越多，他在冬宫舞厅接见枢密院全体成员，又陆续接见各地总督、省长、军队司令、哥萨克军首领。在尼古拉耶夫厅同时接见500名俄国各地代表。后来休息一天，没有接见、汇报，要批阅的东西也很少。他称心如意地同阿莉克斯待在一起，散散步。在这样沉重的时候，自然不好意思提要结婚的事。尼古拉过去一人占用四间房，以后两人住，似太少，于是又添了两间，同阿莉克斯出门选购了地毯和窗帘。

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来到。他与阿莉克斯在冬宫大教堂举行了婚礼，从教堂出来时已成为夫妻。两人乘车前往喀山大教堂，沿涅瓦河岸排着军人（警察奉命撤离）。两人一起浏览亲戚送的结婚礼品，回复了一批贺电。尼古拉只要同

阿莉克斯在一起，就感到无比幸福，一刻也不愿与她分开，但有时因为有事，身不由己。为了躲避各部门向他汇报，他俩跑到皇村舒舒服服过了一个礼拜，白天晚上谁也不接见，也不看呈文，快乐至极，觉得人生在世，再也没有比这时更幸福了。

阿莉克斯在这里用英文写道：你是我最亲最爱的人，为了你，我无限感激上帝！我要吻遍你可爱的脸。如果你的爱妻无意中使你不高兴，请你宽恕！

两人到公园散步，坐马车或雪橇兜风，看锡兰大象，在钢琴上弹四手联奏，绘画，翻看相片册，朗诵旧流行杂志上的打油诗。与娇妻生活在皇村这样的好地方，宛如在天上人间。

回到彼得堡后，他们在新添的房间墙上挂上图片和相片。老沙皇逝世后第四十天，在彼得保罗要塞举行了安灵弥撒。尼古拉审查了冬宫各房间配置用具的方案，挑选家具和材料样品。阅读各省省长呈上的没完没了的报告。整个上午都忙个不停：波别多诺斯采夫一次又一次地面授机宜（他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各部大臣前来做了一些互相矛盾的汇报，使人莫名其妙；接着是一大堆军事情况汇报，接见海军委员会全体成员；给枢密院签发嘉奖令。之后，准备寄往英国和德国达姆施塔特的圣诞节礼物。清理爱妻从德国带来的物品，还察看了将要挂在家里的圣诞树上的礼物。接着，两人乘坐马拉的狩猎雪橇各处跑。结婚已一个多月，自己才刚刚习惯于总是想到自己是有妇之夫，对阿莉克斯的爱情愈来愈深。天天收到许多文件需他审阅，他几乎没有时间再读法文书和喜爱的历史杂志。有一天，他只接见了一个部长，这就等于放了半天假；又有一天，科学院庆祝会到一点钟就结束，这也很走运，剩下的时间可以溜冰，也可以在晚上趁月色坐雪橇到岛上去玩。

就这样，在治丧期间，尼古拉经过不止一两天，而是经过很多天，不由自主地、完全地变成至高无上的专制君主。应该做什么？说什么？任命谁？撤掉谁？同意谁？不同意谁？一定有一条唯一正确的通向上帝旨意的路。可是这条路在哪里？无论是他这个少年沙皇，还是他的谋臣们都不知道。尼古拉从未听先皇对他进行过一次政治方面的教诲，先皇身体健康时总认为讲这些东西为时

尚早，让儿子玩耍吧！长大再说；患病时他觉得自己一时不至无救。尼古拉只记得父皇垂危时说过一句话："听维特的话。"后来尼古拉像受罪似的到国务会议坐了几个小时，感到枯燥已极，那些白发苍苍或头秃脑亮、身患关节炎或糖尿病的老头子在争论什么，他几乎没听进去。

弗拉基米尔叔叔安慰尼古拉说，亚历山大二世和亚历山大三世登基时形势都比较混乱，现在已经过了 13 年太平日子，国泰民安，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不必急于进行改革，也没必要撤换现职人员，否则人家会以为儿子对父皇不满。这些话很对尼古拉的心意，这样也最轻松，不用动脑筋，不用改变现状，一切听其自然。于是他只撤掉了有欺诈行为的交通大臣，父皇本来就打算撤掉他的。

但不能过多听弗拉基米尔叔叔的话，因为这个叔叔完全听婶婶米亨的，而米亨同母后关系不好。阿列克塞叔叔、巴维尔叔叔、谢尔盖叔叔也都能出主意，他们都有经验，也都公正地认为尼古拉的修养是符合承继父业的条件的。还有 8 位堂叔能够提出中肯的建议。堂叔祖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担任大元帅和国务会议主席之职，整天迷恋于大炮。还有波别多诺斯采夫，此人不久前才担任尼古拉的导师，此前担任过先皇的首席顾问。继位几周后，尼古拉向他抱怨说，送来的文件太多，没时间看。波别多诺斯采夫说，其中许多是没有用的，不过是下面的人想推脱责任而已，皇上签个字就行，这样的情形以后会纠正。可是不管波别多诺斯采夫多么能干，尼古拉还是不能在最重大的问题上听他的意见，也绝不能使他的意见比其他近臣的意见更受重视。尼古拉不久发现，维特是个老谋深算的人，说话直率，不甜言蜜语，对财政部以外的事他也干预，是否有意使其他部管辖的事也依靠他？但财政部内部意见也不一致，比如是否容许黄金流通，就是一人一个主张，只好开会讨论，结果开会也没弄明白。维特提议建立农民事务委员会，尼古拉同意了，可是波别多诺斯采夫却说那么做是胡闹，沙皇就又否决了维特的建议。维特接着又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呈上来，阐述成立该委员会的必要，沙皇读后颇为信服，在报告页边批示完全同意。可是杜尔诺沃却站出来坚持反对设立该委员会，于是沙皇又批示"暂缓"。桑德罗介绍来

一位陌生的、卓越的爱国者和深谙俄国生活的人，此人的一个主张深得沙皇赞赏：应全力抵制外国资本侵入俄国。于是他按照这一原则连续批示了几个文件，消息很快传到外国公司，维特得知后深感震惊，立即送来门捷列耶夫教授写的一封信，信中提到输入外国资本的极端重要性，维特要沙皇发表一个所有大臣均须一体遵行的指示。于是召开了大臣会议，通过了允许外资输入的决定。

皇帝最为难的，莫过于在许多谋臣的意见中选择适用者。这些人把自己的主张都说得头头是道，很难判断哪个人的意见是对的。如果这些人的意见一致，那该多好，治国也就容易多了。真希望出谋划策的人意见一致，可惜不可能，他们一个个都像中了邪，意见总是不一致，使得皇帝十分尴尬。无数的来信、报告、汇报压得他透不过气。

尼古拉以前有父皇做靠山，自己不动脑筋，导致现在这么没有自信心。

不仅如此，大臣之间有分歧似乎还嫌不够，许多离皇座很远，甚至离首都很远的人也心怀叵测，他们认为现在已经没有过去的沙皇的铁腕控制他们，也想对治国大政发表见解，企图从中捞一把。一些胆大妄为的人在省自治会议和贵族会议上肆无忌惮地鼓吹限制沙皇权力和立宪（这些人得意忘形，竟然不懂立宪会把他们自己毁掉）。他们不把少年沙皇放在眼里，企图趁他没站稳脚跟钻空子，把政权弄得四分五裂。但尼古拉尽管年少，却懂得他继承的是强大的权力，其强大在于统一，这权力是不容许损害的，俄国这样庞大的国家需要强大的权力。于是他积蓄力量，准备反击，要在接见贵族、地方自治会和城市代表时果断发出警告。他有生以来从未这么不安。（阿莉克斯也很不安，她考虑了是否可以向代表们让步，最后决定不让步）尼古拉担心记不住为他写好的一份短演说辞，他不想照着读，要像是自己的即席讲话。一位近臣建议他把演说稿藏在帽子里，演说时按礼节摘下帽子。

后来就这么办了，讲的也行读的也行，总之这次演说是充满自信心的，他同先父一样坚定不移地捍卫了专制原则。只是在讲到某些地方自治官员沉湎于无根据的幻想企图分享治国大权时，把“无根据的”错念成“无意义的”。但总的说来这次讲得很好，能够让那些人有自知之明了，念错了一点不要紧吧？反

正是反对他们的野心的。

不过，后来许多人却长时期忘不了尼古拉念错这个词，以此责备他。

这次接见仪式出了一个凶兆，使人刻骨铭心。特维尔代表团前来致敬，领头的人捧的盘子当啷一声掉在地上，里面的面包摔成几半，盐撒了满地。尼古拉当时想帮忙，做了一个要捡起盘子的动作，但立即觉得那么做不合乎皇帝身份，会使众人更不安。后来他常想，所有的倒霉事是从这个盘子、这个动作开始的。

做一个俄国皇帝真困难，特别是在登基初不了解情况时。如果只有国内问题还不至于这么难，可是还有外交，那真是令人头痛至极，接触的人都心怀鬼胎，事情乱如麻，众说纷纭。尼古拉有时不禁黯然神伤，觉得靠人类智慧是不可能找到真理之路的。外交大臣吉尔斯虽很有经验，可是已年迈体衰，快要随先皇到另一世界去了。他向尼古拉呈上第一份报告，其中说俄国受俄法军事联盟条约的约束已有两年，此事高度机密，连两国大臣会议都不知道，既已结盟，以后一旦法国与德交战，法国若投入近100万兵力，俄国则须投入800万兵力。在尼古拉被这个秘密枷锁套住之时，却收到德国威廉皇帝几封来信，信中说自己不但是尼古拉的忠实表兄，而且是他的好友，俄德两国及其皇族已百年修好，具有传统的友好关系，两国都同样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共和主义，都建立在专制主义的牢固基础上，与法英两国背道而驰。法国总统宝座是建立在砍国王头的血泊上的，对监狱里的囚犯他们都实行大赦；英国是全世界无政府主义恶棍的避难所，那里的大臣都已越来越腐败，普遍受人嘲笑。

不知怎的，威廉颇有吸引力和说服力。他总是那么真诚，对自己说的每句话都充满自信，都自认为是不容置疑的真理。这些话对尼古拉很有启发。虽然尼古拉没有经过任何国务锻炼，但却本能地懂得俄国之稳固在于其专制原则；如果建立轮流执政的共和国，那些上台的空谈家会在自己短暂的执政期间把俄国毁掉，而那些资本家则会不声不响地收买报刊从而影响社会舆论。

虽这么想，但父皇的遗志儿子却难以违背。父皇究竟为什么要同那个在砍国王头的血泊中建立宝座的总统结盟，而且还要在克朗施塔得摘帽听马赛曲？

威廉对尼古拉和阿莉克斯亲切热情，关怀备至，尼古拉也很想对他报以披肝沥胆，但俄法秘密联盟条约箍住了他的嘴，使他不能随心所欲。一旦威廉得悉有这么一个联盟，他会怎样？尼古拉想到这点就不寒而栗。

尼古拉在老外交大臣逝世前不久才弄明白父皇为什么缔结这一奇怪的条约。原来，俄德之间过去也订过一个共同安全秘密条约，规定如一方发生战争，另一方保持友善的中立。但威廉年轻时从祖父手中接过皇位后立即撤换了俾斯麦，听从新首相的建议，在1890年没有续签这个条约。

那么，在威廉信中满纸甜言蜜语和赠送礼品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意图？真捉摸不透，一个脑袋不够用。不过往好处想，可能会发现这种猜测不过是误会。应该在一颗心里容纳得下德法两国，应该使他们和解！

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一个可实现的机会：德国要举行基尔运河落成庆典。所有的舰队都要开到那里去。难道法国舰队不愿意和俄国舰队一起去？劝说成功了，欧洲和解迈出了新的一步。这是巨大的成功。可是后来法国议会吵作一团：庆典正值普法战争25年！

这时又出现了另一次机会。在尼古拉父皇垂危之时，狡猾的日本突然向衰弱无援的中国发动战争并迅速地征服了它。日本本来不算一个强国，人们对之了解甚少。欧洲统治者中，此时只有年轻的尼古拉一人亲眼目睹过这个地区，他觉得自己对这个地区负有特殊责任，应对之给予特殊关注。机不可失，不能等到谙熟国务后再去处理，应该立即制止强盗行径。尼古拉出于爱好和平之心，呼吁法德这两个宿敌共同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最初，这两个国家似乎不可能共同行动，但后来终于与俄国一起采取了共同立场，结果非常成功。日本停止了自己已取得胜利的战争，放弃了朝鲜和包括旅顺在内的辽东半岛，只占领了中国台湾，在中国大陆什么也没得到而且同意以后对列强的利益要十分谨慎地对待。

真是人不在老少，马不在高低，这位初出茅庐的少年沙皇居然做出了许多经验丰富的老政治家想都不敢想的事。

威廉表兄对日本的狂妄举动比尼古拉还要愤慨。他一再指出，俄国无疑有

一项伟大的义务：使亚洲大陆开化，保卫欧洲和基督教，防止黄种人和佛教入侵。尼古拉如此敏锐地认清了俄国的责任，欧洲为此应该感谢他，德国则应该保证俄国的后方——欧洲安宁。

尼古拉本人迄今还不理解俄国的这一任务，只在经过反复的思考后，才越来越明确。命运之神并非偶然地在他少年时期把他带到神秘的东方转了一圈，千方百计地、乃至以日本大津对他进行未遂谋杀为手段，把他与这一地区联系在一起。东方对他来说并非抽象概念。他看到，俄国的西伯利亚天寒地冻，尚未开发，没有出海口，与之毗邻的都是一望无际的温带沃土，它濒临温暖的海洋，又与俄国陆地接壤，这种联系是极富预兆意义的。(维特提出一个精明独到的主张：我们不必绕过黑龙江，而是干脆在满洲修一条铁路，中国是不能拒绝的)后来得知，父皇曾以付给一个敢想敢干的布里亚特人200万卢布，以便和平地取得中国的蒙古和西藏等地区，这笔钱已经花光了，现在又申请拨给200万卢布，以便继续未完成之业。这个钱是值得花的。而年轻的沙皇也是对东方情有独钟。在东方，弱小的日本算不了什么，到处插手的英国才是我们最大的障碍。维特怀疑，日本之所以敢那么强硬，是因为有英国暗中撑腰。确实如此，自古以来，无论何时何地，英国总是与俄国作对。父皇留下的关于国务的遗言不多，尼古拉记得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无论何时何地，在亚洲，在波斯，在君士坦丁堡，在巴尔干半岛，俄国人每迈出一步，总要受到英国阻挠。

共和国怎么能保密？法国议会很快就有人对法俄秘密结盟表示不满。这让尼古拉在威廉面前真是羞愧难言！好在这条约不是尼古拉订的，俄德友谊经受住了这场考验。威廉对此事采取了宽宏大量的态度，但把尼古拉教训了一顿，说将来总有一天尼古拉会不明不白地卷入一场欧洲史无前例的可怕战争的。

父皇宴驾已一年。服丧期已满。尼古拉惘然若失，觉得服丧是自己与温馨的往日联系的最后一根纽带。尼古拉还隐约地感到父皇在冥冥中向他诉说在世时没来得及说的一些秘密，但须这位年轻沙皇在上帝帮助下自己感悟才能明白。

不久，开始准备加冕典礼，订于5月在莫斯科举行20天。这一回又须同过去一样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发表演说。尼古拉一想到这个，心里就紧张发怵。

只有爱妻阿莉克斯了解他的这种心情，不断鼓励他。他自己也相信，只要在乌斯宾斯基大教堂一戴上皇冠，他就会完全改变，会变成秉承天意的真正的绝对君主。因此在加冕典礼上他充满自信和渴望。他身披紫色皇袍，头戴皇冠，左手托金球，右手持权杖。他诵读教义时声音有些沙哑。他恭听了加冕祷词："祈上帝赋予他超凡的聪明智慧，向您的子民传达真理；祈上帝温暖他的心，使他维护受害者，不负众望。"

加冕后，尼古拉觉得自己成熟了。他对君主的超凡禀赋和最高权威问题想了许久，明确了只有上帝才能左右他。

加冕后第四天，发生了一桩意想不到的灾难：许多群众从半夜起就聚集在宾馆外面，天亮以后突然莫名其妙地向前拥挤，十分钟踩踏死 1300 人。这桩惨祸给全部庆典活动蒙上了阴影。尼古拉心情变得十分沉重抑郁。上帝为什么要降临这场灾难啊？为什么偏偏在加冕期间发生啊？这是不是不祥之兆？当时无暇深入细想这些问题。庆典时间表排得紧紧的，不容变更，当晚须出席法国大使举办的舞会。阿莉克斯说，所有的叔叔也都说，不出席这场舞会是对法国不礼貌，是不行的。

不能用常人的尺度来衡量皇帝的步伐。他在日常生活中要考虑各国家各民族的关系，必须对此习以为常。

但后果却不好。

为这起霍登广场惨案，尼古拉没有惩罚任何一名官员。他宽宏大量，不想再增加不幸者的人数，使更多的人痛苦。

但上天却似乎不肯饶恕沙皇夫妇。夏天，他们两人到尼日尼·诺夫哥罗德参观全俄本地产品展览会，恰巧在他们到达会场后，乌云密布，下了一场冰雹，打碎了展览馆许多玻璃，像被雷击中了一样，满地是玻璃碎片。

这年夏天，他们俩到国外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旅游，拜访了奥地利皇帝、德国皇帝、丹麦国王（尼古拉的外祖父），到了苏格兰，在阿莉克斯的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处做客；最后在巴黎受到凯旋般的接待，法国群众这次对俄国沙皇的欢迎几乎和莫斯科群众一样热烈，他的肖像在大街小巷散发，还印在糖果纸上，

商店出售的器皿、肥皂、玩具上都有俄国国徽。尼古拉深受感动，以至在观看检阅式时竟说出“与法国结成战斗的兄弟情谊关系”这样的话。虽然他的记忆和他受过的教育都不曾告诉他有过这种情谊。之后，两人到阿莉克斯的故乡达姆什达特休息了一段时间，才从这些欢乐兴奋中恢复过来。霍登广场惨案和尼日尼·诺夫哥罗德展览馆冰雹造成的阴暗心理这时已从沙皇夫妇心中荡涤干净。

巴黎之行使尼古拉感动极深，他对共和制法国的反感一扫而光，他热烈同意与法国政府就土耳其问题达成友好协议。但是，他一回到彼得堡，人们就告诉他，他在巴黎受了欺骗，法国人是想在黑海海峡问题上捆住他的手脚。

真是好心不得好报。你以为帮的是好人，不料却是个骗子！尼古拉觉得受到极大侮辱，一怒之下，他听从大臣们献的计策，要立即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土耳其已奄奄一息，应该把它的遗产夺过来。俄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对这个主张特别热心，他一再强调土耳其毫无抵抗能力。军事大臣和海军大臣也一再强调此举在战略上是完全可能实现的。这个计划真是十分诱人！从光荣占领君士坦丁堡这一皇城开始自己的统治生涯，这是以前历代先皇想都不敢想的。的确，重返拜占庭帝国的首府，是俄国的历史任务，谁在什么时候完成了这项任务，谁就是一劳永逸地捍卫了所有的斯拉夫人。尼古拉觉得有一个隐秘的声音在提醒他：时机已经到来，他应该承担这一任务。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奉旨以皇帝名义拟定命令，该大使有权在其本人选定的日期把俄国舰队和3万登陆部队召至君士坦丁堡。尼古拉在这个命令上签了字。其他国家的舰队会不会也开到达达尼尔海峡来？管它的！就是同整个欧洲开仗，我们也干！英国是不会来的，英国很愿意把土耳其瓜分掉，自己去占领埃及。这时，海军上将阿列克赛叔叔从国外回来，他挥着手说，巴黎谣言四起，都说将要发生一场巨大的风波！尼古拉听到后马上解除了大使的全权。

但尼古拉还不能自信自己的举措完全达到了皇帝的水平。他渴望自己具有绝对权威，言出必行，但现在尚未做到。他渴望自己的治理得到完全的认同，但谁也没有这样的表示。从登基第一天起，他就感到自己似乎一直在雾里飘浮。他很想弄清各种事件发生的规律，但无从下手。虽然他通晓俄国历史，也喜欢

加以思考，但这并不能给予明确启示。他羞于向别人请教，而骄傲又使他不愿显得无知。父皇没有给他留下称心的辅佐旧臣。那个波别多诺斯采夫从尼古拉小时候起就没完没了地教训他，令人讨厌至极。这家伙总是唠唠叨叨，他那副模样也令人作呕，又高又瘦，戴个眼镜，双颊凹陷，一对招风耳张开着，似乎要与这每况愈下、毫无希望的世界作对。维特倒是聪明绝顶，工作起来废寝忘食，讲的话总能深深打动人心，创立了酒类专卖制，非常善于把钱从罗特施里德家族手中挖出来。但是维特总想使全部生活乃至整个国家都围着财政部转，而且只举荐那些不会与他竞争的人为大臣，这不由得令人不放心。

除了难分难舍的阿莉克斯和聪慧的母后外，尼古拉无人可信，实际上是孤家寡人。年轻的沙皇夫妇在上层社会中没有朋友。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喜欢热闹，总是宁愿两个人单独在一起。两人从来不漏过一场弥撒和通宵祈祷，这个习惯在贵族们眼中也是怪癖。

威廉可算得上是热心肠的朋友，也许应当对他更信赖更殷勤些。但是他的热情也有点令人生畏。威廉同尼古拉一样是皇帝，一样年轻，他提出的一些诚恳的忠言曾经深深打动过尼古拉的心。于是，这两位伟大的君王除了通过那些笨拙的大臣以外，还通过亲自派遣由副官充当的使节快捷地、坦诚地交换意见，觉得这样很方便。威廉说，亚洲是我们共同的事业。1897 年，威廉访问彼得堡，停留时间甚长，两人交谈十分诚恳坦率。双方确认所有观点都一致，均认为必须在东方捍卫白种人的权益。8 月的一个下午，两人共乘一辆马车从皇村到彼得戈夫，威廉把脸凑到亲爱的表弟的耳边不断地说话，胡子几乎扎到表弟的脸，最后终于说服了表弟不妨碍他占领胶州湾。这股执著的劲头实在令人无法抗拒。

而我们在中日战争后却向中国说，我们与中国不但没有任何争议，而且希望与中国友好相处，还愿意保护中国，防止欧洲人侵略它。依靠这一承诺，我们从中国获得了在北满建筑铁路的权利。后来，中国请求俄国帮助防止德国人侵，俄国对此颇感棘手。后来想出了这么一个答复：俄国可以帮助中国，但需要在中国境内设一个作战据点，有人建议设在旅顺口。于是开了一个会讨论这个问题。尼古拉明白，那样做是不正当的、不合人性的。可是，难道能够用人

类普通尺度来衡量伟大的皇帝吗？总的说来，地球上根本从来就没有皇帝必须遵守的硬性规定。旅顺口是南方离俄国很远的不冻港，俄国为了使本国更强大，很需要它，俄国为什么不能要它？沙皇难道没有这个权力？何况我们应该成为反对黄种人的坚强支柱（阿莉克斯也很反对黄种人）。于是下决心取得旅顺口，租用25年并有权使该港与将建成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连接起来。

威廉鼓掌称赞道，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协定！说实在的，你这一下子就要成为北京的主人了！多亏你做过那次了不起的旅行，你成了东方问题专家。凭你的才智，你以后准能得心应手，大家都满怀希望注目于你这位伟大的东方皇帝了。威廉还打算送给尼古拉几幅版画，描绘他们两人如何携手防止黄祸侵犯欧洲。

威廉的话很有道理。尼古拉对东方确实独具慧眼，也许他是第一位领悟到向东方大大扩展是俄国的使命的沙皇，特别是在别国从未同意俄国取得博斯鲁斯海峡的情况下。不过，德俄两国占领中国领土，一定会引起英国的极大关注。威廉坦诚地向尼古拉透露过，英德两国正在举行联盟问题谈判。难道英国在离间俄德这一对好友？尼古拉告诉威廉，英国以前也曾建议同俄国结盟，企图以此来束缚俄国的手脚，制止它在远东发展，但这个建议被俄国拒绝了。

外交中的诡谲莫测，风云多变，把尼古拉弄得头昏脑涨。他觉得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远比个人之间复杂难办，而各国君主却都是亲戚，不是叔伯兄妹就是表兄妹，娶的妻子也都是亲戚。

强国之间进行着无止境的军备竞赛。这究竟为了什么？它能给谁带来和平？只能浪费各国的力量，引发恶战。有一天，军事大臣库罗帕特金向他汇报说，有些人认为俄国和奥地利为了不落后于其他国家，也为了两国间不要出现差距，两国均应采用速射炮，俄国为此须付出1亿卢布以上。库罗帕特金带着农民的淳朴又加了几句话：我们能不能同奥地利达成协议，两国都不采用这种炮，这对两国都有利，两国力量对比未变。库罗帕特金说完这话后就等着挨训，以为沙皇一定会责备他想得太荒谬，不料皇上竟深深叹了一口气，对他说：

“您对我还不大了解。我非常赞赏您这个主意。我早就反对采用新式武器。”

他觉得这一想法是上帝的授意。他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治国方针。

于是他们对此加以细分。难道只有速射炮？是不是还应提出野战臼炮、爆破弹、混凝土工事、新型机枪？统统是无谓的消耗！它们会使预算无法承受，损害人民福利，所为何来？现存的长期和平时期成了储备前所未有的武器的时期。过不了多少年，所有这些武器都会失去价值和意义，又会要求更新。不如立即向所有大国建议：我们能不能订个条约，不再发展武器？亚历山大二世就曾经向各国建议过禁止爆破枪弹，后来果然禁止了。现在欧洲以外的国家也在很快地掌握现代武器，所以应当赶快提出这一建议。(俄国现已在辽东半岛获得了权益，正应在此时向全世界表示俄国是爱好和平的）经过反复思考，这个主意越来越有诱惑力。正是俄国应当首先提出这种和平建议，甚至可说正是俄国可以决定自己的武器准备落后于其他国家，俄国十分强大，谁也不会进攻俄国。节省下来的钱可以投入农业设施，加强基础建设，这是库罗帕特金梦寐以求的。这是向全世界的土地播撒伟大的种子，这是节省几十亿卢布用于人民福利，还能惠及子孙后代，使他们感激不尽。新世纪一开始，就将铭刻上沙皇的圣名。

1898 年 8 月，俄国政府突然向所有大国发出裁军建议信。事先既未向同盟的法国打招呼，也未与情同手足的德国皇帝威廉说一声，这可使他们毫无思想准备，更重要的是他们来不及劝说尼古拉。这份照会，尼古拉向妻子读过三遍，都觉得写得很好，越读越觉得好。照会呼吁裁军，限制军备发展，以便消除恐慌和不信任感，改变这个充斥着武器的紧张的世界，不再浪费财富，保存各国人民的精力、体力和资本，应召开国际会议并建立国际仲裁法院。

全世界对这份照会都感到突然。报界对之大加赞扬，有的把它捧上天。各国政府则不然，有的加以嘲讽，有的显出敌对情绪。他们说，沙皇在宝座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沙皇是不用理睬民意的，也不用管战争预算能否得到下面通过。法国作为俄国的同盟国，对俄国背着它制订这个照会，感到恼怒。法国已花费了 27 年的时间准备工事，要用武力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地区，这个照会不是拆他们的台吗？英美两国反应较平静，因为照会中没提到要限制舰队，这两国是靠舰队达到目的的。此时，英法两国在非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几度开战。大国间的纷争错综复杂，找不到对各国同样有利的时机来停止军备，不论

何时总是有的国家处于落后位置。即使俄国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博斯普鲁斯海峡问题、远东问题。是否应尽快装备速射炮，以便赶上别国，也可以使别国不要以为俄国是因为自己资金匮乏才提出停止军备的。是否应先更新军事装备然后再提出限制军备？这时，威廉发来了一封电报，向俄皇思想之崇高表示敬意，但他同时立即扩充了本国陆军。

或者放弃这崇高的主张，或者更执著地坚持下去，两者须择其一。许多团体和个人给尼古拉发来感谢函，这足以鼓舞尼古拉坚持下去。1898 年 12 月，他签署了向各大国发出的第二份照会，建议召开多国会议，讨论按人口比例裁减各国军队数量，按国家总预算缩减军事预算，禁止使用新型火炮、新型炸药，海战中禁用潜水艇，建立国际仲裁审理机构。

以上建议是任何人都驳不倒的，各大国无法拒绝出席会议，但他们并不打算达成协议。世界各地报刊与往日一样赞扬俄国沙皇的创举，也赞扬 1899 年在海牙召开的裁军会议，但它并未开创一个新的世纪。德国代表声称，德国人民并不觉得军费负担沉重，而且认为普遍服兵役不是负担而是光荣。几个主要大国组成的委员会否决了俄国的主要建议，而且认为仲裁并非必需。只在海牙建立了监督各大国的国际法庭。

这样，蕴涵在尼古拉建议中的伟大真理就不声不响地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尼古拉把这次失败看做他个人的挫折。他内心矛盾重重，十分后悔，觉得自己干了傻事，给别人提供了笑料，说他自作多情，还说俄国居心叵测。

即使身为真命天子，也难预见前程。原以为是一个壮举，不料却摔了大跤，跌得一身泥。几个大国各抒己见，一些大臣也争论不休，真叫人难受。原来只想到好的一面，没想到结果却是这样。只有家庭生活和生活琐事才是确定无疑的，还有爱妻阿莉克斯，还有给第一个孩子小千金洗澡，还有清晨和黄昏的散步，欣赏神赐予的自然景色。有时乘小艇在水上游弋，有时骑自行车在皇村花园里兜风，有时驯狗玩。晚上观看场面宏伟的歌剧或喜剧，有的剧目连看两次。每逢检阅部队的分列式操练，尼古拉觉得就是一件盛大的喜事，精神倍增。团队在春秋两季都举行不少活动，尼古拉总是去参加。(他的全年活动日程也是参

照团队节日安排制订的，预先订好何时到何团）除了这些以外，就是无穷无尽地签发命令，签得他头昏脑涨；还要每天听两位大臣的汇报，听得快变成傻子了，一边听一边不时地看表，担心耽误了早饭时间，把他个人需要的起码时间剥夺了。没有人明确知道应该怎么办事，但所有的大臣及其下属每天都在自信地做事。

做皇帝，尤其是全俄国的沙皇，真是个苦差事。当一个有妻子儿女的普通老百姓，那才好呢！那就能悠然自得，晚上的时间都是自己的，可以埋头看古代史，读起来心里高兴，历史上的一切都早成定局，后果也早已为人所知。

当然，做皇帝有时也令人骄傲。你过命名日①，甚至德国舰队都会为你鸣礼炮并挂上彩色缤纷的旗帜。当英国与非洲德兰士瓦打仗时，非洲人用捕兽夹夹住英国这个老牌侵略者的士兵，尼古拉知道后幸灾乐祸，心想这才是没抓住狐狸反惹一身骚呢！他对这场战争异常关注，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仔细阅读英国报纸上的有关报道，他不禁暗自觉得骄傲，认为自己是世上唯一能扭转非洲战争进程并置英国于死地的人。他的方法很简单：用电报发一道命令，要俄国驻土耳其斯坦的全部部队作好战备，立即开赴边境。仅此而已。世界上没有任何强大的舰队能阻挠他在英国力量薄弱的地方惩罚英国人。

可是大臣们都反对这么做，他们说我国在军事上准备不足，我国军队装备落后，而且土耳其斯坦与俄国内地还没完全有铁路连接。

的确如此。那不过是一个愉快的梦想而已。尼古拉自己也没有大规模行动的决心，但那么设想也使他感到骄傲，需要做的是加强俄国的交通运输、军队以及俄国在亚洲的影响和地位。俄国的未来无疑是在亚洲，辽阔的西伯利亚使俄国自然而然地置身于亚洲行列。而在欧洲，仅博斯普鲁斯海峡就足以引发战争，还有达达尼尔海峡别人是不肯对我们做出分毫让步的。而在亚洲，我们只需用很少的兵力就能获得丰硕的成果，轻而易举，何乐而不为呢？一旦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车，我们在亚洲能得到的还会更多更多。中国是块巨大的任人宰割

---

①命名日，是和本人同名的圣徒纪念日，主要在一些天主教、东正教国家庆祝。——译者注

的肉，任何一个强国都能随意从它身上割取一块。中国清政府衰弱得奄奄一息，它继续衰弱对大家都有利。但中国已响起了觉醒的声音，民族屈辱感正在增强，1900年夏天，中国人终于举行了起义，群众除打击政府外，还截断了北京到海洋的通道，包围了北京使馆区，据说还在全国杀了几百个白种人。全世界对中国人的暴行义愤填膺。当时那里没有无线电报，外面搞不清不幸的使馆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显然是发生了大屠杀。只好派军队前去解救。欧洲列强对此意见空前一致。组成了多国部队，其中第三支是俄军。俄军占领北京。这时发现外国使馆安然无恙，只不过被一些力量薄弱的中国军队包围，防止起义群众进入。尼古拉为自己参加了这次多国人侵感到问心有愧，觉得很尴尬。维特说，这次对中国采取的敌对行动完全没有道理，何况我们能根据条约从中国得到一切（在这场不大的战争进行期间我已获得了从满洲到旅顺口的一个完整地带）。俄国向其他国家宣布自己即将从北京撤军，建议其他国家也这样做，同时预先告诉各国，不要指望俄国再帮助欧洲各国军队。

真丢脸。我们答应过帮助中国，却同其他国家一起进攻中国。

还发生了一件事。当中国人的暴行消息传来时，布拉戈维申斯克也遭到来自中国方面的枪击，激动的人群把住在当地的中国人从房屋里撵了出去，强迫他们游到黑龙江对岸去，结果许多中国人淹死了。

皇帝的权力是不受制约的。但既不能无所作为，又容易稍有不慎就伤害千千万万人。与其采取过激措施。不如尽可能不采取行动，行中庸之道。按基督教，应该是己（俄国）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但实际的形势都迫使俄国违背了这一点，它建设了贯穿满洲的铁路，沿线布置了守卫队，建立了从大陆通往旅顺的联系线。

这一年，尼古拉废除了往西伯利亚流放犯人的措施，不能再用垃圾一样的不安分子污染这块土地，应该使这块辽阔的净土更干净。他有先见之明，预见到俄国很快就会在这一侧发展。

然而尼古拉的主要精力和脑力花在猜测外部敌人的阴谋诡计上。俄国内部不会有敌人，只有承受皇帝恩泽的臣民，俄国应是团结一致的。但实际上并非

如此。在尼古拉全神贯注地分析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几年里，国内完全不是平静无事的。人们对尼古拉坚决拒绝立宪深感不满，一贯心怀叵测的地方自治官员和一些吃饱了没事干有时间就想入非非的贵族一直在骚动闹事。更糟糕的是有些教授在左右着、毒害着青年学生。

尼古拉登基后的头四年一直相信国内外的问题都可以和平解决，他自己对什么事都是耐心等待，也希望别人耐心等待。但到第五年，即 1899 年，他彻底绝望了：海牙和平会议没有带来世界和平，国内也危机四伏、冲突迭起。

国内危机是突然发生的。彼得堡大学召开庆祝大会，校长在会上讲话时要求学生们以后不要酗酒胡闹。话说得可能粗暴了一些，不太得体，学生们觉得受了侮辱，吹起口哨，打断了校长的话，大会中断了，学生退出会场。这时警察无缘无故地把学生撵到三座桥中的一座桥上，鞭打、驱散他们，使他们深感受辱。这事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学生们宣称永远关闭这所大学，不让上课，也不让人访问。彼得堡的所有大学都跟着罢了课，接着莫斯科和各省所有的大学也罢了课。尼古拉想以慈父的姿态平息事态，指定以同情学生著称的参谋长组成委员会进行调查，禁止警方参与。原指望这样可以恢复平静，但未能如愿。罢课持续了一个月又一个月，基辅的大学教室里还发生了斗殴。又过了一个月，谁也不听调解委员会的话，整个文化教育界都唆使学生继续闹下去。

尼古拉感到，在国际上无论怎么棘手，他都有力量与列强抗衡，但他无力控制国内骚动的青年。只要一想到这些青年学生因贫穷交不起学费，有一半人是免了学费的，有四分之一人还领助学金，心中就不由得升起怒火，国家为什么必须讨好这些大学生？为什么大家都必须尽义务，大学生偏偏不？于是尼古拉同意给予惩治，批准了维特的建议，把一些学生因其不守校规而从大学里开除一、二、三年，开除期间送往军队，即使这些学生不应服兵役或只适于做非战列人员，军队生活对他们也都是最好的教育。

登基头 4 年，他觉得自己的治国方法与其说是继承了父皇，不如说是继承了皇祖父；头 4 年对一些重要问题未能及时解决，也无人提起，现在却出了一连串问题。

芬兰问题，既然芬兰是俄国的一部分，它怎么能不按俄国法律办事？它怎么能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芬兰总共征集了一万名士兵，但俄国却无权调动其中一个人，就是调到别的省也不行。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不惜向芬兰人馈赠重礼，但后来俄国逐渐变得不那么阔绰了。现在，到了世纪的最后一年，需要把本世纪初送给芬兰的土地收回。但那么做，恐怕就难以同芬兰生活在一个国家里了。可是，如果祖上传下来的帝国分裂了，谁能负得起那个责任呢？

地方自治局，皇祖父没有让所有的省份都成立地方自治局。现在，似乎需要其余省份也成立。但维特这个思维敏捷、才华出众、充满自信、精力充沛的人，却一次又一次悄悄说，地方自治局与专制政体是不相容的；地方自治局并未为地主的需要服务，而是只顾自身的壮大并且破坏了专制政体。

问题虽然成堆，解决起来其实也简单。把闹事的大学生送去当兵；地方自治局不再成立；按新的原则征集芬兰军队，对俄国农村村社应加以关注，像眼珠一样地保护。

但农村做出的答复却是歉收，连最富饶肥沃的省份也是。芬兰闹着要完全独立。社会上的动荡大大加剧，人们似乎认为，只要俄国有沙皇，他们宁可不要俄国。这些人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与俄国传统思想大相径庭，简直像是说两种语言，而且无法解释、翻译。在一个半学年里，大学生倒也风平浪静，可是突然在新世纪之初，1901年2月，有一个大学生竟暗杀了教育大臣博格列波夫！皇帝应怎样处理这件事？向学生屈服，听任他们继续暗杀？

审判由民事法庭进行，但它无权判死刑，凶手很快就轻而易举地逃脱了惩罚。尼古拉在位6年间没有判过一个政治犯死刑，也从未想到过以死刑惩罚这些人。在彼得堡喀山大教堂前面聚集了上千名大学生，军警包围了他们，发生了斗殴，逮捕了800人，一时监狱人满为患，就把有罪人犯关到部队驯马场里。被逮捕的人一部分接受了规劝，一部分被开除学籍，一部分被遣送回乡。当时尼古拉指望把这些最不安分的学生处理后大学能恢复常态，就任命了一位较温和的人接任教育大臣，也没有为旧大臣被杀采取报复措施。新大臣上任后先解决大学未经允许不得召开大会问题，并设法改进教学工作。

可不久后又发生了波别多诺斯采夫遭枪击未遂事件。社会对当局的温和措施提出越来越严重的敌意，而且采取了残酷无情的方式。

次年，即1902年初，青年学生又枪杀了内政部长西皮亚金。社会各界对此毫不掩饰地额手称庆。

这时尼古拉震怒了，这些枪弹实质上都是向他射击的，这些人不要他执政，要他投降。但他不动摇。他的皇位是历史赋予的，全体人民拥护他，只有一小撮知识分子反对而已。于是他任命了主张镇压的普列韦为新的内务大臣。

大家都是俄国人，本来在国内应该是有话好好说的，但偏偏出了这些刺头。既然大家都热爱这个国家，都希望它好，为什么不能一起和和睦睦生活？

尼古拉喜欢在4月的夜里到偏远的乡间去，第二天打猎。后来精力仍然充沛，在听完大臣汇报后才稍微睡一会儿。他又去巡视兵营，对军人的服役表示感谢。他还常去观看军事演习，饶有兴味地长时间聆听演习分析会议。他还喜欢看步兵演练散兵队形，喜欢骑马停立在枪骑兵、猎骑兵回营房必经的路口上，喜欢在天气晴好时夫妻二人一起划划小艇，观赏那如镜的海面，或者去看各种小艇的竞赛。晚上去看令人开心的歌剧，夏天则到皇村剧院。

但令尼古拉感到最舒畅轻松的享受，莫过于出席军官集会宴会了，他往往在那里待很久，直到晚餐甚至晚餐后，才无拘无束地交谈，听别人讲一个又一个军旅故事，听茨岗人或俄罗斯人的合唱歌曲。深夜两点钟才回到宫中，第二天起床时满脑瓜还想着头一天的快乐。

很多人可以只顾自己一家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轻松啊！年轻的沙皇却要照顾几十位亲王及其夫人，照顾堂兄弟、表兄弟、伯伯、叔叔、舅舅等比他年龄大得多的亲戚，要关心他们从皇室地产中得到多少收益，关心他们担负的职务，甚至还须关心有的人迟来的恋情，如米哈伊尔叔叔和巴维尔叔叔都不顾皇族身份，不愿抑制自己的感情，竟和平民女子结了婚。这种可耻的行为，致使他们被撤掉了所有的职务，剥夺了称号并逐至国外。这件事使所有的皇族成员感到十分痛心。

弟弟格奥尔基也应是皇位继承人，他生性谦和，好沉思，喜独处，被结核

病折磨得憔悴不堪，住在高加索山区，比父皇多活不了多久。

治理一个国家是很难的，不像自己的头脑管理自己的身体，也不像管理皇族内部，而是要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去关注整个并不属于自己个人所有的广阔的土地。尼古拉在冬宫花园玩或者骑马在皇村兜风时，常常在心里比较他的大臣和与他谈过话的人的各种互相矛盾的意见；他思考得那么紧张投入，不禁挥舞起手中的凿冰铁棍或策马疾驰起来。

治理一个国家的困难还在于很难与被治理的人交往。在一个房间里关上门同两三个人交谈，或者在宴席上与同席者交谈，是很容易的。在军人当中、近卫军当中也很愉快，很容易交谈，张口就能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不久前，他参加帕热斯基团庆祝会，会开得很长很热闹，形式活泼，尼古拉非常高兴，即席讲了很多话。可是一到非军人的会上，特别是知识分子会上，他就张口结舌，言辞笨拙，双手也像被拴住，做不出一个自自然然的手势，舌头发僵，发不出一个清晰的字眼，而且老是担心自己会脸红，被别人发现他在发慌，有时他简直恨不得钻进地下逃开。在帕热斯基团庆祝会前后他还不得不出席了国务会议的庆祝会和俄国建立内阁各部百年庆祝会，尼古拉在会上如坐针毡，没讲一句话。差不多人人天生都能做到的在人群面前举止自如，他却偏偏做不到，那时他就口齿迟钝，手足无措，只好希望靠沉默来显示出他的尊严。

治理国家之难，还难在做出正确的决策，难在选用忠实可靠的官员。好几次，尼古拉以为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但事与愿违，后来决定并未奏效或者根本无法实行。也有好几次尼古拉以为找到了得力官员，但许多人却异口同声地说他找错了人。给他出谋划策的人从未意见一致过，总是互相对立，使别人不由地得出结论：这些人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对。年复一年均如此！尼古拉对这些人越来越不信任，对他们的话也越说越少，只问问他们有什么意见，而且事先心里已认为他们的意见准是错误的。身为沙皇，他的直觉本能能够把更可靠的办法暗示给他。

大臣们也形形色色，有的谦逊，有的任性，但都同样坚持说自己的主张和行为正确，却同样不时提出要嘉奖某人、任命某人担任什么好职务或进入什么

监护委员会或退休担任国务会议名誉职务。皇上本人也答应过克舍辛卡雅，免除她因着装不当而应缴的罚金，为此不得不拿剧院经理作替罪羊。有的人，如维特，向皇人鼓吹用人要看才能，依靠有才之士。其他人则相反，鼓吹用人只要看忠诚可靠，皇上的亲信不应是才子而应是中庸之才，是纯正而又能努力工作的人。沙皇做每件事都很艰难，也很费时间，需听取一个又一个人互相对立的意见，需阅读下面呈上来的一摞又一摞的请示报告，皇帝的决定实际上已是可有可无的。由于大臣间矛盾纷争不断，尼古拉对他们的信任也越来越少，资格越老越不信任，他们只有退休后才能重新获得信任。当大臣们对他作汇报时，他装出注意听的样子，心里却觉得很无聊，不过一旦听到汇报中引人发笑之处，他也会快活起来。如果大臣们敦请他立即否决某事或他们的意见有分歧，尼古拉就隐藏起自己的真实态度和看法，事后征求其他不常见面、地位不高、眼光犀利、为人正派的官员的意见，不再与相关的大臣和机构商量就颁布命令。

若是皇帝能直接知道人民的意见那该多好。大臣像一堵墙，隔在他和人民之间。

遗憾的是，阿莉克斯和母后之间有时也有不同意见，众多的亲王（其中许多人企图对决策施加影响），还有各式各样获准参加接见的头面人物，意见也常有分歧，这就常常导致作决定时久议不决，有时决定了的事后来又改变，尼古拉感到左右为难，后来学会了愈来愈坚决地说："我想这么做"，"我不想对我再提此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尼古拉自信心越来越强，不再认为自己不如别人。他到底是有上帝赐福作为后盾的，早就该记住自己是专制君主。阿莉克斯也讲到这点，他生来就有大智大慧，能比所有其他人更好地治理国家，只不过需要自信心，听从心灵的暗示，心灵是永远不会欺骗的。俗话说得好："沙皇的心是上帝操纵的。"尼古拉须对历史负责，历史是会理解他选择的道路的。有些当代人不欢迎他的政策，那无足为奇，因为这些人本无信仰，对世界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幸运的是阿莉克斯与他彼此十分理解，互相支持。

不过，尼古拉有时出于人人都有的迫不及待的心情，总想通过神秘联系更

准确地得知上帝的旨意，有的专家能人是掌握这种联系方法的。有的通灵术大师能与彼世交往，能准确洞悉许多秘密，不妨借重他们。正好有这样一位令人五体投地的能人来到彼得堡皇宫，他就是法国里昂通灵术大师兼医生菲利普先生。他向沙皇进言说，用不着任何出谋划策的官员，只要有神明的启示就行。他毫不费力地召来了亡灵，其中有先皇亚历山大三世的魂灵，他要弥补生前未尽之业，向儿子传达了治国方略（最初的一个指示是：应向车尔诺哥尔斯克公爵发 300 万卢布养老金）。菲科普还答应帮助皇上解决家庭难题：阿莉克斯已经生了 4 个女孩，还没有皇子。菲利普告诉阿莉克斯，她已经怀上一个男孩了。沙皇夫妇因此高兴了好几个月，但后来搞清楚，根本没有怀孕，这使他们伤心了一阵，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也引起了上流社会的谣言，说皇后生了畸形胎儿，不得不闷死了。这个谣言使阿莉克斯和尼古拉的精神受到很大伤害。他觉得，在俄国，与他最疏远的是虚伪的上流社会，这些人当面卑躬屈膝，背后却随时会背叛你。由于讨厌上流社会，他们不愿受礼节束缚，加上生性爱过平淡生活，沙皇夫妇不再举办宫廷舞会，只在家里度过温馨的夜晚，星期六则去做通宵祈祷。

世界上人人都有仇敌，菲利普先生也不例外。有些人说，菲利普不是医生，法国追究了此人的诈骗行为，但此人此时已是俄国沙皇夫妇的贵宾。沙皇闻讯大怒，气得把文件掷到地上，还用双脚踩，接着就下令要求法国总统给菲利普补发他所没有的毕业证书。俄法为此举行了会谈。法国政府害怕以后议会追究此事，不予补发。于是俄国决定发给菲利普一张俄国大学毕业证书，封他为四等文官并授以贵族称号。这时，俄国警察局派往法国的首席侦探拉契科夫斯基多管闲事（其本职工作是调查在法国的俄国革命者的情况），他向国内密报说，菲利普先生确实是个没受过教育的肉贩子，法国警察禁止他为人治病，他就转而搞起催眠术来。这封密报使沙皇极为不快，他下令把拉契科夫斯基从巴黎调回并撤职。

菲利普的光辉前程受到种种阻挠，这种情况延续了近一年，最后沙皇断然下令完全拒绝大臣意见。他认为这是上天旨意，遗憾的是，菲利普不能从上天那里为他求得如何在远东正确行事的关键性指示。

但沙皇能够看准远东，这显然就是上帝旨意的表现。俄国东方与中国接壤，这也是天意。东方现在力量微弱，需要外国伸出强有力的手帮助，俄国不伸手，更待何国？十分明显，尼古拉在位时的宏图大略，就是把俄国的影响势力远远扩展至东方，攫取丰饶的满洲，吞并朝鲜，乃至把国境延伸到中国西藏。阿莉克斯听到这些话后深表赞成，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不致发生战争，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最赞成尼古拉从速实现上述伟大目标的并非是他的大臣们，而是德国皇帝。这段时间里，尼古拉每年都与这位表兄见面，平时还有友好的书信往来，威廉对他总是热情的，甚至可说是热爱的。威廉甚至似乎预先对本国舰队下过指示，要他们只服务于协助尼古拉维护世界安宁。威廉修筑柏林—巴格达铁路，似乎也只是为了运送俄军去对付英国。1902 年，尼古拉在列维里（塔林）与这位表兄兼密友见面，在其忠诚乃至恭顺的态度感动下，向他披肝沥胆倾诉了自己想夺取亚洲的伟大计划。威廉在登船离去时优雅地向他道别，然后通过海军旗语向他说："大西洋海军元帅向太平洋海军元帅致敬!"最后的署名是：永远维护你的威廉。后来，威廉果然把德国间谍在亚洲搜集到的英国的秘密敌对活动和日本备战的情报通报俄国。威廉还提醒尼古拉说，俄国要警惕敌国结成克里木联盟。那些由乱吵乱嚷的议员多数派操纵的民主国家总是反对稳定的帝制国家的。尼古拉在推行亚洲计划时，也确实看到英美持敌对态度，法国虽是盟国，实际上也并不友好，对此计划反应冷漠。尼古拉向人们解释说，欧洲大陆上的人都明白，俄国也须遵循扩张规律，也应该靠近海岸并拥有不冻港，以便开展贸易，因此俄国应得到中国满洲，作为其接近海洋的地域，还应得到朝鲜，以免它成为贸易中的威胁和障碍。欧洲大陆任何一个无偏见的人都会明白，朝鲜应归俄国所有，至于何时用何种方式做到这一点，那是俄国皇帝及其国家的事，与旁人无关。

遗憾的是俄国的大臣同其君主意见不一致，不过他们自己的意见也不一致，而且前后自相矛盾，这使尼古拉感到欣慰。维特就是变化不定的家伙，在满洲修筑铁路原来是他想出来的，他原来还主张多派些军队去，后来却主张撤军，

免得为了养这些军队借外债以致引起国内金融危机。军事部长库罗帕特金本来应该比别人更赞成沙皇的军事意图，却像个婆娘一样唠唠叨叨地说我国没有力量同时在西方和辽阔的亚洲用兵，他主张根本不去碰朝鲜，也不去碰南满，放弃中国人的圣城沈阳，我们反正是守不住那个城市的，反而会招来全世界的反对，我们只要北满，它可护卫阿穆尔河和铁路，边界线可减少一半，不会与日本发生冲突。库罗帕特金特别害怕这个冲突，因为西伯利亚大铁路还需几年才能竣工，现在火车是靠渡船才能过贝加尔湖的，一昼夜才能过三列车。尼古拉心想：这个库罗帕特金怎么不明白，日俄冲突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日本不敢。这时，维特又来一个大转弯，赞成兼并整个满洲了，甚至提出在朝鲜开办林业租让企业。普列韦指望亚洲发生冲突能转移视线，平息国内的不安。但库罗帕特金却吓唬说，与日本打仗肯定是极不受人民欢迎的，国内的动荡势必加剧，如果我们只占北满，一定能避免任何战争。

有这么多谋士，完全搞不清谁是谁非，不如一个没有。幸亏尼古拉对东方的了解胜过他们所有人，也比他们所有人更能用心灵感悟到俄国的光荣和利益之所在。

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在全俄国从未停止过闹事，这种闹事莫名其妙地造成了人们普遍有极端的不满情绪，不管你怎么做，你总是不对。没人禁止报上的无耻文章，尽是些污蔑人侮辱人的小品文，唆使人们破坏秩序的言论。到了这种地步，应该怎么办？如果父皇在世，他会怎么办？有人告诉尼古拉，曾经有一个叫策布里科娃的女人写了一本反皇帝的小册子，其手抄本在两个首都流传甚广，有关当局打算逮捕此人，亚历山大三世却下令：别抓这个蠢老太婆！现任政府也试图放任不管，但这些人却越来越放肆。也曾试图加以惩罚，有的地方解散了地方自治局，有的地方逮捕和流放了学生，但局势还是越来越坏。所有的麻烦根源全在于：俄国人只要稍微受了一点教育，就一定会马上变成政府的敌人，往后不论你用硬办法软办法，都休想改变他的立场。倘若你委托他对农村情况进行统计研究，目的是改进农村现状，他就会把统计变成为煽动焚毁地主田庄。如果把那些政治上顽固不化的分子送往军队，那就会使军队不愿履行

职责乃至陷于瓦解。而日本全社会上下一致同仇敌忾支持政府反对俄国，爱国主义使他们团结坚强，俄国社会却像神经失常一样，完全不考虑俄国的荣誉及其贸易。他们不但不希望扩大俄国影响，反而每当你获得一点成功和胜利，他就要给你喝倒彩，对远东政策老是骂个不休。

这么一来，兼并东亚的伟大构想越来越沉重地压在皇帝一人肩上。但社会动荡不过是暂时的、非法的、不合理的障碍而已，倒不必害怕。

可是，对于这个伟大构想，沙皇本人也不能简单明了地说清楚，倒像是在亚洲辽阔土地上空飘浮的一片白云，一会儿飞到西藏，一会儿到印度，一会儿到波斯，谁也搞不清其范围到底多大，只知道要从满洲铁路开始干。有了这条铁路，就意味着其终点有一个不冻巷。有了这条铁路，就意味着要护卫它。难道摇摇欲坠的中国政府有力量护卫它？中国 1900 年的骚乱导致俄军占领满洲，那次占领是暂时的，是俄国不情愿的，不过是由于当时的形势不得已而为之。但中国骚乱结束后俄军却继续驻扎在中国，这引起了普遍的不满。1901 年初，俄国不得不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表明俄国尊重中国的不可侵犯性，一旦北京中央政府和满洲局势恢复正常状态，俄军就会尽快撤出满洲。不过，这是中俄两国自己的事，别国不必在旁说三道四。恰好在这个时候，中国清政府因畏惧日本的威胁，不想与俄国签订俄军撤出中国的协定。这种态度解开了俄国的约束，俄国政府从此能够完全自由行动，也根本谈不到把满洲无条件地归还中国的问题了。只要中国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秩序，这个问题就提不到日程上来。但这种情况严重地刺伤了日本，它俨然以中国的同盟国姿态出现，扬言要保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反对俄国的阴谋诡计。俄国今天取得的正是日本 6 年前不得不放弃的东西，它当然不肯罢休。俄国驻日大使费尽口舌说服日本不用担心，只有西方列强才想把中国变成殖民地，俄国与日本同属亚洲国家，其亚洲利益纯属我们亚洲家里的事情，俄国并不想吞并满洲。话虽这样说，但为了以备万一，我们也试探过，如果我们正式宣布俄国打算兼并满洲，会有什么结果？是否那就会势必把满洲归还中国？这问题老是拿不定主意，使人心烦意乱。肯定说，西方强国没有一个会对此公开站出来说话的。可是值不值得为了满洲而得罪日

本？当然日本是怎么也不敢单独同强大的俄国打仗的。如果我们从满洲撤军，我们怎能阻拦其他强国前去开发？除了满洲，还有旅顺港，这地方无论如何应该属于俄国。库罗帕特金非常肯定地说，这个港口就是被围攻10年也挺得住。还有朝鲜，这问题最复杂。按1896年协定，日俄在朝具有同等权利，按1898年备忘录，朝鲜应是独立的。但过去几年里日本蛮横无理至极，企图攫取朝鲜的全部政治军事权利。俄方代表每次向日方表示俄国不能对这个毗邻的小国的状况漠然置之，也不能容许在那里建立一个外国政权，但这种表示毫无效果。极具影响的日本前首相井户侯爵曾到过彼得堡，尼古拉接见过他，对他作过详细的解释，但井户表示日本怀疑俄对朝有隐秘的野心，而日本本身也需要在朝取得政治军事权利。井户建议日俄签订一个新的协定，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权利，理由是朝鲜十分弱小，无力独立生存，只字不提满洲，这就等于说俄国可以在满洲自由行动，今后不会再有什么事妨碍日俄亲密友谊，因朝鲜是两国唯一争端。尼古拉毋须大臣们的帮助自己就一眼看穿了这个建议对俄国不利，对俄国毫无好处：满洲本来已在俄国手中，日本在大陆上还没有找到一个立足点，一旦它在朝鲜得手，它就会截断俄国的通路。俄国在自然而然地向外扩展时，也必须使用武力来向朝鲜扩展从而获取经济利益。日俄两国未能与1901年12月达成协定。

日本紧接着就与英国结成军事同盟，英国刚从特兰士瓦拔出脚，就马上站出来支持日本。法、德两国是否也会这样？法国急急忙忙表示说，俄法联盟只适用于欧洲事务，德国除了威廉写来一些甜言蜜语的信外，没有明朗地表示愿意帮助俄国，甚至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老朋友也翻脸反对起俄国来，显然是受了欧洲社会舆论的影响。

世界虽大，俄国却孤单无助。

俄国虽大，沙皇却孤单无助。

然而沙皇却舍不得放弃那伟大而神秘的亚洲构想。尼古拉应当鼓足勇气引导俄国沿着那条前人未经过的航道前进。遗憾的是，所有的现任大臣都没有能力做这件大事，这就是说应该绕开这些大臣，寻找使用真正可靠的助手。

这样的助手首先当推桑德罗（娶克森尼耶的妹妹为妻），此人对工作异常热情，如加强俄国太平洋舰，他不顾朝鲜政府的无理反对在朝鲜北部开办了林业租让企业。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也同属此类人，他认为俄国过分让步会引起日本提出新的要求，尼古拉完全赞成这位勇敢的人的观点，也认为怎么也不能让步！如果与日本开仗，与其在满洲打，不如在朝鲜打。朝鲜应该属于俄国。不能从沈阳地区撤军，如撤，旅顺口就没有保障。海军元帅阿巴札也是一位了不起的高参，他原属陆军。最最令人称心满意的助手是桑德罗推荐的退休将军别兹奥勃拉佐夫，他原属重骑兵，深谙军事，性格果断，他夸下海口，说他一眨眼工夫就能为俄国拿下满洲和朝鲜全境。沙皇委派他为自己在东方的私人侦探和全权代表，封为御前大臣，让他直接用暗号与皇帝通信，毋须通过那些犹豫不决的大臣。这人是皇上的眼睛，敏锐地监视着众人，看他们是否为皇上卖力，是否执行了皇上的命令。别佐布拉佐夫阅读总司令部秘密资料后，不顾那个迂腐的军事大臣的反对，提出完全毋须在西部边境加强力量，应把全部力量用于扩张东方。他还说，俄国在朝鲜的林业租让企业很快就能取得丰厚的利润，东方很快就能收回成本。他大刀阔斧的作风大大鼓舞了沙皇。别兹奥勃拉佐夫在东部被一大批侍从簇拥着，到处发号施令，根本不同俄国其他大臣商量，不考虑俄国在外交上承担的责任，更不向不足挂齿的中国政府打招呼。他独断专行，认为只有这样独裁才能把远东事业推向前进。尼古拉对自己选用了这样的人并摆脱了各部大臣的监督感到非常得意。他现在绕过谨慎小心的外交大臣，直接与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和别兹奥布拉佐夫联系，不过这两个人之间也存在矛盾，这颇使尼古拉感到沮丧。他从来不曾同时有过两个意见完全一致的助手。

但他这时已真正坚强起来，觉得自己真正是一位专制皇帝了。

东方事业进行得顺利，所谓的抵抗都不过是胆小的臣子们想象出来的，俄国的影响正在不可阻挡地增长着，不过还是太慢。

1903 年夏，尼古拉实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亲自前去参加了一次尊列圣徒的仪式。这次尊列的是圣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早在尼古拉曾祖父时代已经归天。尼古拉没带一名国务人员，也把国务完全置之度外，甚至没带宫廷

侍从。他像是从无信无义、尖刻挑剔、腐败无能的彼得堡小天地逃出来，奔向圣地和自己的人民。他的希望得到最最完满的实现。尊列典礼在知识分子眼里是滑稽可笑的事，但却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从许多遥远的地方赶大车前来参加。既不需要宫廷典礼官，也不需要警察，当然也不用卫队。来朝圣的蓄大胡子的男人和扎着白头巾的女人把赶大车的马卸在旁边，自己聚集在修道院的广场上，又拥到林间大路两侧，观看他们的沙皇抬运圣徒的灵柩。祈祷仪式或在各个教堂轮换着连续举行了4天，修道院院墙里人群挤得满满的，还有许多人在墙外跪着祈祷。在漆黑无风的夜里，灵柩被从原修道院抬到一所旧教徒隐修院，一路上簇拥着许许多多教徒，他们浑厚的歌声从四面升入夜空。尼古拉觉得自己从来不曾这样惬意和幸福。这次，他目睹了老百姓对上帝的信仰与他一样坚定、热烈、虔诚。从这个老百姓的祈祷中他看到国内另一地方，那里上流社会离经叛道，教授纷争，学生闹事，报纸胡言乱语，革命者凶狠残暴。从皇村、从冬宫看，外面是一片可怕的景象；从这里、从俄国的真正腹地看，一切像是在从未见过的美梦之中。假如让这些农民当法官，审判那些应该念书却在罢课的学生，这些农民会说什么呢？沙皇想起这年春天他终于摆脱了大臣对他的约束，心里不禁快活起来。他给这些善良的农民取消了残酷的连环保，不再让无罪的人为有罪的人、听话的人为不听话的人受罚。他就这样不靠公文，不靠办公人员，也不靠上流社会，接触到自己真正的人民，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沙皇，俄国正渴望出现这样的沙皇啊！真理在人民心中，真理也在沙皇心中，此刻在萨罗夫感受到了这两者的联系，以后怎样才能经常再感受到呢？沙皇的意志怎样才能表达人民的意志呢？

“求你保佑我们不因有所向望而受辱……”

尼古拉从萨罗夫回到宫中，心中充满从未有过的自信心。他完完全全懂得了他作为无上君主的意志是必须实现的，任何障碍都必须铲除。他立即给维特下了一道命令，要他光荣地半退休。这个人每周都提出一个新花招，可是社会上一旦为此喧闹起来，他就自动打退堂鼓。现在，沙皇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把远东事务完全从俄国事务分离出去，确立了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专门总督

的地位，使远东脱离了所有大臣的管辖，让阿列克谢耶夫握有军队指挥权、地区管辖权以及与日本、中国交涉的全部外交权，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样，皇上轻松多了，只须坐待成功报喜，不用伤脑筋了，而且，到了秋天，他还须摆脱国事，离开俄国，因为德国黑森公主不幸早逝（阿莉克斯哀痛至极，哭得像个泪人儿），沙皇伉俪须到阿莉克斯故乡去住几个月，哀悼亡者。

现在，日本见到俄国决心很大，一定不会捣乱了吧！但想不到日本竟并非如此。它居心何在？8月，日本送来一份建议书，尼古拉读后气破了肚子。俄国间谍从日本送来密报，说日本正在备战，其实日本这样做无异于自杀。战争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当然也须避免它发生。阿列克谢耶夫与日本人会谈时态度既异常强硬，遗憾的是他又同别兹奥布拉佐夫争吵起来。现在俄国须派兵重新占领沈阳并派兵进入朝鲜。11月里，局势平静。12月，俄国军事间谍突然密报，日本政府已决定开仗。威廉不知道从哪儿也得到消息，也说日本定于次年1月中旬发动战争。日本报纸已情绪激昂。8年前，只要我们对日本喊一声："后退!"他们就乖乖走开了。现在，我们也应同样坚决，决不后退一步，说话应该强硬。时间是俄国最好的盟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愈来愈强大。1月，日本向我方蛮横地提出要求：把朝鲜完全让给他们。他们没对满洲提出要求。尼古拉觉得外交大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任何积极的政策都会遭到他的阻拦，以至皇帝不得不背着他别出心裁：派了两名精明强干的卡尔梅克人到中国西藏去煽动当地人反英，不料反而造成了一个令人困惑的局势。如果真的爆发战争，那应把它推到一年半之后，直到俄国把西伯利亚大铁路两头在贝加尔湖连接起来。当然，最好还是保持和平。1月26日，尼古拉召集群臣开会商议，一个个发言慷慨激昂，都说我们爱好和平，比日本人更遵守海牙会议精神，日本人终究会觉悟过来的。傍晚，尼古拉观看歌剧《鱼美人》，演员唱得极好。他一回到家，就收到阿列克谢耶夫总督发来的电报，说昨天夜里日本人狡猾地攻击了旅顺口，击伤俄国两艘战斗舰和一艘巡洋舰，使我舰队与日舰队相比处于极不利局势。

我们对这一巨大灾难甚至未能立刻理解，不明白发生的是什么事。很多天里，我们只是对这种强横行为表示愤慨，决心对这种背信弃义行为进行应有的

惩罚。军事部长库罗帕特金受命指挥野战军，他自信能很快取得胜利，不会受到重大抵抗。在大陆上歼灭日军后应该在日本列岛上登陆，占领东京，打垮日本人，即使与英美一起行动也行。俄国勇士呀，日本人会知道你的厉害的！令人痛心的是，俄国人自己对本国的舰队评价很坏。

在形势紧张的那些日子里，尼古拉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日常事务需要处理，也很劳神。阿莉克斯一连几个礼拜身体不适，现在已经确定她是怀孕了。她还患偏头痛，总是躺在床上，只是偶尔换到沙发上，很少出来吃饭。沙皇不能与她同出同进了，只好独自一人前去观看《诸神之垂暮》，去听联合合唱队或安德列耶夫三弦琴乐队音乐会。当然，更喜欢的还是晚上与阿莉克斯一起，给她诵读。光阴不知不觉地逝去，尼古拉每天无非是接连不断地听汇报，读呈文，喝茶，吃早餐，与母后或皇室其他人一起出席音乐家宴，参加教堂例行祈祷，有时参加追荐祈祷，安魂祈祷，房屋圣化祈祷；散步只限于冬宫花园内；有时去观看服装色彩斑斓的卫队换防仪式；有一次他竟爬到屋顶上去了。彼得堡整个冬天冰雪未化，出门非坐车不可。3月初又刮起讨厌的尘土。只有星期日可以摆脱一切事务，尼古拉只带一名随从或几条狗，逃到白雪皑皑的皇村，欣赏美丽的园景，在那里流连忘返。整个夏天到罗布夏去打过两次猎，有一次他一个人一天就打到100来只野鸡。还到加来岛海军部新楼房的波罗的海船厂参观制造军舰，厂里的工作热火朝天，工人笑容满面。这种情景稍微减轻了尼古拉内心感受的屈辱。不久前，莫斯科大学有40个混账学生发电报给日本天皇，祝贺日本占胜俄国。弟比利斯、特维尔的十年制、七年制，甚至教会女子中学的女学生上街游行时高呼："日本万岁！打倒专制政权！"

应该等待、忍耐。远方的战争长期需要给养，需要集中力量。西伯利亚大铁路工程在贝加尔湖暂时停止进行了。波罗的海舰队绕行非洲和亚洲的航行不可能很快就准备好。法国在近几个月里宣布与英国达成由衷的一致，不再帮助俄国。威廉早就说中了，他们迟早会在克里木半岛问题上结盟的。可是我们却正因与法国有协议才未能从西部边界撤出本国军队。只有德国威廉的真诚友好超过往常，他以获得俄国赠送的海军上将称号和尼古拉对他人信任为荣，

劝说尼古拉同他一起等待上天赐福；当尼古拉遭到挫折时他总是巧妙地劝慰尼古拉，而欧洲、美洲的自由派报纸，乃至俄国本身的自由派，都是公开地嘲笑尼古拉的。

战争爆发，这真是一场注定倒霉的战争。日本人似乎不慌不忙，每走一步都成功，而俄国每走一步都失败。尼古拉在没有收到东方的电报时，心里比较平静，因为电报报的都是坏消息，尼古拉对阿列克谢耶夫抱很大希望，给他写过一些长信，也收到过阿列克谢耶夫发来的鼓舞人心的电报，可是这些电报里讲的好消息后来都未能证实。日本人在旅顺口使俄国受到重创，又不让俄国向符拉迪沃斯托克方向运动，复活节时日本水雷炸毁了俄国最好的铁甲舰，优秀的海军上将马卡洛夫在舰上殉职。日军在大陆上集结，后转入进攻，俄军却未能合拢，从俄国运去的弹药粮食均不足，结果就在辽阔的满洲大地上畏畏缩缩地向后撤退，丢失了大炮（从鲍罗金诺之战开始，我们就没有丢失过大炮），接着部队开始瓦解，有的撤退到北满，有的撤退到南边旅顺口里面，失去了有利位置。俄国昨天无论在世界、在国内或在皇帝本人眼里还是无比强盛的大国，不过才经过几周就突然不堪一击，兵力微弱并且布置不当，最糟糕的是位置不对：陆军在大陆上位置不对，舰队在海上位置不对，闭守的港口也不对，海军变得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犯的错误简直不可饶恕。

在这样的令人感到可耻的时刻，尼古拉认为保持自己最高尊严的办法，就是完全不动声色，隐藏自己的屈辱感和悲哀，一定要做出日常职务的履行丝毫未受影响的姿态。他如同往常一样，到园子里去敲碎正在融化的雪块，室外的新鲜空气和运动使他情绪好了起来。凡是要他出席的典礼仪式，他一个不漏，诸如升御旗仪式，军校操演分列式（他自己也知道怎么才能走得优美灵巧），皇宫广场的检阅和进攻演习，胸甲骑兵周年庆祝会及其检阅式，御前骠骑兵或枪骑兵的团队训练以及其他各式各样阅兵和团队活动。他在队伍前面或士兵食堂里按传统喝一盅酒，在军官集会时与他们一起吃早饭或吃些小吃。他接见所有军校的毕业生，出席气球升空式，视察以皇后命名的军用医疗列车，还查看新式海上行军装具，见到这东西设计制造得十分精巧，不禁高兴起来，对俄国军

队的前途想得乐观些了。尼古拉还同从远东回来并将重回那里的伤病员谈了话，这也使他受到鼓舞，他通过与这些人的接触甚至觉得自己亲自到前线体验过那儿的生活了。最使他情绪昂扬的是在彼得堡欢迎“瓦里亚格”和“朝鲜人”两舰的英雄，尼古拉在冬宫宴请了他们。

每周星期六和星期日的祈祷仪式例行不误，还有复活节大规模的互吻3次的礼仪，有700名宫廷侍卫和普通士兵担任保卫。尼古拉场场必到，他尽心尽力地祈祷，希望以此来弥补他不能亲身穿越西伯利亚给远东作战军队以帮助。同往常每年一样，在4月里他也为在日本大津遭日本人暗杀幸免于难的纪念日举行了祈祷仪式，今年这个纪念日具有象征意义，上帝在这一天曾降福于他，是有所启示的。

尼古拉也照常听取大臣们或长或短、或中听或烦人的汇报，不时还须昏头脑涨地阅读呈文并在上面作批示，也照样不放过许许多多琐细小事，发各式各样的指示。如果长时间收不到阿列克谢耶夫发来的鼓舞人心的电报，他就同海军大将阿列克塞皇叔或海军上将阿巴扎谈天，倾吐心中的苦闷，他正是为了这个才把两人留在彼得堡的。

皇帝家人每年居行是规律的，现在没有理由加以改变。春天冰消雪化将尽时，全家住到皇村，仲夏时节住到海边的彼得戈夫（圣驾车队刚驶进时，枪骑兵团按传统在亚历山大公园路上列队恭迎）。按次序更换喜欢的住地，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享受。在彼得堡最惬意的事是上剧院，看历史文物珍品展览或考古出土文物展览，但在彼得堡散步却嫌人多太拥挤，坐车兜风也只能顺着沿河大街跑。在亲爱的皇村什么天气都能游玩，即使下着瓢泼大雨或吹着大风也行，当然最好还是阳光温煦的时候。有时骑马到巴甫罗夫斯克闪遛，有时成群结队到加特契纳的维纳斯亭去喝茶和举行露天烹调。今年夏天还想出了一个新招：坐铁路上的小机动车出去玩。春天，有两次到雷鸟发情聚集的地方去打猎，平时也在皇村公园里打乌鸦，最初一天只能打到一只，后来能打到两只。在彼得戈夫时常坐小舢板或电艇到海上玩，只到浮标为止，也常常带着小狗到海边玩，有时只在小河沟里光着脚淘气。这样消磨时光，心里非常平静。他才36岁，还

年轻，具有多方面的需求。每星期日都必须在家里休息，不听任何汇报，这时精神得以彻底轻松，好像世界上什么可怕的坏事都没发生一样。但即使在家宴上也不能完全摆脱烦恼。阿列克塞叔叔显然在亚洲事务和日俄战争中抓的权太多了，母后却不同意撤掉他在海军领导机关中的职务。铁甲舰被炸毁时马卡洛夫牺牲了，基里尔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弗拉基米尔叔叔要求现在让基里尔休假并到国外治疗，毫不顾忌发生了这么多悲惨的事。

这一年，尼古拉还在家里庆祝了订婚10周年和登基8周年（对这两个日子的回忆也起了振奋精神的作用。涂油加冕仪式并非是白白进行的），但这一年最令人关注的事是阿莉克斯怀孕，她第六次燃起了生个儿子的希望。尼古拉对她体贴得无微不至，几乎天天陪他坐在马车软椅上沿皇村或彼得戈夫林阴道或在公园里兜风（有时有几个女孩骑自行车跟随着），在她体力稍佳时还陪她到池塘里划小船玩，有时阿莉克斯带着孩子坐在马车上，尼古拉骑马跟在旁边。一天没见到阿莉克斯他就受不了。这时他忽然想出了一个奇妙的主意，他感到他作为君主，心中自有左右战事的良策，比总参谋部高明得多，也不用依靠供给、装备和粮食。如果没有这个主意，尼古拉是怎么也不会同阿莉克斯分别的。

这个主意是，由沙皇本人直接向部队赐以祝福。他亲自在各部队面前现身，向他们祝福，可以整个团整个营或整个队，也可以个别地进行。沙皇向他们赠送圣徒（如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像，官兵们亲眼目睹沙皇御容并听见他的祝福，必能鼓起士气，这能大大弥补军事准备和领导中的不足。阿莉克斯听到这个计划后大加赞赏，还同他一起挑选圣徒像。沙皇无法见到在东方作战的部队，但可以见到整装待发的部队，尼古拉决定对他们一一赐予祝福，一个不漏。他下令各地部队出发前的阅兵式地点一律须靠近同一条铁路，这样他同阿莉克斯的分别不至于超过一周，几天内就可以巡视并祝福许多部队。他的第一次巡视到过别尔戈罗德、哈尔科夫、克列门楚格、波尔塔瓦、奥廖尔、图拉、卡卢加、果赞。各地部队军容优良，表现出色，纪律井然，甚至在滂沱大雨之后队伍行进得也很好。沙皇亲自前来送军人上战场，记住他们每一个人，向他们每一个人赐予祝福，军人受到鼓舞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尼古拉由于身边缺少亲热

温柔的皇后，还是感到空虚怅惘。巡行完毕，头脑里充满美妙的印象，忽然又回到家里，看见了亲爱的阿莉克斯，遗憾的是，又须坐下来看外出期间积压的报告。尼古拉第二次巡行，到了科洛姆纳、摩尔尚斯克、坦波夫、奔萨、塞兹兰、乌法、兹拉托乌斯特、萨马拉，所到之处见到部队在检阅时行进得都十分整齐肃静，尤其是坦波夫和摩尔尚斯克。于是，尼古拉心中很是欢喜，他在后备部队中还认出了几个熟悉的士兵，他是在他们退役时见过的。皇帝对人的面孔和姓名具有罕见的记忆力。在各个火车站还接见了许多代表，有时还有不少居民站在四周围观。每到一个城市，皇帝必到教堂参加祈祷。巡行回家后，他心中对上帝赐予他的慈爱感恩不尽，坚信上帝是不会舍弃俄国的。回到温馨的家之后，他更是称心如意，又能陪着娇妻坐车在林阴道上兜风了。尼古拉第三次巡行到了斯塔罗鲁斯和诺夫哥罗德，对检阅和见到的人也十分满意。尼古拉第四次出巡来到顿河师、诺沃契尔卡斯克哥萨克军营，车厢里十分闷热，在月台上他受到哥萨克军、贵族和商界人士的欢迎。尼古拉两次检阅了顿河，举圣像为他们作了祝福。哥萨克一个个气宇轩昂，骑着骏马，给人印象极好，他们还随着运行的火车骑马飞驰并在马上表演各种特等骑术。沿途各站总有许多人迎送，一个个都那么热情欢乐。是的，俄国是不可战胜的！上帝永远不会丢下我们不管。

最令人难忘的伟大的日子终于来临，这一天上帝降福于我们，7 月 30 日中午 1 时 1 刻，阿莉克斯喜生贵子！这是上帝在这多灾多难之年赐予他们的安慰，感谢上帝。随之从世界各地发来了许多电报，尼古拉用 3 天时间才回复完毕。尼古拉在电报中建议威廉做这个皇太子的教父，威廉回电说殊感荣幸。在这艰难的一年里，威廉是他在国外唯一的忠实朋友，对他的失败深表同情，还答应给他的绕行非洲的波罗的海舰队供煤，为他出主意如何使黑海舰队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给他送来有关英国帮助日本的情报。只是威廉所坚持的贸易协定使俄国负担沉重，尼古拉曾派维特出使德国拜见威廉。皇太子诞生后第十二天，为他举行了洗礼，海边上金光熠熠的轿式马车排成长队，四周站满了哥萨克骑兵、骠骑兵和军官，俄国也在这一天宣布废除最后几种肉刑。婴儿到第四十天时一度吐了不少血，之后又奇迹般地转危为安，又活泼起来，后来心脏长期有毛病。

皇太子诞生不久，日军从陆地上逼近旅顺口并开始合围。俄国舰队成了网中之鱼。阿列克谢耶夫要俄国舰队留在那里，真把我们坑苦了。尼古拉下令舰队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但突围未成，伤痕累累的舰队只好又回到那命里注定逃不开的旅顺口。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巡航分舰队也遭到失败。现在还要不要派波罗的海舰队到那里去？它也对付不了。阴雨连绵，延误陆地上的战事。到8月，他们终于在辽阳一带展开一场大战，双方兵力差不多，但库罗帕特金丧魂失魄，错过了可以取得的胜利，他害怕敌人从侧翼包抄，竟屈辱地决定撤退。真想不到会这样，真令人难过。

这真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倒霉的战争，没取得一次胜利。俄国的太阳像是熄灭了。俄国皇帝刚刚把钢刀举起，这刀就化为粉末了，也许是举起的手化为粉末了。

辽阳战役后，人们的面部和眼神显露出的表情似乎在说，这次战争我们可能失败。

倒不是这场战争中俄国损失惨重，因为在过去的战争中俄国有时损失的比这次还多，但那时是虽失犹荣，而这一次的失败完全出乎意料，对交战双方来说太不成比例，令人感到羞耻。它使西方漫画家得以肆无忌惮地作画，画上有几只小猴子把一个魁梧的巨人裤子扒下来，抽打他，赶他走。

这年夏天，两桩谋杀案夺去了两个人的生命。恐怖分子先暗杀了芬兰总督，后又暗杀了内务大臣普列韦，后者是在前往彼得戈夫汇报时遇难的。普列韦之死使尼古拉失去了一位无与伦比的大臣。上帝震怒时，对我们的惩罚是严厉的。

我们怎样才能揣测到上帝是否发怒，我们实在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沙皇视察过的所有部队都真心实意地对他高喊“万岁”，铁路沿线所有的城镇居民都向他挥手、挥帽子，女人则挥头巾。不过，也许不应忘记，在千百万这样的居民之外，还有情绪日益激愤而且凶狠到莫名其妙地步的知识分子阶级。也许，对这个阶级应当有所让步？普列韦一直走镇压国内一切不满表现的路线。也许，在当前战争失利之际，内务大臣应该软和一些？于是尼古拉任命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公爵为内务大臣，因为此人受到地方自治局人员拥戴，身上散发着

自由派的气味，但还没到立宪派的程度。也许，正确的方针是在国内和谁也不要斗争，而是和和睦睦地把政府和社会拧成一股绳。怎样对待那些不满的阶层，这永远是一个最大的难题。无止境地镇压不行，无止境地让步也不行。最可靠的办法是用对俄国的爱心吸引他们，但他们又不受吸引。

尼古拉常常幻想，希望第二天睁开眼睛时，社会上已经没有不满，日俄战争也没有了。有时，一连几天过的也还算平静，他常暗想，若能总这样该多好。按照惯常的程序生活，尼古拉的精神渐渐沉稳下来，同母后一起去采蘑菇，又带阿莉克斯坐软座马车兜风玩，晚上则对她长时间地朗读书籍，婴儿则在襁褓中安睡。讨论了好长时间是否解雇英国保姆，动摇不定，颇为棘手。有时见晚霞似锦，他们则乘小艇泛游海上。尼古拉感到接触大自然如同接触活生生的人一样，他每天的第一件事是问：今天天气怎样？他非常注意天气好坏，天气左右他的情绪，影响他待人接物，接待来人，甚至影响他的决定，晚上他记日记时也是先写当日天气。在奇特的夏天后，秋天也奇特地接踵而至，早得令人不舒服，肃杀的秋风呼啸四起，9月的艳阳天也凉气逼人。尼古拉对过早降临的秋天十分反感，不出去散步游玩了。9月末，他才从海边搬到皇村住，常到加特契纳和彼得戈夫一带打猎，围猎很成功，野禽四起，他们射中不少野鸡、乌鸡、沙鸡，而雪兔则一次能打到几十只；他们还照例去巡视、检阅团队，近卫军骑兵团在他面前操练齐步走或策马奔驰，与军官们一起照了不少相片；他们还为团队官兵的健康举杯祝酒，出席龙骑兵教堂圣化仪式、苏沃洛夫博物馆圣化仪式；参加骠骑兵在室内练兵馆举办的节日庆祝活动。曾经在日本大津救过他命的希腊王子来访，请求尼古拉从土耳其手中夺回克里特岛还给希腊。尼古拉虽对他怀有感恩图报之心，有意从中调解，无奈自己正处逆境，只好表示支持希腊王子向欧洲各国政府提出的请求。确实应当还给希腊，有什么理由不还？

对战况的关心使尼古拉坐卧不宁，他一次又一次出宫远行，以圣像对开赴远东的部队祝福。他在一些火车站上受到贵族和农民代表的欢迎，然后从那里骑马到附近的兵营视察，所有的部队状况都十分良好，马匹也膘肥体壮。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新部队开赴前线了，甚至包括过去从未动用过的军区。尼古拉的

出巡曾经远至华沙附近和奥德萨，旅途遥远，尼古拉一路上读了不少书，还不顾颠簸地给阿莉克斯写信。

假如没有阿莉克斯，没有儿子，没有政务和领导各大臣的重任在身，尼古拉会亲自到远东去的。他为自己不能与自己的军队同甘苦共患难而难受，他历来觉得住在军队里是最舒心的事。每当有从满洲回来的人，他必与之交谈，而且总是满怀兴趣地听对方讲话，偶尔他们也有很精彩的汇报，尼古拉听到后就满心欢喜了，如斯杰塞尔关于击退猛攻的汇报，库罗帕特金关于攻占山岗的汇报。他接见了俄军新的将领格里本贝尔格、卡乌尔斯，给他们临别赠言。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坚持要进攻并挽救旅顺口，这完全正确，但库罗帕特金却拖延不决，老是埋怨兵力不够并且不集中。终于等到迫使日本人屈从我们意志的时候了！9月中旬，库罗帕特金转入大规模进攻，向前运行了总共二三十俄里就与日军遭遇，双方在几十俄里战线上展开了9天激战，在圣母节时见了分晓：我军败退，损失显然比对方大，尼古拉经过长时间的内心斗争，终于下决心把光荣的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从最高领导职位上撤了下来，其总督职位从此告终。尼古拉一年来对此人所抱的巨大希望和亲自所作的精心选择完全破产。虽然旅顺口还在拼命抵抗，但其失陷已成定局。人们到处议论这场刚刚开始的战争是否就要结束？这话也传到尼古拉耳中。但战争似乎还没展开，舰队还没施展身手，部队还没有开到，难道就已接近尾声，就要摇摇手，缔结和约？

在这些令人焦虑不安的秋日里，谁也没有像威廉表兄那样给尼古拉那么多支持。他不愧是真诚的朋友，根本不想听战争就要结束的话；他通过一位接近他的俄国侍从武官捎来话中得知，即使旅顺口陷落，立即签订和约对俄国也是个错误，对日本却是个胜利。难道俄国连一次像样的胜利也没有获得，就善罢甘休？

尼古拉致函威廉，对此深表谢意，并让威廉相信，俄国一定会把战争进行到底，直至把最后一个日本人赶出满洲。

这个时期尼古拉遇到难以决定的一个问题是：该不该从波罗的海派第二支分舰队绕行地球到太平洋去？这条绕行的航路要走好几个月，很容易受到日本

和英国的攻击，抵达目的地后实力只相当于日本舰队的三分之一。从实际出发应该不派。可是，既然拥有一支庞大的舰队，却不肯把它派到需要的地方去，这不是拱手把海洋让给敌人吗？不是表示现在已承认自己战败了吗？

这年秋天，动摇不定难以决断的事一件连着一件。尼古拉时而苦思冥想，时而找人谈话，收集意见，召开会议。几次决定不派舰队去，这使他觉得仿佛肩上卸下了千斤重担；几次又决定派舰队去，这时他觉得心头仿佛压着一座卸不掉绕不过的大山。

他登基为皇以来的政事都是这样的，举又举不动，绕也绕不过。上帝保佑啊!

尼古拉一向喜爱自己的舰队，对这个第二分舰队更是满腔深情，似乎为它感到懊悔或者有所预感。这支舰队配套完毕时，他前去进行了视察。这支舰队起航前，他又去巡视了每一只船。当天天气晴朗，这可能是个吉兆。他乘快艇把舰队送出了克朗施塔得港，军舰上升起皇太后旗，舰队排成两行鸣放礼炮，十分壮观。过了1个月，他坐火车到列维里停泊场追上了舰队，又到所有军舰上看了一遍，最后与他们告别。有一部分军舰，是他同阿莉克斯一起视察的。阿莉克斯后来还在火车站接见了爱斯特兰当地妇女。舰队离开立巴瓦驶向困难重重的航线后，尼古拉时时刻刻想念着它。上帝啊，求你保佑他们平安完整地到达! 后来尼古拉还专程去欢送两艘迟起程的巡洋舰，专门接见过潜水艇人员。他密切地关注着分舰队的行进情况。

刚刚过去10天，就发生了一起可怕的灾难。舰队驶近英国时，分舰队在夜间遇到几艘不明国籍的四烟囱驱逐舰向它们开了火。等他们靠近时，驱逐舰不见了，他们看到的却是英国渔船。真像堂·吉诃德把磨坊看做巨人一样，世界舆论哗然。英国威胁说，英国巡洋舰正在追赶俄国分舰队，可能对之开火，理由是充足的。真是祸不单行。

怎么才能使那目空一切的敌人平息下来？俗话说得对：做了好事总会有好报。想当年，尼古拉建议成立了海牙国际法庭，没想到今日这种情况，只有靠国际法庭的审理才避免了一场冲突。

到父皇宴驾10年忌辰了。主啊! 这10年俄国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上帝会

发善心的，平静的日子终究会到来的!

第二分舰队行驶得越远，离英国的捣乱和开火的危险也越远。舰队开动全靠煤，而只有德国才能给它煤。可是，威廉表兄却在这时说，供煤违背了中立国立场，现在越来越危险，英日两国可能要求停止或用武力制止供煤，德国可以同俄国携手对付这种危险，但法国到底是俄国的亲密盟友，难道它真心与英国一致吗？能否现在向法国试探一下，建议它加入大陆国家联盟，如加入，我们就什么也不用怕了，日本也会完蛋，俄国准会胜利。

威廉这个主意简直像是尼古拉本人头脑里想出来的! 尼古拉本人不是早就有这个想法吗？于是他开始行动，说服法国舰队前去参加德国基尔运河通航典礼，企图使这两个仇家和解，从而把两国联盟扩展成三国联盟，如成功，就能把欧洲从骄傲自大、蛮横无理的英国下面解放出来，也能立即遏制厚颜无耻的日本。确应如此，俄法联盟已有 12 年之久，俄国现在处境艰难，难道法国不能前来帮一把忙？三国联盟一定能给全世界带来和平安宁。尼古拉请威廉起草一份条约草案。

威廉行动神速，很快就寄来了草案。但尼古拉对草案不满意，其中对日俄战争谈得不多，主要谈的是如果法国不与俄德结盟应该对法国怎么办。彼得堡对草案进行了修改，遗憾的是威廉不同意这些修改，又拟了一份新草案寄来，同时不知为什么强调在俄德签署这个条约前一点也不能向法国透露，直到法国同意加入为止；如果透露出去，就可能提前爆发和英国的战争。如同所有的外交谈判一样，俄德两国条约谈判进行得旷日持久，枝蔓横生，互相猜疑，担心欧洲报界的反应，还须对没参与谈判的国家进行答复和再答复。俄国外交大臣怀疑德国此举是想挑唆俄国同法国的关系。这个勇敢而有益的建议悬而未决，最终不消自灭。

这期间，俄国两个首都都发生了动荡，才干杰出为人忠厚的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公爵新任内务大臣职务之初，颇受社会和报界欢迎，有些人给他写贺信，他也许诺将要信任并善待各种社会力量，社会各界似乎也准备信任他、善待他。尼古拉不禁暗自高兴，想到他自己为了达到国内广泛的团结，不顾严

厉的谢尔盖叔叔的阻挠，冒险采取了软化政策，他是做对了。看来，一向棘手的国内问题，终于靠仁爱解决了。

遗憾的是，报界并不满足于与当局互相信任，而是得寸进尺，重弹俄国多年流传的老调，说所有的失败都是政府造成的。一下子，像河水决堤一样，所有的报纸、所有的舆论都突然要求在战争期间立即进行改革，开放各种自由，直到任意摆布国家政权。以前曾有过这样一条建议：出版《沙皇报》，即沙皇自己的官方报纸，阐释最高当局的观点和决定，但未付诸实行。社会上几乎是公开地谈起限制君权来。一些革命政党号召俄国实行军事失败和恐怖手段。自由派不惜在巴黎与恐怖主义者沆瀣一气，要求废除君主制度。

这时，斯维亚托波尔克失误了。一些地方自治局分子未经任何选举，擅自到彼得堡开了一个所谓的代表大会，内务大臣未对他采取断然措施。尼古拉原本已同意召开全俄地主自治局代表大会，但须真正得到人民全权委托的代表。沙皇对那样的代表是值得听的，不能充耳不闻。但选举这样的代表需4个月时间，可是那些自封的代表已在彼得堡开起会来了。斯维亚托波尔克未阻止他们。他们不但未经允许擅自公开举行会议，而且制订了自己的纲领，按这个纲领，政府一点权也没有。这个纲领很快流传到全俄国。斯维亚托波尔克此时却像是完成了任务似的立即提出辞职，令尼古拉十分生气的是，谢尔盖叔叔本人这时也要求辞职，他说有这样糊涂软弱的大臣在朝，他不愿再当莫斯科总督了。这两人水火不容，势必有一人需退休。真难决断。这时尼古拉做出了一个令他自己也感到惊异的决定：同意由斯维亚托波尔克召集一个会议，讨论立即进行可能的改革问题。

此时，俄国各地像生了传染病一样，流行起举行大型宴会的风气来，人们不论有没有钱，都在一起吃喝，借机发表即席演说，号召限制沙皇权力，实行宪政！这一下看明白了：社会各界互相利用互相信任，目的并非与政府团结，而是为了变更社会制度。

一群群年轻人在涅瓦大街上举着红旗任意游行，高呼："打倒专制制度！"莫斯科市杜马蛮横要求整个国家行政机构服从代表的监督，还在全莫斯科代表会

议上侮辱了拒绝在这份请求书上签字的杜马代表。年轻的观众在音乐会上高呼："打倒沙皇!"高唱革命歌曲，搅乱了音乐会。有些人印刷传单并散发到各地。有一次，有好几千人举着红旗涌到斯特拉斯特广场上。谢尔盖叔叔没下令让警察开枪，但警察用马刀鞘和刀背驱散开会群众，群众则用棍棒、锤子、铁条打警察。

这种内乱局面深深刺伤了尼古拉，他越来越不知道怎样做才对。那些天，天气也坏透了，一片灰蒙蒙，冰雪消融，寒风刺骨，天空晦暗得吓人!

12月初，召开了两次会议，讨论采取何种改革措施以便遏制动乱。到会的是几位担任要职的皇叔，几位大臣。会议最初倾向于召开有各阶层代表参加的全俄缙绅会议，但谢尔盖叔叔坚决反对，他说这个办法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战时要求。后来决定从地方机构中吸收选出的代表前来对国家事务进行初步讨论。但尼古拉对这一办法也犹豫不定。谢尔盖叔叔主张从诏书中删去此条，维特却主张保留此条，否则诏书中只剩下堂皇的空话，谁也不会满意。维特强调说，俄国也应如此。上帝啊，你为什么偏偏要我来做这样的决定啊？它关系到俄国今后许多世纪走什么样的道路。俄国自古以来就认为：听取人民的呼声是有益的，但必须由沙皇一人做出决定。议会制的治国方式不会给我们带来好结果，只能造成人心涣散的恶果。那样做纯粹是把俄国引上一条与其人民精神相背离的道路。最后，还是把召开代表会议的文字从诏书中删掉了。

尼古拉这年11、12月之所以感到特别压抑，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时没住在过去住惯了的柔和的克里木半岛上，因形势严峻，他不得不留在气氛紧张、天气晦暗的彼得堡。他感到心里堵得难受，做起决定来比平常困难得多。他不能对那些人的要求让步，但也不敢与那些人对抗。万一那些人说的是对的呢？谁晓得!他虽然进退维谷，但还须保持皇帝的尊严，不能把自己的惶惑显现出来，因此在所有人面前他始终是平静的、甚至是淡漠的。他可不能让别人对他内心的感情起伏说三道四。这一时期，他常到加特契纳去看望母后，在那里喝茶，一直到晚饭；他与母后谈得很多很多，从她那儿寻求意见和指导，问母后如果父皇在世时会怎么处理。

这年秋季，他未能举行大型狩猎活动，一年没到洛维日去过。只打过几次猎，一次去一天。到彼得戈夫和罗普夏打野鸡，到察尔斯科斯拉文基森林打鹿，第一次驼鹿逃出包围，第二次打到一只，它长着很好的角，但上面只有四个嫩枝。但即使打猎的那些天，他也逃脱不掉听汇报，一大清早就坐下来，一边听一边担心误了上火车的时间。打猎回来以后，他心旷神怡，身体疲倦，还得继续听汇报。

冬天，尼古拉自愿承担神圣的职责，无一例外地给所有开赴远东的部队祝福。在阴暗的12月，他好歹总算以发布一份诏书结束了会议，接着就带着米沙弟弟和一些随行人员到基辅省去了。在风雪迷漫的寒冬，沙皇奇迹般地突然出现在冰天雪地上的部队面前，步兵、骑兵、山地兵、掷弹兵、浮船兵在城郊远处列队恭候，他们精神抖擞，蔚为壮观。有一天，在日梅林卡附近，北风怒号，酷寒刺人肌骨，尼古拉巡视部队时左手手指几乎冻僵了，但他依然在一个半小时里走遍了所有部队。事后，当他坐进暖融融的火车车厢里时，觉得格外舒服。次日，他到了巴兰诺维恰，天气还是那么冷，他不敢再到旷野去，而是命令把部队开到火车站来。

尼古拉抵达波布鲁斯基的夜里，收到了旅顺口俄军投降的惊人消息。那里的守军牺牲惨重，疾病流行，弹尽粮绝，注定有这样的结局，但他总是抱着一丝幻想，希望守军能坚持住。看来，这也是上帝的旨意。尼古拉一面哭泣一面祈祷。

巡视一周后回到家中，尼古拉见到阿莉克斯和孩子们都很健康，心中十分高兴。当然，他又不得不立即听汇报。他在家休息了一些天，全家一起吃早饭，吃晚饭，翻相片册，看电影，欣赏搪瓷厂送来的花瓶，接受乌拉尔哥萨克赠送的供个人收藏的圣像，朗读作品，有时与另外一人四手联奏钢琴。这些家庭活动给他心灵带来宁静。他遐想着一切不幸都将消失。

不知不觉地到了圣诞节。先是参加了儿童松树晚会，接着参加全体晚会，然后到练马场参加部队晚会，后来又到同一地点另一批人的晚会。大主教到皇村来挨家唱圣诞歌，尼古拉与之共进早餐。尼古拉访问伤兵医院，也为他们举

行了圣诞松树晚会。可怜的阿莉克斯带孩子出去游玩时在山上摔了一跤，受了点轻伤。

新年前夕，尼古拉接见了斯维亚托波尔克。这位大臣汇报说，现在到处乱七八糟，全国到处都在举行那种大宴会，怎样才能制止？他还接见了阿巴扎，阿巴扎请示他现在在远东怎么办。尼古拉强打起精神阅读了下面拟定的皇帝诏书并在上面签字。在皇村大教堂做了一次祈祷，悼念在旅顺口牺牲的军人。

尼古拉参加了早祷，祈求上帝保佑在来临的1905年俄国取得战争胜利，俄国人民持久和平和稳定宁静的生活！早饭后他回复了一批贺电。下午与阿莉克斯在一起。真想整个冬天都住在可爱的皇村，不搬到冬宫去。圣诞节期间，政府举行了松树晚会，皇室所有的孩子都参加了，沙皇的小宝宝们也在其中，而且举止十分得体，尼古拉不得不同意谢尔盖叔叔辞去原职，但请他转任军职，任莫斯科军区部队司令。尼古拉与这位叔叔痛痛快快游玩了一阵子。叔叔预言，采取新的自由主义方针决不会有好的结局。一个商业学校的学生不是开枪暗杀特列波夫吗？次日，尼古拉同斯维亚托波尔克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并没有把这位大臣怎么样，而这位大臣自己却要辞职。尼古拉又接见了阿巴扎，与他坦诚地交谈了一番。

主显节[①]时，尼古拉与家人回彼得堡参加圣水仪式。先在冬宫教堂做了祈祷，然后与举着十字架的一行人一起走向涅瓦河边举行洗礼。这时，近卫军骑兵团炮兵连发射的礼炮中有一颗真正的重型霰弹爆炸后落在洗礼队伍上头，击伤了一名警察，打坏了旗幡，打碎了冬宫底层的窗玻璃，有些弹片甚至落到大主教的站台上。

礼炮后来继续发射，直到射完101发炮弹。虽然还可能射来炮弹，但沙皇若无其事，稳如泰山，其他人也没有一个跑开。

空弹中有一颗实弹，这是有人预谋还是偶然出错？也许这又是一个不祥之

① 主显节原本是东方教会庆祝“耶稣诞生”的节日，很早便和“耶稣受礼”联结在一起，后来又融入了耶稣在加纳“变水为酒”的纪念。——译者注

兆？假如那颗真弹射得准点，就会打死好几百人。这件事使沙皇心情十分沉重。当晚他只同阿莉克斯一起吃晚饭，过不多时就早早就寝了。

第二天，讨论从智利和阿根廷购买军舰问题。舰队舰只不足，须在其航行途中就予以加强。这一天是令人焦急不安的，尼古拉不得不接连接见了9个人。彼得堡最近几周爆发了大规模罢工。最初是由于一起地方性的冲突从普梯洛夫工厂开始的，现在发展到有10万人参加。工人提出的要求都是无法实现的。有一个神父不知为什么代表所有的工厂出面勒索，如果答应了他，俄国本国的工厂就会完全倒闭。一定是有人在蛊惑工人，说巴库罢工终于使当局让了步。大批罢工工人从这家工厂走到那家工厂，要求别人也罢工，否则他们就要强迫。警察局为了避免发生大规模斗殴，有时甚至也要工人们放下工作。所有的印刷厂都停止了工作，彼得堡没出一份报纸。表面上看来局势停留在胶着状态，实际上这只是间歇，人们都明显地感觉到混乱的危险性已大大加剧。有的人提议逮捕闹事的头头，但维护秩序的警察人手不够，而且目前局势普遍紧张，这样的措施未见得合适。沙皇夫妇还前去恭恭敬敬地吻了圣母像。

又过了一天，似乎彼得堡所有的工人都罢了工。这样做很奇怪，对工人自己也不利！都不干活，能有吃的吗？这一天，有消息传来说，明天星期日全体工人将在冬宫前集会，向皇上倾吐自己的心愿。朝中所有的官员眼神里都露出疑问：怎么办？但谁也没说出办法。皇帝在星期日是否回到冬宫？工人还以为在那里一定能见到他呢！皇帝会不会对他们讲话？尼古拉从未与工人单独谈过他们的要求，不懂得怎样进行这样的谈话，更何况这次是要同好几万人谈话？他可以在几万人前面露面，但他们须编成一个个团队，排成队伍，有军官率领，只用简单的发号施令和表示致敬就行。可是要他一个人面对那么多无人统领、没有队形的群众，他马上就会心慌意乱，手足无措，喉咙会发干，眼睛抬不起来，不知道该说什么话会发生什么事。尼古拉明白，沙皇有机会同子民直接交谈本来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他过去也曾在脑海里想象过那样的场面，但不是现在这样突如其来，毫无准备，不知讲什么。尼古拉已经被沉重的战争和同知识阶层的纷争弄得焦头烂额，忘记了还应注意工厂，工人突然就找上门来了。尼古拉

本人倾向于站到阳台上见见这些人，听听他们讲什么，但亲王们全都反对。于是他又倾向于不露面。阿莉克斯完全赞成他这样做，她的直觉是不会错的。这次行动，是那些心怀叵测的群众头头和那个社会主义神父的猖狂挑衅，无疑其中也有革命者在活动。到了傍晚，工人群众准备举行请愿游行的事已广为人知，还证实了一点：他们改变了将要提出的要求。新的要求是头脑简单的普通工人不可能根据个人的需要提出来的，这就是通过普遍、平等、秘密的投票选举产生立宪会议，出版自由，政府不对沙皇而对人民负责。他们说的话也很蛮横："我们哀求您答应我们，如不答应，我们马上就死在您宫殿前广场上!" 官方没弄清这个请愿书是怎么产生的，是否向工人们宣读过，也许工人们一点也不知道？这完全是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惊慌失措的斯维亚托波尔克到皇村来汇报准备采取的措施。他对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已经黔驴技穷，尼古拉对这位大臣也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只不过现在没有适当的机会让他辞职而已。警力薄弱，而且完全没有受过大规模行动的训练，市内卫戍部队人数也不多，预定明天从附近各地调些部队进入彼得堡，以便维持治安，不许人群靠近皇宫。要不要宣布彼得堡戒严？没有理由。市行政长官印了一个布告在全城张贴，要求市民们不得集会，违者依法惩治。可以放心的是，各处都有负责的将军监守，他能因地制宜采取措施，沙皇不必事事操心。只是，因印刷厂罢工，布告印的纸张太小，数量不多，贴的地方也有限。

晚上，尼古拉做了长时间祷告。不知怎的，他觉得这个突然出现的局面很可怕。可怕的倒不是那些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而是那些无法驯服的 20 万人突然在城里游行。从早上起，他就怀着希望和恐惧交织的心情在弥撒仪式上祈祷，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都等皇帝做出决定。若是能不做这些决定该多好啊! 他希望形势能化险为夷。这一天阳光明媚，尼古拉呆在幽静的皇村公园里。他在这里没看见工人的面孔，也没听到那致命的枪声。上帝啊，这是多么惨痛的一天啊! 真可怕，但各地军队都是不得不开枪的，因为军队无论是规劝、警告、威胁，甚至朝天开枪，都制止不住汹涌而来的人群，人们涌向市中心，甚至高喊着"冲啊"冲向军队。夹在工人群众中的大学生嘲笑军队，甚至说些骂人话侮

辱军队，向军队掷石块，有的还用手枪向军队射击。在一些地方不得不动用枪炮，比如在纳尔瓦哨卡、特洛伊茨广场，华西列夫斯基岛（那里也有一个街垒），甚至海军部大厦旁、别夫切夫斯基桥和波立策斯基桥上，因为有许多游行的人跑到这里来了，结果近百人被打死，有些受伤的也奄奄一息。

上帝啊，这事多令人痛心啊！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而且这么突然，值得么？怎么才能防止？沙皇政府缺少年轻人，如果有几百名年轻人帮助，渗入正在酝酿游行的群众中，向群众解释，说明他们的请愿已被人恶意地扭转方向，皇上是知道他们的疾苦的，只是因为战争的拖累未能抽出手来处理。如能那样，该多好。

尼古拉又想，游行队伍并未举红旗呀！从普梯洛夫工厂来的队伍甚至还举着神幡，捧着圣像，与教徒行列一样，警察见面后很是惊讶，他们甚至脱帽走到游行队伍的前头去。工人们可能不明白军队吹的号角声是什么意思，他们本来可以由此免遭劫难。工人也不可能知道沙皇当时并不在彼得堡，他们要谒见的并不是市行政长官，也不是大臣，而是他沙皇，这意味着他们对他是信任的，他们来是想一定找到他的，不肯白跑一趟，不应该禁止人们在街上行走。政府当局也没说清楚多少人聚集在一起是可以的，多少人不可以。这一切发生得突如其来，御前汇报时没来得及充分讨论应如何处理，没有说必须开枪。

上街游行的人有20万之多，这就是革命吗？革命就这么容易，一天内就开始了？

尼古拉祈祷时哭了。上帝啊，你为何不救助我？我周围为何黑暗重重？求你启发我吧，我该做什么，该做什么呀！

难道今天的劫难，明天、后天还会重演？闹事者趁警力不足而且惊慌失措之机在彼得堡各处砸碎路灯和商店玻璃，抢劫商品、个人住宅和武器库，夜晚截断电线。单个的军人在街上遭到言语和行动上的侮辱。这不是革命的开端是什么？军队还应在街上站两天岗。斯维亚托托让波尔克完全一蹶不振了，需要找一个坚强的人来掌权。正好，德米特里·特列波夫刚刚同谢尔盖叔叔一起卸掉了莫斯科的职务，现在正在彼得堡，即将起程前往满洲作战。尼古拉决定任命他

为彼得堡市和省总督，不再由内务大臣兼任这两个职务。

此举未令他失望，收效甚佳。特列波夫性格果断，知道该做什么。风波停息了，冲突消失了。但有些工厂的工人想恢复上班，却受到阻挠。

虽然局势平息下来，但似乎发生了某些变化，并未恢复原样。一部分动乱分子转到了莫斯科。大臣们多次向他汇报说，无论是警察还是军队，实际上现在都已无力扭转形势，首都大街鲜血横流之后，大臣说话已经没人听了，需要元首说话。

元首说话？确实。沙皇与人民本来就应是一致的。可是，沙皇怎样才能使自己讲的话越过重重机构到达人民呢？假如不通过现成的机构、参议院、诏书、敕令、各级负责官员等，他的话能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向什么人说呢？尼古拉不知如何是好。

大臣们一再请求皇帝出面说话。他们代为起草了一份诏书，对惨案深表沉痛悲愤，但事故发生时皇帝并不知道，军队采取的行动未经皇上许可，这句话是维特建议写上的。

可是，皇帝不能这样讲自己的军队呀！他不能出卖自己的军队！虽然他确实不完全知道，也不完全明白情况，可是别人也如此，大家都觉得突然。

特列波夫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建议从各工厂召集一些忠厚老实的工人代表来开一个会。人数不要多，30 人即可。这是可以做到的。惨案发生 10 天后，这些代表被运送到皇村。皇帝对他们讲了话，措辞严厉，但声音柔和，充满怜悯：

“你们是被煽动加入叛乱反对我的。罢工和叛乱的人群总是迫使当局不得不动用武力，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引起许多无谓的牺牲。我知道工人的生活是艰苦的，希望你们能忍耐。但是以大规模叛乱的方式来向我表述自己的疾苦，这就是犯罪。”

但尼古拉不生他们的气，他说：

“我相信工人是诚实的，对我的忠心是不会动摇的，因此我原谅你们的过错。”

可是，这样宣布宽恕后，形势还是不稳，没有恢复正常。也正是在这几天库罗帕特金在满洲发动了进攻，但几天后又被打败，损兵折将，后退若干俄里。看来沙皇应该采取某种措施了，但他无法揣摸天意，上帝究竟要我做什么呀？

威廉皇帝近几周并未袖手旁观，而是热心地介入事件，并且认为对谁也不能宽恕。他作为尼古拉的忠实朋友和地位相等的君主，能够为尼古拉设身处地地着想。威廉先是通过自己身边的俄国侍从武官，接着又写来一封热情的甚至是激烈的长信，后来还不肯罢休，又通过尼古拉的母后向尼古拉详谈了应实行的行动计划，而且一再坚持，甚至露出按捺不住的焦急心情，逼着尼古拉去做。他把一句话重重地敲在尼古拉的心上："鼓足力量前进！俄国正在揭开自己历史新的一页！"他还说，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过快地放松了缰绳，导致报上发表了大量前所未见的贬低当局的文章；革命党蒙骗了轻信的工人，工人出面提出自己根本不明白的要求；你应当从冬宫阳台上接见一定数量的无知工人，慈父般地同他们谈谈话。你讲的话可以使群众醒悟，可以使煽动者们失败，要知道群众并不晓得沙皇有何想法。既然是专制制度，君主应该亲自提出纲领，不做任何改革都不过是大臣们吹出的泡沫，人们也会因此感到缺少铁腕而惶惑不安。当皇帝避而不见时，连老实厚道的人也会胡乱议论，发泄对他的不满。专制君主应该雄才大略，清楚意识到自己一举手一投足的后果。欧洲所有人都认为，沙皇应该对战争负全部责任，包括战争突然性和俄国显然未做战前准备，后备部队开赴他们连地名都没听说过的地方作战，他们是很不情愿的。在爱国主义烈火尚未燃起之时便进行了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这是很可怕的。人们都期待着沙皇采取某种有力措施，甚至挺身而出亲自接过最高指挥权，以便挽回士兵的信心。你们古代祖先在奔赴疆场之前都要到古老的教堂里祈祷，还要在克里姆林宫召集人们开会。现在你们受到日本进犯，莫斯科人也一定在迫不及待地期盼着你的号召。战争爆发时你没有从克里姆林宫发表宣战讲话，已经造成了不良影响。不过沙皇现在再来控制莫斯科，也为时不晚，控制了莫斯科也就能控制全俄国。对叛乱分子当然不能和解，不能做一点让步，一点微小的让步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对无政府主义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镇压措施，但在

实施这些措施的同时应该制造一种适当的喜庆气氛。你应当显示出皇帝气魄，吸引人民的注意力，鼓舞军队士气。打一场大战，改革国家治理，这两者都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不可同时进行。如果不取得重大战绩，是无法结束对日战争，因此必须推迟国内改革，必须做出不容改变的决定并晓谕天下周知。宣布这一决策的最佳地点仍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皇帝出现时身后应跟着一大群贵族和高级僧侣，召来听讲的应是各个阶层中思想端正的代表人物。应该在神幡下圣像旁走上阳台对忠于皇帝的臣民宣读谕旨。下面的人一定会屏息静气地恭听。皇帝谕旨：禁止讨论国内政治，全力争取战争胜利！战后进行改革，实现你们希望的人身保护法，扩大国务会议权限，但决不能召开立宪会议，也不允许有任何肆意妄为的自由。而且，不能把国内改革委托给维特那样的花言巧语的人去进行，此人城府很深，不论何时触犯了他的自尊心，他都念念不忘，他也一向不尊重贵族传统。如果必要，你也可以说自己即将前去为他们的弟兄们分担艰难。只要你这么做，全体人民就会跪倒在你面前，为你祈祷祝福，人民也会纷纷为战争做出捐献。

据说，每个人命里注定要接近某个人并把自己的大部分活动和这个人联结在一起。对尼古拉来说，威廉就是这样一个人。

尼古拉读到威廉的忠告后既羞耻难堪，又感激不尽。是啊，同威廉这样的人交友，永远不让这种友谊受到损害，是能够使俄国乃至全世界与德国一起避免灭亡的。

然而尼古拉还没有采取重大步骤和断然措施的决心。在克里姆林宫前出面演说的时机已经错过了。莫斯科聚集着许许多多自由派，沙皇想象过他如在这些人面前讲话，他们一定会露出嘲讽的表情。但是，如果他想跑到荒无人烟的天涯海角去躲避很长一段时间，那么阿莉克斯和孩子怎么办？

当然不能。只能顺其自然，听从上帝摆布吧！

又过了不多日子，也是在莫斯科，也是在克里姆林宫，在空旷的宫殿院落里爆炸了几颗炸弹，谢尔盖叔叔被炸死了，他当场殒命，粉身碎骨，他的车夫身上中了 80 块弹片，还垂死挣扎。爆炸声响如雷劈。那些恶徒嗜杀成性，一次

又一次进行暗杀，现在已从杀大臣进入杀亲王。他们暗杀的人个个都是坚持制止骚乱的，其用意显然是威胁整个皇族。尼古拉因而不能亲自前去为叔叔送葬，甚至不能到彼得堡大堂参加祭奠仪式，凡是可能有刺客的地方都不能去，诸位亲王及夫人也不能去。他们只能在家庭小教堂里做祷告，全家族都穿上了丧服。尼古拉和阿莉克斯回忆起他们俩是在谢尔盖叔叔结婚典礼上相识的。整个皇族在各宫邸里好像一下子变成了俘虏，弗尔基米尔叔叔受到的攻讦最厉害，还收到过恐吓信。这期间，抓到了十几个革命者，查获了一个炸药库。现在，连皇村及其四周的道路也不安全了，他们只好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尼古拉取消了所有的检阅和外事活动，从那次不幸的洗礼仪式后他就没离开过皇村。这倒不是因为他胆小害怕被刺，而是作为一个专制君主，他无权忽视自己的性命。

从 1 月 9 日起形势变得更坏，尼古拉对此当时并未察觉。彼得堡工人平静了不少，但罢工蔓延到莫斯科、铁路沿线、波罗的海沿岸去了，波兰铁路甚至已停止运营。俄国各城市包括雅尔塔在内都充满了抢劫、杀人、纵火、骚动等事件，有些城市晚间出门很危险，人们甚至疑惑这个国家还有没有沙皇？没有军队维持治安，军队越来越多地前去增援满洲俄军，一昼夜开出 14 列车。一种思想似乎是通过某种神秘途径人不知鬼不觉地灌入了各处好斗之徒的头脑，这种思想就是：现在到了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时候，沙皇不能再使用武力，他只能一个人在林阴道上溜达，不知如何是好。

知识阶级从 1 月 9 日起比普通老百姓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好像是为自己以前未能打头阵而生自己的气，现在他们要赶上去。律师、教授乃至院士纷纷发表抗议书、罢工、罢教。有 300 人写了公开信，几乎所有的高等学校学生都罢了课。想上课的学生无法逃避罢课者的围攻，甚至文科中学、实科中学的学生也罢课，有些父母要自己在皇村实科中学上学的孩子也罢课。整个俄国都患了歇斯底里症，所有的报纸都把召开全俄缙绅会议当作已成定局之事来谈论。彼得堡大学的学生举行了两个经过批准的大会。一个大会宣称他们希望召开的不是缙绅会议而是立宪会议，亦即建立新政权，好像现在俄国没有政权一样。另一个大会把沙皇肖像撕得粉碎，还用脚践踏了一阵，然后散会。

对这些人有什么办法？不能逮捕，也不予理睬，若无其事。

2月的白昼，温和而阴沉。尼古拉徘徊在积雪的林阴道上，心情异常沉重。他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他觉得现在好像是打开了一个神秘的袋子，从里面掉出了什么东西。知识阶级现在怒气冲天，对沙皇极尽藐视、嘲讽、诅咒之能事，尼古拉一想到他们心里就充满了畏惧。他完全不知所措，能做什么呢？怎样才能使他们听从当局呢？

谁也帮不了他的忙，给他出主意的人也莫衷一是。令他稍感欣慰的是特列波夫。他觉得这是唯一一位直率果断、不怕暗杀的人，但所有其他大臣都憎恶此人，特别是维特，大家都说特列波夫的不妥协立场毁了一切。其实，对这样的事，向来都是两个办法，一是强硬，二是让步，最后总需两者择一，不能意气用事。

尼古拉把所有的大臣都召到皇村，亲自主持会议，企图让他们各抒己见，然后找到最终出路。众人全都主张让步，召开社会各界代表会议，否则财政会崩溃，外国的信任会丧失，革命也会蔓延，如在4个月内召开全俄缙绅会议，局势尚有望转危为安。

然而尼古拉还记得威廉的嘱咐：应该亲自直接对人民讲话。如果不亲自讲话，也应颁发一个诏书。他还是觉得威廉说得对：现在是战争时期，能搞什么改革？是斯维亚托波尔克错误的让步政策导致局势失控。于是，尼古拉背着大臣们，依靠几个亲信，起草了一份诏书，号召全体忠顺的臣民消弭叛乱，打败外敌，又说捍卫所有基督教国家在太平洋之利益是俄国之天职，俄国立国的基本原则是教会圣化过的，不容动摇。

尼古拉拿出了坚毅的气魄，在诏书上签了字，心中感到满足和稳定。但过了片刻，他却又后悔起来而且产生了一种同情心。他想，许多人是善良的，他们不过是想提出一些善意的、有道理的建议而已，难道皇帝能蓄意对人民的声音闭目塞听吗？他只是不愿中断祖国历史传统，不想把国家命运交到那些代表手上，不同意助长党派间的斗争；他是愿意听到言之有理的意见的，甚至是渴望听到！沙皇的旨意应该表达人民的思想。于是，他决意在颁布那份强硬诏书的

同时，还颁发一份宽宏大量、慷慨大度的敕令：赐予全体臣民就改进国家制度自由公开发表见解之权利，责成大臣会议接受并研究所有的改革方案，不论何人提出。

尼古拉主意既定，心里觉得平衡了，于是未通过大臣会议而直接下了命令：2月18日晨同时发布诏书和敕令。

可是那天早晨，大臣们也都来开会了。他们没太注意敕令，但对那份非出自他们之手的诏书则坦率地表示惊讶。尼古拉本来兴致勃勃，听到后马上就泄气了。大臣们带来了他们自己起草的诏书初稿，这也是皇帝前些时下旨要他们做的，不过是皇帝自己忘记了而已。这份诏书提出召集各地代表共同制订法律草案，文中只字未提镇压叛乱和对外战争问题，这就是说要不顾战争进行改革。它完全与刚刚公布的诏书相反，而且与敕令也大相径庭，它不是号召提出善意的建议，而是要建立强制性的议会制。大臣们又一次齐心协力逼迫皇帝做出难以忍受的让步，他们是那么固执，皇帝无法加以拒绝。他一向担心自己性格过于软弱，果然，他在一大群大臣的包围下，左右为难了一阵，最后还是签署了这份诏书，求上帝保佑先签发的诏书和敕令，也保佑后签发的诏书吧!

尼古拉走出会场后觉得自己很卑鄙，在阿莉克斯身边哭泣起来。

追悼谢尔盖叔叔的祈祷仪式这些天一直还在进行。回复了大批唁电，当然都是国外发来的，国内对谢尔盖叔叔的死却是欢天喜地。这期间小太子长出了第一颗牙齿，阿莉克斯给流动医疗列车寄去不少礼品。旅顺口英雄斯杰塞尔被日本人释放，回来了，尼古拉与他共进早餐，谈了好长时间被围情况。

现在，唯一能挽救俄国、扭转整个社会情绪的办法，就是在满洲取得辉煌胜利。整个社会都沉溺于造反，简直忘了正在打仗，可尼古拉却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它，为它祈祷，盼望胜利。他知道那里有60万大军在相互对峙，这是前所未有的。当他在这里签署充满爱国情绪的诏书、诚挚的敕令和第二份倒霉的诏书时，库罗帕特金开始了沈阳会战。

上帝啊! 你的考验有没有尽头啊？你为什么对我们的惩罚没完没了啊？这一战又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库罗帕特金为了避免被完全包围，在敌军三面压

迫下向后撤退，丢了近一百门大炮，甚至连军旗也丢了，3万人被俘，死伤6万人，其他人落荒而逃。

从那个解开的不祥的袋子里跳出的恶神一次又一次飞人俄国。

到了春天，尼古拉还不得不在皇村闭门幽居，以防恐怖分子陷害。现在，所有的地方都变成了监狱。他感到真正的权力已不在他手上，事态的发展已非他能左右。但权力也不在自由派手上。一切似乎都在重新排列高低，看谁能先攫取实权。

人们成立了各式各样的联合会，然后又成立了联合会的联盟。有些人在毫无障碍地筹备地方自治代表大会，他们最想得到的是普遍、平等、秘密选举权，好像它是一副万灵药方似的。尼古拉希望不批准开这个会，这些人空谈得已经够多了。不料大臣们竟批准了这个会议的召开。皇帝前些时发布的敕令原是希望那些关注国事的人提出善意的建议，现在被肆意曲解了，许多地方召开大会，大肆宣扬应该把一切都取消，包括皇位和俄国本身。社会上报纸上公开议论是否应缔结和约了，好像决定这类事的应该是他们而不是皇帝。他们甚至议论应该给日本什么，给多少。

春色宜人，明媚多姿。可是到了5月，尼古拉心里还是觉得阴沉寒冷，因为又传来了坏消息，最初互相矛盾，后来越来越可怕：在对马海峡海战中我方舰队损失越来越大，敌方却毫无损伤，3天之内我方整个分舰队几乎全部覆没，令人震惊至极，欢乐的春天使心中的黑暗更加浓厚沉重。

上帝的怒火真是可怕！整个战争期间还没受到过这么大的打击。这显然是上天注定的，无法逃避。噩耗正好在登基9周年那天传来。

尼古拉常骑马四处游荡，有时还划小艇，骑自行车玩。接见炮兵和军校毕业生。有一次与皇后一起接见了一位姓古契柯夫的莫斯科人，他是从军队来的，会见中谈了许多饶有兴味的事。阿列克塞叔叔在对马海战后决定从海军领导机关中退出。他真可怜，真为他难受。

现在，对战争怎么办？第八次局部动员后（俄国还没进行过全国动员），能有15万年轻的新兵，3个月后可运至满洲，兵力可达50万。还可以进行第九次

局部动员，不过那就会触动形势紧张的危险的西部边区。可是海洋还是在日本控制之中，无法守卫堪察加半岛、萨哈林岛、阿穆尔河河口；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防御工事也没完成，无论是守军、弹药，还是粮食都不足，军心本已涣散，对马海战后更是加剧了。许多人劝尼古拉设法求和（包括他的爱将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此人原是最早的主战派，现在却比谁都灰心丧气）。还有些人劝尼古拉先探听日本会提什么条件。他自己这时也想通了：国内的昌盛对我们最为主要，为了它可以忍辱负重；如果我们使俄国得到外部和平，也就可以使它得到内部和平，这样就能使目前不能解决的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应该趁日本现在没有占俄国一寸土地时抓紧和谈，即使和谈只是开始，也能对俄国民众产生良好影响。不过尼古拉不知怎样才能摆脱这场倒霉的战争，回想当年没发生这场战争时，他是何等幸福而又身在福中不知福，朝政又是何等轻松啊！

然而有些人持不同意见，他们说，假如这场战争无胜利而终，国内纷争肯定不会平息。那些打败仗的军队回来后社会情绪会变好？一旦日本得知我们渴求停战，就会采取新的步骤来欺侮我们。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跳不出去的怪圈：因国内形势不好需要停战，停战又会使国内形势进一步恶化。唉！世上的事都这么难办。矛盾堆积得越来越多，均非人类智慧所能解决。它们都堆到尼古拉头上。

威廉这时来信说：你打的这场战争不受你的人民的欢迎。为了维护民族荣誉，不能再派他们去送死了。上帝会追究责任的。我愿为停战效劳。日本人很尊重美国，我同罗斯福总统是好朋友，可以以私人身份从中斡旋。

事已至此，只好这样啦！威廉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他洞察一切。

过了不久，美国总统果然出面调停。双方开始谈判。尼古拉还在尽可能地坚持俄国不能签订不公正的和约。他在电报里也这样答复一些国家人士。他派那个事事都想冒尖的维特前去谈判，虽然他明知道维特不在乎俄国是不是吃亏。他原想派一个有主见的聪明的人前去，但环顾朝廷上下，竟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

维特走后，尼古拉心情非常矛盾，一会儿希望谈判成功，一会儿又希望

谈判不成功，两种希望都使他稍感轻松。成功能使他摆脱战争，但同时对祖国的信心将完全破灭；不成功能使他避免受辱，但是需要继续流血。他不知道应希望什么。在生活中做这种选择是他力所不及的，只有对上帝的信仰使他得到安慰。

国内局势越来越糟。罗兹发生暴动，筑起了街垒；奥德萨发生骚乱；更令人吃惊的是，黑海舰队铁甲舰上也莫名其妙地发生了叛乱，杀害了军官。简直难以置信，多么可耻呀！又连续进行了两次局部性的战争动员，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开赴满洲，军力大大得到加强，国家财力依然雄厚，经济未受损失，还没要年岁大的男子入伍。如果社会不乱，俄国至少还能打 10 年，在这种情况下缔结一个屈辱的和约，真是太令人痛心了。日本人最初要俄国把整个萨哈林岛割给他并索取大量赔款，这时尼古拉下决心分文不给，巴不得谈判就此破裂，那样社会上会说是日本而不是他造成破裂的，有了这种评价，社会上就不会再有叛乱了。但这时日本突然放弃了赔款，而且只要求得到萨哈林岛的南半部、旅顺口和辽东半岛。维特签了字。日本同意得那么突然，和约签订得那么迅速，以致尼古拉觉得这是遭受了又一次新的失败和灾难。他整天迷迷糊糊，踱来踱去，一阵阵强劲的凉风逐渐使闷热的空气和尼古拉的头脑清爽起来。他又想，也许还是签了字好，可能应该签。他与众人在宫里做了祷告，可是并未感到慰藉。

这场战争像是在梦里开始的，现在又像是在梦里结束。

夏天如往常一样是在彼得戈夫过的，这里地方较小，更安全些。有几个礼拜酷热难当，尼古拉常去游泳，阿莉克斯也带着孩子们下水，还坐电动游艇在水里玩，有时打网球。

在艰难的几个礼拜里，威廉提出要与尼古拉见面，尼古拉欣然同意，他在精神上确实需要与一位亲密的朋友谈谈心。鉴于俄国局势紧张，两人商定乘帆船到芬兰湾的比约尔卡（现芬兰波里市）会见。这地方很近，尼古拉盼望在对日和约和国内混乱局面问题上得到威廉的支持和友好建议。威廉惯有锦囊妙计，令人羡慕。威廉与尼古拉会面时是高高兴兴的，但有时也面露忧色。他说，俄

国现在正在摆脱对日战争，这却正是英国可能进攻俄国的危险时刻，他们两人拟议过的签订防御条约的时机已完全成熟而且十分必需，以后再把法国拉进来。尼古拉由于许多日以来一直未得安宁，思想不集中，听见此话后一时不明白为什么威廉认为偏偏在现在战争即将结束、对日和约即将签订之时如此需要这个防御条约。威廉有些窘迫，但仍十分友爱，不容反对地坚持要签订，他已把条约文本带来。尼古拉问，以前不是说好先要同法国商量吗？威廉答道，千万不可，那样英国就会马上知道，而且会宣战，现在就应当签字，威廉一边说一边自己先签上字，我们签字后，法国就更容易签字了，只要它有良心。威廉一边说一边把笔递过来，让尼古拉也签字。尼古拉还是没完全明白威廉的意思，思想没转过弯来。啊！是呀！在俄国打仗和累累出事的几年里，法国一直把俄国视为路人，根本不像个同盟国，倒像是敌国的亲密朋友。只有威廉才是患难之交，他们两人正是在对日战争期间变成最好的朋友的。威廉把尼古拉称作亲爱的兄弟，说自己唯一的希望就是见到尼古拉成功，他说建立联盟对俄国最有利，所以才提出这个建议，两国联盟，日后可以与三国联盟合并，形成五国联盟，那么谁敢反对我们？那时所有的小国自然都会巴结我们，跟着我们走，连日本有朝一日也可能希望与我们站到一起。从今日起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于是，尼古拉签了字。两人拥抱，多么友爱快乐呀！这时威廉说，对这份条约目前必须绝对保密，请你连外交大臣也不要告诉，否则就会泄密。甚至不能告诉外交大臣？是的。可是条约上我们的签字后面还需有人副署呀！那好办，海军大臣随你来了，让他副署，但不让他读条文。为我副署的是我的副官。尼古拉同威廉亲热地告了别。他带着这段时间十分美好的印象回到家里。现在，俄国既与德、法两国结成三国联盟，就又成为不可战胜的了。

但国内的事怎么办呀？人们随兴所至，召开各式各样的代表大会，彼此攀比谁的决议写得更激烈一些。城市和地方自治代表大会想派代表前来觐见皇上，皇帝无法拒绝，只好像个小学生似的和自己的敌人立宪派面对面谈话。他站在这些人面前，审视着他们的面孔。这都是普通的有钱人，而且几乎都是贵族，有的甚至是公爵。尼古拉等着他们攻击他，但他们讲话都很恭敬，也许

是体谅他？他们只说如果皇上不履行诺言召集人民代表会议，政府就只能是软弱无能的。

尼古拉被他们突然采取的克制态度感动了，因此回答他们时也是热情的。他确实做过那样的承诺，后来因故推迟了。那个缙绅会议，现在更好的称呼是“国家杜马”，其纲领始终没有制订出来，大家设想的会议性质也不一样。君主认为它应是温和正派人物咨询性会议，会议提出的建议有助于寻求出路。但贵族造反派把它想象成一个激烈的大型会议，通过它把政权从沙皇手上夺出来交给众人。

一个月后，这些地方自治派召开了一次新的代表大会，会上宣布的纲领与他们上次带到彼得戈夫的不一样。可是，改革并未等来，革命却成现实。求助的对象已不是皇帝，而是人民。这些贵族造反派未经任何人委托，自己通过了自己编制的宪法草案，否决了皇帝的召集咨询性杜马的方案。他们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皇帝弄不清到底该听谁的，是听昨天的权威呢还是听今天的时髦人物的，后来终于看清，所有他们关于建立人民代表制的请求都不过是夺取政权的圈套。知识分子建立的联合会联盟公开称现政权为匪帮，这些知识分子讲起话来比革命者还恶毒。

人们希望皇帝召开的杜马会议是全民族性的而非阶层性的，而尼古拉越来越倾向于绝大多代表应是农民代表，这些人不轻浮、不偏激、办事稳重，不识字的更好，他们不会照搬报纸上的胡言乱语，也不会受阴谋诡计的欺骗。是不应该把使劲嚷嚷的无耻的城市平民全都排除在外？哦，应当在沙皇和俄国间、沙皇和地方自治官员间谋求一致和谅解，这似乎是古已有之的真理。尼古拉在夏天召集群臣开会，会前一起做了祈祷，他尽量亲自参与研究每一项条款，确定措辞。他明白，他现在采取的步骤是前所未有的，祖宗为此不会原谅他。

夏日炎炎，不时雷雨大作。由于要听取汇报，还要召开会议，尼古拉异常繁忙，特别是下午五六点钟，还需接见许多伤员。休息时同军官或米沙打网球、骑摩托车、坐汽艇、吃茶点，有时在屋外打着伞，有时在阳台上或中国式凉亭里。最令人开心的还是访问部队，在团队军官之家里长时间痛痛快快地吃喝。

尼古拉还到近卫骑兵团去发警报玩，接着骑上马驰向演兵场看部队集合。

这期间，传来了菲利普先生去世的噩耗。

经过半年准备，在主显容节那天（也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举行阅兵式那天），尼古拉终于公布了关于杜马的法律。紧接着，城里的一批坏蛋以及和他们同流合污的留利柯夫家族的公爵们就大喊大叫这是骗局。威廉一直在催促公布这部法律，此时发来贺电，又催促尽快选出代表，不管以后人民代表是拒绝或是接受拟议中的和约条件，以后他们都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反对派就无话可说，皇帝无论怎样都不至于受到攻讦。世界上任何一位皇帝都不能撇开人民的帮助独自做出这种决定。

威廉提出的意见当然是中肯的，不过，尼古拉认为，真正的人民永远是信任自己的皇上的，他并不畏惧独自做主可能带来的麻烦。过去11年里，他已习惯于这类麻烦了。

国内有一些人属另一类，他们更不安宁。如果第一次没惩罚他们，第二次、第三次也没把他们管住，后来就很难制伏他们。国内许多地方，特别是波兰、芬兰、波罗的海沿岸，都被罢工、爆炸、谋杀、抢劫等事件搅得鸡犬不宁。罢工者上街游行示威；巴库的石油工业被纵火焚烧了2/3；亚美尼亚和鞑靼人之间又开始互相杀戮；梯比里斯也发生了类似的血腥事件；显然，从国外向俄国境内运来了大批武器。一只装载了2000支瑞士步枪的轮船在一处浅滩搁浅，这才暴露了秘密。官方向大学生做出了让步，宣布大学自治、选举校长、警察不侵犯大学校园，目的在于使大学生们在罢课后较顺利地开始新学年，然而大学生们却不领情，依然不肯住手，还是违反禁令，召开大会，发表煽动性的无政府主义言论。

这一系列的事实在叫人受不了。尼古拉早就想找个机会抛开这些令人苦恼的事，外出休息几天，让自己快乐一回，稍微享受一下生活。他的这一愿望在对日和约缔结后终得实现。沙皇夫妇带着几个孩子乘舒适的"北极星号"快艇驶至芬兰海岸边的小岛，停在舰队碇泊场里，孩子们与军官和水手们在一起嬉戏，快活极了。尼古拉本人在这次自由自在的休息中也像小孩一样开心，他希

望自己年幼的继承人日后也能热爱海洋。游玩之后，他们举行了小艇比赛和帆船比赛，与阿莉克斯一同访问了舰只，在有些舰上他还拉了警报器，发出海难警报、战斗警报和火灾警报，为此感到很满足。消磨时间最多的还是打猎，在岛上进行围猎，水手们充当驱赶猎物的人，打了不少乌鸦、兔子，还有一只大狐狸。晚上放焰火给孩子们看，或者吹风笛、玩乐器，与海军军官共进午餐，尽欢而散，觉也睡得很香。这两个礼拜过得真惬意。他朦胧地预感到，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他们不容易再有了。这期间，维特回来了，他急于要求觐见，尼古拉把他召至岛上，封他为伯爵。维特惊喜万分，三次要吻皇上的手。尼古拉本来还想继续待在岛上，但气压下降，海上起了风，不得不回到彼得戈夫，重新开始了听汇报和接见的生活。这时他分外怀念那只可爱的快艇。

尼古拉指望签订和约后动乱会平息下去，可是不但没平息，反而加剧了。大学生现已获准可在一些地方不受警方干预召开大会，他们就一连几周开起大会来，每次有近7000人，其中夹杂着一些看热闹的群众，演讲人大吵大嚷，然后散会回家，第二天早上继续开会。他们在会上通过的决议说，即使他们停止罢课，那也不过是停止了一种消极无力的斗争形式，是要转向一种积极的激烈的形式，把大学变成政治学校和革命策源地，“现在整个俄国已陷于血泊中，再上学有什么用？共产主义万岁!”听到这样的声音却听不到一点反驳声，是很令尼古拉难过的。他身边就没有反驳声。沙皇觉得大学生们变得神秘莫测难以琢磨了。他内心深处还有一个不愿告人的创痛，那是1月9日流血惨案造成的，现在政府的一举一动均需十分小心，以免重蹈覆辙。但即使这样，动乱还是继续发展。记者们肆无忌惮，言语张狂，但却没有人依照有关法律指控他们。有一家印刷厂罢了工，厂里的青年排字工纠集了一批身份不明的人砸碎了其他印刷厂的窗玻璃，结果其他印刷厂也都停了工。宪兵警察遭到暗杀打伤的事时有发生。当邮局还没罢工时，亲王们常收到下流的辱骂信件，后来邮局罢工，接着是电报局罢工，律师们不知为什么也罢工，面包师罢工，中学生罢课。罢工罢课像波浪似的扩展开来，连神学院也罢课，总主教前去劝说时，学生们打着口哨唱着革命歌曲阻止他入内。有些神父拒绝朗读总主教发布的号召和解的公

开信。整个9月，莫斯科罢工罢课和街道上的冲突连续不断，一直到10月。罢工者要求工人代表有权不被解雇不被逮捕，却可以解雇管理当局的人员。擅自召开了许多代表大会，代表也是他们自己定的。他们到处散布传单，上面写着许许多多承诺。在大街上也开起大会来，演讲人要求的已不是地方自治和成立杜马，而是推翻专制政权和召开立宪会议。没人下令开枪，只说应予驱散。然而通讯社发来的电报却只讲警察哥萨克和士兵的杀戮行为和群众的愤怒情绪，司法部门也不去追究政治犯，法院侦察员也不去揭露犯罪者，他们这些人连检察官在内都同情群众。

不过，没关系。也许可以听任这种混乱局面发展下去，俄国终究会自己认识到这种混乱的坏处，自己把它摒弃。

擅自成立了一个革命铁路联合会，它强迫所有的铁路职员都参加罢工。他们干得很顺利。从10月7日至10日，几乎所有从莫斯科通往外地的铁路线都罢了工。他们还有个计划：号召普遍绝食，阻止部队通行，从而破坏政府的镇压意图。大学生还勒令小店铺关门。一些居心不良的家伙利用消息闭塞，在莫斯科造谣说："皇帝拒绝了人民的要求，到国外去了。"莫斯科马上就停水停电，所有的药店也罢了工。尼古拉把彼得堡全部卫戍部队都交给特列波夫指挥，后者发出警告：任何破坏秩序者必受严惩，这才好了一些。可是不久后，他们就宣布全国总罢工，真可怕。工人的要求可能有许多合理因素，但事情只能逐步解决，他们却没有耐心等待。

想不到在这样可怕的时刻基利尔堂弟偏要娶离过婚的表妹维克托丽亚为妻，全然不顾皇帝下过的禁令，因此尼古拉非常生气，不得不把他送到国外，甚至想破例取消基利尔的亲王称号。

可是，有什么法子？局势比1月份还要坏，与莫斯科的电报电话全都不通了。大臣们全都慌了神，无计可施。在这样惶惶不安的日子里，讨论的问题却只是应不应该设一个首席大臣职位（维特想得到），其他大臣是不是应该服从他？所有人的神经都紧张得快断裂了，都感到有一场震天撼地的暴风雨快要到来

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维特有一次要求单独觐见。尼古拉满怀希望地召见

了他。当前，政府在全国的各个环节均已失灵，人们不是不服从就是干些没用的甚至有害的事，维特这个聪明勇敢的人却能把国家从倒霉的战争中挽救出来，不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还能寄托在谁身上呢？维特早晨抵达彼得戈夫，傍晚才走，整整一天，全是他向皇上汇报。阿莉克斯有时也在场。维特还向皇上呈上一份报告，当前形势非常复杂，只有人中精英才能够力挽狂澜，维特正是这样的精英，他思维不落窠臼，能越过政府的日常事务站到全人类的历史或最科学的理论高度上看问题。他话讲得很长，讲得兴致勃勃、热情奔放，使人听得出神。维特说："俄国现在所展现的乃是人类精神向前的发展，任何社会肌体都具有渴求自由的本性，这种愿望正合乎规律地表现在俄国社会追求国民权利的运动中。"这一运动现已接近于爆发的程度，若想使它不致引起无政府主义，政府就必须自身勇敢公开地站到这个运动的前列。无论如何，自由是必然会实现的，可怕的只是通过革命来实现，是企图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动，是毁灭家庭和宗教，那时外国就会把俄国侵吞瓜分了。不过这种危险是很容易避免的，只要政府同社会一样，也把实现充分的自由作为自身活动的口号就行。只要提出这个口号，政府马上就能获得支持并在全国做到令行禁止（维特愿亲身坚决执行这一方针）。成立咨询性杜马之事提出得为时过晚，现已不能满足民意，民众现已趋向极端思想，也不能依赖农民的忠诚，只要注意农民就行。应该做的是满足先进社会思想的要求，把逐步实现普遍、平等、秘密投票选举作为未来的理想。不应该害怕"宪法"这个词，它意味着沙皇统治和选出的代表分享立法权，对这样的前景应当有所准备，主要的是应选择在社会上享有声望的人担任大臣，维特当然是其中佼佼者！维特直言不讳地说："这样做当然是许多世纪以来俄国政治的巨大转折，但在目前这种极端危险的时刻，绝不能再死抱传统不放，或者是皇帝站到解放运动前列，或者是听任国家被自发势力折磨，必须从两者之中选择一个。"

对这样雄辩的逻辑，尼古拉是找不到论据加以反驳的，形势也确实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了。但他内心是反对这样做的，不愿意一下子把自己的统治权、许多世纪以来的传统，还有农民，通通拱手放弃。似乎有些不对头，和这样的

智者再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大臣中无一人可做高参，连那位性格随和、对人关怀备至的宫廷大臣弗列杰里斯也不行。在皇帝身边，甚至在整个首都里，都没有一个真正的智者可做高参。母后远在丹麦，但母后也总是说困难时刻要依靠维特的，父皇在世时也这么说!

特列波夫倒是忠诚，但头脑简单，不善言谈，做不出旁证博引，说不出有说服力的话，只知道坚持说在当前混乱状态中不能做任何改革，应当用武力镇压动乱，只有这样改革才不会被看成让步。

但从这天起，尼古拉已不打算用部队来对付群众了。

在聆听了维特的那一番动人的谏言之后，尼古拉从阿莉克斯那里也没得到答案。几天里他又找了一些人商量，还是没有解决办法。由于连续几天进行紧张的讨论，尼古拉疲惫不堪，简直快到什么事也不能想不能做的地步了。偏偏这时还有些无关紧要的人来访，如乌拉尔哥萨克前来献鱼子酱，一个代表团前来坚决恳求谒见皇太子，还有些外国人。晚上，尼古拉还可以照例吹吹笛子，打打台球，但早上，即使起床很晚，却怎么也摆脱不了种种棘手的事。

这一段时间，铁路罢工不仅席卷了彼得堡，而且蔓延到彼得戈夫，因此应召前来的人们不能坐火车，只能坐马车或轮船。这真是古怪的年代。

尼古拉忽然觉得，维特也许是夸大其词了，也许用不着做什么重大决策，只做一些简单的不大的决定就可以了。于是他给维特发去一封电报，命令他协调各大臣的行动，恢复铁路和各地秩序；待恢复平静后，立刻召集当选代表开会。

这封电报很像是特列波夫拟的稿。维特是特列波夫的对头，当然不能接受。次日晨，维特乘船来到彼得戈夫，再次进宫陈言。他说，镇压在理论上是可以采取的，但未必有效，他维特也无力实施。现在没有足够的兵力来保护铁路，部队现都在贝加尔湖那边，其调动的交通线已受阻。维特说自己已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一个奏章，只需皇帝签署，就是采取新方针了。这就是用广泛赋予自由权利之法来挽救俄国；首先立即实行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然后逐

步弄清在居民中占大多数的通情达理的人的政治理想是什么样的，并相应地建立起法律制度，这需要很多年，因为居民不可能很快养成公民习惯。

尼古拉同维特谈了一上午，接着又谈到傍晚。维特的建议中有许多奇怪的东西，但是没有另外一个人提出什么建议，也没有另外的人可以咨询。看来只好同意了。只是，一下子就这么屈服于这么一个人，尼古拉觉得有些胆怯。维特是否愿意让戈列梅金这个属于另一派的人当内务大臣？维特一再表示可以，他在独立选用同僚时，不会狭隘，甚至他可以从社会活动家中选人，皇上不必担心。

但尼古拉还是不能批准这份奏章。他后来提出是不是应该以皇帝个人名义颁布一个什么东西，比如一个诏谕，表示恩赐，在教堂里宣读，使那些渴望获得自由的人直接用耳朵和心灵听到。对于尼古拉来说，他的让步的全部意义都在于这份诏谕的形式：须是沙皇亲自颁发的，又须是满足人民愿望的。好吧，请维特草拟诏谕，明天送来。

当晚没进行任何娱乐。次日清晨，尼古拉沙叔叔直接从自己在图拉的庄园乘驿车绕过罢工处匆匆赶来。来的正是时候！如果需委任一个铁腕人物为独裁者，他比谁都更合适。尼古拉在御前骠骑兵当连长时，尼古拉沙叔叔是他的团长，从那时起，这位叔叔就成了尼古拉在军事上的权威。尼古拉沙下车伊始喘息未定时就同意担当独裁之责了。可这时维特又乘船抵达这里，又鼓起如簧之舌向他们劝说了一番，尼古拉听后又软了下来，不知如何是好，但尼古拉沙却完全被说服了，变成维特和自由权利的支持者，甚至说如果尼古拉不签字批准给予自由，他就要开枪自杀。维特劝道，即使有一位敢作敢为的军人现在去镇压叛乱，那也会血流成河，带来的不过是短暂的喘息，如按他维特的计划做，带来的却是持久的安宁。他坚持要把他的奏章予以公布，这样可以使皇帝不承担责任。而且，有些话在皇帝诏谕中是不好说的。他把诏谕也准备好了，是在轮船上起草的，现在正由几个工作人员在码头上加以润饰。于是尼古拉派人去取诏谕草稿。

草稿中有些话写得很精彩，如“俄国君主之幸福与人民之幸福是密不可分

的，人民之悲苦亦即君主之悲苦”。尼古拉确实是这样理解的，也一直想这样表达，只可惜以前没有高明的代笔。尼古拉打心眼里弄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凶恶的骚乱平息不下来？为什么相互友好和忍让就建立不起来？倘若城乡老百姓大小文武官员、皇族和皇宫里的人和所有的亲王及其夫人们，能在那样的环境中生活，谁也不必放弃什么或改变生活方式，那该多好啊！

诏谕草稿还是提到维特坚持的各项自由，并且扩大业已宣布的杜马的选举人的范围，还提到把普遍选举权作为未来的理想，今后凡未经“国家杜马”通过的法律一律无效。

尼古拉明白，俄国人民当然还没有为代表制做好准备，他们还蒙昧未知，没受过教育，而知识分子却充满了过分的革命思想。皇帝并非对街上的游行示威和革命让步，而是对温和的国家机构让步。这一措施正合知识分子心意。

这一措施，既然是沙皇大发慈悲心肠做出的恩赐，就不能说是立宪吧？

在场的人竟然全都同意这份诏谕草案。为谨慎起见，尼古拉没有马上签字，而是把它留了下来，要再做一番祷告，再想一想。

尼古拉又同阿莉克斯商议了一会儿，还找戈烈梅金和其他人商量了一阵，又起草了两份诏谕稿，但维特离去时曾经一再叮嘱，如对诏谕草稿做任何修改，都须取得他的同意，否则他将拒绝执行。星期日夜晚，尼古拉派老弗烈杰里克斯到彼得堡找维特，维特拒绝做任何修改，认为这是对其本人的不信任，拒绝担任首相职务。

而这么多天来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另一条出路。所有的人，以尼古拉沙为首，除忠诚的特列波夫外，都深信必须赐予自由权并限制沙皇的权力。

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很可怕的。尼古拉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同日本缔结和约时也经历过同样的苦恼困惑。他问自己：这么做是凶还是吉？这可是破坏了从祖宗那完整无损地传下来的规矩。这简直可说是一次反对他自己国家的大变革。他感到自己似乎快要失去皇位了。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这可说是上帝的旨意，可以使俄国摆脱已持续一年之久的无法忍受的混乱局面。皇帝用这样一份诏谕能使全国安宁，能加强稳健人士反对极端分子的斗争力量。

于是尼古拉乐意赐给自由了。

这一天是1905年10月17日，星期一，正好是铁路翻车事件17周年，在那次事故中几乎整个皇族的人都命丧黄泉，每年都要纪念这一天。尼古拉前往混成近卫营参加节日活动，接着做了祈祷，然后就坐等维特到来。尼古拉沙不知为什么显得过分快活。他还一再开导皇帝，目前所有的军队都在满洲，就是想建立独裁也没有力量。此时尼古拉已头昏脑涨，思维混乱得像一团烟雾。

他又祈祷了一阵，画了十字，接着就签了字。签字后忽然觉得精神清爽了不少，以往在经过一番折腾做出决定后也有类似感觉。现在诏谕已经签署，形势总该好起来吧!

次日清晨，风和日丽，这是吉兆。尼古拉预料这一天人民群众中当会出现最初的狂欢和感恩的热潮。但出乎意料，情况并非如此。那些狂热的人并不感谢皇帝，反而公开撕毁他的肖像，辱骂现存政权，把让步说的一文不值，不要"国家杜马"而要立宪会议。多亏特列波夫完全禁止举行任何游行，所以彼得堡才没有发生流血事件，报纸坚决要求撤掉他的职务，但莫斯科和其他所有城市都有游行，人们举着红旗，庆祝胜利，嘲笑沙皇，对他毫无感谢之意。不过，第二天，作为对第一天游行的回应，各城市举行了另一种游行，这一次是惊惶不安而又无人领导的教徒，他们举着神像、皇帝肖像和国旗，唱着国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也不是感谢和欢乐，而是激怒。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以沙皇的强大足以自己解决问题为理由阻拦第二种游行，但未成功。所有的城市都有举红旗和举三色旗的两种游行，不可能不发生冲突。各地当局吓得不敢出头，像不存在似的。令人惊异的是，在俄国全境和西伯利亚所有的城市里，人们是那么齐心协力，一下子都出现了举三色旗的游行，他们对革命者愚弄群众的疯狂行为感到非常愤怒。革命者中有许多是犹太人，群众的愤怒有时就发展为蹂躏犹太人，英国报纸像往常一样把这说成是警察局组织的。有些地方群众愤怒得发狂，把革命者关在公家房屋里连人带房一起烧毁并杀害任何想进去的人。几天后，尼古拉不断收到全国各地发来的大量诚挚的电报，电文明确表示他们希望保持专制制度。尼古拉的孤立无援之感被人民的支持驱散了，可是这些支持为

什么不早些出现呢？当活跃的尼古拉沙和忠心的戈烈梅金同意让步时，这些善良的人为什么缄默不语呢？专制制度是不是真的不能生存了呢？也许它依然能够存在，不过是在更高的意义上？

还有一点，除了诏谕和维特的奏章，还没有来得及制订有关文件；所有的旧法律似乎一下子全都失效，但却未制订一项新的法律规章。仁慈的上帝自然会帮助的，尼古拉心里已感到上帝在支持他，因而不灰心丧气。

维特向报界求援并通过报界向社会各界表示：请给他几周缓冲时间，他将要组成一个新政府。但社会各界要求他先稳定局势，一开始就取消强化了的保卫工作和军事状态，撤销特列波夫职务，废除因抢劫、纵火和杀人罪而判的死刑，从首都撤走军队和哥萨克，取消新订的限制报纸的法律并使报纸不受任何制裁。维特在几天里没有获得支持，这使他不知所措了。无论他如何号召，地方自治派和自由派人士谁也没有加入他那个领导自由的政府。他撤换了半数大臣和34名省长，撤掉了特列波夫和警察部门许多高官，但局势仍然不但不安定，而且有继续恶化趋势。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维特这样聪明的人居然也估计失误，新政府同以前的政府一样，也不敢采取行动，总是等待上级命令。现在，连尼古拉沙也对维特大失所望了。

这时才得悉，在颁布诏谕的前夕，莫斯科的罢工很快就要平息了，自来水公司、铁轨马车、宰畜场都已恢复工作，大学生也已复课，市杜马也不再要求建立共和国，喀山、哈里托诺夫、尼日哥罗德等地铁路已恢复运营。可惜知道得太迟了，假如那时知道该多好！形势本已趋于安定，用不着发什么诏谕。皇帝发诏谕像是火上加油，莫斯科一下子又沸腾起来，甚至街上高唱马赛曲时总督都尔诺沃也脱帽向红旗致敬，一名医生逝世竟有近十万人前去参加葬礼，发表的许多演讲都要人们不要相信诏谕，要推翻沙皇；大学里散发新手枪，彼得堡工学院学生向谢苗诺夫团投了炸弹。

唉，若是那时有人前来告诉我们情况已趋缓和，那该多好！为什么夏天不听威廉的话，不去召开咨询性杜马，若那样做，一定能扭转局势，而现在却闹得更凶了。各地都把国旗收了起来，以前罢过工的人要求照发罢工期间工资，这

时又爆发了新的罢工；报纸猖狂无耻至极，满纸对当局的造谣污蔑，对报刊的审查已完全停止，革命报纸公开流行；高等学校里的大会连续几周不停地举行；铁路交通重新中断；与西伯利亚完全失去联系；鄂姆斯克以东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伊尔库茨克建立了共和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未被遣返家乡的后备部队发生兵变并蔓延开来；莫斯科有一个掷弹兵团也发生兵变；沃龙涅日和基辅也有士兵骚动；一群喝得烂醉的水兵把克朗施塔得要塞的权夺了两天（因电话中断，无法得知详情；彼得戈夫宫的窗户被那个要塞的枪炮声震得直响）；水兵们在彼得堡横行霸道；俄国南部和东部武装匪徒十分猖獗，率众焚烧庄园；城市里的煽动家煽动农民抢劫地主财产，无人阻拦；农民骚乱从一处蔓延到另一处；革命党公开讨论如何在军队中进行工作和发动武装起义；擅自成立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控制了首都各印刷厂并要求拨给经费；波兰全境一片叛变声，波罗的海沿岸诸省和芬兰发生了真正的暴动；总督逃到铁甲舰上；这时在塞瓦斯托波尔也发生了一起水兵暴动事件，又是海军出事；全俄邮电工人这时也宣布举行总罢工，交通和通信联络全部瘫痪，从皇村同彼得堡联系只能通过无线电报。仅仅一个月的工夫俄国就垮了，包括俄国的全部生活、活动、经济、财政全部崩溃了，更不用说外交关系了，简直无法理解。唉，假如各处官府都能忠实而又无所畏惧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何至如此！但现任官员没有一个是克己奉公的。

维特也未能左右他所谓的“自然的进步运动”，现在他也提议要采用枪毙和绞刑了，只是他自己没有力量。

而流血事件终于发生了，而且更悲惨。伤亡者都是自己人，想到这点就令人痛心，不寒而栗，真为俄国感到可耻啊！它竟不得不在全世界面前遭受这样的危机，短时间内竟被弄成这个样子。

尼古拉悲观失望，痛苦不堪，独自关在房里，不愿离开彼得戈夫和皇村。他担心这些宫殿和亲爱的母后的加特契纳宫殿不久会消失。不过，说不定农民群众会拥进杜马要求恢复君主专制，求上帝赐给他以工作力量和灵魂安宁。这期间，尼古拉结识了仙长格里哥里·拉斯普廷，他是托博尔省真正土生土长的老

百姓；并且赦免了斯杰塞尔（他向日本人交出了旅顺口，有些人要求对他提出审判）。

在这些痛苦的日子里，精神上最欠缺的是与近卫军的交往，未能感觉他们的尚武精神。不得不屈从于预防恐怖分子袭击的需要，不能直接到部队驻地去。不过尼古拉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把整团整团的人邀请到皇村来。他真的这样做了，部队每周来两次，谢苗诺夫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莫斯科团、近卫骑兵团、御前哥萨克团轮流，每个团第一天开进皇村驻扎在兵营里，团里全体军官与皇帝皇后共进午餐并长时间交谈，这样的会面使皇帝非常高兴，精神大为振奋。第二天则在宫殿前广场上举行阅兵式，如天气不好则在练兵大厅里，每次都非常精彩；近卫重骑兵团分别以慢步、大走、大跑检阅了三次，也极好。幼小的皇太子阿列克塞是芬兰团的名誉团长，尼古拉抱着他走过这个团，格外引人注目。每次阅兵后，尼古拉都与军官们共进午餐，久坐不起，一直到晚餐，晚餐后又继续待到深夜。这些举动使团队受到极大鼓舞。尼古拉本人也觉得朝政似乎变轻了，领导俄国似乎不那么艰难了。威廉深谙此中奥妙，他来信说："减轻忧愁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投身于自己心爱的近卫军，举行检阅。"

然而，尼古拉与威廉的关系这年秋天也遇到很大麻烦。他终于忍不住向外交大臣讲了比约尔卡条约的事。外交大臣听后大惊失色，他说，把这种已订好的条约给法国看，这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表示该条约是针对谁的？这是威廉离间俄法友谊的奸计，目的是使德国摆脱孤立状态并使俄国依附于德国。该密约与俄法条约是极端矛盾的，法国一心一意要向德国复仇，它为了谁又为了什么要加入这样一个条约？

尼古拉以前没想到这点，现在才生了疑心。一方面，法国确实算不上是俄国的忠实盟国，它在日俄战争中置俄国于不顾，现在又以俄国犹太人的遭遇不好为理由拒绝给俄国贷款。另一方面，德国靠贸易条约并利用我们被日俄战争捆住手脚之机使我们不得不白白给它大批粮食。俄国的确没有忠实朋友。难道最好的朋友威廉也是在对他玩弄诡计？尼古拉怎么也想不通。不过，他想，既然威廉耍花招，我也可以摆脱那个条约？于是尼古拉想试试。

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威廉：我们的协定是极有价值的，但目前看来法国不会加入，现又遇到很大困难，因此绝对不能付诸实行，否则势必把法国推入敌人的怀抱。

威廉并未被难住，回复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俄国是否应对法国仍承担义务，应视法国是否配得上而定。法国在日俄战争中抛弃了俄国，德国却千方百计帮助俄国，这就使俄国承担了道义上的责任。我们互相伸出了友谊之手而且在上帝面前签了字，上帝也听见了我们的誓言。签了字的条约是不能取消的，我们应该照章履行。况且法国未必会拒绝签字加入。

尼古拉感到十分尴尬，想不出办法应付这一局面。后来与外交大臣商定这么说：尼古拉在比约尔卡时身边没有带父皇以前同法国签订的文件，因此凡可能导致与法国冲突的条文均应排除，比约尔卡条约是有条件的，目前不应生效。

但威廉仍固执地坚持说：条约既已签订，就必须履行，亚历山大三世虽然与法国签订过条约，但却当面向威廉说过自己对法国共和制度非常憎恶。

这无疑是真的，尼古拉对法国共和制度也同样憎恶。而法国共和制度政权对俄国君主专制制度一定也同样憎恶。父皇为什么要订那个条约？但做儿子的无权废除父亲做的事。为什么德国在签订那个条约之前没有使俄德友好条约继续有效？……这些事都纠缠不清、扑朔迷离，想纠正也不行。为什么威廉在比约尔卡那么狡猾，现在又这么固执？

威廉的武断专横使尼古拉深感受到屈辱，不禁萌生了摆脱其约束的念头。他可不是小孩子！

唉，人与人之间在1905年及其以前存在的坦诚关系，现已荡然无存。嘴上还口口声声讲友谊，实际上已无往日的意义。

俄国在对日战争后的衰弱，迫使它谋求与英国改善关系，迫使中亚边界得到安宁。爱德华舅舅从英国到列维尔来与尼古拉见了面。这之前尼古拉从来没有仔细思考过同英国结盟或结交，现在却变成了这样：在威廉和全世界人的眼中，俄国似乎在同英国拉关系，想结成它并不需要的同盟。

一年后，1909年，这一切的后果才显现出来。奥地利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他们选择的时机十分狡猾，当时尼古拉正乘心爱的快艇漫游，长时间与外界无联系，一无所知。欧洲所有国家这时已不把俄国当作强国对待。军事大臣所作的关于这些状况的汇报也告诉尼古拉：只能忍耐，再忍耐。这一回轮到尼古拉向威廉复述后者以前讲过的话了：俄德的紧密团结是君主专制制度的柱石，他将毕生致力于加强两国的紧密关系。威廉没有亲自，甚至没有通过私人副官给他回信，而是通过政府渠道粗暴地教训俄国不仅应保持缄默，而且要在侵吞波斯尼亚事件中谦恭地对待奥地利。整个俄国社会，从右翼党派到立宪民主党，都群情激昂。所有的人在斯拉夫主义上心理都是一致的，都又再度藐视起自己的政府来，皇帝本人也感到无法逃脱这种屈辱状态。他下定决心绝不忘记这事，但与其说不忘记德国，不如说不忘记奥地利。

即使这样，尼古拉与威廉还继续会面。他到波茨坦去参加了德国在俄国援助下获得解放百周年纪念活动。双方又重提真诚合作、忠实友谊和源远流长的战友感情。尼古拉从来没有以武力反对德国或与德国打仗的念头。

俄国曾经有过太平、繁荣、昌盛、幸福的年代，那时它得到了巩固。但忽然历史开始重演，仿佛进入了一种神秘莫测的轮回，这样的事通常是不会发生的，它嘲弄般地召唤所有的演员再上演一遍，而且要演得比以前更好。6年后，奥地利再一次同样地威胁了塞尔维亚，而且更不公正，尼古拉手上再次拿着威廉的信：

1914年7月，尼古拉收到威廉电报，提到两国间多年来真诚亲密的友谊。

电报虽然提到近年发生的不和，但也谈到真诚亲密的友谊。当事件发生时，威廉正在挪威海峡由海上回家，在路上就给尼古拉发了电报，只有朋友才能这样做，其他国家的首脑才不会哩！两人建立了直接、忠诚、密切和快速的联系，这是一大幸事！如果通过两国外交大臣和大使来联系，那就慢得多，麻烦得多，在紧要关头也不安全得多。谁也做不到这样像琴弦似的灵敏，即使那个长着狐狸般的脸和长鼻子的好动的外交大臣萨佐诺夫也做不到，他总是提反对意见，总爱谈自己的观点和附带想到的问题，以致总是耽误时间。现在这种做法可以准确叙述，直截了当，什么也不能代替皇帝间的直接联系。

事件发生时威廉正好在海峡中，这足以证明他并未同奥地利勾结。于是，

尼古拉进一步相信了威廉确实并未很快得知奥地利侵占波斯尼亚的事件。奥地利惯于采取狡猾手腕，这一次也如此，它趁法国总统彭加勒在铁甲舰上出席尼古拉举行的送别晚宴时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就是不想别人马上知道，而那份最后通牒的口气是前所未有地强硬蛮横，限48小时内答复，不容拖延。奥地利怎么能这样呀？

难道在位已66年的弗朗茨–约瑟夫不想得个好死？

尼古拉批示：从星期五起采取防备措施，让部队从野营开回冬季军营，召回度假军官，加强要塞和舰队防务，避免重蹈旅顺口覆辙。尚无必要在靠近奥地利的边境实行局部动员。7月14日，星期一，尼古拉收到威廉电报，完全放心了。他写信给萨佐诺夫，要他立即敦促塞尔维亚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指控，现在是审查案情和裁判的大好时机，要奥地利提出证据！对大公的谋杀准备工作是在奥地利进行的，奥地利侵吞了波斯尼亚，现在自食苦果，跟可怜的塞尔维亚有什么关系？但塞尔维亚的答复却是服服帖帖的，几乎接受了全部屈辱的条款。

星期一天气很好，尼古拉同安尼亚·维鲁波娃打了一会儿网球。晚上看书。

星期二也是好天气。军事大臣苏霍姆林诺夫和总参谋长亚鲁什克维奇前来做例行汇报。

尼古拉对老苏霍姆林诺夫一向十分尊敬，他是个英俊机智的军人，当尼古拉还是太子时，曾经听过他讲课，亚鲁什克维奇是与皇帝同龄的将军，聪明博学，正直稳重。他们这次没有讲什么新鲜事情，局势仍与星期六一样，一旦需要，即可进行局部动员，现正在做准备，但还没见到紧急情况。有这样经验丰富沉着镇静的将军掌管，一切都能安然无恙。苏霍姆林诺夫一再说，我们现在不怕任何战争，也打得赢任何战争。

这天，政务之余，他还打了一会儿网球，到斯特列里纳去探望了奥尔加姑姑，同她一起吃了茶点，这时萨佐诺夫来电话报告说，奥地利今天中午已向塞尔维亚宣战！

这简直如同晴天霹雳。对一个弱国宣战，可耻至极！奥地利像只老馋猫，老是捣乱，挨了一次打、两次打，还是没变老实，又把脑袋伸到别人的奶罐子来了。

晚上在彼得戈夫会客时间之外，尼古拉接见了萨佐诺夫。这人雄赳赳的样子，一双锥子一样的眼光从深凹的眼窝里锐利地刺着人，他坚决主张立即宣布局部动员，并且当他在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之后就一再指出俄国靠和平手段是达不到任何目的的，俄国如让出塞尔维亚，就是再一次受侮辱，一旦德国决心开战，它就会夺取俄国在敏感地区的利益。萨佐诺夫确信奥地利的最后通牒是与德国充分商议后才发出的，但尼古拉认为不是这样，不可能是这样的！他气得发抖，真想好好教训奥地利。再次忍受波斯尼亚之辱，再次不敢前去援助斯拉夫人，真叫人难受至极！难道我们不是强国了吗？

可是，不能丧失理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向海牙法庭提出控告还为时不晚，然而萨佐诺夫摇晃着小脑袋，显示出从未显示过的大胆，甚至举止近乎失礼，不住地跑动着，摆动着双手。他说，俄国整个社会都无法忍受这样的耻辱，整个社会精神高涨到惊人的程度，如果我们对这场战争敷衍搪塞，社会热情就会消失。尼古拉难以拒绝来自人民的意见，勉勉强强地批准了在邻近奥地利的区域里进行局部动员。同时他在百忙中还想到，应该在外交大臣走后给威廉发一封电报。

他用英文起草电文时手颤抖着，几次修改，反复阅读，然后才交付译成密码。当晚电报到达柏林。尼古拉在电文中说，他这是向威廉求援，整个俄国现在极为愤怒，对他压力极大，他恐怕很快就顶不住了，恳求威廉看在老交情的面子上，不要让奥地利做得太过分，不要酿成欧洲战争大祸。

他谈到他们两人曾几十次会面，共进午餐，友爱地拥抱，开玩笑，互赠礼品，曾经许多次彼此披肝沥胆、倾吐衷肠。感谢上帝，这些现在总该起作用！

第二天，7 月 16 日，星期三。这天过得很不顺心，清早尼古拉接见总参谋长亚鲁什克维奇，他很快就使皇帝心急如焚，坐立不安。原来尼古拉昨天好不容易才批准的局部动员令实际上无法实施，因为总参谋部居然根本没有制订过局部动员计划！此外，怎么划分华沙军区呢？它既同奥地利接壤，也同德国接壤。难道总参谋部没有足够的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尼古拉心里十分恼怒，但对这位温柔的亚鲁什克维奇是绝对不好意思发火的，他的声音、举止和柔和的外

表是那样的有魅力，何况他担任总参谋长才不过4个月，不能追究他的责任。真是没研究过这种计划吗？应当问军需司令达尼洛夫，他什么都知道！打听之后，才知道达尼洛夫刚刚休假回来，他说总参谋部从来没有订过这种计划。真是咄咄怪事，对付奥地利须局部动员，这是最简单自然的措施，居然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苏霍姆林诺夫也没想到过？他不是当军事部长已有5年之久了吗？话说到这里，亚鲁什克维奇忸怩不安起来，他从未想使有恩于他的苏霍姆林诺夫出丑，是萨佐诺夫昨天请求进行局部动员的，苏霍姆林诺夫当然不知道这些情况。大臣会议居然从来没讨论过这个问题，真是怪事。

不过，这也许是好事。尼古拉甚至松了一口气，这就是说，目前不会宣布任何动员了。过些时候再说吧！（也许会化险为夷，老友威廉不会抛弃我，一切都能通过谈判圆满解决。最后还有一张备用王牌：英国，它迄今还没露面。德国以为它会中立。应当请求英国及时表示坚决态度，只要它表态，就不会再有危险了）还是不宣布任何动员为好。

敏感的亚鲁什克维奇的焦急心情不比皇帝少。他先说，3天前他已做了部署，现正在制订局部动员计划……嗯，嗯，皇上通晓军事，知道即使是3个月也不可能完全制订好动员计划并发至各军区的，其次，其次……从局部动员转为全面动员可能引起极大的混乱，制订的军用列车运行表和动员的士兵的运载路线可能被打乱……亚鲁什克维奇用他那柔和的声音和柔和的眼神织成一幅使人驯服的网……我们不妨在紧要时刻立即宣布全面动员……不妨立即准备全面动员……

全面动员的命令他已经写好带来，只等皇上签字。

尼古拉吓得往后一闪，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全面动员，那样做会震惊欧洲。有什么必要那么做？他昨天对局部动员也是勉勉强强才同意的。

但不能毫无准备。当然要准备局部动员，可是也不妨制订一份全面动员计划，有备无患……亚鲁什克维奇害怕失掉这次机会，柔和的眼皮垂得低低的……皇帝签字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动员，只不过是此项工作的开端，还须获得三位大臣的签字，然后送参议院通过……这不过是程序的开始。

好吧，既然是开端，的确还要找那些大臣，他们不先请示皇上是不会签字

的……雅鲁什克维奇请求得是这么恳切，这么固执。说得也对，既然不做局部动员，也不能不做任何准备。皇帝问：

"可是，你可别骗我呀！您会去同萨佐诺夫商量吧？然后还要再同我联系？"

"当然会，毫无疑问。"

尼古拉签了字。

同时还签署了另一份文件：《关于野战部队管理条例》，没读，因为谈话时间已经很长了。

但令人苦恼的事并未随着早晨这席谈话的结束而结束，这才刚刚开始，整天都乱哄哄的，所有的事都通过电话直接向皇帝汇报。因形势紧张，官员可以直接给皇帝打电话，这是前所未有的。整天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尼古拉一听见电话铃响，就觉得仿佛是大头针往身上刺，发出吱吱声。每次接电话他都须走到侍从室，尼古拉现在为了办事迅速不得不使用电话这种工具了，其实他心里觉得这东西很讨厌，有什么行为比用电话交谈，特别是谈重要事情，更不愉快、更不自然呢？你并不想同对方谈话，你看不见他，也不能看着四周的情形，不能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沉默一会儿，考虑一下。

尼古拉被钉在彼得戈夫不能动弹，只主持过一次海军学校毕业生晋升海军准尉的仪式，还打过一回网球，因情绪消沉，满腹心事，没玩起来。天气依然很好。在彼得堡、维也纳、贝尔格莱德、柏林等所有的首都都发生了一连串事件，都在互致信函互发电报。（可怜的彭加勒受尼古拉宴请后乘船离去，尚未抵达巴黎）

上午，德国大使访问萨佐诺夫并带来鼓舞人心的消息，说德国将竭尽全力说服维也纳政府让步（这正是尼古拉希望的），要求俄国不要进行预先动员，如进行就无异于制造障碍（尼古拉原也不打算那么做）。萨佐诺夫答复说，局部动员已准备就绪，但尚未进行（这是事实），我们的军事措施绝不是针对德国的，也不是为了进攻奥地利。当天中午，大臣会议开会，决定不进行局部动员。

但这时又传来另一条消息：奥地利拒绝同俄国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换意见，不论直接的或是通过会议。

这是 1908 年让步的后果。奥地利估计我们这次还是不敢出面打抱不平。

过不多时，德国大使要求萨佐诺夫再次接见，见面后他读了德国首相发来的电报：如俄国进行军事准备，即使不动员，德国也认为自己不得不实施动员。这就是说，德国将立即发动进攻！

当天天气晴朗，尼古拉心里却布满黑暗。彼得戈夫一片太平景象，从窗户向外望去，芬兰湾平静如常。可是我们没有退路了。与我们谈话，与同塞尔维亚谈话一样，根本没把我们看作强国，甚至不允许我们采取一般的防范措施！

这种侮辱简直叫人透不过气。只剩一个希望了，让萨佐诺夫请求英国出面表态！

这时却收到威廉发来的救命电报。威廉毕竟没有出卖朋友！他不会出卖的。威廉答应给予帮助，从中调停，但坚决要求俄国不要引起战争。

尼古拉再度受到鼓舞。他们两人的友谊能挽救一切。他急忙跑去打电话，要萨佐诺夫、苏霍姆林诺夫和亚鲁什克维奇不要采取任何无法挽回的措施。

尼古拉立即给威廉复电。两人电报往来频繁，有时没等回电就又发一封。

尼古拉在电文中问道，您的和睦友好的电报同大使送来的声明口气完全不同，这应怎样理解？请示知。让我们把奥地利和塞尔维亚问题提交海牙法庭吧！应避免流血！我信任您的智慧和友谊。

这时接到报告：奥地利已轰炸贝尔格莱德。

啊，这就是他们什么话也听不进的原因了，他们为了赢得时间而这样做的！

萨佐诺夫和苏霍姆林诺夫此时在总参谋部同亚鲁什克维奇一起开会，讨论获准实施的局部动员问题。他们打电报报告皇帝说，不能冒险以局部动员来破坏全面动员，那样会打乱一切。他们请求批准全面动员。

尼古拉手持电话筒贴着耳朵，人被钉得死死的，整个思想也被压抑住，必须在这种情况下做出决定，他们已经轰炸贝尔格莱德和平居民了，我们应该采取一些行动。但我们居然对局部动员毫无准备，真丢人！

唉，不是在亲眼目睹的炸弹下面，也不是骑着驯服的马在军队面前，而是对着这么一个胶木话筒，这样做起决定来更困难。但只要他的话一出口，千万

人就会立即行动起来。

尼古拉晚上过得很孤独、忧愁，没有人来汇报，也没有什么对外约会。晚餐晚茶都是家里人一起吃的。此时某个地方正在发生某种不可挽救的事件，想到这点，尼古拉怎能安睡？

忽然，又来了一封宽慰人心的电报，还是威廉发来的！威廉说，他当然赞成尼古拉的维护和平的愿望，俄国当然可以只做旁观者而不把欧洲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极其可怕的战争中去。彼得堡和维也纳直接协商是可能的，也是应当的，威廉愿尽力促成此事。但俄国所进行的备战工作妨碍了他的斡旋活动并加速了危机的发展。

真得谢谢他！一切尚可挽救，令人如释重负，令人高兴！不过，手下的人说不定已经行动了？不，还没有，还须几位大臣和参议院签署，没那么快。

晚上10点钟。尼古拉不知道多少次下楼到侍从室里，吩咐接线员接通军事部和总参谋部的电话。金属话筒传来一个嘶哑的声音，完全不像亚鲁什克维奇的，口气也不像以前那样殷勤讨好，而是固执地反对说：动员不像驾马车，不能随意说走就走，说停就停，总参谋长不能对这样的行为承担责任……

尼古拉喊叫起来："我承担责任！"

"不过现在怎么也不可能制止了，动员令电报已发往所有军区……"

"这怎么可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几位大臣签字了吗？"

"他们不可能在一个半小时以内让几位大臣都签上字！"电话筒里干咳了几声，蛮不情愿地承认，白天他们作为准备措施已取得几位大臣的签字；萨佐诺夫已把我方开始进行全面动员之事告知巴黎和伦敦；此时他们正往各军区发电报……不可能后退了。

"停止！停止！"幸亏他不是选举产生的被捆住手脚的总统，而是自己国家的独裁君主。"停止！只能进行局部动员！"皇帝不愿再听任何进一步的解释。

说完这话他一下子觉得自己轻松了不少。

温暖的夜静谧无声，繁星满天。海上也十分宁静，连浪打浪的声音都听不见。

安然入睡以前，尼古拉还需做一件愉快的事，这就是给威廉复电。衷心感谢他这样快做了答复。俄国的备战不足以成为障碍，才不过进行了5天，都是常规的、简单的，只为防御，尼古拉衷心希望威廉进行斡旋。现在发这封电报还不够，明天还要派御前侍从送一封详尽的信给威廉。

立即召见御前侍从，命他明天出发。

电报译成密码发出时已是夜里一点钟。皇帝沉重的一天结束了。明天他就会得知，正是在夜里1点钟德国大使打电话给萨佐诺夫，请求立刻召见他。

感谢上帝，星期四上午过得比较平静，没有人打电话汇报令人不安的消息。只有海军大臣请求允许在波罗的海布置水雷作为障碍物。尼古拉没同意。这种事只有经过他的特别批准才能做。

既已信任威廉，就应信任下去，应该冒冒风险。

电话铃又响了，是农业大臣克里沃舍因请求紧急接见。真不是时候，尼古拉说太忙，不能接见。后来才得知是萨佐诺夫怂恿他来请求皇上允许进行全面动员的。

尼古拉确实忙，但不是忙于按预约名单连续不断进行意义不大的接见。他须在中午以前给威廉写一封极为重要的信，今天就叫御前侍从送走，以便彻底消除他与威廉之间的隔阂。

但他还没来得及坐下来写信，就又被叫去接电话了。这是苏霍姆林诺夫和亚鲁什克维奇从总参谋部打来的。两人对昨天皇上取消全面动员的决定感到不满，再次要求批准。尼古拉勃然大怒，他从未见过自己的臣属有如此纠缠不休的。他们是关心德国的威胁呢，还是不过是掩饰自己对局部动员毫无准备？尼古拉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而且干脆中断了同他们的谈话。

谈话中断了，但不知怎的尼古拉没马上挂上电话筒。亚鲁什克维奇赶紧说萨佐诺夫正在他身旁而且请求讲几句话。

办事须干脆果断，有这种素质的人是幸运的。尼古拉确实是发怒了，但并不干脆果断。尼古拉沉默片刻后。萨佐诺夫迅速冲着话筒说，他要做关于政治形势的紧急汇报，请求今天面见皇帝。

在目前这样的时候尼古拉不可以不接见外交大臣的，有什么理由拒绝萨佐诺夫呢？但要想法把他挤掉，把这些事全都了结，尼古拉决定把接见萨佐诺夫的时间安排在御前侍从前来取信之时。

接着尼古拉就坐下来给威廉写信。当大家都在异口同声谈种种危机和威胁时，唯独他们两人心心相印，想的一样。电报语言和密码太限制人了，所以尼古拉才拿起笔来。刺杀大公无疑是一桩可怕的罪行，那些恐怖分子并不比在俄国刺杀谢尔盖叔叔、斯托雷平、几十位将军和几十位政府要员的家伙好！但有何证据说塞尔维亚政府参与此事呢？法庭审讯不是常出错误吗？奥地利为何不向全欧洲公开审讯结果，却代之以发布简短的最后通牒和宣战？塞尔维亚本来已经做了对一个独立国家来说难以承受的让步，但奥地利对它却还是要进行剿杀，就像对一个殖民地一样。消除俄国国内的应战情绪是十分困难的。尼古拉请求威廉协助……

昨晚收到威廉电报和今晨醒来时，尼古拉觉得要写的是一封非常能打动对方感情的倾吐衷肠的信。可是这会儿，在经历了各式各样无谓的接见、电报、早餐之后，新鲜的思路已荡然无存，再找不到恰当的词句了。这样的信两天后送达到威廉手上时，未必能对扭转欧洲局势起什么重大作用。

这时，御前侍从走进屋来。萨佐诺夫一起进来了。

这样，他就同时接见了他们。原来也是这么安排的。尼古拉不满地望着萨佐诺夫。萨佐诺夫已人近中年，头顶快秃光了，剩下的一点头发像羊毛似的呈半月形挂在后脑勺上，他相貌猥琐，不招人喜欢，而且正在患神经性头痛症。他利用自己神经痛的机会，不顾任何礼仪和给人的印象，开始激动地、不停地、冗长地说起话来。有的话确实有振聋发聩的效能。他说，一个悲惨的时刻正在到来，它将决定俄国和皇朝的命运，我们不能就这样一下子切断从来就奉行的斯拉夫政策。战争早已酝酿成熟，现已不可避免。维也纳早已决心要打，而且已经开始，柏林并不想劝阻它，反而要求俄国对它投降，使俄国又一次蒙受耻辱，如同意他，俄国将来是不会原谅自己的君主的。外交的作用现在已用尽，德国显然是想挑起冲突。国家的安全需要我们全面武装起来。如果我们不立即

动员，以后再动员就不能起作用，俄国就会大难临头。我们会还没来得及拔出刀，就被打败。如果全面武装起来，则大不一样。战争并不是我们挑起的，如果被打个措手不及，就会比担当挑起战争的罪名可怕多了。何况我们可以让动员工作秘密进行，不让欧洲知道。

尼古拉像受伤似的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暗中扭着自己的手指，他觉得自己似乎被撕成两半，被拖往不同方向，他应当立即做出最重大的决定！不论在场不在场的人都不可能为他出主意，也听不见上帝的声音。他有那么多大臣、将军、亲王、御前官员，但他命中注定还须自己做出决定，虽然他犹豫不定，精神受尽折磨！缺少一个坚强、聪明、杰出的人来承担责任，做出决定，当机立断地说："只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

斯托雷平就是这样的人，现在就缺这样的人，缺斯托雷平……

现在棘手之处在于如果德国在欺骗我们，我们就要栽跟头！如果德国是真心实意的，我们走的这一步就是挑起战争，战争规模之大是难以想象的。

御前侍从一直默不作声，看见皇上的窘状后，慢慢说：

"真难啊！"

尼古拉紧张的神经像挨了一击似的，浑身颤抖了一下，断然说：

"我来决定！"

他想起一个问题，向萨佐诺夫问道："您的英国现在怎么样？这么多天它还不能发一个明确的声明吗？要是它发了，也不至于有这么多麻烦。"

萨佐诺夫这时才想起，他动身到这里来前的最后一分钟，收到一条最新消息：几小时前，德国舰队已从基尔港开出，正全速向波罗的海行驶，目的是进行突然袭击。

"出现这样的事？皇帝还不让布雷！"

尼古拉紧张到极点的神经突然断裂了，他没有忘记旅顺口的教训：

"好吧！您把我说服了。但这是我一生中最沉重的一天。"

说完这话，尼古拉如释重负。

每次让步后，他都有这样的感觉。

每次做出决定后，他也都这样。

萨佐诺夫请求立即从彼得戈夫给亚鲁什克维奇打电话，通知从今天半夜起开始全面动员。

天气暖融融的。大海闪着柔和的光。难道德国舰队现在正在大海某处乘风破浪前进，准备偷袭新的旅顺口吗？

真是这样吗？消息也可能是假的。

尼古拉走开了，去洗了个澡，真舒服。

但是他的心里还是很沉重。

这是不是不祥之兆？6点钟，他收到了威廉电报。

这封电报再也没有任何甜言蜜语，与德国大使的正式照会没什么两样：你方的动员令导致严重的危险后果，奥地利迄今并未进行全面动员，目前的后果完全是你方的决策造成的，无论是战是和，你方均应负全部责任。

这种话真叫人难受！真可怕！上帝啊，请保佑我承受住这种非人所能忍受的负担啊！

尼古拉第一个反应是："要打电话给亚鲁什克维奇，取消动员令。"

但向自己的大臣说出这样的话，他感到很丢面子。

尼古拉眼前鲜活地浮动着威廉的形象：他目光炯炯，热烈奔放。尼古拉也曾想象过威廉最后可能会成为自己的敌人，但怎么也想象不出居然这么快，而且确实发生了。20年来，他们一直友好相处，不知为什么现在会这样，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误会，对某些问题双方未充分交谈，如同1905年1月8日一样，那天威廉要他制止暴民，但却没谈清楚应该怎样制止。

尼古拉头脑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威廉！让我们都清醒过来吧！我们在干什么呀？我们是在破坏自己的皇帝宝座呀！

但他不好意思打电话取消动员令，他也不知道，亚鲁什克维奇从当时起一昼夜间也没有打通电话。

从另一方面看，俄国对奥地利的让步已经很多，已令人感到羞耻了。有时应在行动上采取另一种态度，表现强硬的立场。现在可以把话讲得强硬些，革

命的魔鬼已永远从俄国清除出去了。

萨佐诺夫承诺秘密进行动员，但实际上是怎样呢？从18日早晨起，彼得堡大街小巷贴满了红纸动员布告。为什么是红的？是表示将要流血，还是表示红旗已经插进了皇帝的营垒？所有的外国人都看见了这个动员布告，它的红色不知怎的给人的印象尤其深。不久，德国大使和奥地利大使接踵而至趋访萨佐诺夫。这之后，皇帝的电话铃响个不停。萨佐诺夫向德国大使保证俄国决不会做任何不可挽回之事。德国大使则送来一封信，信中说德国正在采取措施，奥地利不会侵犯塞尔维亚，俄国必须接受冲突局部化。

局部化？就是说听任他把孤立的塞尔维亚置于死地？

这种形势，上帝能保佑变好吗？能那样多好！真遗憾，为什么宣布的不是局部动员？就因为那些不可靠的奴才对局部动员没有准备。啊，但愿一切都能平安过去。

奥地利大使通知俄国，奥方同意就最后通牒问题与俄国直接进行谈判。

应当开始谈判。但萨佐诺夫不知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尼古拉没法猜出自己的部下是怎么想的，也不可能及时阻止他们。萨佐诺夫居然让奥地利去伦敦谈判，而且要他们停止军事行动。这倒是对的。现在只有奥地利采取了军事行动。

这一天天气阴霾闷人，弥漫着一种类似办丧事的气氛。尼古拉后悔莫及，为什么他同意进行全面动员呢？不过，历史上也并不是每次动员后都一定发生战争的。

中午11点，所有的大臣都来到彼得戈夫开会，讨论了谁担任最高司令问题。难道不应该由沙皇本人担任吗？他觉得自己在这些文臣中从来像是一名俘虏，只有检阅、巡视部队、演习，同军官谈话时，他才觉得快乐，如鱼得水。他早就决定要亲自领导部队，但会上说的却只是不由他而由政府治理俄国。可惜他的愿望未能实现，又遇到反对。全体大臣，包括戈烈梅金，都异口同声地反对说，不能让军事失败的阴影落在皇帝身上，还举出先例，亚历山大一世离开了军队，亚历山大二世也没参加最高司令部。

似乎此事最后须皇帝自己决定，但他不能拒绝众多大臣的一致意见。

只好放弃幻想，这颇令人惋惜。

这时，萨佐诺夫接到德国大使打来的电话。

尼古拉在会上就开始构思给威廉发的下一封电报，应作些解释，谈谈如何挽救局势，而且也应感谢威廉的斡旋，这使得和平解决问题尚有希望！由于技术原因，我们已不可能中止军事准备工作，但我们绝对不希望打仗！我国军队绝不会采取任何挑衅行动，这点可以向您保证！我相信上帝是仁慈的，忠实于您的……

这封电报立即交去译成密码。

尼古拉亲切地接见了德国大使普尔塔列斯伯爵。尼古拉说，如果说两国间不久前还悬浮着是战还是和的疑云，现在已肯定是和平了。德国大使被事态的恶性发展压得精神快要崩溃了，一再恳求沙皇终止动员，使威廉皇帝有斡旋的余地。

尼古拉答道，伯爵，您也是军人，您明白，已开动的动员机器，谁能有办法加以终止？

这次会见，加重了忧虑和无计可施之感。

等待威廉的复电真令人难受！

尼古拉同女儿玩了一会儿，然后强迫自己坐下处理文件。

不久，他收到两封信，一封是受伤的格利戈里从西伯利亚发来的，信中恳求不要打仗，打仗会带来许多不幸。另一信只有几个字："畏惧上帝吧！母。"尼古拉如万箭穿心一般疼痛。

心头受到重重一击。怎么办？

忽然，尼古拉收到威廉电报，却是在没收到尼古拉最后一封电报时发出的。他们两人的动作不再能及时配合了，不再能像过去20年一样互相倾听了。

威廉在电报中说，由于俄国动员，他的调停已化为泡影。他对尼古拉和俄国的友谊是遵照祖父的遗训传承下来的，他素来视为神圣。文明世界如遭受灾祸，责任完全不应由他负。但如俄国停止军事准备，尼古拉仍有可能防止不幸。

不过，尼古拉不知道怎样才能停止军事准备。

他觉得面前有一个万丈深渊，他们俩身不由己，无法抗拒地向它走去，被

推向两个悬崖。

尼古拉独自坐着把头伏在电报上嘤嘤哭泣起来，为他俩友谊的结束而哭泣。

他弄不清他俩究竟是谁导致友谊结束的。

下午，尼古拉收到俄国驻柏林大使密报：威廉在发出上述电报 1 小时后隆重地返回首都，从阳台上发表演说，宣布他被迫开战。街上已散发德国对俄国提出的最后通牒传单，但尼古拉没等见到它就睡觉了。

鲁尔塔勒斯于午夜对萨佐诺夫递交了最后通牒，限俄国于 12 小时内，即星期六中午前停止军事准备。

星期五晚尼古拉又收到消息，奥地利与我们同时宣布进行全面动员。

19 日，星期六，尼古拉睡觉醒来时，心里充满惊恐不安，不知战争是否已经爆发，或者还没爆发。

这就是说，还有希望？

今天是圣谢拉菲姆干尸现身 1 周年。每次想起这一天，尼古拉就异常难受。

白天依然听早已预定的汇报，都是些陈词滥调，好像什么地方都没有发生什么新鲜事情一样。

尼古拉提议让苏霍姆林诺夫担任最高司令官一职，不料其本人拒绝，却积极推荐雅鲁什凯维奇任最高司令部参谋长。

于是尼古拉宣布尼古拉沙为最高司令官，后者得意地接受了。

尼古拉噙着泪水交出了最高司令职位。但他想这不过是暂时交出，以后他当然还要下部队。

德国最后通牒限定时间已到，又过了几小时，还没发生任何战事。

还可以再努力一把，还可试一试！

于是尼古拉又发了封给威廉的电报，他在电报中说："我明白，您应该动员自己的军队。但请许诺我，这并不就意味着战争，我们仍将谈判。我们久经考验的友谊在上帝的保佑下能够防止流血冲突。我满怀希望地急切期待您赐复。"

祈祷吧！上帝仁慈，这一切都将过去。

尼古拉同孩子们逛了一会儿。

再往前走就是通宵祈祷教堂。两人到那里做了祈祷。

回家时尼古拉心情宁静多了。

这时，他接到萨佐诺夫电话：德国已对我国宣战！普尔塔勒斯大使来过了。

萨佐诺夫说，普尔塔勒斯来后异常激动，问道：俄帝国政府能否对德国最后通牒给一个满意的答复？萨佐诺夫答道：全面动员不可能撤销。普尔塔勒斯听后更激动了，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像没听见刚才的答复似的，又重复一遍刚问过的问题。萨佐诺夫觉得很奇怪，也重复了一遍自己的答复。普尔塔勒斯拿纸的手颤抖着，像精神失常似的，第三次提出同样的问题，萨佐诺夫也第三次重复了同样的答复。这时，普尔塔勒斯大使气喘吁吁地递交了宣战照会，走向窗户，抱头哭泣起来。他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种情况下离开彼得堡。然后，他拥抱了萨佐诺夫。这时他已不能思考任何事情，只是请求萨佐诺夫帮他安排一下大使馆撤退事宜。

尼古拉听后满眼泪水，就像是一个家庭被毁了一样。

可是日子还得过下去。吃了午饭，晚上 11 点钟接见英国大使，同他一起拟定了致英王的电文。

这像是转入另一个家庭。

尼古拉觉得自己完全病了。夜里两点钟，尼古拉在洗澡，侍从敲浴室的门，叫道："有一封非常紧急的电报，是威廉皇帝陛下来的！"

现在还来电报干什么？写些什么？尼古拉手发抖了。没写发报日期，只写夜 10 时，自波茨坦。威廉希望俄军不要越过边界线。

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理解？这是说，还有希望？

但威廉今天下午已对俄宣战，还能有什么希望？

那么，是威廉改变了主意？一切还能挽救？哦，有时真会出现奇迹。对谢拉菲姆·萨洛夫斯基做的祈祷一定灵验了。

尼古拉给萨佐诺夫打了电话，后者接着就给普尔塔勒斯打电话。

尼古拉焦急不安地等待回音。他没惊动已入睡的妻子，独自一人祈祷着，不断地搓着手。威廉一定是受到良心责备了，他终于省悟到自己几乎给欧洲造

成了一场大灾难!

萨佐诺夫终于来电话了。尼古拉下楼走进侍从室。普尔塔勒斯回答说他没有收到新指示，此外一无所知。很可能威廉最后这封电报是在一天前发出的，在路上耽误了。

唉，真叫人难受!

一个皇帝给另一个皇帝的一封电报，居然走了一昼夜，特别在目前这样的时期，可能吗？不可能。尼古拉明白，这封电报肯定是今天下午发的! 威廉是想蒙骗我，为德军赢得时间。以为我还可能动摇不定，立即采取某种软弱可笑的退让步骤。

此时尼古拉从同威廉的友谊中解脱了出来。他心冷了。

星期日睡醒时，他觉得身心舒坦了不少。生活的道路既已确定，就须沿这条路走下去，不能灰心丧气。灰心丧气是莫大的罪过。

尼古拉觉得轻松了。战争顶多打 1 年，也许只打 3 个月。经过战争，民族感情一定会更加牢固，俄国在战后一定会变得更加强大。

这一天，又是红日高照。尼古拉精神昂扬起来，愁苦荡涤一清。

他带着两个女儿去做弥撒，心里又进一步宁静下来，更加坚强了。

早餐时他只同家里几个人在一起。

彼得戈夫周围一片静谧。

虽然今天是圣伊利亚（雷神）节，但毫无雷雨迹象。

昨天，沙皇夫妇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个想法：要在人民群众面前亮亮相。现在，人民一定会像孤儿一般涌向冬宫，但那里空荡无人，没人出来接见。

当天，尼古拉乘汽船穿过碧波粼粼的海面抵达彼得堡，然后换乘快艇直达河岸上的冬宫。尼古拉耶夫大厅里拥挤着许许多多近卫军军官、女宾和内侍，接着他宣读了诏书，然后在喀山大教堂圣母像前做了祷告（库图佐夫率军前往斯摩棱斯克战斗之前也曾在这座像前祷告），全大厅的人高唱《祈上帝保佑你的子民》和《万寿无疆》，高呼“万岁!”许多人哭了。

接着，尼古拉和阿莉克斯站到对着宫殿广场的阳台上。

目之所及，直到尽头的总司令部，整个地面上，都是攒动的人头，沙皇的肖像、旗帜和神幡的海洋。

尼古拉向四周鞠躬，人群则高声歌唱，接着又跪了下去。尼古拉现在站在自己的人民面前，正大光明，威严盖世，施恩于世，他过去多次想象自己就是这样，只是为什么加冕后时至今日才第一次这样做？

这时，他忽然想起威廉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尼古拉一旦走到阳台上，广场上的人民就会跪在他的面前的，果真言中了。

尼古拉想，自己为什么不常常走上阳台？群众唱着教堂歌曲，祈祷，鞠躬，那些不愉快的年代在记忆的光亮水面上漂起一串浅浅的涟漪。总有 5 年，或者 10 年、15 年光景吧！想起来都痛心颤抖。但现在那一切都如过眼烟云，不复存在。他在位 20 年一晃就已过去，他从未做过错事，从未同自己的人民争吵。他今天还是一位年轻的新沙皇，才开始光荣地临朝新政。

文件 8

1914 年 7 月

拉斯普庭自西伯利亚医院致皇帝的信

亲爱的朋友，我再说一遍俄国天空堆满乌云，大灾临头，暗无天日。是不是就要泪水成海血流成河啦？我能讲什么？可怕得是我描写不出来。我知道大伙都要你打仗他们不明白这是要毁灭。当上帝使人失去理智时他的惩罚是严酷的那就是战争的开始。（汝为沙皇和众民之父不能让疯子得逞并毁灭汝及汝之子民。德国会被打败但俄国会怎样呢？想想吧实在从来没有比这次的灾难更悲惨全都要倒在血泊里。毁坏严重，哀愁无限。格利哥里俄文[①]。

①原文多错，无标点。——译者注

第七十五章

“经过那么多年发生的事，谁能料得到今天人民会这样同心同德，谁能想到大学生会跪在地上高唱《求上帝保佑沙皇》？会有几千人举着国旗向沙皇欢呼？社会同国家和解了！各个党派、阶级和民族间的分歧消除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伟大的俄国！我们在不久以前能想到今天吗？1812 年以后，从未有过这样高昂的热情！连我们自己也认不得自己了，更认不得俄国了。”

说这话的是一位高大爽朗的高等学校女学生，她身穿宽大的方格连衣裙，大脸庞，外表虽不秀雅，举止却充满自信，大俄国人往往都是这样；她的双臂动作很大，嗓门也很大，她的话是对同班同学讲的，但不远处的和过路的人都能听见。这样的话在 1 个月以前是没有人会讲的，即使有人讲，也会被看成是骗人的，现在不但没遭到别人嘲笑，而且还能听到支持的声音：

“社会同国家和解了，真是奇迹!?”

“《致波兰书》也了不起吧？我们向波兰人伸出了手!”

“现在我们不是欧洲宪兵了！塞尔维亚受到侮辱，我们挺身而出捍卫它!”

“随着第一声炮响，似乎诞生了一个新世界!”

身穿方格连衣裙、浓密的淡发卷得紧紧的高大女郎点点头，说道：

“是的，我们需要战争！它甚至首先不是为了塞尔维亚人，而是为了拯救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现在已被磨光了一切棱角，丧失了信念。我们衰落了，已降低得不能再低，到了给宪兵当密探和跳探戈舞的地步。我们只有建功立业才能获得新生。为了更新我们生存的气氛，我们需要胜利!”

周围没有人对这位女郎发嘘声，喊“可耻”。因为大家都走过了那些面目一新令人惊异的街道，那里色彩缤纷，到处都是戴着白头巾并佩着红十字徽的护士，缠着绷带的第一批伤员和人群，他们都沐浴在彼得堡从未有过的突如其来的温暖气氛之中。各家各户的妇女都在准备包扎伤员的材料，还开始为士兵们编织手套、袜子和毛衣。

韦罗妮娅在沉思，第一批伤员的情景使她想到：这样的伤员以后还会有多少？

但这时一个高傲的声音反驳道：

“怎么能随波逐流，随着群众的爱国主义情绪走？难道我们许多年来不是一直在寻求自觉和开放的意识吗？”

另一个面孔消瘦的泼辣女郎也用尖细的声音断然说：

“我们窒息得要命，确实如此。但这是内部混乱造成的！我们需要的不是战争，而是持久和平！如果我们没有卷入这场战争，又会怎样？”那位大个子女生比其他女生年龄大些，已不年轻，她冲着刚才说话的姑娘几乎是呵斥道：

“考虑问题应当站在民族生存的角度上！现在是斯拉夫人同日耳曼人殊死决斗的时候。假如我们撇下单独一个法国不管，德国人这些天就会把它打得落花流水，然后把矛头转向我们，我们就须与德国一对一打起来！如果我们结成同盟，我们就能胜利！”

一位皮肤微黑、扎着辫子的姑娘反对说：

“您说全国同心同德。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危险了。这意味着社会和国家必有一方错了。至于是哪一方错，那需靠检验。”

大个子女郎转过身对刚才说话的姑娘高傲地说：

“全国同心同德不构成危险，而是人民的正常状态！遗憾的是我们未能早些做到这点，只是在付出那么多代价后才做到。整个俄国社会几十年来都具有反国家性质。但愿我们今后能从团结一致中领悟真理。”

另一人又反驳起来，但反驳中也含赞成：

“倒不是因为爱国主义，而是因为现在是与人民融合和平等相处的良机。人民承认我们是自己人了。这种状况是我们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

与人民融合，这是许多人现在需要的。但人们不清楚应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没有人向他们提出直接任务。别斯土舍夫女子高等学校校方也没有告诉过或号召过学生去做什么事情。于是，在学年开始前 10 天，女学生们群情激昂地聚集在前厅里，希望通过交谈或碰到某种机会，为自己找到一点办法。大家谈论着怎么过明天的“国旗节”，全首都现在都在开展募捐，许多女生已经报名参加，但也有不少人说，用小小募捐箱进行一天募捐，募不了多少，少得可怜。有些年轻女子决心舍弃一切去当护士。但也有人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去当护士，未免有些荒谬。但这次战争突然打乱了生活，本来就是莫名其妙乱七八糟的。战争爆发后头几天，人们觉得有如晴天霹雳，惊恐万分，一度自私地想要躲在一边旁观，但很快就兴起了以全部身心支援战争的热潮，其声势压倒了一切，有些人甚至急于亲身前去参加他们这一代人遇到的第一次战争，要知道这场战争一共不过打四五个月就会结束。俄国在为世界正义而斗争，我们怎能作壁上观？俄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我们怎能不支援？

有人说：

“批评政府，使其预防错误，是支援战争的办法之一，比如反对限制犹太人。”

坐落于中央大街上的女子高校新楼据说已被当作医院，校办公处仍设在第十号路旁的建筑里。

往常，8 月底以前，女校前厅里是见不到人影的。现在大家都往这里跑，来打听消息，解决疑问。女生们三五成群，或站立或踱来踱去。这一天阳光温煦，大家只穿着夏季连衣裙。

前天，彼得堡更名为彼得格勒，女生们对此也有些争论。不过她们没有说这是酸溜溜的沙文主义、可笑至极，而只是说，这是把圣徒彼得换成了彼得大帝，应该叫圣彼得格勒才对；又有些人说，追溯过去，这城市原先是用荷兰语叫“彼得布尔赫”的，“彼得堡”一词是德国人强加给我们的，它是我们永远处于屈从地位的象征，现在改掉很好!

一年级学生还没入学，马上上二年级的学生这时还是同以前一样觉得自己年级最低，说话都小声小气的。有人说课表已经贴出来了，这么早就贴了出来？

是的。显然，校行政当局也感到形势逼人。二年级一些学生就去看课表，其中有韦罗妮娅、李孔妮娅，住在五山下的瓦尼亚，这是个把浓密秀发剪得短短的、下巴颏露出一股犟劲的姑娘，还有一个姑娘也叫瓦尼亚，住在大河湾，长着一头金发，还有从唐波夫来的李莎，她的身材苗条似柳枝，眼神含着忧愁。还有些别的姑娘，大家议论着课表。

课表上出现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教她们中世纪史的是位女教授——安多泽尔斯卡雅。她的博士学位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法国获得的，但在俄国国内也得到提升，不久前通过为硕士。课表里还是把她写成“教员”，但大学里的人都公认她是教授，学生们也这么看。她除了给二年级上中世纪史外，还在高年级主持《史料研究》讨论班。

此事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姑娘们想今天就目睹这位女教授的风采，对她下一番评论。这个愿望实现了，她们在办公室打听到，安多泽尔斯卡雅现在在系主任那里。大家等她。

这群姑娘挤在窗户旁边，交谈着各人所知的安多泽尔斯卡雅的情况。她无疑是解放的产物，也是所有被压迫者的成绩。安多泽尔斯卡雅曾经帮助学校获得资金以修建食堂、宿舍和发放助学金。她在去年春天开始主持的讨论班上提倡学生死啃 11 世纪教皇拉丁文训谕，她发表的论文也都是这类东西：《论中世纪宗教社会》、《论圣地朝圣》等。

两个瓦尼亚都认为，这样的做法令人不解，甚至会引起嘲笑。怎么能离生活这么遥远？怎么能这样浇灭学生心中的社会意识？

当然，可以理解，既然妇女不能在俄国获得教授职称，只能到欧洲去获得，因此不得不研究他们的中世纪史，但为什么要把这些陈腐的东西照搬到我们这个学校来？

“她需要解放自己，但代价是不是太大了？钻进毫无用处的黑暗的中世纪里去了……”

“怎么能说是毫无用处呢？那么，卡烈也夫、格烈夫斯呢？”

虽然两个瓦尼亚思想都进步，但在 1913—1914 年的别斯土舍夫女校中，

却显得有点反动。这就是辩证法！她们二人饱吸了社会空气，在女校里却有些跟不上哲学讨论和辩论的步伐，而且她们的发言也太尖刻。在大教室的圆顶下发生了某种肉眼看不出来的转折或不可逆转的变化。这时，她们当中个子最高的唐波夫姑娘李莎（神父之女）发言了，她说话慢条斯理，摇头晃脑，口气中怜悯多于责备：

"姑娘们，你们怎么还不厌烦这些陈词滥调？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多么广阔的天地，党派利益已被自由精神所替代，我们已有机会倾听真理的声音。我们已有可能变得比那些政治活动家更聪明。我们为什么还要……"

她那未施粉黛的脸拉得更长了，笔直的鼻子困惑地翕动着。

争论还没白热化，这时从系主任办公室出来一位女士，她正是安多泽尔斯卡雅，她虽然身材不高，但发髻盘得高高的，所以看起来比李孔妮雅高，她对衣着并非漫不经心，但只穿一身悦目的微微闪亮的灰色连衣裙，不戴任何装饰品，看不出有炫耀自己形象的表现。

她走过人群时显得很谦和，手中拿着一本古式装帧、夹着精美玫瑰色书签的小书，可能是祈祷书。她才30岁出头，作为教授，即使是男的，也是很年轻的。

这就使得大家更容易接近她，大家围住她七嘴八舌问了起来："对不起，请……""是您要主持……""我们应该怎样称呼您？"

"奥里达·阿列斯托夫娜。""奥里加？""不是。是奥里达。""这名字有点像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可能是的，是家父幻想的产物。"安多泽尔斯卡雅停下脚步，随和地和大家交谈起来。

应该说，最著名的教授也乐意和大学生们待一阵子。谁都知道俄国高等学校有一条导向性规则，即教授地位和荣誉不是由领导的好恶而是由学生的评价决定的。有的教授，尽管领导认为他不好，但受到学生爱戴，能够长期执教，有的教授甚至已被解职但仍荣耀满身。如果一个教授被学生认为是反动的，他就惨了，会受到轻视、拒绝听他的课等，下场只能是灰溜溜地离开。

家住五山下的瓦尼亚不肯罢休，又重提旧话：

"请您告诉我们，钻进死气沉沉的中世纪里面，是不是花的代价太大了？"

安多泽尔斯卡雅说道：

“这不能说是代价。如果抛开中世纪不管，西方的历史就切断了。只看近代史的断面，是什么也弄不明白的。”

她望望韦罗妮娅安详的脸，又抬头向上望着李莎沉思的大眼睛。

五山下的瓦尼亚说：“但实际上西欧史以及我们需要的一切，都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

大河湾的瓦尼亚加了一句：“从启蒙运动开始。”

五山下的瓦尼亚接着说：“确实是从启蒙运动开始的。与到耶路撒冷朝拜、与古字学有什么关系？”

在安多泽尔斯卡雅听来，这是个老问题，她微微一笑说：

“这是思维过于匆忙而犯的错误，错把一根树枝当作一棵树。西欧的启蒙运动仅仅是西欧文化的一条树枝，而且绝不是果实最多的树枝。它发自树干而非生自树根。”

“那么，什么更重要呢？”

“可以说，更重要的是中世纪的精神生活，非常浓厚的精神生活，大大超越物质生存。这种状况是人类以前和以后都未达到的。”

“能这么说中世纪的黑暗和宗教裁判所吗？”

两位瓦尼亚又问：“请问，怎么能把我们今天的力量投放到西欧的中世纪上面？这对人民解放有什么好处？能促进总体进步吗？在今天的俄国还需学学教皇训谕，而且用拉丁文？”

安多泽尔斯卡雅轻轻抚摸了一下伪装的祈祷书的页边，这是一本珍贵的拉丁文书。她平静地微笑说：“亲爱的姑娘们，历史不是政治。在政治上，一个人可以滔滔不绝，唇枪舌剑，与别人的不同意见争个对错。历史的根据不是观点，而是史料。知识的独立性高于……”

这些话出乎大家意料。太过分了！

“如果结论与当今社会的需要发生冲突呢？”

“对于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只需要分析今天的社会环境和今天的实际条件

就够了，那为什么还需要中世纪呢？”

安多泽尔斯卡雅因个子矮，被淹没在这群谈话人中间，于是她稍稍斜抬起头，非常自信而又意味深长地笑着说：

“假如个人的生活确实是由物质环境所决定的，那你们说的就是对的。假如那样，事情就简单多了：永远是环境不对，永远要改变环境。您刚才提到今天的所作所为，大概是指革命吧？可是物质革命恰巧并不是解放，相反，那是反精神本原的斗争。除了社会环境以外，还有精神传统，几百种传统！还有个人的精神生活。因此，尽管有时是与环境冲突的，每个人还负有个人的责任，为他所做的，以及为别人在他在场时所做的负责任。

韦罗妮娅像是从梦中惊醒一般，脱口而出：

“还要为别人的？”

安多泽尔斯卡雅用目光表示肯定：

“是的，为别人的，因为你可以帮助别人，也可以妨碍别人，也可以摆脱干系。”

李莎问道：

“教授，您是不是将要主持我们的一个组？”

安多泽尔斯卡雅表示愿意：

“只要我们能选好一个题目。”

李莎用试探的目光望着她：

“比如是什么题目呢？”

安多泽尔斯卡雅用眼睛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大家，数数她们在这里有多少人，考虑是否此时提出题目。她思索片刻，把两片嘴唇嘟在一起：

“唔……比如说《中世纪和文节复兴时期美之宗教衍变》，”她又扫视了一下大家，见到大家脸上露出惊异困惑的表情，“或者《中世纪的神秘诗歌》，”她说完后莞尔一笑，“让我们再考虑考虑吧！”

她微微躬一躬身，矜持地做出一个要走开的样子，接着就走开了，显得娇小沉稳。从背后看去同一个学生一样，不过身上透露出的那股优雅却是一般知识分子所缺少的。

李莎的目光呆呆地跟随着她。

其他人却喧哗起来。两位瓦尼亚十分愤慨，她们说，中世纪的精神生活难道不是来源于其社会经济条件吗？她敢在讲课中讲这些东西的话……

李莎却把头一扬，说：

“结束你们那套把什么都说成是来源于经济的论调吧！真叫人受不了!”

但五山下的瓦尼亚经过这年夏天已变得十分自信，她说：“唉，变化多大啊！我对你们说过，我有一个朋友，一周前我在矿泉火车站遇到他……”

韦罗妮娅自言自语地平静地为女教授辩护：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责任，这不是好事吗？如果什么都是环境、环境，那我们个人算什么？那不是等于零了吗？”

大河湾的瓦尼亚紧逼不让：

“我们是环境的分子，这就足够了。”

李孔妮娅望着窗外，想离开这里。但人们要她讲自己的看法，她扬起眉毛，伸直脖子，两只肩膀先后各耸了一下：

“我很喜欢她。特别是喜欢她的声音，好像是唱咏叹调，而且是复杂的咏叹调，使你分不清旋律。”

女友们都笑了起来，问道：

“那么她说的内容呢？”

“你喜欢小组的题目吗？”

李孔妮娅皱皱小小的额头，但丰满的嘴唇却咧开笑了：

“内容？……我没在意。”

别在村里找。

要在自己心里找。

第七十六章

阿格拉伊达·菲多谢也夫娜·哈里托诺娃是个严厉的女人，习惯于掌权，权力也总是归她所有。她一生难得对丈夫托姆恰克让一点步。她过世的丈夫是个善良老实的人，从最初追求她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他都很惧怕她。他身为中学督导员，职务上的事却须经常同老婆商量，职务以外的事更是须无条件地服从她。孩子们都知道，大事一律由妈妈决定。市政当局也对哈里托诺娃不敢冒犯，她办的女子中学左倾自由主义思潮泛滥，但谁也不敢排斥她，指责她。罗斯托夫作为哥萨克社会的首府，其教育界接受左倾自由主义思想是很自然的，不可能接受别的。在哈里托诺娃的中学，教历史课的是一位革命者的妻子，这位革命者被判过刑，后来逃跑了，现在在罗斯托夫从事地下活动。中学的历史课带着不加掩饰的革命倾向，文学课也有同样情绪。当然，学校里也不可避免要开神学课，但应聘来教课的神父并非反动的黑暗主义者，也非宗教狂热分子，而且半数以上女生都作为犹太教徒免修这门课。当然，女生们在节日典礼上也须唱《祈上帝保佑沙皇》，但她们的歌声显然缺乏热情。然而，哈里托诺娃决不允许把对政府当局的大不敬扩展到她当权的学校内部。她在女校的统治一直是贯彻到底不容动摇的。不只她的女学生在她面前战战兢兢，就是那些应邀前来参加晚会的男学生和航海学校的学生们上台阶时也都提心吊胆，因为这位铁石般的校长站在楼上，透过夹鼻眼镜敏锐地注视着他们每一个人，一旦发现谁的衣冠稍有不整，就会走下台阶批评。哈里托诺娃女校的风气备受赞誉，收的学费也高，送孩子来学习的家长都是有钱人，每班只有两个女孩是免费的。

哈里托诺娃以铁腕掌管着学校，管理自己小小的家庭更是易如反掌，遇不到任何反抗，丈夫从来服服帖帖，但是，大儿子（洗礼名为维亚切斯拉夫，母亲喜欢叫他哈里托诺夫）虽然从小受到文明精神的熏陶，却从五年级起就强烈地想上武备中学。专制而又自负的母亲从不容许儿子生活上有一点越轨行为，这种越轨的愿望自然使她非常难受。儿子太不懂事！这种想法简直就是背叛，在她心上投进了一条重重的阴影。儿子想进的是一个黑暗愚昧的帮派，既未受过批判的自由精神，也未受过知识力量的熏陶。哈里托诺夫从小受的教育是要热爱人民，为人民解放尽力，现在却逆向而行，要去接触他所谓的神圣力量和环境。这孩子性格本来是温柔的，但这次的叛离很坚决。母亲同儿子斗争了3年，痛心至极。儿子中学毕业后，母亲的权威、说服和愤怒更是一概无济于事。哈里托诺夫到莫斯科进了亚历山大罗夫军校。

挽救儿子的奋斗本来还可以继续进行，自由思潮也是渗入了军官中间的，克鲁泡特金就是贵胄军官学校毕业生，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在武备中学当过教师！但就在同一年里，女儿热妮亚给了她第二次打击。

尽管哈里托诺娃对社会关系的自由和妇女平等等观点极为同情，但却死抱着一条老规矩不放，即大姑娘在生孩子9个月以前必须正式结婚。可是热妮亚却破坏了这个规矩，她没等母亲给她婚礼祝福，就急急忙忙嫁了人，接着生了小孩，不得不中断在莫斯科师资培训班的学业。而且，女儿的丈夫德米特里·菲洛乌马丁斯基是个教堂助祭的儿子，大学还没毕业，长的也不英俊强壮，他完全不符合哈里托诺娃为女儿寻找女婿的形象。于是哈里托诺娃横下心来坚决不承认这桩婚事，根本不承认女儿已经成婚，也不承认生下的小孩，干脆把3个人都拒之门外，不许他们到罗斯托夫来。这三口人住在莫斯科科季赫音胡同一个小阁楼上，热妮亚摇着婴儿里亚卡的摇篮，丈夫则准备着最后的考试和毕业论文提纲。

克谢妮亚近一年里常到他们这里来，对被逐出家门的热妮亚深表同情，在给罗斯托夫写的信中或到这个城市时都热烈地为热妮亚辩护。她终于说动了哈里托诺娃这位母亲在这年春天允许女儿夫妇回来一趟。

哈里托诺娃虽然曾经怒不可遏，但她不得不承认，女儿已经纠正了错误，或者说，根本没有错误。女婿确实长得既不壮实也不漂亮，但小外孙女里亚里卡却是个很健康的小孩，长得像母亲。这小孩的诞生几乎拆散了这个家庭，但后来却成为这个家庭新的中心，形象耀眼，声音悦耳，令人欢乐，她夺走了11岁的叔叔尤里克的位置。外祖母第一次看到她以后，就不愿意同她分开了。后来又发现，女婿原来是个聪明能干的人，不同于一般的工程师，而是个熟悉新技术的热工专家，不论是热工和制冷，不论在罗斯托夫或是亚历山得罗夫格鲁谢夫克，人们都希望这位年轻的新毕业生去工作，甚至顿河工学院也邀请他去从事实验室工作。他没有公鸡般的勇武好斗的气概，不过这样更好，比愚蠢的大儿子强。新世纪的标志是交叉的铁锤和螺丝板子，不再是交叉的剑和旗帜了，女婿懂得这个道理，外表谦逊，内心却大有力量。全家一起吃饭时，女婿常常被岳母弄得抬不起头来，但他并不大在乎她的尖刻言辞，他能宽宏地开个诙谐的玩笑，一笑了之。由于事业成功，家有爱妻爱女，他现在是沐浴在幸福之中。热妮亚感受的幸福比丈夫还多，哈里托诺夫家庭迷漫着玫瑰色的幸福空气，任何人进来吸上一口，都不能不受到感染。哈里托诺娃每天要从中学走廊回家3趟。她虽然生性倔犟，却不能不降伏在这种玫瑰色空气的包围圈中。里亚里卡银铃般的喊叫，女儿的吟唱，女婿的暗笑，小儿子尤里克吃饭时发表的愈来愈像大人的言谈，使哈里托诺娃由丈夫之死遭受的旧伤和长子胡闹造成的新伤渐渐地痊愈了。

克谢妮亚于7月战争爆发前从莫斯科来到南方，她同女校长一家人在一起时总是很快活的，这一次更是快活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热妮亚寄到农场给她的信充满着近乎迷狂的连自己也不敢相信的欢乐。战争的爆发几乎没有影响他们的情绪。克谢妮亚在从库班来的路上已经预感到这个家庭的幸福滋味。她在罗斯托夫火车站下车，坐上马车，数了数自己随身带的6件行李。

她前些时到农场去的时候心里轻松得像一只小鸟，离开那里时却满腹忧愁。这些忧愁，除了向哈里托诺夫家的人倾吐外，还能从谁那儿获得帮助、保护和建议呢？父亲的专横意旨像一块沉重的暗黑的石板压在她的心上，不但不准她

进舞蹈学校，而且要她退学嫁人。在伊琳娜的帮助下，她得以把这事拖到圣诞节，因为现在已爆发战争了。看来，在家里这事无法解决，怎么能同父亲争论呢？

克谢妮亚清晨在车厢里醒来时，火车刚过巴塔斯克，绵延在河岸山梁上的梯形道路投入眼帘，这是广阔、坦荡、快乐的罗斯托夫，是克谢妮亚最早的自由、欢乐和兴趣诞生和成长的地方。她一见到这些，父亲岩石般沉重的威逼立刻从她心头落了下去，大鼻子大嗓门父亲不再是裁决她生活的可怕的不容反驳的法官了。

刚到克罗斯托夫，她的心跳动得很剧烈。特别是在清晨，空气清新，从花园大道到多洛马洛夫斯基街的陡坡绿树成荫，马车疾驰而下，不比电车慢。这里的电车与莫斯科的完全不一样，行驶时显得沉重些，车顶上不用弓而用滑轮，两侧没封严，通风好，适于夏天用。男孩子们惯于按罗斯托夫方式“香肠式”地挂在车厢后面，一直到十字路口警察岗哨前。那里有些特别的用许多木板搭成的活动跳板，状似拱桥，安着扶手，当南方的大雨滂沱而下时，人们从这些跳板上跨过满地流水，晴天时则从上面走到人行道上。花园大道从尼科尔巷起伸直了身躯，出落成一条3俄里的笔直大路，一直通到那希切万区。啊！那就是阿尔汉哥罗茨基家二楼的窗户，拐角上的阳台里面是会客室，窗外挂着亚麻布遮光帘，也许卓娅·李沃夫娜正在屋里摆弄鲜花哩！但浓密的树叶遮住了视线。在阿尔汉哥罗茨基家作客是很有趣的，但不能一大清早就去。在花园大道有阳光的一侧有一座黑色的两层建筑，上面刻着一些粗糙的装饰图案，这是一家现代型商店，每个玻璃橱窗上面都罩着用格子布做的垂着穗子的遮光帘。克谢妮亚很想让马车转到塔甘罗格大街上，但不行，还是向前走吧！到教堂大路去吧！如果沿塔甘罗格大街走，就会经过老市场，那里一排排卖鱼的摊位发出浓烈刺鼻的鱼腥味，总是有大量鲷鱼、鲤鱼等各类鱼出售，夜里捕来尚未售出的鱼摆到了马路中间，都是活蹦蹦的，发着闪闪银光，在摊子上跳动不停。在塔甘罗格大街拐弯处有一座莫斯科也有的现代派建筑，其最上面的几层几乎没有墙，全是玻璃……富豪大酒店……富商花园…… “圣·列莫” ……罗斯托夫真不小，多舒适……剧院广告。正在演什么？马松金剧院正在为某人举行义演……

特鲁齐马戏团……法国小型剧……在索列耶剧场上演重头戏……还有马克斯·林德尔的绝妙喜剧片……克谢妮亚想，这几天她应该去看看这些演出。马车从城市花园拐到大教堂街，这是一条不平坦的圆石路，到了尤里克上的实科中学，接着是邮政总局。在胡同的空隙处可以看见高大的、笨重的、难看的、古老的大教堂，不远处整洁的广场上伫立着亚历山大二世纪念碑，四周是八角形的围栏。莫斯科路五彩缤纷，极富引力，商店鳞次栉比，橱窗上全罩着遮光布帘，这条路可以使人们的穿戴打扮丝毫不比在莫斯科逊色。马车向斜拐弯，经过市场的进货场，不远处是哈里托诺娃女子学校……我不走这个前门，要从后门进去见女校长。

亲爱的楼梯呀！亲爱的门！跨过第一道门槛，马上就感到这个家庭素来充溢的精神自由和互相关系中的轻松自如。热妮亚！亲爱的热妮亚旋风似地冲上来拥抱，轻快得好像比克谢妮亚年龄还小。好一张活泼、果断和开朗的面孔！真叫人高兴！没料到你会来。怎么来得这么早？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应当同你父亲决裂，同我一样，他们以后会醒悟过来的……听我说，里亚里卡是个奇迹！她有音乐天才，我说得准没错，她说话总是像在即兴创作宣叙调[1]，简直就是唱歌！我们一起去听听。不，她现在是在说话，说起来就不停，说实在的，只有我一个人懂得她说的是什么……有时候她藏在被子里喊："找我！"她的皮肤非常嫩，你摸摸看，没见过这么嫩的！"

快乐机灵的热妮亚笑声不断，快活地把自己热情洋溢的幸福让给别人分享。她们两人过去没有一起住过。当热妮亚到莫斯科培训班上学时，克谢妮亚才住进她这间屋子。两人相差 5 岁，一个是莫斯科学生，一个是草原野姑娘。热妮亚曾经想到，克谢妮亚这丫头会不会因为家里有钱而骄傲？热妮亚是不能忍受这个的，还会为此责备她。但克谢妮亚并未骄傲，依然勤奋好学，后来还成为热妮亚和柯济兴斯基联系的使者。5 岁的障碍消失了，现在出现了新的差异。

---

① 宣叙调：歌剧、清唱剧、康塔塔等大型声乐中类似朗诵的曲调叫"宣叙调"。宣叙调一词，语出意为"朗诵"的意大利语动词。——译者注

热妮亚已经做了母亲，克谢妮亚还是个未婚姑娘……克谢妮亚有时心想：我也会跟热妮亚一样？当然会。为什么不能？一定能，希望能，说不定能更好：生个儿子！德米特里·伊万内奇是个很不错的人。我也能遇上一个人……

如果能忘掉父亲的威胁，或者干脆不加理会，那是可以幸福地生活的。一切都很美好！

又有了一个爱好——摄影！他们有一台柯达牌照相机，米佳常常摄影。他们一起在红灯下冲洗。热妮亚亲自为相片配框，四面墙挂满了相片镜框，有方形的、圆形的、椭圆形的、菱形的，有的相片有背景，有的后面是人造的白底色，照的是里亚里卡戴着发帽，里亚里卡光着身子，里亚里卡在浴盆里，里亚里卡抱着洋娃娃、妈妈和里亚里卡、爸爸和里亚里卡、奶奶和里亚里卡、热妮亚和米佳在海滨——这是亚速海，洗海澡舒服极了，而且很近，花钱不多，以后每年夏天我们都可以去！

但并非什么事都令人高兴，还得去看望阿格拉伊达·菲多塞耶夫娜，并非什么事都令人高兴，因为哈里托诺夫……你说什么？不可能在那里，因为两个单位已经分开，不过都恰巧在一个区。去看看我妈，去吧！

哈里托诺娃正端坐在双座沙发上摆牌阵——“十字战胜新月。”见到克谢妮亚进来，她稍稍转了转威严的头颅，把皮肉松弛的脸颊伸了过来（她只准克谢妮亚在中学毕业后才能像女儿一样吻她）。克谢妮亚弯身靠近这位妈妈，看见她的两鬓和前额刘海已经斑白，与以前大不一样了。

阿格拉伊达只在闲聊无事的晚上才独自摆牌阵，早上是绝不摆的。她早晨总是很早就起身积极投入工作。此时此刻她深深坐在沙发上面，双肘抵在小桌上，难得动一动。阿格拉伊达像惯常一样注意聆听着对方的话，仿佛她自己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新鲜事值得说，也像惯常一样带着死板、矜持的神情，声音也不透出一点点温柔和直爽，只向站在小桌旁的克谢妮亚问了几个最一般的问题：这个夏天过得怎么样？家里人都好吗？为什么提前来？几号到莫斯科去？她问的时候并不望着克谢妮亚，而是依然看着摊开的纸牌：9张新月，4张红十字，她思索着，慢慢地移动着牌。

现在正是克谢妮亚诉苦的大好时机，可以请求保护，以便抵制父亲的专横跋扈。于是克谢妮亚开始诉苦，简直胡作非为，荒唐至极！要知道，戈里津娜农业讲习班是很难进去的，招收的学生几乎全得过奖章，现在能让克谢妮亚自动停学吗?

女校长皱皱眉道："是的，她明白，克谢妮亚是对的，应该给扎哈尔·费约多罗维奇写封信……"

但克谢妮亚只看见夹鼻眼镜后面发暗的半圆眼圈。女校长撇着嘴唇，表示非常不满，好像马上就要申斥全班学生。花瓶底下压着一个信封，角上露出雅斯拉夫的字迹，克谢妮亚看见字迹后顿时感到惭愧起来，满脸通红。她冲动地喊道：

"哈里托诺娃，雅里克给您的信是几号写的？我也收到他的一封信！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信啊！我向您讲讲那封信。"

女校长猛地抬起头来，扬起一只眉毛：

"那封信是几号写的?"

"8月10日写的。邮戳是奥斯特罗连卡的，印着第十三军……"

这个该诅咒的数字13。

哈里托诺娃又摆起牌来。

她收到的信是8月5日写的。今天是20号。今天见到了最高司令部公报。

她挪动了一张牌。

她望了一下克谢妮亚。这姑娘晒得黑黑的，头发却近乎淡色，她的脸刚才已变得活泼，这会儿却快要流泪了。

克谢妮亚与雅里克情同兄妹，比热妮亚和他还亲密。

哈里托诺娃指指一张相片，说："你把那张相片拿过来!"

这张相片镶在框里，立在一张小桌上，靠一个厚纸板贴在后面支撑住。这是雅里克穿着少尉军服的毕业照。

克谢妮亚把相片拿过来与哈里托诺娃一起观看。

天哪！相片上的雅里克戴着那么大的帽子，脖子上支着那么高的硬领，比他

只穿衬衫不穿外衣站在房子旁边更像一个小男孩。他把身上的几条皮带绷得直直的，看样子对自己的外表很满意。宽宽的皮带上还挂着一支沉重的左轮手枪。

哈里托诺娃这时才把一直挺得笔直的背和僵硬的双肩放松下来，她对克谢妮亚说话像对女儿一样了：

"你这一次亲眼看见，固执己见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他本来现在可以成为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谁也不会伤害他，报纸上的报道写得都十分谨慎含蓄，谁也看不明白……那个军现在在哪里？纳尔夫团又在哪里？信封上的邮戳是奥斯特罗连卡的，这说明在南方，在萨姆索诺夫手下，雅里克正好处于战线中心……"说着说着，一滴滴泪水落到胸前。

突然，一双年轻温暖的胳臂平生第一次搂住了女校长衰老的脖子。

哈里托诺娃终于像个老妈妈了，比老妈妈更像个老妈妈!

"哈里托诺娃! 亲爱的哈里托诺娃! 雅里克还活着，我知道他还活着，我相信他还活着。我的心直觉地告诉我是这样! 从他的来信可以感到他是非常快乐的。雅里克这样的人不会很快就死的。他命中注定是会幸福的! 您能见到这点，我们很快就能再收到他的信!"

女校长泪如泉涌。

命中注定？她想知道的就是他是不是还有命，是不是还活着，是不是还能来信。但哈里托诺娃无法从支配事态发展的隐蔽力量那儿得知任何信息。

说不定她布的牌阵能……

哈里托诺娃又挺直了身躯，恢复了正常的姿势。她蹙起眉头，小声说道：

"你见过尤卡了吗？去看看他吧! 有一次，志愿参军者在花园大街上游行，尤卡在人行道上跟随他们一起前进。后来又有一次，一些哥萨克举着旗、骑着马从农村进入市里，也是游行，尤卡又跟他们在一起。有些小学生被派去举着旗高唱《祈上帝保佑沙皇》，没人要他去……"

小儿子尤里克在家里被叫做尤卡，因为这孩子小时候不会发"里"音。

尤里克原来住的房间现在给女婿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做了书房。尤里克搬到大屋里用厚纸板间隔的一个角落里住。尤里克这时不在屋里，而是趴在阳台

上，时而望望尼古拉耶夫胡同，时而在大幅马尔克斯地图集的一页绿色光滑的地图上用铅笔画着黑色曲线，还思考着。

克谢妮亚快活地向他打招呼“你好!”，然后在他身边蹲了下来，带起了一阵微风。

她摸摸他的头，搅弄一下他的头发。他没剪平头，发尖向不同的方向耸立着。尤里克礼貌地侧过身子看着她，但没有放下手中的铅笔，脸上现出恍惚神情。

“你在做什么呀？为什么在这么漂亮的地图上面乱画呀？”

“这是我的地图册，我以后能用橡皮蹭干净。”尤里克说这话时似乎还沉溺在梦境中。

“你画的这些线是什么意思？”克谢妮亚快活而又讨好地向他问道。她还在蹲着，裙子铺满半个阳台。

尤里克发绿的眼睛严肃地望着她。她从未使他和他哥哥雅里克失望过，兄弟俩都信任她。

“我告诉你，不过你一点也不要对家里说。”他挤挤鼻子，阴郁的有晒斑的脸露出一种做出重大让步的表情，“我画的是前方战线。每当一方打了一次胜仗，我就擦掉重画。”

克谢妮亚见到他的时候，他刚刚擦掉画的线，因为侧翼已被攻破，但中心部位还没问题。

“可是这里是俄国南部。你是怎么想的？根据你画的线，德国人已经占领了哈尔科夫，还有卢甘斯克!”她不想扰乱这孩子的情绪，但还是忍不住笑出声来。你需要另找一张地图。尤里克，战争永远不会打到那儿的!”

他斜着眼睛，怜悯而又容忍地望了她一眼。

“你不用担心。我们永远不会放弃罗斯托夫!”

他又重新趴下画线，把战线从塔甘罗克向北移动。

第七十七章

(报纸浏览)

我们必须胜利!

德军乱作一团……古宾宁战役后，德国疲惫不堪……大量骑兵部队从比利时调往东方……

德国人侮辱东正教神像。德军在布鲁塞尔残杀伤兵……奥地利军人屠杀塞尔维亚平民，不分性别年龄……

* * * *

……威廉皇帝夜不成寐，血腥的幻影总在他眼前晃动……

……挪威作家汉姆生写出了神圣的诗句：斯拉夫人是属于未来的人民，是继日耳曼人之后的世界的征服者。"

* * * *

我是你唯一的爱人

要把你带到柏林

(伊戈尔·谢维里亚宁)

* * * *

战争不妨碍工作！我们一如既往，还是出售“维多利亚”牌快速针织机……

* * * *

使你收入增加一倍！请购曼德尔牌照相机!

*　*　*　*

今天有赛马

*　*　*　*

科兹玛·克留奇科夫建立光荣功勋的消息迅速传遍全俄。我们是一群小学生，也要出一份力所能及的捐助……附上5卢布……

*　*　*　*

节制饮酒，保持清醒！……各地都在进行动员……人民精神大为振奋……除了隐藏在俄罗斯人灵魂无法窥探的深处的原因以外……应禁绝酒类贸易……

*　*　*　*

彼得堡的德国学校……对待学生极为严厉……

*　*　*　*

彼得堡的犯罪率降低了30%

*　*　*　*

尼日哥罗德集市……松鼠皮商人处境不佳……

*　*　*　*

……一个伤兵说，俄军几昼夜没遇到一个德国兵。队伍前头往往是手风琴手一面走一面拉琴，士兵们唱着歌……人们看见时都忘了这是在打仗……

*　*　*　*

……我们这些没有被召去服兵役的人应该为我们自己、也为正服兵役的人干活……一起去为上前线的人种地，为失去马匹的人收割粮食。如有问题，可去找当地自治局负责人。

*　*　*　*

现居巴黎的著名俄国社会主义者布尔采夫向俄国所有的政党发出呼吁信，要大家摒弃前嫌，团结在政府周围，捍卫俄罗斯民族……

*　*　*　*

必须由言转为行。德国人的力量在于惊人的团结、组织性、工作能力……现在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工作的时候了……

*　　*　　*　　*

战时日记俄军占领索里达乌、纳登堡、威廉贝尔格、奥尔德里堡等城市，切割开溃逃的德军……几个德国军团有被俘之虞。

*　　*　　*　　*

今天有赛马

*　　*　　*　　*

把奴隶劳动换成自己的产业，每年 2000—6000 卢布收入。克鲁泡特金名著译本。

*　　*　　*　　*

样式特别的背带，能使你获得英武的军人风采……

*　　*　　*　　*

德国将来是毁于饥饿还是毁于战争？一位经济学家的文章。

*　　*　　*　　*

德国人的兽行连宗教裁判所最残酷的严刑拷打也相形见绌……参加过战斗(地点不详)的一位负伤军官(姓名不详)对《市场新闻》记者说，德国人对被俘的轻伤俄国军人普遍施行手术，割断他们手上的筋。德国人认为，这些伤员经过这种手术就再也拿不动武器……

*　　*　　*　　*

德军企图在东普鲁士发动进攻……德军从法国边界调来……

*　　*　　*　　*

土耳其毫不掩饰自己对俄国的敌意……我们希望，土耳其不会不因此受到惩罚……希腊人也跃跃欲试，想趁机算清旧账……阿拉伯人听英国人的指示，高加索的亚美尼亚人希望在已得到的东西之外得到更多的……如果奥斯曼帝国胆敢……最后它还能剩下什么就难说了……

*　　*　　*　　*

土耳其军队中流行霍乱病……从亚得里亚海地区跑出来的逃兵说……

*　*　*　*

……德国人的兽行前所未闻……引起德裔移民极大的愤怒……他们，特别是住在赫尔松省的德裔移民，有许多人为了与德国的兽行划清界限，决定申请把自己的姓甚至名改为俄国的……

*　*　*　*

拉脱维亚军人们！你们正与英勇的俄国军队一起逼近古李沃尼亚剑骑士团的首都马里恩堡。野蛮残酷的剑骑士匪帮正是从这里出发把我们的祖国置于其铁蹄之下……把拉脱维亚姑娘掳去当作人质……拉脱维亚的未婚妻们盼望英雄凯旋而归。

*　*　*　*

残疾人使用的轮椅……

*　*　*　*

向音乐爱好者推荐难曲简化谱集

*　*　*　*

各种虚弱无力病症均能用激素治愈

*　*　*　*

防弹背心

*　*　*　*

必须胜利!

*　*　*　*

战争和伏特加酒……在这种艰难时期，居民经历了如此巨大的个人悲伤和民族欢乐，以致对伏加酒已经没有很大的心理需要了……

*　*　*　*

马车夫的请求……自戒酒以来，车夫惯有的粗暴态度大为减少……活干的也较快较自觉……最好能使这样的日子延续下去，能到战争结束也行。警察局摆脱了沿街收集醉汉的职责，能更专注地去抓小偷……

*　*　*　*

向预备役军人家庭发放口粮，向登记入册的每个空庭成员每月发放 68 俄磅

面粉、10俄磅粗粮、1俄磅葵花子……

战时日记……由于必须对军事秘密严格保密，最高司令部不得不在通报战事情况时十分审慎。德国军事当局在战报中描述了一些实际并不存在的胜利，我国总参谋部有时则对赢得的胜利缄口不言……不过，在我南方部队行进途中，德军包抄萨姆索诺夫将军的队伍暂时得逞，司令本人及佩斯季奇和马尔托斯两位将军阵亡，司令部受到炮火猛烈轰击，俄军受到严重损失。

然而，我军虽遭受惨痛的牺牲，但战略形势丝毫未受损害。援兵源源不断从俄国运来，在力量对比中我军占了上风……德军为了阻挡萨姆索诺夫部队前进，不得不从比利时调来两个军团。

可以说，萨姆索诺夫将军的有力行动实际上是以血肉之躯对兄弟部队做出的支援。

悼念萨姆索诺夫

你以鹰的犀利眼力，

注视着战斗和攻击，

敌机似隐约的黑点，

在你头顶上空盘旋……

据熟悉萨姆索诺夫将军的人说，将军极受部属拥戴。他为人稳重，极有教养，总能迅速掌握情况并做出判断……

* * * *

骑兵将军帕·克·冷嫩坎普夫因战功卓著被光荣地授予二级带剑符拉基米尔勋章。

谁也不会想我们会向柏林或维也纳胜利进军，因为只有和平人民的凶恶敌人才觊觎别人的东西。与敌人的斗争必定是十分残酷的。不久前，我军在古宾宁一带歼灭了3个德军军团，现在我们却得悉，敌人以大量兵力攻击我军两个军团，给我们造成了重大损失。牺牲者包括萨姆索诺夫将军。当然，听到这个

消息后，谁也不会灰心丧气，不会以萎靡不振来对待烈士的牺牲。烈士的血加强了我们的英勇精神……

我们遭到不幸。消息传来，无疑大家都感到沉重……但与悲伤会自然而然同时出现另一种情绪，即高兴的情绪。我们高兴的是能公开地说出真实情况。无论真实情况多么令人悲哀，敢于直言者就是强者。只有弱者才撒谎。

我们将一如既往，
昂起千万颗头颅来捍卫俄国。
我们将一如既往，
挺起胸膛赶走敌人。
只要骄横已极的德国鬼子不放下武器，
我们就各尽所能地战斗，
士兵用刺刀，诗人用笔。

总参谋部管理总局收到大量预先付清回电费的电报，都是请求为此次动员中被征人员免除服役、缓期服役或给予其他照顾的。该局希望通过报纸广为告知，法律已规定被征服役人员弄清本身权益的程序，因此其亲属代其提出之申请一律不予受理。

* * * *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和政府公告

* * * *

法兰西同胞们！我国英勇战士正在浴血奋战……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力下……为了更好地照顾同胞们的安全，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将暂时撤离巴黎……

* * * *

据权威人士提供的消息，东普鲁士局势安全无虞。俄军两军团严重受损的原因是敌重炮射程甚远，军团受到炮火轰击的面积甚大，但这次受创并未对东普鲁士战事总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 * * *

法国人获胜法军收复巴黎后转入进攻……法国政府迁至波尔多……

* * * *

我军重创奥地利军……在300俄里的战线上获胜。

* * * *

8月21日第一个国旗日。秋季的白昼刚刚在蒙蒙灰色中开始，千百个出售协约国国旗的募捐者就涌上莫斯科街头，“援助战争受害者”……饭店里……

* * * *

请现在就考虑建立第二次卫国战争博物馆

* * * *

我军向东普鲁士腹部进攻正在继续。大批援军从俄国源源不断开至该地，使得继续深入敌境成为可能……将进一步削弱德国西部战线……

* * * *

把战争进行到底……不能与德国单独和谈，那样做就是与德国人一起来反对爱好和平的人民。历史上往往由于一时的宽大为怀使花费极大代价得来的成果丧失殆尽……世界性的道德意义……手持血淋淋的宝剑立下的外交誓言……三国政府具有骑士的忠诚……

第七十八章

几周来，伊里亚·伊萨柯维奇多次收到朋友们的来信，他们都劝他不可放过在罗斯托夫迎接和接待奥波多夫斯基的机会。伊里亚的这些朋友都是工程师，有的在哈尔科夫，有的在彼得堡，有的甚至在科罗门机器制造厂，伊里亚是该厂在南俄的兼职代表。奥波多夫斯基在当今俄国工程师界是位鼎鼎大名的卓越人物，他用德文发表的许多著作都闻名遐迩，有普通经济学、港口装配方面的，还有工业集中、俄欧贸易前景、价格涨落等方面的，这些还不算他的本行采矿工业方面的著作，那只是采矿人员才感兴趣的。关于这个人，流传着许多逸闻，比如说他在米兰时曾经穷得身无分文，一天在街上游荡，忽然觉得可以使该市的电车交通布局得更有效率一些，于是画了一张图表，卖给了市政局，赚了一笔钱。奥波多夫斯基曾经是国事犯和被通缉的革命者，后来成为移居外国的侨民，罗曼诺夫皇朝建朝300年大庆时因其某事有功而获得特赦，“免于追究一切罪责”。过去3个月里，他到俄国各个重点工业企业进行巡访，虽然他不事宣扬，访问时却像是凯旋归来似的，人们因他的才能卓越和革命经历而热烈地欢迎他。顿涅茨煤矿区是他访问的主要地区，他到达那里时正值战争爆发，但他还是完成了在那里一个月的计划。接着，他来到顿河罗斯托夫，并带着一封介绍他认识这里的阿尔汉哥罗茨基的信。两人通过电话约定一起度过8月20日上午，然后到伊里亚·伊萨科维奇·阿尔汉哥罗茨基家吃午饭。这天上午，两人在主人的办公室里（也是面粉业厄尔兰格尔公司东南分公司）见了面，一起翻阅了一些图纸和地图，然后一起去观看阿尔汉哥罗茨基在罗斯托夫建造的两家工厂，一个

是城市新粮仓，另一个是每年能周转百万次的巴拉蒙诺夫斯基面粉厂。

奥波多夫斯基和阿尔汉哥罗茨基两人尽管有些不同，但却一见如故，伊里亚·伊萨科维奇比他的新朋友年长10岁，体态矮胖，话语不多，也不爱作手势，衣着讲究，都是罗斯托夫最好的裁缝做的，他总是细心地把乌黑的胡子、眉毛、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奥波多夫斯基39岁，高高身材，浅色毛发，对衣着不太在意，有时甚至是马马虎虎的，走路有时使劲甩手，以致显得步履蹒跚。他脸上有一种惊讶的表情，好像做一件重要事情时遇到了另一件重要的事。他身上蕴藏着使不完的精力，不久他就开诚布公地说：

"我在这次周游中觉得自己像一个带许多水嘴的茶壶。任何一位打开我一两个水嘴放出一点茶水的人对我来说都是大善人。假如我还待在国外，我就成为无源之水了。这一次周游使我减轻了压力，像高尔基所说的，我急于搅起生活的泥潭。老是在国外写些俄国不能读的教训人的东西，我腻烦死了。我在国外待够了。我想用双手为俄国建设好的生活，哪怕一天只睡4小时，我也不在乎。这次旅行，我一昼夜也只睡4小时……"

他脸上舒展着坦诚的笑容，说话时脸上的线条是活动的，额头的条条皱纹也游移不定，头发剪成平头，轻轻地覆盖着。

他高兴地、饶有兴味地回答着对方的问题，也常常主动叙述着什么。他思绪如涌泉，急于分析别人标新立异的创造，在每一个重要问题上都说明西方如何，俄国又如何。

在旁人看来，他们两个人这一天过得真是枯燥无味，然而他们自己却觉得过得很充实，交流了许多思想、信息和设想。他们坐马车时交谈，走过院子、上下楼梯、参观车间时交谈，甚至一面谈眼前的机器运转，一面还继续交谈原先的话题。把自己的成绩给内行人看，总是使自己感到愉快而且对看的人产生好感。奥波多夫斯基不放过任何一个重要环节，包括瑞士制造的轧延机床设备改装、谷粒洗涤机等，对所见所闻都给予相应称赞。尤其使人佩服的是他的概括能力，能立刻指出任何一个程序或问题在全俄经济和将来俄欧贸易中的作用。

这两个人履历、生活经历和专业都不相同，甚至毫不相干，但工程师共有

的精神却让他们走得越来越近。

有时两人也唠唠家常。阿尔汉哥罗茨基在客人的细问下叙述了自己的生平，哈尔科夫工学院第一届毕业生中磨粉专业有 5 人，每人都能找到高薪职位，但他却到一家磨坊当了一名辅助工，这使他的身为小经纪人的父亲大为恼怒。过了一年，他升为精粉师傅的助手；又过两年，他当上了精粉师傅。他认为，只有通过这段经历，他才真正懂得了制粉厂是怎么一回事，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两人在市里观光了一番。更准确地说，是客人想去看看顿河岸塔甘罗格斜坡，罗斯托夫市政当局有意在这里修一条自动人行道，以便使行人从岸边升到上面去。奥波多夫斯基说，战争打断了莫斯科地下铁道的建设，已经在为地下铁道列车修建发电厂，1915 年第一条从大剧院到霍登广场的线路即可运行。这些年来，莫斯科以疯狂的速度建设着，成就很大。

伊里亚·伊萨科维奇的生活一向是平淡无奇的，而奥波多夫斯基的生活则充满着波折坎坷，连他的呼吸都是不均匀的，好像他想一下子把空气吸进 10 个肺里一样。他虽然诅骂战争，但在和平的日子里他似乎又嫌日子过于平淡，总希望多发生一些非常事件。

他从不提起他往昔的革命历史：为了革命，他曾两次被判刑，坐过牢，被流放过，后来逃到国外。他讲得更多的是最近在国外得到的印象。他到过美洲，在德国研究过采矿工业，在奥地利从事过工人保险工作，还为俄国写了一本书，但此书在哈尔科夫几个月都没印出来，一会儿说铅字不够，一会儿说把序言遗失了。但他最感兴趣的还是正在进行的周游。作为矿业学院毕业生，俄国的矿山矿井本是他应到之地。但以往他忙于革命，而在西伯利亚时他也未能带着脚镣下到矿井干活。侨居国外时，他就渴望到顿涅茨矿区来效力。现在他眉飞色舞地谈起这里 10 年、20 年间能做些什么，可以制订一个统一的综合性计划，每做一件事都要考虑将来，比如说，应该考虑使煤在地下变成煤气问题……

他兴高采烈地高声说："总的说来，俄国风平浪静的时期已告结束，但即使刮风，船也可以逆风而行呢!"

他所到之处，受到了校友的热烈欢迎，他们大多为他的 1902 届校友或其后

毕业的校友，如今已担当矿业企业家，而对他们的热情，奥波多夫斯基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邀请他担任工程师、顾问、教授或矿务局经理。

奥波多夫斯基惊诧地问道：

“为什么能实干的人总是不够？大家看到一个能实干的人，都争着抢着要。这么大的国家，那么多高官显爵，那么多官吏，那么多吃闲饭的人，却没有实干的人!”

“您选择什么工作？”

“我谢绝了最有吸引力的邀请。目前打算到矿业学院教课，同时在彼得堡兼点别的事。现在搞不清什么是主要的，培养学生、保险、劳动委员会、港口、贸易、银行、技术协会。现在俄国什么都需要，什么事都需快做。总的说来，我们有两个同样重要的任务：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动精神。两方面都必须做。”

“是的，但是要没有战争才行。”

“假如那些人打仗打得高明也行! 像一些生锈失效的弹簧，什么事都靠别人干，是些废物! 他们不晓得自己生活在什么时代，他们把这样一个大国看成自己的领地，想讲和就讲和，想打仗就打仗，上个世纪对土耳其就这样。他们以为这么干可以不受任何惩罚。没有一个亲王知道‘生产力’这个词。皇宫里需要什么，有人送来，这就行了! 他们觉得重要得多的是开各种庆祝会，在科斯特罗马大宴宾客，铸造奖章……”

阿尔汉哥罗茨基诙谐地开了一个玩笑：“若是宫廷不举行这样的庆祝会，你这把茶壶说不定会在鲁尔的什么地方爆炸了呢!”

奥波多夫斯基笑了起来：“确实如此! 另一方面，俄国知识分子都把经济理论理解为 8 小时工作制、剩余价值、租金。他们全然不懂具体的经济，如矿藏、水利、交通等。需要冲破所有这些人，现在已有民族和解的苗头，能不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建设？哪怕只给我们 10 年和平发展时间，我们的工农业就能发展得你认都认不出来。我们能和德国签订多么有利的贸易条约啊! 简直令人吃惊，我对您详细说说……”

这时他们走到了家门口。伊里亚·伊萨科维奇按了门铃，家里的人从二楼看

见了他们，门就自动开了。他们家就是这么安装的，不用看门人。住房在二楼，占许多房间，由一条昏暗的走廊连在一起。伊里亚·伊萨科维奇把客人带到家里的时间比预定的早了10分钟，因此心里有些不安，恐怕夫人卓娅·李沃夫娜没准备好，使他尴尬。家里有一名厨娘，如无人干扰，她会非常准时地做好一桌菜的，可惜她的手艺太一般，别人一看便知道每样菜是用什么做的。如果来了贵客，外号叫"火山夫人"的卓娅·李沃夫娜就不得不亲自下厨。她的烹调热情是由莫洛霍维茨编写的《烹调教材》培养出来的，平素时高时低，此时高涨了。

卓娅·李沃夫娜从走廊拐角厨房的门口向外伸出头，脸被炉火烤得红红的，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开饭时间推迟半小时。温顺的伊里亚·伊萨科维奇不得不从餐室用托盘端着细颈玻璃瓶、鲑鱼干、夹肉面色片送到会客室来。

健谈的奥波多夫斯基迎面对他说："还有工程师协会问题，这个组织在你们这里怎样？"

"松松垮垮的。"

"但在许多地方却是很坚强很活跃的团体。我们认为，工程师协会很容易成为俄国的领导力量之一，比任何党派都重要，也更有成效。"

"这个组织也参与管理国家？"

"不直接参加。政权对我们来说没什么用。在这方面我今天还是相信斯托雷平的话……"

"您指的是谁？"

"克鲁泡特金。"

"您认识他？"

"是的，很熟，因为都在国外……聪明能干的人并不想从政，而是创造、改造。政权不过是条死癞蛤蟆。但如果政权妨碍国家发展，那么也许不得不夺取它。"

他笑了起来。

第一杯酒下肚，两人脸红心热起来。第二杯酒后更加兴奋，他们眼前的一切似乎升高了，模糊了。奥波多夫斯基从皮沙发深处举起消瘦的手臂以他惯常的豪爽提出了质疑：

“为什么您所有的分厂都叫做‘东南’？我想明白这一点。为什么您认为您是在俄国的东南部？而事实上您是在西南部!”

“西南部是小俄罗斯。我国这边的铁路也叫东南铁路。”

“那么您是站在哪里，从什么位置看俄国呢？您如果这么说，您就是没看见俄国！老兄，俄国，应该从远远的地方，同月亮差不多远的地方看。那样，您就能看见北高加索是在这个庞然大物的最西南部。俄国地大物博，但我们将来的全部希望都在东北部，并不在通向地中海的海峡，那样想未免太傻了，而是在东北部，从伯朝拉到堪察加，整个西伯利亚北部。在那里能做多少事啊！可以在那里铺设环行的和对角线的铁路和公路，使冻土带变暖并排掉水分。从冻土带里能挖出多少宝藏，能在上面种植多少东西，搞多少建设，住多少人啊!”

伊里亚·伊萨科维奇突然想起：“啊！我想起来了，您在1905年差一点搞了一个西伯利亚共和国，是吧？您是想独立出去？”

奥波多夫斯基快活地挥一下手：“不是，而是想从那里开始解放俄国。”

阿尔汉哥罗茨基叹了一口气：“不过那里还是太冷。我不大想去。这里好些。”

“伊里亚·伊萨科维奇，应当想去呀！当然，如果您没到这个年龄，而是年轻人。何况世界正在进步，那么广阔的土地却依然荒凉如旧，人们不久的将来会对此吃惊的，人类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占着茅坑不拉屎’。你如果不利用它，就应当把它交出去。真正征服西伯利亚的不是叶尔马克，而是在将来。俄国的重心将移至东北，这虽还是预言，却不会落空。顺便说一句，陀斯妥耶夫斯基晚年也曾得出这个结论，放弃了以君士坦丁堡为重心的观点，他在《作家日记》最后一篇文章中谈到这个。您别皱眉头，你们没有别的出路！您知道门捷列夫的计算吗？我国人口到20世纪中叶将要大大超过3亿。有一个法国人预言我国人口在1950年将达到3.5亿!”

身材矮小的阿尔汉哥罗茨基一向生活平静、谨慎小心，此时坐在花园的硬皮旋转安乐椅上，双手叠放在略略鼓起的肚子上，说：

“斯托雷平，只要我们不互相杀戮，才能达到这个数字。”

第七十九章

伊里亚·伊萨科维奇明白，最大的家庭幸福不在于美丽的妻子，因为与感情丰富的美女一起过日子，是非常不容易的。虽然有识之士一再向他提醒这点，但他还是禁不住吸引力，最后还是娶了金发美女卓娅·李沃夫娜为妻。卓娅喜怒无常，好走极端，衣服不是领子高到耳朵，就是低到不能再低；如果她嫌相片没把她照得合她心意，她就撕掉。她未能登上舞台，没念完华沙音乐学院，喜欢在家里举行席勒剧本分角色朗诵会和音乐晚会，嗜爱花瓶、戒指和胸针，蔑视针线和抹布。她戴上珠宝首饰后的确很漂亮，头发上、脖子上、胸前和手上琳琅满目。伊里亚·伊萨科维奇在娶她时候就预言，后来又再三说过："我是个工程师，不是商人。"虽然如此，妻子的行为却使丈夫获得了充分休息，使他摆脱了日常事务。房间里满是帷幔、窗帘、包着缎子面的家具，外人在其中会觉得缺少什么，也许是窗户和灯光不够明亮，也许是暖气不够热，也许是有些角落没打扫干净，也许是碗架里的残羹剩菜没扔尽。

卓娅摘下围裙，走过几个房间，喊大家入席。除贵客外，其余都是或差不多是家里人。儿子不在家，女儿索尼亚和她的中学同学克谢妮亚，还有男青年纳乌姆·伽里彼林，此人是罗斯托夫一位著名社会民主党人之子，主人于1905年曾把这位社会民主党人藏在家里，此后两人结成莫逆之交；最后还有索尼亚自幼的家庭教师，她完全是家庭成员。

纳乌姆和索尼亚长得并不相像，也不可能相像，但确实有某些相似处。两人都有一头浓密的黑发和明亮的深色眼睛，两人在辩论时都有战斗性和灵活性。

他们预先早已商量好，要同父亲谈谈他参加罗斯托夫犹太人所谓的爱国游行的可耻活动问题。这次游行是7月末举行的，起点是一座犹太教圣歌教堂，伊里亚·伊萨科维奇只按传统节日到那里去，在教堂东侧拥有一个荣誉座位。他并非犹太教徒，本可以不去游行，但却去了。犹太教堂挂了许多面三色旗和一幅沙皇肖像。祈祷仪式开头有士兵参加，大家一起祝愿俄军胜利，犹太教士先讲话，接着是警察局长讲话，然后大家高唱《祈上帝保佑沙皇》。后来，1200名犹太人举着旗帜和上写“伟大统一的俄国万岁”的标语举行游行，又加进了一支志愿参军者的队伍，到达亚历山大二世纪念像时在那里又开了大会，在会上向市行政长官致敬，向沙皇发出最崇高的致敬电。这次游行干得无耻勾当还不止这些。事情发生后不久，索尼亚到外地去了一趟，接着她父亲也到外地去了一趟，现在才相聚。昨天，索尼亚和纳乌姆看了两部纪录影片，片中对这次游行极尽美化歪曲之能事，使他们难以忍受，把他们气得够呛，不禁要马上与父亲说说理。

两个年轻人很晚才知道一起进餐的还有一位客人，此人过去是著名的革命家，现在退出了革命。听到这个消息，他们俩最初有些为难，考虑是否推迟进攻的时间，后来决定不变，有这位客人在场也许更好。如果这位无政府主义者身上还保留着一点革命良知，他会支持他们；如果他彻底背叛了革命，那么这场战斗就会更激烈、有趣。两人入席后，就赶紧在端上汤菜以前找借口发动攻击。

冷盘端上来的时间已经晚了些。卓娅·李沃夫娜打电话（从餐室到厨房通电话）叫端汤上来，是红甜菜汤，用纯红甜菜和半酥半糊的奶渣有趣地掺合在一起做成的。女主人坐上座，客人坐在她身旁，称赞着女主人独具匠心，然后叙述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正在为自己选择活动领域。两个年轻人想，这难道不是时机？正是大好时机！蓬头乱发的纳乌姆用吓人的目光死盯着这个退出革命的人，问道：

“可是您要发展的是什么样的生产？资本主义的？”

伊里亚·伊萨科维奇脸色沉了下来，他猜到这两个年轻人准备闹事，他想立即平息下去。

奥波多夫斯基也猜到了。他今天饭后有一大堆事要办，希望现在安安静静地吃完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惯用于与志同道合者谈话，以便推进事业，而用于反驳思维浅薄的年轻人，却有些过时，而且也太无聊了。不过他是客人，不得不尽量勉强自己应付谈话，好在他言语一向流畅自如，不费力气。于是他和颜悦色地详细地回答说：

"这个问题在20年前已经提出来了，我早就听到过。19世纪90年代末我们还是大学生时也常在晚间集会时互相问这个问题，大学生也因此产生分歧，是做革命者呢，还是做工程师？是建设呢，还是破坏？当时我也以为不可能建设。应当到西方去看看，到那里能看到西方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规规矩矩地生活，勤勤恳恳地劳动。你会感到惊奇。只有贴近实际的人，亲手干活的人，才能懂得，生产只有一种，既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也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就是创造国民财富，建立共同物质基础。没有物质基础，任何一国人民都不能生存。"

哼！这些花言巧语是迷惑不了纳乌姆火热的黑眼睛的。

"人民是看不见也不可能看见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这种所谓国民财富的！它们都从人民手边滑走，全到剥削者手中了。"

奥波多夫斯基轻轻笑了一声：

"那么，谁是剥削者？"

纳乌姆耸耸肩膀：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您这样的人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应当感到可耻。"

"年轻人，依靠事实的人不可耻。只有袖手旁观、在一旁瞎评论的人才可耻。今天我们参观了一个粮食库，那地方不久之前还是一片荒草；还参观了一个磨粉厂，这些企业包含着多少智慧、教育、预见、经验、组织工作，我是很难向您说清楚的，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有多大的价值？占将来利润的90%，而那些砌砖铺瓦的工人的劳动只占10%，而且他们的劳动还可以用起重机来代替。工人得到了10%的报酬，但是那些人道主义青年却到处游说……您是人道主义者吗？"

“问这个有什么意思？总的说来，我是的。”

“人道主义青年到处游说，向工人们讲他们得到的报酬太少，而那些戴眼镜的工程师没亲手动过一个铁片，却拿那么多钱，真叫人不明白！这简直是收买。一些智力水平高的人容易相信这种说法，听到后就愤怒了。这些人只看见自己劳动的价值，不可能明白别人劳动的价值。我国人民由于受到的教育很少，是很容易受人唆使被激怒的。”

这时索尼亚喊了起来：

“为什么帕拉莫诺夫拿利润？”

“他拿利润并非全无道理。我说过，他起了组织作用。至于他拿的不该拿的那部分，应该用理性的方法逐渐转移到其他渠道中去。不应该像我们过去那样用炸弹来剥夺他们。”

这番话把叛徒嘴脸和投降哲学暴露得再清楚不过了。纳乌姆轻蔑地似笑非笑哼了一声，和索尼亚交换了一下眼色。

“这就是说，您永远背弃了革命方法？”

纳乌姆和索尼亚由于紧张和轻蔑而忘掉了吃饭。这时，一位身材很好看的女仆端上了第二道菜。女主人一定要客人承认他猜不出这道菜是用什么和怎么做成的，她期待着客人赞扬，听见赞扬后她会容光焕发。奥波多夫斯基确实应当赞扬，但是四只炯炯发亮的黑眼睛还从桌子对面盯着他，使他这个退出革命者焦躁不安。于是他一口气把话说完：

“我不想说这个问题，以前我最关心的是分配那些我未出力但已生产好的东西。现在我最关心的是创造。只要创造的东西多，即使错误地把东西分得精光，也不会把任何人漏下。”

纳乌姆和索尼亚在长桌的一端并排坐在一起，正对着两位工程师，他们又交换了一下眼色，冷冷地反驳道：

“创造？沙皇才不让您创造呢！”两人决定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暂且不谈，留作备用的主要问题。此时奥波多夫斯基却询问起来：

“请问你们属于哪一派？”

纳乌姆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但他答得很简单，声音很小，因为这是不便张扬的：

“我是社会主义革命者。”

他没走他父亲的孟什维克老路，认为那太平和了，扭扭捏捏的。

伊里亚·伊萨科维奇即使谈最重要的问题，做最重要的强调，也从来不大声；即使斥责孩子们，也不过用手指轻轻叩叩桌子而已，孩子们也总能听见。此时，他从浓重的黑眉毛下面几乎是温柔地瞅着纳乌姆，问道：

“请问，你们党的经费是从哪里来的？秘密接头处、安全住宅、化装出动、炸弹、转移逃亡、印刷物，这些都是要花钱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纳乌姆使劲地晃晃头：

“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不该问的……我还认为，社会上是知情的。”

“问题就在这里。”伊里亚·伊萨科维奇一边用一个手指刮着桌布，一边说，“你们有好几千人，长期以来谁也不劳动，却还不让问。你们不是剥削者，却一直在消耗着国民财富，还说在革命中这些能给予补偿。”

这时女儿突然愠怒地叫喊起来：“爸爸，你可以不为革命做任何工作。但不可以这样讲革命，这是侮辱！不成体统！”

她坐在父亲的斜对面，正如纳乌姆坐在奥波多夫斯基斜对面一样。四只愤怒的眼光交叉着直射对面。

这时，厨房按电话吩咐送上了装在大贝壳里的大块烤鱼。客人见后赞不绝口，卓娅·李沃夫娜高兴极了，对他讲解着什么，比划着手指和上面的菱形白金钻石戒指。这些政治争论把她压得透不过气来，她恨透了这个政治。

坐在长桌另一边对着女主人的是家庭教师马德姆阿泽尔，她也对这些政治争论厌烦得要命，而且更加绝望，因为除了对女仆说一句谢谢外，她就完全没有人可以说说话了。15年前，她在巴黎一家自由气氛浓厚的咖啡馆里结识了哈尔科夫审判庭长，被他带到俄国。最初她不懂一句俄语，当然也不能指望她看护的第一批幼儿懂法语，她只好胡乱唱些“什么人偷偷爬上别人的床”之类的歌曲哄孩子入睡。后来，她熟悉了俄国语言和习俗，也听懂了这些没完没了的

政治谈话并对之憎恶有加。日月如梭，如今，她珍藏的贴着仰慕过她的人的相片的册子已经旧得发黄，她也变成了一位乐善好施的人。最近一年，她教一名携鹰打猎的独身男子法语，据卓娅·李沃夫娜听说，两人快要结婚的时候，那个男的突然被召去打仗了。

离这位家庭教师不远，在气呼呼的索尼亚身旁坐着文静的克谢妮亚，她两眼炯炯发亮。索尼亚和她在学校里是给班上添增光彩的人物，两人总是一起坐在第一桌，一起举手，一起得5分。但课堂上要答的问题是明明白白的，应该记住和知道的东西，不是以前课堂上讲过的，就是在教科书里写着的，都肯定无疑。克谢妮亚现在也不愿意一声不吱，但却害怕一张嘴说出的是傻话错话。在一起吃饭说话的是聪明人，他们的话大不一样，她分不清谁对谁错。从小在草原家庭长大的克谢妮亚所受的家庭教育要她在这种场合不能瞪眼睛打呵欠，露出不明白式感到枯燥无味的样子，而要以非常细致的办法表现出对讨论很感兴趣，十分明白，例如向说话人转过头去，有时点一下头表示赞同，以微笑表示感兴趣，抬抬眉毛表示惊异，等等。克谢妮娅现在就依法炮制，她并没有把人们讲的话听进去多少，因为她还得注意正确使用刀叉，而且她还有心事。

她的生命陶醉在重大的向往之中，非笔墨所能形容。她生活的每一天，走过的每一步，都在无形而又坚定地把她带向那最高的幸福。人们生到世上来就是为了这种幸福。但这种幸福的到来，既不能依靠战争，也不能依靠革命；既不能依靠革命者，也不能依靠工程师，但不可避免地——来到。

伊里亚·伊萨科维奇继续往下说，不像在辩论，倒像是对着盘子沉思："你们迫不及待地盼望革命，比起建设俄国、干粗活来，空喊当然容易得多，干革命也有趣得多……假如你们年龄大一点，遇到1905年的情况，那时一切看起来都……"

索尼亚心想："今天自己说话太温和了，这样父亲是转变不了的，他是必须受斥责了。"

"爸爸，你真可耻！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是拥护革命的！"

父亲照样沉稳地小声说下去：

"难道我们不是知识分子吗？所有主要的东西都是由我们工程师制造和建设的。我们不是知识分子？有理智的人不会拥护革命，因为革命是长期的疯狂的破坏。任何革命首先都不能使国家面貌一新，而是长期破坏国家。革命流的血越多，持续时间越长，国家付出的代价越大，它就越能获得伟大的荣誉。"

索尼亚听到这里痛苦地叫喊起来："但是总这么生活下去也不行！不能再在这个发臭的君主专制制度下生活下去！这个制度是怎么也不会自动离开的！你去试试看，对它说革命会破坏国家，让它自动离开！"

伊里亚·伊萨科维奇还是照样用手指在桌布同一位置反复而坚决地刮着：

"别以为取消了君主专制制度你们马上就好了，还会有类似的制度代替它的。对于俄国这样的国家，你们的社会主义很长时间是不适用的。目前对我国来说，自由主义宪法就够了。别以为共和国是块好吃的馅饼。上百个虚荣心十足的律师聚集在一起，互相争论不休，谁比他们更能说？反正人民是什么时候也不能自己统治的……"

被桌旁的人们以"您"称呼的女仆用一个一个小篮子向各人送上甜食。卓娅·李沃夫娜对奥波多夫斯基讲述去年夏天她带着孩子和马德穆阿泽尔在南欧旅行的情形。

这时两个信心十足的青年用两只拳头击着桌子异口同声地叫喊道：

"能！能！"

两对炽热的黑眼睛怀着最后的希望看着这位无政府主义者。难道这人真的不可挽救地沉沦下去了吗？

不，他还是有些不同意主人的讲话，他好像想反驳主人，但他须听女主人讲什么。

而伊里亚·伊萨科维奇这时把话说得更固执了，他已经开始激动，眉毛胡子有些发抖了：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是不是？那是不负责任的！我在南俄建立了200个蒸汽机或电力的面粉厂，如果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它们能剩下几个？……那时我们吃什么？甚至在这张桌子旁。"

哼！他自己提供了挨打的时间地点，索尼亚强忍着屈辱的眼泪，紧张地喊道：

"所以你才同犹太教士一起游行，表示自己对君主专制政权和市行政长官的忠诚，是吧？你怎么能那么做？你怎么才能有个够？你是希望君主专制政权巩固吗？"

伊里亚·伊萨科维奇抚平挂在胸前的餐巾，说话的声音仍未提高，也无任何失常之处：

"你们想改变历史，但历史的道路比你们想的要复杂。你们所生活的国家已陷入苦难。能不能对它说：见你的鬼，垮就垮吧！是不是应该说：我也想帮助你，我是属于你的。既然生活在这个国家，就应该下决心真正使自己的灵魂都属于它，一旦下了决心，就应矢志不渝。如果没有这个决心，不论是破坏它或离开它，都是一样的……如果有决心，就应耐心地加入历史的进程：工作、说服、逐渐推进……"

卓娅·李沃夫娜也在听丈夫说话。她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犹太复活节吃硬面薄饼，接着在东正教复活节时烤圆柱甜面色，做彩蛋。一个开朗的心灵应该接受一切、理解一切。

纳乌姆本想严词驳斥，但出于尊敬家庭的感谢心情没那样做。索尼亚却把积压在心头的不满全发泄出来：

"你说生活在这个国家！准许你生活在罗斯托夫，是人家发善心，考虑你是特殊的荣誉公民。那些没机会受到教育的人，却只能在圈定的犹太人定居区里腐烂到死。你把女儿叫索菲亚，把儿子叫符拉基米尔，以为这样人家就能把你当作俄国人了，其实还是处在可笑的、低贱的、奴隶的地位里。哪怕不张扬自己这种奴隶的忠心也就罢了！市议会的议员！你支持的是什么样的苦难中的俄国？你打算建设什么样的俄国？……爱国主义？在这个国家讲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很快就会变成蹂躏犹太人的暴行。这里有个广告，你读读吧！护士训练班，只招收信仰基督教的人！好像犹太姑娘会给伤员撒毒药似的！罗斯托夫医院挂着个牌子，上写是以斯托雷平命名或以本市行政长官日沃里金命名的床位！这

简直愚蠢到极点，滑稽已极！偌大一个罗斯托夫，教育程度这么高，还拥有你的面粉厂、议会，却什么事都盲目服从哥萨克首领，他们下令哥萨克用鞭子抽打我们。”

伊里亚·伊萨科维奇咬咬嘴唇，他的餐巾从扣紧的领子上滑了下来。他继续说：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我们却应该超越于它们之上。我们应该有一种愿望，要建立一个比俄国人民联盟更有意义的组织，建立……”

他谈到这里，忽然表露痛色。奥波多夫斯基毫不犹豫地接过话头说了他没说完的话，一边说一边向年轻人使眼色：“比如说建立全俄工程师联盟。”

阿尔汉哥罗茨基把胸脯紧靠在桌旁，重新说了起来：“说得对，你们为什么以为全俄工程师联盟意义小些？”

索尼亚激动得把袖子擦到还没吃的甜食上，喊道：

“黑色百人团才是最重要的呢！你这是向黑色百人团，而不是向祖国表忠心！我为你感到羞耻！”

她终于使父亲失去了耐性，他又用手不时抓抓桌边以表示强调某些词语，话声是颤抖的：“你这一边有黑色百人团，另一边有红色百人团，夹在中间的是一批实际工作者，”他窝起双手手掌像一支船，“这批人企图冲出夹击，但却不可能！”他分开双手，接着又合掌猛击一下，“他们只能被挤成齑粉，化为灰烬！”

第八十章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在亚历山大三世时期受人歧视，甚至在人们眼里他都算不上是沙皇的亲信。然而，他却是亚历山大三世时众多大公中出类拔萃的人物，而且是最富有天赋者的化身。他身高1.99米，是王朝中最高大的男人。在皇亲贵族中他的确非同凡响，但是，他的地位却并不巩固。有时他能对沙皇产生有力的影响，以自己的影响力争得沙皇的赞同。有很多问题都是在他的影响下一起谈定的，比如，10月17日的宣言和召集杜马会议就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强行逼迫沙皇同意的：当时在沙皇的书房里，他竟以开枪自杀威吓沙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从不在乎社会舆论，也不怕社会运动，而是听之任之（即便最后社会上有人说他是个黑帮分子，他也无所谓）。不过，由于他暗中反对皇后（为什么违背了这黑山两姐妹——他的第二任妻子和她的姐姐——的意愿，他就必遭失败呢），便失去了职位，失去了对沙皇的影响力，失去了沙皇的支持，遭到了沙皇的怀疑。结果，1908年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主持的国防会议被解散了（但是，对此他却并不太在意），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也因此被停了职，不再负责拟订军事计划和军队的整个行动。后来他又失去了对近卫军的指挥权，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将军，仅担任彼得堡区司令。

但是，你瞧，战争一开始，那些部长们又劝沙皇鉴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具有果断精神任命他为最高统帅。到了这个时候，所有的人又把目光投向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在俄国没有别的什么人能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更胜任此岗位了。于是乎，大公重又扶摇直上了。

可是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一切就又都变了——想要调换由沙皇亲自指定的大本营成员已经太迟了。沙皇按自己的方式（尽管在军人看来十分荒诞）选择了亚努什克维奇将军为最高统帅的参谋长。亚努什克维奇将军是个有名的实干家，还是个大学教授，不过，他是军事行政教授，虽十分了解部队的所有组织、调度和总结工作，但是他根本不懂得如何率领军队。如果遇上一个很在行的军需官将军可能会重新修正一下这一任命，遗憾的是军需官将军也是沙皇亲自指定的——他就是头脑迟钝、缺乏远见但却善于埋头苦干的“粗人”丹尼洛夫。此刻，沙皇正以平时大家所习惯的那种漫不经心、我行我素的态度请求大公理解；保留最高统帅的参谋部，这也就是把参谋部的人员召集到一起令沙皇高兴高兴，是小事一桩罢了。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难道会拒绝接受任命吗？在这场战争中能得到最高统帅的位子，对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来说是多么重要啊！这正是他所需要的，也是命中注定的。由于憎恨日耳曼，他早就盼望得到这个位子了。他不愿成为别人的障碍，况且他又是个很真诚的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习惯把沙皇的意志看做是神圣的，他所受的教育就是如此：虽说沙皇是小辈，是他的侄子。但是，沙皇是他的主宰，没有沙皇，就没有了作为一定之规的君主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预感到自己将得到最高统帅的位子，他为自己描绘了一幅受命为最高统帅的蓝图，琢磨着任命跟自己关系密切的帕利岑将军为参谋长，任命长得虽然欠佳但风度谦恭的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大公非常信赖他那出类拔萃的军人理智）为军需官，这种任命会使整个俄国、整个军队、整个宫廷大吃一惊的。但是，你瞧，结果还是得采用别人的编制，采用他根本没有参与而别人已经制定好的作战计划。

然而，“最高统帅”这一妙不可言的神圣标志却令他震憾，令他振奋，令他神往。大公从大本营来到巴兰诺维契后，突然产生了一种预感：他的最高统帅部必会顺利成功，俄国必将获胜。他是从一种特殊的几乎不可能的因此而显得神秘的巧合中产生这种预感的：在巴兰诺维契附近的一个铁路小镇（他正是把大本营从彼得堡迁到了这里）里，有一座为纪念圣者尼古拉而建造的小教堂。

不过，这个尼古拉可不是那个整个俄国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其王位、在这里却毫无惊人之处的尼古拉·米尔利基斯基，而是尼古拉·科昌，他是个狂热苦行的基督教徒、诺夫戈罗德显灵者，7 月 27 日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恰恰就是最高统帅的命名日，可见，这个尼古拉也是他最好的庇护者。在俄国几乎找不到这样的教堂。这种巧合不可能是偶然的！神秘的预感正是由此而产生的！

为了全面正确地解读这个上天示意的预兆，大公显然是不能离开，不能长时间离开这个对未来局势发展有决定意义的有利地方，也不能在各师团间奔来跑去。所有的路线都在这里交叉，这也正决定了他们注定要在这里获胜！

由于军事驻地固定不变，便有了与之相适宜的固定不变的作战计划，就可以从容不迫地去完成任务和休息调整。大本营的两辆车停在森林边上，最高统帅的专车几乎总是停在林子里。军需官将军的军需部设在一座不大的小房子里，他们就在这里对战役中的所有战略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军需部选择的这座小房子就在最高统帅的专车的正对面，仅有 20 步远。大公在自己的车厢里安静地休息。即便夜里有电报或情报来，他们也不会去打搅最高统帅。最高统帅一般都是在上午 9 点钟起床，他们要等他洗漱完毕、做完早祷告后，才把这些电文送交给他。喝完早茶之后，最高统帅才会见他们。一个小时后，参谋长也来向他汇报情况了。他们在一起对战役问题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的分析研究，很快就到了中午，他们才去吃早饭。饭后，大公躺下休息片刻，接着便开车走了。这么一来，时间便过了两点，两点之后他与自己的随员们已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可做了，只剩下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和个别谈话。午饭前大公坐在自己的车里给在基辅的妻子写每天必写的家信——向她详细讲述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如果没有跟自己亲人的这种在精神上的交流，他就无法生活。所以，即便是在行军打仗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间断过给妻子写信。因为最高统帅的位置是固定的，所以大公总能按时收到妻子的回信。晚上 8 点半钟，参谋部的成员们按照彼得堡的习惯，在餐车里共同进餐，而且总是要喝些伏特加和啤酒，因为他们还要工作到更晚些时候——深夜 3 点，就不一定能喝到茶了。

最高统帅总是到自己的教堂（这里的合唱班是由从宫廷合唱团和喀山大教

堂合唱班里精选出的歌手组成的）去做通宵祈祷和节日弥撒。他在自己的教堂里总有种与上帝面对面地单独在一起的感觉：他不是坐在供桌后边，也不是只祷告一阵子，而是彻夜跪在地上，一边磕头一边默默祈祷很长时间。他在祈祷时陷入了沉思，他坚信上帝会给他们以有效的帮助的。

大公在久久地渴望着，他渴望尽快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无论出于他本人骑士般的好战性格，还是出于对日耳曼人的军国主义的仇恨，或是对友好邻邦法国的特殊责任，不仅俄国负有全面责任，大公也负有一定责任：前年他的豪华专车曾到过法国，那里的人民都很爱戴他，信任他，始终坚信会任命他为最高统帅。法国原本就不该陷入这场灾难！这就是大公为什么命令两支俄国军队刻不容缓地坚决对东普鲁士发起强大进攻，甚至还果断地提前了进攻日期。

但是，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迅速获得胜利。奥地利战线上的进展也不顺利。而在普鲁士，自贡比年战役之后，就没有过第二次成功的进攻：无论在海上，还是在维斯瓦湖，都没能大批消灭掉敌军。萨姆索诺夫先占领了一座城，后来联系中断了；接着，又传来了阿尔塔莫诺夫被撤职的消息（罢免进行得特别轻松，特别顺利，你还没打够仗呢——几个军团的兵力就这样给撤回了）；再后来就没有什么消息了。16日日林斯基赶到了巴兰诺维契。遗憾的是，萨姆索诺夫竟然自作主张，随意中断了联络，现在什么消息也得不到了，派往那里的沃罗滕采夫上校不知为什么还没有回来，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消息，不是件好事。17日还是什么消息也没有，整整一天都无从得到任何方面的消息。18日深夜，大公被人叫醒，给他送来一封令人震惊但并不可靠的电报：这是封用密码写的电报，却是通过普通民用发报机发来的，费了很大周折才送到了前线司令部：“经奈坚堡—霍亨什杰因—比绍夫斯堡地区的5天战斗后，第二集团军几乎损失了大部分兵力。司令开枪自杀了，残余部队逃到了俄国境内。”电报下方还有签字，但只是军队联络官的签名。为什么不是更高级些长官的签字呢？为什么他不是参谋长？难道是个骗局？或是吓破了胆的军官犯的一个错误？日林斯基和奥拉诺夫斯基为什么不说话？他们应该知道更多的情况，不是吗？

8月18日日林斯基和奥拉诺夫斯基送来的全部消息就是：萨姆索诺夫的过

错和冒险行为，以及军队司令部如何突围。“有关第二集团军各军的情况没有任何消息。可以推测，第一军可能要在奈坚堡附近打一仗……第十五军的部分人马正成群结队地涌往奥斯特罗连卡。”

丹尼洛夫和亚努什科维奇齐心合力地设法使大公相信，不会再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了，说不定情况会突然出现转机。但是，最高统帅的心还是在一阵阵抽搐，就算对近处的几个军可以做出些推测，那么远处的军队呢？他预感到大难就要临头了，这是人的力量无法挽回的，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了。他又去做了一遍晚祷告。他在自己的车厢里挺直身子，瘦得皮包骨的膝盖硬邦邦地跪在点燃的灯旁，默默地祈祷着。

其实，他并没有接到日林斯基有关军队覆没的正式报告。这就是说，他也没有正式信函向沙皇呈报。这些天里，大公也只能机械地完成自己的生活程序，他就像棵挺拔高大的杨树（看他的架势就像骑在强壮无比的英国猎马上一样），腰不弯、背不驼地在大本营里穿行。他的脸上虽已失去了好战的表情，但是，他依旧显得那么年轻，实际上他都已经是近60岁的人了。他神情镇静、彬彬有礼地与随员们和司令部的官员们交谈着，平时在大本营里他们通常并不谈论有关军事秘密的事情，从来不随便谈论任何军事行动。特别重要的事情，他们都要瞒住跟他们同住在车上、一起在车上就餐的盟军代表们，即这些法国人、英国人、比利时人、塞尔维亚人、黑山人，以免他们得知有关俄国失利的任何消息。趁他们还没有想到应该让他们知道真相，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猜测到。尽管人们在私下里议论着许多凶多吉少的传闻，脸色也变得忧郁起来，但是，所有的人都学大公，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大本营的生活表面上照常从从容容地过着。近卫重骑兵队副官缅格坚伯爵站在大公的车厢和军需官将军的小房子之间，打着刺耳的口哨，一会儿召回信鸽，一会儿又把它们放飞掉，或是训练自己的獾。

19日，已不得不向沙皇报告灾难临头了，因为报纸上已经透露了这些坏消息，只得承认报上刊登的消息了。

大公心里苦闷极了，无法事先预料到沙皇对他所讲的事会做出什么反应，

这个沙皇可是个喜怒无常的人，搞不好会失去他对自己的赏识。不能匆匆忙忙地从他那里得到答复，该等等，等两三天再说。年轻的皇后和拉斯普京派的所有人以及苏霍姆林诺夫，必定会想方设法地把俄军在普鲁士的失败都推到大公身上，甚至不等最后情况改善，就让他辞职。从彼得堡到所途经过的地方——无论奈坚堡、别洛斯托克或是巴兰诺维契，轻而易举就能让人们相信是最高统帅断送了一切。

但是，在这一事件中大公因为不掌握情报而显得惊慌失措，这比等待沙皇的答复更让大公感到难堪。因为这有损大公的名誉，他将因此受到惩罚。当时的情况显得十分隐晦，叫人感到莫名其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究竟是怎么了？事态糟糕到了什么程度？日林斯基在宫廷官员圈子里只不过是只猴儿而已，大公不可能像要求其他下属那样，让他快速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他可能知道情况，但却隐瞒了，而要对这一切负责的是最高统帅。

20日夜里，大本营再一次要求了解西北线的详细情况，奥拉诺夫斯基却声称自己无法得到西北线的详细情况，因此不可能知道，也无可报告。

这些天一直都很平静，夜里十分凉爽，白天却极其酷热。20日早晨阳光灿烂，不过并不热。光线很快就不那么强烈了，天渐渐变得阴暗起来。没看到哪儿有云朵飘过来，天空就不知不觉地渐渐被阴云遮住了。一阵阵微风轻轻拂过，十分凉爽。你瞧，西边的天空已经变得阴暗了。到了中午时分，天越来越暗了。

大公的心情虽然很沉重，但他依然像平时一样按部就班地在特定的散步时间内穿好了户外活动服装，走出了车厢。他遇见了慢条斯理的军事联络官，这人心肠好，还是个雪茄商标收藏家。大公想起自己有雪茄新品种商标，转身回车厢去取。

当大公重新走出车厢时，看见沃罗滕采夫上校正大步流星地从森林里径直朝他走来！不错，是沃罗滕采夫！！不是在做梦吧？他居然还完好无损地活着？现在在所有人里最需要见到的人就是他了！

沃罗滕采夫快步走过来，那样子像是在追赶什么人，要第一个走到大公跟前似的。其实这会儿只有军事联络官将军，他正为大公给他商标乐呢。他身旁

还有个副官，再稍远处是个等待任务的将军。沃罗滕采夫一身制服，没带行装，跟在司令部时一样。他走路的姿势仍保持着平时惯用的军人行军步伐，不过显得有点儿虚弱，腿有点瘸。他的一个肩明显比另一个高，他的颚上还有块凝结的血痂，两腮上的胡子都没有刮净。

"沃罗滕采夫！"不等他走近，大公就先大喊了一声，"您回来了?！怎么没有人向我报告呢?"

沃罗滕采夫忙行了个军礼，不过，不像在司令部行礼行得那么优雅，身子有些摇晃，胳膊似乎也比平时沉重了。

"阁下！我——刚刚回来才10分钟……"

他可不是才回来10分钟，他已经在森林里坐了几个钟头了。他让布拉戈达廖夫拿着军大衣和地图囊留在森林里，自己故意等到这个时候才从林子里出来，为的是避开亚努什克维奇和丹尼洛夫，好马上见到大公。

"您受伤了吗?"大公那两道富有表情的眉头明显地动了一下，他猜测上校制服下的肩膀上肯定打着绷带。

"不要紧。"

最高统帅的双眼立即显露出热切渴望得到些消息的神色。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尽管显得很激动，很担心，但他那长圆型的脸变得年轻了。他急切地大声问道：

"喂！那边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沃罗滕采夫挺直腰板站着，一副军人向上级打报告的姿态。可他的两只眼睛却在副官和站在稍远处的军事联络官将军身上扫来扫去，此时不少人从四面八方朝他们这里跑过来，想赶来听听他们讲什么。

"统帅阁下！我请求您听完我的报告后要保密。"

"对，那是当然啦！"大公果断地点了点头，随即以他特有的、与自己身份相符的动作猛地朝车厢转过身去，蹬在军靴里的两条细长腿像年轻人似的矫捷地蹬上了车厢的小台阶，他站在台阶上对副官下令：不许任何人靠近。

最高统帅的车厢内改建得与普通车厢迥然不同。他们走进两窗之间的办公

室，办公室的地上铺着一块东方地毯，有一张书桌。墙上挂着一块熊皮和两把交叉成十字的兵器、几幅圣像和沙皇的肖像。

伟大俄国的全军最高统帅与沃罗滕采夫两人面对面地隔桌相坐。大公的态度和蔼可亲，他支开了碍事的参谋们，热切地等着听沃罗滕采夫给他带来的唯一可以得到的新消息！沃罗滕采夫在自己的整个戎马生涯中还从来没遇见过如此独特的上下级关系——将来也不可能有这种不可多得的时刻了：一个明智的军官就能影响整个军事的行程！显然，他以往的服役经历促成了这一关键时刻的到来。他极力将思绪紧张地集中起来，对准一个目标。他虽像死人似的昏睡了两夜零一天，还是觉得浑身酸疼，心里烧得慌，但是头脑却很清醒。由于谈话一开始就很顺利，他的机灵劲儿也顿时大增。

他在地位尊贵的谈话者面前口若悬河地侃侃而谈，一点儿也不打怵，他从来也没在谁面前害怕过。他言简意赅地向大公禀报前线的情况：集团军还没做好充分准备，就如何被催促着仓促行动，又如何受到阻挠；萨姆索诺夫如何如何了；集团军战役实际进展得怎样；德国人都干了些什么；他们忽视了什么样的关键时机，又有什么样的机会出现了。沃罗滕采夫收集了所有被包围的日子里的情况，后来又向突围出来的人询问了有多少人来得及跑出来，所有这些情况他都有详细明确的记录。9天前他揣着这份记录去找萨姆索诺夫时还那么轻松呢，可是今天，他带着满脑子的想法来到最高统帅的车厢办公室里，却带来了浓烈的战争气息，他讲述了乌兹道一带的激烈战役以及他跟埃斯特良团的人一起毫无希望地为捍卫奈坚堡而战。他把这种战斗激情带到了这里，这种激情的产生不是源于某种信念或某种正义感，而是他自己真真切切亲身经历的诸多苦难。他用这种眼光述说着什么情况不可能发生，讲第十五军的哈里托诺夫少尉因为遇到俄国人如何孩子般地兴高采烈：

“那么说，你们——没有被包围？在你们的身后，或更远些——是自己人？”

而布拉戈达廖夫一听少尉的话就像铁匠的风箱似的大喘了一口气：

“再往后就是——俄国啦？唉，我的妈呀！我们还以为我们的腿伸不到家了呢。”他像一只慢慢瘪下去的空口袋似的，一下子把再也不需要屠杀的军刀插入

了地里。

最高统帅似乎对这段描述并不感兴趣，他漫不经心地挥了一下手，仿佛要挥去眼前的这一切，沃罗滕采夫像踢皮球似的把这些问题都推给了他，推到了他的面前。

大概沃罗滕采夫当时就去了各团的营，搞清谁遭遇了什么命运；他已得知后卫队的牺牲情况；了解到有一群人已经撤退出来；炮队已全军覆没；至少有7万人陷人了敌人的包围圈。不过，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没有将军的指挥下，居然能有1万—1.5万人撤了出来。

最高统帅难道不知道这一情况吗？西北战线司令部没有向他汇报此事吗？

最高统帅那张雕塑般的具有贵族气质的消瘦的脸显得非常紧张，就像狩猎时那样。他几次差点打断沃罗滕采夫的话，差点一个劲儿地追问，而沃罗滕采夫却口若悬河似的一口气地讲着，他连一点儿插嘴的空隙都没有。好几次他拿起笔来想记点什么，可什么也没记下。他显得非常激动地叼着雪茄烟，用力地吸着，仿佛这支烟很长很长，让他无法搞清所有真相似的。他表示赞同少下达命令——他已经陷进去了，使自己成了这场不幸战争的一个不幸参与者。

沃罗滕采夫时而为自己没白像个多嘴多舌的人似的跑到这个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而希望倍增；时而又焦虑不安地起来。不过他马上得到了补偿，马上将大公的一只沉甸甸的手掌按在了所有这些榆木脑袋上。沃罗滕采夫待人从来也不过分恭敬，现在尤其这样。他谈到军团长们时，就像谈论那些他自己就可以随时革除的愚蠢透顶的排长一样。

突然，他比任何人都更加痛恨阿尔塔莫诺夫了，他从最高统帅的目光中感到有种反抗情绪，一种冷漠态度。他又想起了阿尔塔莫诺夫那双像堵墙对着完全不同面孔的眼睛。

“不错，命令一事的确让人无法理解。但是也许是一个尉官搞错了。”

大公很善于与下属们相处，他可不像沙皇那样善变：昨天还深得沙皇宠信的大臣，今天就会被他腼腆地微笑着推入失宠或废黜的尴尬境地。大公为骑士似的忠诚而感到自豪，他总是保护那些他曾经爱过的每一个人。

即便是——傻瓜……

为了更能说明问题，沃罗滕采夫列举出了所有因受骗而在乌兹道附近被击溃的团，其中有叶尼谢伊斯基的团，不久前大公还跟叶尼谢伊斯基一起在彼得堡阅兵式上并肩行进呢！……他又听到沃罗滕采夫说道：

“当然啦，侦察都是最严密的。不过，他的确是一个勇敢的将军，而且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生存的意义何在？打算一起上哪儿去？所有这一切像焚香的团团烟雾在神情威严的大公心中升腾起来。

沃罗滕采夫沉默了，竟然命令从乌兹道撤退，这都是小事一桩?！如果说士兵自发奋起进攻、一连射击了几小时后才撤退；如果说训练有素的军团也被迫撤离了 40 俄里，致使军队遭到了毁灭，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背叛行为，也不能为此扯下将军的肩章、砍下将军的脑袋，那么，当时为什么还要发给这支军队制服？为什么要发起这场战争呢？

最高统帅的车厢真该因沃罗滕采夫的这一番话而翻个个儿！让他的整个静止不动的列车开始震荡！离开轨道！但是，当最高统帅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时，杯子里没有喝完的茶却一点儿也没有晃动。

最高统帅并没有举起手掌来惩罚或教训人，而沃罗滕采夫却猛地一闪，想躲开一段距离。他闪得飞快，凭借惯力将自己沉重庞大的身躯朝前推进。他自以为整个身子会马上移开，哪知沉重的身躯却稳稳当当地纹丝未动，他的双手沿着圆桌表面滑了过去。

他试图移动身躯，可惜身体没受到推动力。

沃罗滕采夫一口气讲了这么多的话，气都没来得及喘一口，现在该歇口气了。

而最高统帅却沮丧地站在那里，耷拉着脑袋，两肩下塌，垂着两只长长的胳臂，失去了军人的威严仪表。

“很感谢您，上校先生。您的报告我是不会忘记的。明天日林斯基将军要到这里来，我们将在军事行动部进行研究。您也可以参加，请您来汇报一下情况。”

有希望了。沃罗滕采夫从近处看着坐在桌子对面的最高统帅那张长着一对蓝眼睛的瘦长衰老的大马脸。或许明天大家都会受到启发？一切都会有进展？说到底，不关阿尔塔莫诺夫的事。问题在于要接受教训。

大公说完话后打了个手势，表示会见结束了。

沃罗滕采夫站起身来，请示是否允许他离开。他已经在大公的车厢里待了大半个上午了，可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愁得连大嘴上的伤疤都扭曲了。沃罗滕采夫或许会认为这是自己的报告造成的。

就在这时有人敲了几下门。参谋德费尔登手里拿着一份没有拆封的电报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他极其恭敬地弯下了他那类似近卫队骑兵般的高大身躯，将电报递给了最高统帅：

"沙皇陛下发来的电报！"

报告完毕，他向后一退。

最高统帅站起身来看完了电报。

而沃罗滕采夫在那里显得有点不自在了，他忘了他是没有权力看沙皇发来的电报的。他感到困惑不解，大公似乎有什么话不好对他讲。

室内的光线越来越弱，窗外的一切都已经显得十分昏暗，但他发现大公那张骑士般的脸却似乎在发光，显得十分平静，也变得年轻了许多，整个脸都舒展开了，刚才因沃罗滕采夫的一番讲述而愁得扭曲了的嘴角上的线条，此刻也不见了。

最高统帅向跟在身后的德费尔登伸出自己那双长的出奇的手：

"骑兵大尉！请您叫神父到我这里来一趟，他刚刚走过去。"

大公是位浑身筋骨强壮的军人，他的每一个姿势都显得富有弹性。此刻他庄重地站在沙皇的肖像面前。

沃罗滕采夫遭到了大公的冷落。他再一次举手向大公行了个军礼，请求准许他离开。但是大公却一字一句地郑重回绝道：

"不行，上校！您还得再在这里待一会儿！您心情沉重地讲了这么多，理应

第一个得到宽心丸。您听听吧，沙皇陛下给了我们多么大的支持！他对我的有关大灾难的报告给予了多么仁慈的答复啊！"

说着，他用一种如释重负的腔调读起电报来，他欣赏着电报上的每一个字，那劲头胜过了欣赏自己写的字：

"亲爱的尼古拉！朕与您一样为英勇的俄国军人的牺牲而深感悲痛。但是我们要顺从天意。谁忍受到最后，谁就必将获救！您的尼卡。"……"谁忍受到最后，谁就必将获救。"他像着了魔似的用教堂里的祈祷方式，以军人特有的和缓均匀的语调拉长声音重复道：得救也好，不得救也罢，他还是从这些话中听出了什么新的含义。

大神父敲了敲门走了进来，他那张脸充满了智慧，表情十分温和。

"听我说，乔治神父！听我说，沙皇陛下多么仁慈啊！你听他说的多让人感到欣慰：'亲爱的尼古拉！朕与您一样为英勇的俄国军人的牺牲而深感悲痛。但是我们要顺从天意。谁忍受到最后，谁就必将获救！您的尼卡。'"

神父一边表情虔诚地听着，一边对着圣像画着十字。

"后边还有：沙皇陛下命令我们速将《圣玛利亚向圣谢尔盖显灵》这幅圣像从谢尔盖三圣大教堂转移到大本营来。这是件多么让人高兴的事啊！"

"这的确是个非常好的消息，亲王殿下！"神父恰如其分地说道，"这幅画在圣谢尔盖陵墓木板上的非同寻常的圣像在3世纪时曾伴随着我们的军队行军打仗。在向立陶宛进军的途中它曾伴随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沙皇陛下。它还伴随彼得·韦利基在波尔塔瓦一带作战，伴随着亚历山大·布拉戈斯拉夫征战欧洲，还有……在对日战争中也曾伴随过最高统帅的大本营。"

"真是太让人高兴了！这正是上帝的仁慈所在！"

最高统帅激动地在办公室里神经质地大步走着。"圣母在借助圣像给我们以帮助啊！"

你不能一边祈祷，一边去揉发面。

九号文献

(德军飞机上散发的传单)

俄国士兵们！

你们完全被蒙蔽了。

俄国第二集团军已经全军覆没！

……你们的 300 门大炮、所有的车队都被我们缴获，93000 人被我们俘虏……

战俘们很满意我们对他们的态度，都不愿意回俄国去了。他们在我们这里生活得很好。

比利时被我们摧毁了，我们的军队已经驻扎在巴黎一带……

第八十一章

真是难以让人置信：转眼间就到了秋天。“秋老虎”天气也已经过去，夏天成了肩膀头上累赘的军大衣，现在穿上正合适。秋风在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松林里自由自在地穿来穿去。有时，突然从变幻莫测的阴暗的空中落下绵绵细雨来。我们在沼泽地里艰难跋涉时没遇上这种鬼天气，真是万幸。

两个上校——沃罗滕采夫和斯韦钦——不约而同地将军大衣的领子稍稍提起，两手插进兜里，拎着大衣的下摆在松树间走着。他们似乎有意在那些没有过多枝杈而风只能摇曳其枝叶茂密的树冠的松树间穿行。

“不!”沃罗滕采夫耸动了一下强健的肩膀。离开突破口后，他的心情就一直无法平静下来。他在焦虑中度过了几个日日夜夜，现在已经度过了第四个昼夜。“你把你所想到的一切一下子都说出来——这是一种快乐！这也是——职责！把自己内心的话一下子痛痛快快地倒出来，就算在哪儿死了，也无憾了。”

斯韦钦的脑袋整个都是圆咕隆咚的：耳朵是圆的，鼻子是圆的，嘴巴也是圆的。他的眼睛又黑又亮，炯炯有神。而他本人说出的话，则既不招人愤恨，也不令人信服：

“反正你是不会说的。难道你忘了日林斯基是绝不可能擅自采取冒险行动的吗？整个军事行动都是由上边下令的，你不能假装不知道……”

“我也可以不知道!”

“如果还没有做好准备，还没能休整一天，还没巡视一下四周的情况，就这么毫不理智地向前赶，那么，至少大公是这种不利情况的酿造者。不过，他到

底是更高一筹。你究竟是怎么想的？所有这些仓促行动，这些失策，都只是因为日林斯基和丹尼洛夫太迟钝了吗？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得到最高层同意的：好吧，你们就把没做好准备的军团扔掉吧！俄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对高贵的同盟者有利，我们在这里不惜牺牲自己人的性命，而巴黎人只是在那里做弥撒。也许是欧洲人没考虑好我们的情况吧。你到底是跟什么斗呢？”

“不！巴黎人可没为我做这种弥撒！”沃罗滕采夫的两道灵活的眼眉往上一挑，那两片富有表现力又尚未被胡子遮掩住的嘴唇痛苦地微微颤动着，“押着我们成千上万的战俘走过一座座德国人的城市，就是德国老百姓也会欢呼雀跃的。我可不让做这种弥撒，我也不到教堂去做弥撒！历史上这种事从来也没有得到过什么补偿。就这么毫无益处地让自己人去送命？”

斯韦钦微微撅起他的厚嘴唇：

“这么说，我们大家都明白说的是谁是什么了，那你还要去攻击日林斯基。当然啦，他也不是一个小人物。不过，你跑得并不算远。大公对同盟国的含义理解很透彻，所以他才力求去喜欢同盟者，所以他才大声说出不能放弃法国。”

“我明白了，是大公在赶着我们的人往前走了。可是他并没有犯什么实际错误，而是日林斯基犯了错误。他既没有头脑指挥军队，对军队也没有同情心！除了我们自己人，我们会让所有的人送命。只是为了这个日林斯基，我就该猛烈地抨击自己的思想？还有阿尔塔莫诺夫。难道就因为这只公羊跟博布利科瓦娅结婚后有了点儿进步，就该让4万俄国人躺倒吗？”

“但是，”斯韦钦冷静地否定道，“如果你想了解的话，大公的命令是8月1日跨越边境线。而日林斯基却请求延期，他自认为进攻必定会失败。”

“本来就不该搞这种进攻！”沃罗滕采夫的灰眼睛闪着亮光，“就应该有勇气——报告！有勇气——拒绝！”

“得得！好嘛，你的勇气倒是不小……不小啊……”斯韦钦差点儿没笑出声来。

昨天傍晚，沃罗滕采夫在最高统帅走后向亚努什科维奇和丹尼洛夫做了汇

报，不过，只是潦草地报告了一下，所以他们也没有得到详细的情况。他们希望能得到更详尽的报告，可惜死人和被俘的人什么都报告不了了。后来到了夜里，沃罗滕采夫向斯韦钦说出了一切，斯韦钦也给他补充了在大本营所看到的情况。今天一早，在开会前的最后几分钟，又说了些他们这里发生的情况。

"是谁想出封锁空城克尼希斯贝格这个蠢主意的？是日林斯基。第一集团军干什么去了！在这个限期内即便换一种方式，都可能还来得及！我是了解大公的。阿尔塔莫诺夫也不可能对他产生多大影响。但是，他毕竟是个军人。他不可能不被他们报告的详细情况所激怒。"

在作战处，在整个总军需部，乃至整个大本营里，对沃罗滕采夫来说，只有斯韦钦是唯一值得信赖的人，正如他在斯韦钦心目中一样。有裂痕的信任，便不再是信任了。而真正的信任是没有任何隔阂的。

"至尊的大个子，"斯韦钦脱口说道，"大家凭什么有这种信任呢？凭什么相信他能了解所有的情况、掌握所有人的命运、能拯救所有的人呢？就因为他跑遍了整个俄国，因为他建立了一支严明的骑兵队吗？是啊，当然啦，还因为他的个头、模样、声音……可是，在他的脑袋里自己人都算不得什么，随便往哪儿抛……"

"得啦，亚努什科维奇更是个软绵绵的懦夫！他从来都没有打过一场仗，没亲自率领过一个排！还有蠢材丹尼洛夫，怎么没把他清除掉呢？大本营里都塞了些什么人啊？"沃罗滕采夫突然痛苦地大叫起来，"我们跟谁开战呢？"

但是，斯韦钦对沃罗滕采夫的急躁情绪、对他那近乎病态的慷慨激昂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也没有被沃罗滕采夫的慷慨陈词搞糊涂。

"揭示这些对大公没有任何好处，反倒会殃及他的。你在我们这里看到谁用激烈的言辞居高临下地去劝说什么人了？在某种程度上有理有据的论证或条理清晰的公文反倒有可能成功，但是，总体来看呢？把所有的事一下子都抖落出来让大家都知道？绝对不可以。这就像一个旋涡，而且是焦油旋涡。就连圈里的人都不可能走得过去。你听我说，一个小时后你再做生死攸关的抉择吧。当然啦，你免不了要发言。不过，意见可能会不一致。"

“也许你是对的，”沃罗滕采夫说道，他那消瘦生动的脸上却露出一种不肯让步的病态微笑，眉宇间有一块暗红色的斑，“如果你现在就想亲自体验一切，那……就算你也好还是我也好都很理智……不，这种情况在人的一生中太少了，大概也只有一两次吧。我什么也不求，只想把所有的真相告诉他们！我在突破口时曾发过誓：只要我能活着走出去，我就……”

“得，那么你只有自己毁自己了。”

“什么？我自己毁自己？”沃罗滕采夫似笑非笑地说，大公那副轻易就从沙皇那里得到安慰的高兴模样此时仿佛浮现在他的眼前，“谁忍受到最后，谁就必将获救！……以后没再派出团去，而我指挥团指挥得不错。”

斯韦钦比他小两岁，但是，就其性格、明白事理的程度而言，却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比他小：

“是啊，如果你的每一步都不会受到阻碍就好了。可是他们硬是要把一大堆愚蠢的命令推到你的面前，你不是还得执行、还得向士兵传达吗？而且你还会发电报给我斯韦钦上校，恳求说：老兄，救救我们吧，保护保护我们吧！不行，要干，也是要创造性地去干，而不是像搞叛乱似的，并且还得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地去干。你瞧，我一天至少要更正两道愚蠢的命令，力争把它们改得合乎情理一些。某个地方我要证明勇敢的团长是对的，而在另一个地方，我又得设法让工兵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没有一天得闲过。你一起坐下吧，正好还有两道命令你去修改修改，我都已经改了 4 道命令了！跟当权者叫劲儿毫无意义，倒是应该好好修改修改他们的命令才是。无论到哪儿，你都不会比在这里更有用。你会不可思议地走大运。比如，在选择某个策略时，哪怕你只是做了一个小小的注释，大公都会牢记你一辈子的。就算你在大本营，可是一旦他们把你赶到下边去，你就再也不能升迁到这里来了。”

的确如此，就因为有了好感，大公只看了他一眼，便记住他、喜欢上他了。虽说他本人知道现在也没忘了向大公表示自己的谢意。在整个这段历史时期，他都在极力想把大公从这让人无法脱身的柏油状旋涡中拽出来。

而头脑清醒、好嘲笑人的斯韦钦无疑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

“你看你，这么死乞白赖地求你留下，你还是要走。你干吗非要走呢？你不是已经修改了很多处了？很需要这么做吗？”

“我就是因为这个才要走的，免得白费力气。”沃罗滕采夫含糊其辞地推托道。

就是急着想走，这似乎没什么不对的。然而此时此刻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证明离开这里是正确的。

“你相信我好了，要是这纯粹是个军事问题，是策略上的错误，我一定会守口如瓶的。是啊，如果是在别的地方，在其他什么事上，可能还可以稍加修改一下。但是，这已经不是军事问题了，你明白吗？即使他们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也不能容忍。我之所以急着要到前线去作战，是因为我认为军队的命运，战争的胜败，实际上取决于下层群众。但是，上层社会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即认为这些都属于战略战术问题。要忍受到最后！他们开始忍受我们的一切努力，直到最后，甚至连前沿阵地都不去。他们打算再忍受3次、4次甚至5次这样的包围，到那个时候沙皇就会来救他们了！”

他直到最后也没有明说。这不是因为斯韦钦，甚至也不是因为他自己。真的，他就是连沙皇本人都不原谅！连这么让人轻松的自我安慰他都不肯宽恕。

“反正你什么也帮不了忙，”斯韦钦毫不让步地说道，那声音就像从牙齿缝里吹出口哨似的，“你就是打破了脑袋，一切也只能是这样。也许我的话会惹你发火。总之，虽说造反往往是最直接最实在的办法，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证明忍耐的方针是正确的。我跟你说正经的，你别光气势汹汹地坐在这里了，安安静静地干吧。”

“不行，我已经没法安安静静坐在这里干了！”沃罗滕采夫一点儿也没冷静下来，“你瞧，一箭射中了你的胸膛，你怎么就不能忍受呢？……”

斯韦钦不做声了，他转过身来，本能地按住胸部，按在胸前的武装带上。

“连你也知道……就你知道吗？我说，你好像有点大惊小怪。我当时深更半夜披星戴月地到林间空地去查岗，我的命令却不起任何作用。我突然开始怎么也搞不明白了：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不是说在这片林间空地，在这里的包围

圈里，而是……总之，为什么在这场战争中呢?"

"这又怎么样?"

"就是说，我们大家所苦恼的——突然都不是地方了……我们迷路了。不然的话，我们就行动了。"

他撩起制服，露出受伤的肩，诉怨道：

"我自己都无法理解自己：这脑袋是怎么了……裂开了？后来我这么想：我们一辈子学的好像只是怎么打仗，而事实上并不单纯是打仗，要不然怎么忠诚地为俄国效力呢？战争来临了，我们像命中注定似的参战了，只要用得上知识，我们就投入到战争中。但是俄国的利益似乎跟我们身上的这套军服所代表的荣誉不大相符。你想想吧，最终不可避免而且众所周知的战争不就是克里米亚战争吗，就是从那时候起……怎么，你从来也没这样想过吗?"

"如果不是战争，我们又怎么会服役呢?"

"这也正是我想的！捍卫军队要靠一种力量！就是这么回事，我又想起斯托雷平了……"

得，这已经是前言不搭后语了。斯韦钦皱了几下凸出的额头，他得让朋友返回国土去：

"要是让我们再卷入战争，我们又会像现在这样受到攻击。还会因为动员参战而受责难。让步，低头，这是应该的，反正你也不想喂饱德国。"

"不，决不让步!"

"那好吧！……你就念念不忘此事吧。萨姆索诺夫战役无意中给了你一击。不过，请你相信，整个这场战役在这次战争史上也不会比一个事件大多少。他们的脑子里现在根本就没有你的普鲁士，没有你的萨姆索诺夫。此时此刻他们所有的人一门心思只等着占领里沃夫的电报。虽说……"他继续引导着，脸上毫无笑容，他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睛显得十分谨慎地可怕地瞪着前方，"大家都知道鲁兹基这个又笨又马虎的家伙已经摆脱了60万奥地利大军的钳制，平平安安地撤到南方城市去了。他没有消灭奥芬贝格和丹克利这两支军队，而是客客气气地把它们推了出去，也算是一种理论吧……他们还用这个里沃夫掩护了你的

整个萨姆索诺夫集团军，他们将会因此获得勋章。愚人节的钟声在整个俄国上空回响，笼罩着空荡荡的城市。”

但是，除了奈坚堡一带的包围圈，沃罗滕采夫很难搞到有关奥地利前线的任何情况。于是，他口气十分激烈地说道：

“这样更好！我马上就去告诉他们！”

“好啦！我是为你担心！”斯韦钦摇晃着大脑袋说道，“协商时你要不时看看我，然后你再慢慢坐下。你要明白：今天将要决定你一生的命运。你把命运不当一回事，你自己也会不高兴的。”

他们又返回来了，走到了林边上，朝镇子和火车站走去。为了适应严峻的战争环境，大本营就设在森林里，设在安着大轮子的火车上。他们住在车厢里，在旁边的板棚工作。走了不到50步远，他们遇到了几位正向军需部将军的板棚走去的军官。

就在这个时候，司事绕过高级长官待的地方，像只摇摇摆摆的鸭子似的匆匆忙忙地沿着小道走来。布拉戈达廖夫一步不拉地紧跟其后，他一步几乎顶得上司事两步，这是因为布拉戈达廖夫是个天生的直性子，而不是因为他是个军人或是后天培养所致。他一路自由自在地挥舞着胳膊，随意地左顾右盼，仿佛所有的重负都从他肩上卸掉了，也从他的心里卸掉了。他多么需要放松啊，他不受高高在上的大本营的束缚，也不受即将到来的大公的束缚。

沃罗滕采夫激动紧张的情绪好像一下子消失了。他伸出双臂拦住司事。

忧心忡忡的司事还没有来得及行军礼（在大本营里他们谁都知道谁怎么样），不等对方发问，就机灵地先报告道：

“你瞧，我们已经将你们的行动方向、给养全部都抄录下来了。”

“好，好！”沃罗滕采夫放他过去了，自己却满怀喜悦地看着布拉戈达廖夫。

布拉戈达廖夫挺直身板，端端正正地向这两个自己团和别的团的上校行了个礼。不过，他连眼珠都没有转动一下，他毫无向他们领功请赏的表示，却像是在做游戏。

“怎么样，布拉戈达廖夫，去炮队了吗？”

“是的，我已经去炮队了。”布拉戈达廖夫自豪地笑着说。

“看，难道不像个掷弹兵吗？”沃罗滕采夫一边欣赏地打量着布拉戈达廖夫，一边使劲在布拉戈达廖夫胸口上捶了一巴掌，问斯韦钦道，“你去掷弹兵的炮队吧，我已经说妥了。”

“那好吧。”布拉戈达廖夫显得有些无奈的样子，舌头在嘴里滚动着哼了一声。他像想起不该做这种不礼貌的动作似的，忙说道：“太谢谢您了！”他再次表示谢意，似乎还隐隐地笑了一下。

并不是现在这种处境促使他发笑，沃罗滕采夫在乌兹道城下时就见他这么笑过。不过，当时他不是冲着自己的上校，而是冲所有的当官的这样笑：他准确无误地掌握了军人应有的全部表情，而且十分有把握地认为他不会因为做这些表情而改变自己的特征。不过，他说话的腔调却改变了，因为在他看来服兵役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在做游戏。布拉戈达廖夫什么也没有学会，但是他却表现出他好像懂得很多军事科学知识似的。

“要不然你再看看，我就会有一个团了，你不想到我的团来吗？”

“步——兵——团？”布拉戈达廖夫撇着嘴问。

“步兵团。”

布拉戈达廖夫故作思索的样子。

“不——不，”他唱歌似的说，“我还是不想去。”话音刚落，他却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又改口道：“那好吧，我遵命！”

沃罗滕采夫像大人笑话孩子似的笑了起来。他将一只强有力的手放在了布拉戈达廖夫的肩上，压着他那个皱皱巴巴、没有熨平的硬纸板肩章，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无论如何我是决不会命令你来的，布拉戈达廖夫。你不会因为我把你硬从维堡团拽到这大包围圈里来而生气吧？”

“当然不会！”布拉戈达廖夫蹭了一下鼻子，像对自己乡下人说话那样小声地简单答了句。

以前他们有时一起突围，有时一起睡一觉。而现在每个人都要忙着服自己

的兵役，就连交谈的话题也因肩章不同而不同了。不过，这都无所谓了。

沃罗滕采夫觉得嗓子发干，得咽口唾沫润润。

布拉戈达廖夫的土豆形鼻子“啪嗒啪嗒”抽得直响，舌头又在嘴里滚动起来，好像他的舌头特别大似的。

“得，你是知道的……山外有山嘛……到时候还可以……你就好好服你的役吧……争取升到上校职位……”

两个人都笑了。

“……你还是想着留个全身回家吧。”

“你不也是吗！”

沃罗滕采夫摘下帽子。布拉戈达廖夫也突然像想起什么似的将帽子摘下来。天下着蒙蒙细雨，寒冷的风吹透了他们全身。

他们互相吻别，正好都亲在了嘴上。

布拉戈达廖夫的手掌又大又结实。

沃罗滕采夫赶忙飞快地去追赶斯韦钦。

布拉戈达廖夫则去追赶一脸不乐意的“公鸭”司事。

第八十二章

小房子里没有稍大点的屋子，最宽敞的也只能住两个人，窄小的只有坐的地方。而军需官那边却有20间屋，现在已经收拾好的只有3间。

两张不大的桌子摆放在角落里。从一旁看去，最高统帅似乎比所有的人都高些，甚至他坐着的时候都显得比别人高。坐在他身旁的是总跟他形影不离、殷勤关注着他的亲兄弟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大家都知道他对战争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但是他却擅长教堂建筑，而且已经有了多年的实践经验；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他的堂兄彼得·奥尔登堡斯基公爵，他是个脾气十分暴躁的“头脑不清的巴夏[1]”；接下来是特级公爵、总参谋长德米特里·戈利岑，他专管沙皇狩猎用的设备；还有执行任务的将军彼得洛夫-索洛沃夫，他是一个非常亲切的梁赞贵族首领。最高统帅的参谋长亚努什克维奇中将长着一张讨人喜欢的特别机灵的脸，一双灵巧的手压在文件上。长得黑不溜秋的军需官丹尼洛夫中将额头呈直角状，下颚宽阔，目光坚定，毫无犹豫神态。大本营的“值班将军”主管任命和奖赏。靠近另一侧墙，即最高统帅正对面的几张折损的桌子旁坐着西北战线的总司令——骑兵队将军日林斯基。他年近60，长着一张冷酷无情的黄脸，一副冷冰冰的瞧不起人的样子。另外还有在大本营的外交部长、海军部长、军事联络部部长。

不过，有的人却没能坐在桌旁，如作战处的官员以及最高统帅的值班参谋，

---

① 古代土耳其人、埃及人对高级军官和行政长官的称呼。——译者注

还有加尔梅克的诸侯、亚努什克维奇的参谋、日林斯基的参谋等，这些人只能坐在窗户或炉子旁的椅子上，本子垫在膝盖上做记录，其实他们才恰恰应该坐在桌旁以便记录的。

一大早屋子里就生上了炉子，全靠它取暖了。玻璃窗上凝结了越来越多的水珠。屋子里虽说点着灯，却仍旧一片昏暗。

站着太拥挤了，于是大家商量还是都坐着发表意见。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得十分认真，彼此交换交换看法，没有理由要发表演说。

应大公的邀请日林斯基开始发言了。他稍稍抬起发灰的眼皮，无心去看所有在场的人，只是偶尔扫了几个人一眼；他或是眼睛盯着递给他的文件，或是看着大公，说话的语调总是显得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他不愿意让这里的人觉得他是在指责谁；他炒蹦豆似的噼里啪啦一通说，口吻像在教训人，一点也不温和；他的看法似乎跟大公完全相同，连对所有虽然给人带来不快但后果并不算很严重的事件的分析也如同一辙。

第二集团军所遭遇的可悲失败完全是已故的萨姆索诺夫将军的罪过。首先是萨姆索诺夫没有执行前线司令部有关进攻方向的重要指示，关于这点已经做了详细说明。他擅自离开西线，不可容忍地把自己军队的战线拉得过长，延长了军队的行军时间，也就是说延长了军粮的运输路线，更糟糕的是他造成了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之间的空隙，破坏了它们之间的联系。萨姆索诺夫跟一丝不苟的伦南坎普夫不同，他对许多其他命令都采取了一种逃避责任的态度。萨姆索诺夫命令中央集团军从 8 月 14 日到 15 日继续进攻，不管其想法是否合理而言，这一命令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当时他已经知道前头的人已经撤退了。由于萨姆索诺夫在奈坚堡时轻率地下令拆除电话，而使得这个对集团军的错误命令造成的严重后果更加重了。因为这样一来前线司令部就失去了防止军队被敌军击溃的机会：正巧在耽搁了一些时间之后，前线司令部便搞清了事态发展情况，并立即给各军发去了电报，命令撤到原路线。就是因为萨姆索诺夫将军的过错，致使中央集团军没能收到这份电报。

谈到这些时，前线总司令甚至都没有提高嗓门大声谴责，而那些坐在这里

听他说话的人们无疑都觉得整个事情很简单：的的确确都是已故司令铸成的大错。不然的话坐在这里的人的损失就会少些，担忧也会小些。

没有人提出异议，没有人交头接耳，也没有人咳嗽一声。只有苍蝇在生着火的暖融融的屋子里飞来飞去，落在刷得白白的炉筒上和天花板上，黑压压一片。

苍蝇围着沃罗滕采夫打转转，弄得他心烦意乱。在整个俄国乃至整个战火纷飞的欧洲，谁也不像这个“活死尸”那样如此令他痛恨。他痛恨他那副干巴巴的嗓子，痛恨他那张土黄色的、满腮长着经人工修饰的胡子的脸，痛恨他如此傲慢地不许任何人反驳的态度。他痛恨这个人已经不是一天了。此人的迟钝、失策还有忽视总参谋长的存在，这一切就像一条铁链一环扣一环地套在俄国军队的脖子上，致它于死地。他在这里斟词酌句地解释着，不担心有人会反驳，不担心会有其他解释，甚至不怕受到处罚，乃至被撤职。他当然不怕啦，因为马上就会有另一个更好的职位等着他。要知道他在法国盟军面前、在若福尔将军面前履行着一个重要的职责。他巴不得现在就去巴黎接受夫人们的鲜花，到总统府去进早餐。

日林斯基并非不想丢下自己的听众一走了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与胆小的萨姆索诺夫不同，他的许多想法都十分大胆，可偏偏在这个时候，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的联合行动又在马祖尔湖附近重演了！伦南坎普夫为此已经做得很好了，他已经深入到了普鲁士腹地。他得补充第二集团军，再补建一些军团，让舍杰曼朝军事行动开始前所选定的方向前进。

大公挺直腰板坐在那里，显得那么高大，仿佛他每一分钟都在等着演奏国歌似的。

尽管所有重要的事情似乎都已经处理完了，但是丹尼洛夫将军现在却要发表意见了：正如在座所有的人都知道的那样，俄国军队的大战略家是不会不发表意见的。不过，鉴于他的地位，他不会只做个简单发言，而应该显示出他思想的深奥性，并暗示大家一连串令人关注的想法正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脑海里，可是大脑却这么迟钝！思维这么缓慢！思路都给堵死了！也正因此总军需官特别自信地不容别人争辩地说了起来。

的确，完全可以赞同前线总司令在此所讲的意见。但是，必须做个重要的补充。如果像给萨姆索诺夫下达的命令那样第二集团军跨越德国边境还为时尚早，而他正好延缓了执行命令；如果他像指示的那样在马祖尔湖附近打击敌军的翼侧，而他在敌军翼侧向萨姆索诺夫战线展开来时不去等待，那么，毫无疑问他就能战胜惊慌失措的敌军，我们今天也就能庆贺巨大的胜利了。第二集团军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同时也被搞得筋疲力尽，萨姆索诺夫也正为此而不可避免地遭到了谴责：他忽视了军队正常的一日休整，违背了步兵作战条例的规定，即允许部队作战后休整一天。除此之外，可能有人还会提出许多没有多大意义的指责。

总军需官沉默不语了，他这种自我感觉已减轻的傲慢态度反倒更显得妄自尊大。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种非常无奈的神色，脸拉得长长的，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他的两眼发呆，耳朵扁塌塌的，连个形都没有。而胡子却像缠绕的线轴硬撅撅的，显得很多余。你瞧他这副尊容！总军需官似乎已经觉察到自己正面对着一个深藏的秘密，一个他在这里不能说出的秘密，因为会议上要讨论的问题太广泛了。这是一种牺牲精神：他在用自己的双肩承担着这个秘密以及所有复杂的问题，为了以后能像个专家似的搞清所有的问题。因为他是一把锁，是整个战略的关键：比他级别低的军官们不可能像他那样知识渊博，不可能有他那种能力；而亚努什克维奇虽说职位比他高，想法也不错，又有热情，但是却束手无策；还有就是没有多大工作能力的大公们。

这不，自然而然就轮到该最高统帅的参谋长发言了。嘿，你瞧亚努什克维奇正打算放弃这一轮发言呢。这个长着一对黑亮的眼睛、毛茸茸的胡子、脸部浮肿的亚努什克维奇正态度温和得近乎讨好地看着文件。彬彬有礼的亚努什克维奇就像小红帽[1]走在黑暗的大森林里一样，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在一个吉祥的时刻，受心地善良的沙皇之命走上了这个岗位。他觉得自己是个有战略目光、懂得作战艺术的人。但是能占据如此高的地位毕竟也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

① 德国作家格林兄弟所著《格林童话》中《小红帽》的主人公。——译者注

尽管他的心仍在收缩，不过这却是因为快乐而收缩。这会使眼睛蔚蓝、目光拘谨的沙皇感到不快而认定你对一切都一无所知吗？不论亚努什克维奇乘坐着马车还是走在彼得堡皇宫的镶木地板上，他都在一旁想象着并忽惊忽喜地反复念叨：俄国总参谋长亚努什克维奇中将！他在那个位置总共就待了4个月，他的主要努力似乎便是促使这场战争开始，而他原本打算对严酷的战争袖手旁观的，但是军事部部长苏霍姆林诺夫，这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硬是把他推向了最高统帅参谋长的位置，要是他断然拒绝这次毫无疑义的升迁呢？可是他在这里的第一天起就受丹尼洛夫的左右，这里只有丹尼洛夫知道些情况，他还总是不断地用自己的腔调指责亚努什克维奇，为什么参谋长不是丹尼洛夫呢？大概只有亚努什克维奇看明白了在俄国军队中战略家们要比丹尼洛夫更胜任得多，但是丹尼洛夫是苏霍姆林诺夫看中的人，而且当面承认他的声望，答应为他谋到他自己应该获得的所有官衔和勋章。看来，留住丹尼洛夫会更有利些。这就像彼此连接在一起的两条船，他们只能一起渡战争这条河了：亚努什克维奇领导指挥部，丹尼洛夫则负责战略部。

但是每天早晨却要受多少罪啊！摆脱不了进行战略性的交谈，还要装出理解的样子。现在无论如何也要努力振作起来，要沉得住气，这是极其重要的，免得让人觉得你自己好像害怕跌跟头，好像很苦恼，好像压根什么都不懂似的！还说什么反对表面上服从你的肥胖的日林斯基将军，而实际上却是反对前任总参谋长，什么时候你也能在中将堆中崛起，超过任职期限比你长、职位都比你高的人呢？

亚努什克维奇措辞圆滑、腔调谦恭地重复着他前面的人所说的一切，什么也没有补充，什么也没有漏掉，只是挪动了几下位子。

会议所谈的问题越来越清楚了：已故的司令断送了自己的第二集团军，这是很不道德的。为了使自己的心情能轻松些，他辞职了。而其他的将军们任何时候也不会犯类似的错误。

所以会议的气氛显得并不怎么激烈。你瞧，一切似乎都已经完全解决了，其实是所有的问题全都掩饰起来了。

沃罗滕采夫两手抽搐着用铅笔将他们吞吞吐吐挤出来的话记在图囊上放着的一张小纸片上，待将来一有机会就可以用来攻击他们。夜里，他用蘸满墨水的日本自来水笔记下了会议的主要论题，他已经不再记录亚努什克维奇的话，甚至连听都不听了。他合上眼皮，省得看到他们大家的脸。而在他的脑海里却浮现出了萨姆索诺夫那张毫无掩饰的坦诚的脸。不是此时此地，而是在他躺着的那片昏暗无光的林子里；也不是在他与士兵们告别的奥尔劳，而是在奥斯特洛连科。他完全有理由也有权不输掉这场战役的，但是当时在他的脸上却显露出无力自卫的神情。沃罗滕采夫仿佛已经看到了野猪穿过灌木林朝他逼近，野猪冲着卡奇金和奥夫洛西莫维呲牙咧嘴，猛扑到他们肩上。仿佛还看到了布拉戈达廖夫的军刀，就像能开垦出上百俄亩土地的犁铧一样，最后猛地一使劲，军刀的刀刃深深地插入了土里。

沃罗滕采夫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不经允许就要发言。但是邻近坐着的斯韦钦悄悄地狠狠捏了一下他的胳膊，最高统帅没有发现。

大公把一条骑兵特有的细长腿放在另一条腿上，他的腿一点也不打弯，一副傲慢得不可接近的姿态。他的胡子微微上翘着，有时目光穿过整张桌子，落在日林斯基那张有点傻乎乎的铁灰色的脸上。不久前他还亲自授权日林斯基"如果需要的话就撤换萨姆索诺夫"呢。但是昨天和今天他开始看清楚了：日林斯基恐怕会是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现在撤他的职是最高当局最明智的选择，也是对将军最好的教训。可是如果这样做，其结果可能就是：他的职位会降得比日林斯基还低，尽管他本人也乐意解脱。日林斯基会马上匆匆忙忙跑到彼得堡，在上流社会的圈子里絮絮叨叨地诉苦，跟苏霍姆林诺夫两人一起嘀嘀咕咕。在宫廷官员的圈子里所有的矛头都会指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战争进行得不顺利，一是因为他无能，他没有能力担任最高统帅职务；战争要是进行得顺利，又说他功名心太重，他之所以有威望全是仪仗他的皇室家庭。

上帝清楚，他是怜惜军官中的优秀分子，怜惜负担过重的士兵们，他们已经在包围圈里承受了极大的痛苦。虽说有 9 万将士被包围，2 万将士被打死，但终究不是整个俄国。俄国有 1.7 亿人，要拯救整个俄国，就应该不光是打赢前线

的一两场战役，而是首先要打赢更为重要的宫廷战役，赢得沙皇的心，撤掉卑鄙的苏霍姆林诺夫的职；把肮脏的拉斯普京从皇宫里赶出去；削弱皇后的势力。凶狠的日林斯基现在不可能马上预见到这一招，不可能来得及加强他们党派的势力。大公今天应该出于对大俄罗斯的忠诚，抑制住自己内心对小俄罗斯的同情，对这个反正已经覆灭了的萨姆索诺夫军队的同情。

你瞧，真应该让日林斯基发发抖，吓唬吓唬他，应该唆使沃罗滕采夫反对他！大公总是念念不忘沃罗滕采夫，总拿眼睛的余光去瞟他，搞得他似乎都坐不住了。

整个屋子都笼罩在一片阴暗之中。稀稀拉拉的小雨点打在玻璃窗上，室内的光线越来越暗。几盏小电灯打开了，雪白的墙壁显得十分明亮，每个人脸上的细微表情都看得清清楚楚。

这不，大本营的外交部部长也表示要发言了。外交部部长请求将军先生们不要忘记了上层的态度、观点和对国家的责任。法国社会舆论深信俄国会做出巨大贡献。法国政府向我们提交了一份报告，说我们没有派出所有可能有的兵力，我们对东普鲁士的进攻力度不够。根据法国侦察队提供的情报，与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恰恰相反：德国人不是从西线撤走了两个军开向我们，而是从我们这里撤走了两个军开往了西线。法国盟军的确使我们想起了曾经许诺过要坚决进攻……柏林。

出于礼节大家都装作没有听到上层人物的这一令人难堪的许诺，所以直到现在，无论是坐在窗子旁的、靠墙的还是正在看文件的公爵和将军，都没有提到这个许诺。

尽管现在谁也没有说出“进攻柏林”这个字眼，但是对外交部的正义立场以及沙皇的决心却是清清楚楚，即不惜任何代价尽可能快地援救法国盟军！当然，我们的损失令人痛心，可是让盟军避免陷入窘境更为重要。

军事联络部部长也报告说，应该竭尽全力加强反德战线，为此我们要不停地将军队从亚洲边境地带调过来。现在已经有两个高加索军正在开往前线，或

许他们已经下车了；还有 3 个西伯利亚军即将到达。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从精神到物质上为刻不容缓的新一轮进攻做好充分的准备。

于是日林斯基也因此请求与会的诸位对他复述马祖尔湖战役表示赞同。

不仅仅是丢了职务，丢了军队，丢了肩章，甚至连脸皮都丢尽了。整个脸在发烫！撒谎！撒谎！哼，撒谎也总该有个限度吧?！沃罗滕采夫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挣脱斯韦钦紧抓住他胳膊肘的手，忘记今天大家在这里都是坐着说话了，猛地站了起来，结果自己一发怒竟忘了第一句话该说什么了，却听到大公威严的声音：

"我想还是请沃罗滕采夫谈谈自己的看法，他去过第二集团军。"

这时沃罗滕采夫的满腔怒火也似乎烟消云散了，没有发作。一颗充满愤怒的心已经被一个预言或是一个谚语控制住了："受自己的怒火控制的人，必受所有人的控制！"

"我们必须选择了，尊敬的殿下！伦南坎普夫的军队马上就要面临危险了，下场可能比萨姆索诺夫的军队还要糟糕！"

玻璃窗不知怎么地一下子被打破了，寒冷的风突然从缺口处猛刮进来，所有在场的人冻得瑟缩成一团，纷纷站起身来活动手脚，大公也不例外。

然而，沃罗滕采夫的话却一句比一句平静了，他好像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开始发言的："先生们！虽然没有邀请第二集团军的任何人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不过也等于已经邀请了——因为，这几天我都在这里。现在请允许我代表已故的或被俘的人讲讲有关第二集团军的情况。我将以我们已养成的直率、已得到故去的人原谅的直率来讲讲……

"……我这里就是不说将士们的英勇精神，你们也决不会怀疑它的！阿列克谢耶夫、卡巴诺夫、佩尔武申、卡霍夫斯基等几位团长都应该载入史册。如果说有 15000 多人冲出了包围圈，那么首先就应该感谢这些上校上尉们，而不是前线司令部！……德军炮兵队当时并不比我军占据双倍的优势，有时我们的部队在战术上甚至还优胜于他们。比如，在乌兹道战役中维堡团的将士们在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几小时几小时地坚守着阵线；第十五军团在极具优越感的马尔托

斯将军的指挥下——只有进攻！只有成功！集团军战役虽然没有使我们遭受失败，正如大家在这里所说的那样，却使我们遭到了彻底毁灭！”

他的这句话使在场的人都震惊了，整个屋子像炸开了锅！缺口处刮进的风抽打在人们的脸上。

这“毁灭”二字是违背最高统帅的意愿说出来的，尽管他有心向沙皇谢罪，但他决不会在沙皇陛下面前承认“毁灭”。他不承认毁灭，可他也没有出面阻止沃罗滕采夫。外表威严、仪态高贵的大公身体挺拔地坐着，他一脸高傲的神情。

“应该说，我们对此是会有所担心的。俄国的参谋总部经调查德军司令部的情况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俄军总是像第二集团军现在这样进攻，而德军却总是成功地进攻我们的左翼，也就是部署在纳列夫河的军队。正因为此才派萨姆索诺夫将军去……我……在这里听说，所有的罪过全在萨姆索诺夫身上。然而，死去的人是不会提出反驳的。我们谁也用不着去改变什么，这似乎很合适。但是，请你们原谅我的过于自信的预言：我们的惨败还将会重演，我们将要冒着输掉整场战争的危险!!”

屋子里顿时响起一片愤怒的责怪声。日林斯基抬起他那双目光呆滞的眼睛盯着沃罗滕采夫，仿佛在说：真该打断这个不懂礼貌的上校的话，让他坐下才是。

但是，善于不顾情面的最高统帅却连动都没有动弹一下后仰着的头。他仅仅表明他是事态发展的主宰者。

“……为了已故的萨姆索诺夫将军，我还是有责任提出异议。他从土尔克斯坦到别洛斯托克的途中，获得了一份毫无道理的已拟订好的计划，从中得知我军队伍正向马祖尔湖泊群深处一个很显眼的地方挺进。隘口在要塞和湖的边缘。他在给最高统帅的报告中讲了自己对所遭遇的战役的有关看法，并于7月29日把它呈交给了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奥拉诺夫斯基中将！”

“……一天天过去了，他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对他的报告没有任何答复呢？他请求我务必到大本营查明原因。昨天我才知道，大公从来就没有接到过这份报告！”

日林斯基木然地冲沃罗滕采夫呲牙咧嘴。大公仍旧不做声，又一次拖过了

出面干涉的时间。

“有关这个报告我一无所知。”

“阁下，这真是太糟糕了！”沃罗滕采夫似乎很高兴有人提出反驳意见。他转身对日林斯基说道：“也就是说毫无结果，查不出什么真相！如果是这样，那么我请求尽快找到这份报告！”

将军们的脸愤怒得直抖动，大家都很清楚这个鲁莽的家伙所说的结果是什么……在场的所有人都看着最高统帅：真该立即制止这个狂妄的上校才是！

但是大公高大的身躯往人前一站，就使人产生一种威慑感。大公居高临下地看着日林斯基，他那优雅的头如同雕刻的一般。

日林斯基一反常态地语气干巴巴地气愤地反驳道：

“也许是萨姆索诺夫将军把计划拿回去了。”

沃罗滕采夫好像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的：

“不，他没有把计划拿回去，这是毫无疑问的！”说话的同时，他猛地击了一下自己的手掌，两眼不看任何地方任何人，只盯着日林斯基，盯着这个来自奥斯特洛连科、奈坚堡、奥尔劳的天外之人——日林斯基，盯着这个头发灰白、瘦骨嶙峋、像具挺不直腰的活死尸般的死老头。“萨姆索诺夫将军拒绝执行对他的命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正确的。因为前线司令部提出要更深入地包围敌人，而他只是还不够深入罢了！正是由于前线司令部令人费解地坚持抓住马祖尔湖泊群的偏远角落不放，致使我军的战线在相当程度拉长了。”

“这不是什么湖泊群的偏远角落，而是联系各军队的纽带！”日林斯基又被激怒了，打断了对方的话。

这时沃罗滕采夫却已经感觉到了一种默认的妥协了：最高统帅没有打断他的话，在场的其他人也没有附和日林斯基大声说话来反驳他。他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参加这个会议，他决不能白跑这一趟！他感到浑身发冷，头脑却变得更理智了，嘴唇上甚至露出了嘲讽的冷笑。他一句紧接一句地劈头盖脑地向日林斯基砸去，像在做圈套要把日林斯基的思路搅乱一样：

“强行让一支部队去进攻，而让另一支部队休整时，这就谈不上是联系各军

队的纽带了！如果伦南坎普夫将军的5个骑兵师在到达贡比年之后不跑去追击敌人，而在第二集团军遇难的时候不派他们去援救，这也谈不上是联系军队的纽带。前线司令部好像有意不去协调军队的行动，偏偏在一个星期之前就派第一集团军去进攻——为什么？如果军队之间在这里有联系，就该在8月10日把萨姆索诺夫派到伦南坎普夫那里去的舍伊杰曼军收回，14日派他们到华沙一带去，而决定第二集团军会战的这天舍伊杰曼军不该在东普鲁士……"

有关这件事沃罗滕采夫是从哪里知道的呢？这事在大本营已经有过传闻。丹尼洛夫满腹疑惑地看了斯韦钦几眼，不安地说：

"这是一些战略性的想法，第九集团军准备开往柏林……"

"那么，第二集团军就任由狼啃吗？"沃罗滕采夫毫不客气地顶了一句，"……8月15日到底还是派第九集团军去援救第二集团军了，但是前线司令部竟然给军团提供了一个不准确的方向。本应在16日把军团派到了华沙一带，而伦南坎普夫将军却在8月17日把它派往了北线，这也叫军队之间有联系吗？要知道，就是为了两支军队之间的联系，才建立了北线西线。萨姆索诺夫将军曾被指责缺乏果断精神，但是前线司令部却恰恰表现出高层领导的不果断。为了保险起见，居然留下了一半军队在交通线上，在'掩护地带'，而不从比绍弗斯堡撤退，不离开索利道向前推进!!"

沃罗滕采夫一针见血地刺痛了他们，日林斯基怎能不气得胡子翘起来，他们怎能不气得浑身发抖、七窍冒烟？

"那一半军队在哪儿？那一半军队到底在哪儿呢？"屋子里顿时喧哗起来，不光是丹尼洛夫在表示异议，还有他特别喜爱的那个笨拙的家伙——瓦尼卡-卡因上校也在那里提出了异议。

"先生们，你们认为：两个军团——右翼军团和左翼军团以及3个骑兵师，正好是整整一半兵力。而另一半兵力都被萨姆索诺夫调去进攻去夺取胜利了。如果前线司令部要阻止翼侧的行动，那么它就应该调动翼侧去援救中央集团军。不错，萨姆索诺夫将军是犯了错误，但他犯的是军事行动上的错误。而前线司令部犯的应该说是战略上的错误。萨姆索诺夫不具有压倒敌军的优势兵力，而

前线却有，结果战役失败了。应该做出结论了，先生们，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开会？为什么开全体司令部成员会议呢？因为我们不能派出规模更大些的部队了！这就是结论。"

"大公殿下！我请求您立即制止这个上校毫无意义的发言！"日林斯基强烈提出要求，同时用拳头猛击了一下桌子，以显示他并不完全是具"活死尸"。

大公用他那双富有表情的椭圆形的大眼睛冷冷地扫视了在场的人一眼，然后语气坚定但声音不大地说道：

"沃罗滕采夫上校说出了问题所在。我本人也从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东西。我认为大本营，"他看着丹尼洛夫，这位正低垂着自己的牛式额头。而亚努什科维奇的背却敏感地抽搐了一下，"几乎就没有领导这场战役，完全相信了西北战线。"

他的确知道丹尼洛夫的价值！他甚至常常比丹尼洛夫更快地从丹尼洛夫所做的报告中抓住线索。

"……至于上校所说的不够准确的地方，你们可以马上加以纠正。"

日林斯基呼哧带喘地站了起来，他需要出会场方便一下。

最高统帅现在很想知道的就是所提出的论据。发挥这些论据，建立起侦查委员会。日林斯基被耻辱地驱赶出大本营，大本营也就纯洁了，就能避免遭受指责了。

沙皇昨天已经亲自发来了一份表示宽恕的电报，给大公指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即彼此原谅对方，停止互相责备。这不，沙皇提升奥拉诺夫斯基为大将军的命令尽管还没有公布，但已经到达了，事态的发展都有自己的过程，一种不以战役过程为转移的过程，不能扭转它们。

如同尽管有损失但已经越过敌军防御地带的骑兵们一样，现在沃罗滕采夫也有了可以自由驰骋的时间。会议现在才真正开始！

"……不过，我想把问题说得更广些。第二集团军的兵力都用在什么上了？用在征服俄国自己领土上的无路可行的空旷地带吗？早在到达边界之前，在到达与敌军的接壤处之前，他们要有五六个昼夜被困在沙地里！而接下来炮弹、军事装备、给养、储备品统统都扔在了这块空旷地带。为什么？到底因为什么

在战前没有在边境附近安顿好储备品呢?"

亚努什科维奇一副不满的样子,听这个脑瓜子没被打穿的"青年土耳其派"讲话,真让人难受。大公又为什么要让他们受这种痛苦呢?

"当时敌人可能缴获了这些储备品吧。"他咬着掩在毛茸茸的胡须下的嘴唇解释道。

"真是这样吗?"沃罗滕采夫高挑起眉头和颚上的那颗紫红色痣,说道,"难道2万人被打死、7万人受伤的损失比损失一打军需库的东西要强吗?"

他没法不极其厌恶地看着亚努什科维奇,这家伙那娘们儿似的一举一动都表明他是一个冒牌将军,他又怎么可以当最高统帅的参谋长呢?

"军需库没有设在边境附近,"丹尼洛夫深信不疑地坚持说,"是因为我们打算在边境进行自卫,而不是进攻。"

这是对的,但是却一头扎进了仓促改变了的整个作战计划,而且还是由当时的参谋长日林斯基改变的计划。不过,也是由军事部、由沙皇改变的计划,大公也表示了支持。这个时候沃罗滕采夫是不会让自己受迷惑的。但当他正要更加严厉地指责时,日林斯基在门口出现了,并慢腾腾地朝他自己的座位走去。

"……然而重要的是萨姆索诺夫的军队因为什么全军覆没了,他的军队以及整个俄国军队都还没有做好准备,就如此过早地出动。在场的人都很清楚:军事动员前的两个月做好准备的真正意义。至少也需要一个月做准备。"

日林斯基走到自己的座位前,但没有坐下,他说得太激动了!他就这么站着,面对着沃罗滕采夫,拳头击着桌子。沃罗滕采夫则挺着胸,紧张得脸涨得通红,好像跟谁打仗似的劈头盖脑地冲他一通说道:

"……希望做出一个令法国人高兴的轻率的许诺,即只做三两天准备就在动员的第五天开始军事行动,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这种许诺是无知的!它使我们各部队的兵力都投入了缺乏准备的战斗中!"

"大公殿下!"日林斯基大叫了大公一声,"俄国的国家荣誉、沙皇已同意的决定在这里受到了凌辱!根据与法国签订的同盟公约……"

趁从最高统帅那里夺得的最后一秒钟,沃罗滕采夫还是狠狠地冲日林斯基

抛出了一句：

"根据公约俄国答应'给予坚决帮助'，但不是自杀！您签署的是为法国而自杀，殿下！"

大家早把亚努什科维奇忘置脑后了。亚努什科维奇胆怯地低着头。早在4天之前他就想离开西北战线了……

"还有军事部部长！"日林斯基大声喊道。只是因为嗓子上部有些溃烂，所以声音并不很大，"沙皇陛下也表示赞同了！而像您这样的军官在大本营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位！在俄国军队中也没有地位！大公殿下！……"

大公像雕塑似的端端正正地坐着，一条腿放在另一条靠着桌边的腿后。他口气显得十分严厉地对沃罗滕采夫冷冷地说：

"不错，上校，您已经超出所允许的范围了。您是得不到对此的结论的。"

最后的结论被收回了。最后的结论，也许要在军人的整个生涯中去寻找。服从同一个声音是可悲的！明明知道可又不说出来，为什么？……一切都已经失去了，没什么可怕的了，沃罗滕采夫已经摆脱了所有的禁令，他只看到多罗戈布日团的将士们怎么扛着已死的上校、受伤的中尉，只看到谢梅奇金上尉——一个活泼愉快、生性好斗的家伙——带着兹维尼戈罗德团的两个连突围了。这时他情不自禁地冲最高统帅大声说道：

"大公殿下！我也是俄国军队的一名军官，就像您和日林斯基将军一样，我们大家都是这支军队的军官，要对俄国的历史负责。所以不允许我们一场接着一场地输掉战役！否则那些法国人明天就会看不起我们的！……"

大公突然少有地勃然大怒了，一股怒火猛地涌上心头，但是他马上抑制住了自己：

"上——校！请您离开我们的会场！"

而沃罗滕采夫却如释重负，解脱了！炽热的箭头终于从胸口拔掉了。

尽管还带着肉。

他没再说话，而是挺直腰板，两手垂直，一个转身，脚后跟"啪啪"敲击了两下，便朝门口走去。

就在这时一个参谋兴高采烈地从门口迎面而来：

“大公殿下！西南战线来电了！”

电报来了！他们正等着它呢！大公的愁眉顿时舒展开来。他站了起来，其他人也跟着站了起来。

“先生们！圣母没有抛弃我们俄国！里沃夫城已经拿下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应该立即通报！”

19号文件

8月20日电报

陛下，您有幸为鲁兹基将军的军队在里沃夫一带经历了7天的连续作战后所取得的胜利而感到高兴。奥地利人狼狈不堪地撤退了，他们已弃阵逃跑，丢下了所有的轻重型武器，还有炮兵厂和车队。敌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我们缴获了很多俘虏……

最高统帅，总参谋长尼古拉

谎言不是我们编造的，

谎言也不是由我们了结。



上架建议 畅销·长篇小说

ISBN 978-7-5399-3782-3

9 787539 937823 >

定价：98.00元（第一卷1、2、3册）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红轮 第一卷 第三部
作者=（俄）索尔仁尼琴著
页数=992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05
SS号=12655888
DX号=000007621210
url=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7621210&d=D9EBEBAC4D5B7B9F184D70A5757D8E8C&fenlei=0906&sw=%BA%EC%C2%D6+%B5%DA1%BE%ED+%B5%DA3%B2%BF